HZ BOOKS
华章经管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具争议性作品 全球销量超过1000000册

对于每个关注世界经济未来进程的人，这是一本必读的基本著作。
——乔治·索罗斯

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华 章 经 典 · 经 济

Joseph E. Stiglitz



〔美〕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著

李 杨 章添香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这本敏锐、有深刻见解的著作解释了全球经济政策巨大的缺陷。凭借在白宫和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斯蒂格利茨描述了全球化的主要机构对它们为之服务的国家所采取的失败政策，以及为什么会失败。对于每个关注世界经济未来进程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基本著作。

——乔治·索罗斯

容易理解，富感召力，有很高的可读性……对发生在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危机及其他问题提供了权威的见解。

——《纽约时报》

发展和经济学并不是统计问题，而是生活和工作。斯蒂格利茨从来都没有忽略那些处在政策末端的人们。成功的政策应该被定义为：不是如何尽快偿还国际银行的贷款，而是人民有多少食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得到多大的改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无论你的观点是什么，你都会被斯蒂格利茨关于重塑全球化的睿智远见而吸引。如果你关注全球的未来，相信一个由体面工作组成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并希望避免穷人和富人间的冲突，那么这本书就是你的必读之作。

——胡安·索玛维亚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关于全球经济政策制定难题的一次伟大的探索。向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对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很有益处。

——《金融时报》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华章网站 http://www.hzbook.com

网上购书：www.china-pub.com

上架指导：经济学·世界经济
ISBN 978-7-111-29384-2

9 787111 293842

定价：39.00元

全球化及其不满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华章经典 经济

Joseph E. Stiglitz



〔美〕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著

李 杨 章添香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具争议性的出版物之一，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作者用犀利的语言、亲身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关全球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窗户。本书从全球化的视角，既有对东亚危机的剖析，又有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改革的考察，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如果您迷惑于扑朔迷离的经济，如果您对全球化怀有质疑，如果您想揭开国际组织的神秘面纱，请驻足书香，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pyright © 2003 by Joseph E. Stiglitz.

First published as a Norton Paperback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W. W. Norton&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4-23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及其不满/（美）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 E.）著；李杨，章添香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

（华章经典·经济）

书名原文：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SBN 978-7-111-29384-2

Ⅰ. 全…　Ⅱ. ①斯…　②李…　③章…　Ⅲ. 经济一体化－研究　Ⅳ.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5415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章集香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242mm · 16.75 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29384-2

定价：3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88379210；88361066

购书热线：（010）68326294；88379649；68995259

投稿热线：（010）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斯蒂格利茨学术成就和政策实践的杰出结合，使《全球化及其不满》值得一读……他的热情和直率给古板的经济学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商业周刊》

本书为读者解析了治理全球化的指南。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知道如何管理全球化，而且他以朴实、具有吸引力的语言解释了如何管理全球化。

——詹姆斯 K. 加尔布雷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

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波士顿环球报》

这一睿智、具有感召力的研究对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争论具有重要贡献，而且为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挑战的援助国提供了分析模型……热情洋溢、全面、博采众长……一本必读作品。

——《出版者周刊》

为什么对于世界最贫穷的公民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失败？如何建立和管理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对此本书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它非常及时，极具感召力。

——马洛克·布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斯蒂格利茨的言论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大快人心，他用大量的案例证明了他所支持的经济发展政策，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及其政策的缘由进行了控诉，本书可谓是出版业的伟大创举。

——《纽约书评》

一本新鲜、及时的关于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影响政策的著作……斯蒂格利茨为那些从未看穿公共机构性质的人开启了一扇了解它们的窗口。

——《旧金山纪事报》

当我和斯蒂格利茨于1969年在肯尼亚相遇时，他的思想创造力和对发展问题的深度评论深深打动了我。30多年的友谊中，我发现他的观点有趣而深刻。他是现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尼古拉斯·斯特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总裁

斯蒂格利茨……几乎是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民主的政策加深了第三世界贫困的第一人。他是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一位评论家，他宛如一面旗帜，为知识界认识转型经济开创了新局面。

——《国家》杂志

激动人心……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表明他是凯恩斯的合格继承者。

——《独立报》（英国）

中版文序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在本书的中心主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认为全球化（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国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时，全球化可以说是收入巨大增长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崛起应对这样的挑战，它们就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中国已经做到这一点。它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它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而这些外国投资者已经做出了反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它还利用全球化来缩小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的经济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据官方统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了542%，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4.6%。

中国的成功在国际贸易体系（international trading regime）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尽管自己到处宣称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益处，欧洲和美国却仍然通过配额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在本书中，中国在每一主要的议题中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

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上述的每一个例证中，中国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代的政策，这种可供替代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当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着收入下降、贫困激增时，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贫困率也明显下降。当东亚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深重的衰退以及在这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处方的国家出现大萧条时，中国的增长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遵循“华盛顿共识”政策时，它们的增长不过是刚刚超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前增长水平的一半而已。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的收入都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速率在增长。

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此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中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短期内收入的增长，奠定了较长时期的增长基础。他们关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创办企业，而不是仅仅对旧企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此外还存在一种实用主义：个人责任制也许并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欲求的私有化之“纯粹”形式，但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乡镇企业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荐的“纯粹”私有企业，但它们却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激励是有效的，但如果没有正确地设定游戏规则，扭曲的激励就会导致资产的剥夺，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该国）、高利率、法律规则的缺位，以及资本可获得性的缺乏，都意味着剥夺资产比创造财富更加有利可图。

中国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它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比如股票市场）创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将来还会不断有对于诸如竞争性政策、破产法和市场经济所隐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其他方面问题的关注。只要强调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的法律程序，就会出现从“法制”（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的过渡。

中国的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一直强调对发展和转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长极为迅速时，中国也依然关注西部省份、东北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我本人曾经有机会亲眼目睹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某些计划的实施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出现对这些传统价值的歪曲，而我希望本书能够增强中国的决心。

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导致中国城市居民的不断集聚，这就迫切需要确保这些城市是适宜生活和居住的，并且对环境予以特别的关注。成功的发展并不总是要模仿，它涉及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从西方许多失败的城市发展经验中可以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失败包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公共生活福利设施 、没有社区的感受。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许多教训不仅说明“以不变应万变”（one size fits all）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所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策，明显不同于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它们自己追求实施产业化政策，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而却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这样做。它们维护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实现私有化。向别人学习包含着比听取他们所说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仔细观察他们怎么做。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它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强烈地批评国际经济机构，指责它们的不透明和不民主的治理，指责它们不反映发展中世界的观点与关注的利益，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其声音的增强，中国有必要代表发展中国家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同我所强调的那样，政治全球化并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感觉往往停留在某一国家。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角色，不仅表明发展存在着可供替代的选择，也表明存在一种不只是能够把繁荣带给少数人，而且能够把繁荣带给绝大多数公民的战略。但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不能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它可以主张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坚持国际的游戏规则不应当由西方国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所制定，而应当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相一致。

在本书初版后的一年半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从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更多了。我认为，本书已经对转变思想倾向做出了贡献：如今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争论已经明显不同。有一种认识是，虽然全球化可以是（如同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积极的力量，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它还没有发挥其潜能；在许多地方，它实际上已经引发了贫困。

问题并不是人们是否应当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我们应当如何使全球化发生有益的作用，应当如何对国际的游戏规则以及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在某些圈子里，习惯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对全球化感到不悦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它，就像吃药那样痛苦，然而却对他们有益。但是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有过从全球化中撤出的先例——并且如果我们不能使全球化更加有益，就会出现回潮。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一种认识是，他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了过度的限制性，并且亚洲国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过度的财政节俭。在阿根廷的紧急援助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发生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俄罗斯的紧急援助的失败，他们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考察可替代的选择，比如说破产和停滞。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所一直倡导的）是具有误导性的：它既不能提高增长也不能增强稳定性。这就是一种进步，虽然还没有对更加根本性的难题有所作为——比如说与全球储备体系产生联系，或者发展中国家仍然落在后面，承受汇率和利率易变性的冲击。

如今，几乎没有人捍卫过去的不平等贸易协定，包括1994年所达成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新一轮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启动，它被看做是对过去贸易不平衡的矫正，是一轮“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的谈判。但美国和欧洲违背了那一承诺。

值得庆幸的是，在坎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了。它们明白没有协定可以比另外一个协定更好，因为先前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中国必须继续表明它与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休戚与共的，以确保如果有一个新的协定，它就应当反映出发展中世界的关注和利益。这也许会要求中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利益做出牺牲。世界场景正变得足够庞大，它也许能够帮助达成一项交易，以牺牲更加贫穷的国家为代价，实现自身关注的利益。但这将是一种失误，并且将是短视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能够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实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能。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前言

1993 年，我离开了学术界，开始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在从事多年研究和教学后，我第一次进入政策制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政治领域。1997 年，我离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到世界银行任职，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在世界银行，我差不多工作了 3 年，并于 2000 年 1 月离职。这是我进入政策制定领域的最佳时机。我在白宫任职期间，恰逢俄罗斯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又适逢 1997 年爆发并最终笼罩全球的东亚金融危机。我一直对经济发展问题有浓厚的兴趣，我的所见所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全球化和发展的看法。正是因为在世界银行任职时，亲眼目睹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这些国家的穷人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我才撰写本书。我相信，全球化——取消自由贸易的壁垒以及国民经济更紧密的一体化——可以成为一种一劳永逸的力量，并且它具备使世界上每个人（尤其是穷人）都富裕的潜力。但我也深信，要实现这种目标，我们就需要对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已在取消贸易壁垒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国际贸易协定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作为一名教授，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和思考我在华盛顿工作 7 年间所处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相信，在做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这一决定之前，以冷静的方式来审视问题，抛开意识形态并

且重视事实非常重要。不幸的是，无论是在白宫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由总统指定3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向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提供经济建议），还是后来在世界银行工作，我都发现，组织往往是按意识形态和政治来制定政策的（虽然并不令人惊讶）。结果，它们采取了很多执迷不悟的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并没有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但却符合那些掌权者的利益和信仰。法国知名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基于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写出了政治家需要表现得更像学者并且要致力于科学辩论。可惜的是，当参与制定建议的学术界变得政治化并开始歪曲事实以迎合那些掌权者的想法时，经常也会发生相反的事情。

虽然我的学术生涯并没有为我在华盛顿特区遭遇的所有事情做好准备，但至少它为我做好了专业方面的准备。在到白宫任职之前，我主要从事抽象数理经济学（有助于形成经济学的分支，此后一直被称为信息经济学）和更实用的学科（包括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我花了25年以上的时间撰写诸如破产、公司治理、信息公开和准入（经济学家称之为透明度）等主题的文章。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些问题都成为核心议题。我也花费近20年讨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议题。在如何处理这些转型的问题上，我的经历始于1980年，当时我第一次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而那时中国正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进。我强力提倡中国采取渐进政策，过去20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些政策的价值；并且，我曾经强力批判那些过激的改革政策，比如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已经明显失败的“休克疗法”。

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得更远——从1969～1971年在肯尼亚进行学术宣讲，也就是肯尼亚于1963年独立后不久，我就开始了对其的探索之旅。在肯尼亚的所见所闻，对我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工作都有所启发。我知道，肯尼亚面临着非常艰巨的挑战，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事情，以改善肯尼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数十亿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民的生活。虽然经济学看似是一门枯燥而深奥的学科，但实际上，好的经济政策具有改变穷人生活的力量。我相信政

⊖ 布迪厄（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英国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傅柯、巴特、拉岗等比肩的思想家；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价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译者注

府需要——而且能够——采纳那些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经济增长，而且也能保证该经济增长的利益被更公平地分享的政策。拿私有化这个议题来说，只有当私有化（也就是向私有公司廉价卖清政府垄断）有助于公司变得更有效而且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低的商品时，我才信任它。如果是竞争性的市场，相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我之所以支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世界银行还是在白宫，我所提倡的政策与我早先进行的大量经济学理论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工作很多都与市场不完善相关——假设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简单模型认为市场能够完善地运行，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我借鉴了信息经济学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即工人与雇主之间、贷款者与借款者之间、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匹配）的研究成果。几乎所有的经济体中都普遍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对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为更现实的劳工和金融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例如，它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失业，为什么那些最需要贷款的人却时常不能获得贷款——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存在贷款分配问题。几代经济学家运用的标准模型认为，要么市场能够完善地运行，要么失业（一些人甚至拒绝承认存在真实的失业）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工资太高，而且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降低工资。基于对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市场更好的分析，信息经济学能够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对失业问题提供了更真知灼见的解释，也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波动、衰退和萧条等现象。这些理论具有强大的政策暗示作用——几乎对任何一个感受真实世界的人来说，其中的一些暗示都更加明显。例如，如果将利率提高到过高的水平，那些深度负债的企业将会被迫陷入破产，对经济来说这很糟糕。虽然我认为这些暗示作用很强，但这些政策规定与那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坚持的政策却背道而驰。

由于建立在市场本身能够实现有效的产出这一过时的假设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没能考虑市场中适当的政府干预，而政府的干预措施能够引导经济增长并使每个人的情况都变得更好。所以，在以下的篇幅中所探讨的很多议题都是有关观念的，以及从这些观念中衍生出的“政府作用”这一概念。

虽然这些观念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在发展、管理危机和转型中都具有重要

作用，但它们也使我考虑改革那些被假定用以驱动经济发展、管理危机和经济转型的国际机构的核心问题。对信息的研究使我对缺乏信息的后果特别敏感。我非常欣喜地看到，1997～199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也对这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虚伪感到悲哀，它们在东亚强调透明度，但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它们也是我遇到的最不透明的机构。因此，在改革的讨论中，我强调增强透明度、提高公民知晓这些机构在做什么的知情权、允许那些受政策影响的人们在这些政策形成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对政治机构中信息作用的分析非常自然地由我早期关于经济学中信息作用的工作演化而来。

到华盛顿工作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我不仅获得更好的机会能充分了解政府如何运作，并且有机会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提供前景。例如，作为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试图提出一个经济政策和哲学体系，该体系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互补充，政府和市场能够相互合作运行，并且认识到当市场处于经济中心时，政府将会发挥重要（如果是有限的话）作用。我已对市场和政府的失灵进行了研究，因此，不会如此幼稚地认为政府能够弥补任何一项市场失灵；同样也不会如此愚蠢地相信市场本身能够解决每个社会问题。政府必须在不公平、失业、污染等所有问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曾为发动“彻底改造政府”——使政府更加有效而且反应更迅速——而工作，我发现政府无效且反应滞后。我知晓改革是多么困难，但同时也看到对政府进行适度的改进是有可能的。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曾希望在发展中世界面临的更加复杂的问题中能够引入平衡的观点和已经吸取的教训。

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我非常享受这种政治辩论，虽然某些辩论取得了胜利，但在另外一些辩论中我却失败了。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我不仅能够很好地观察这些辩论，而且能够看到如何解决这些争论。在涉及经济领域的争论时，我也会参与其中。我知道观点至关紧要，在政治中也是如此。我的职责之一就是说服其他人同意我所提倡的不仅是好的经济学，而且也是好的政治学。但当到国际舞台时，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发现二者都不能决定政策形成。这些政策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糟糕的经济学而制定的，一些教条有时候看起来

似乎笼罩着某些特殊利益。在遭受危机打击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不合时宜地规定是否采取“标准”的解决方案，而不会考虑这些政策对那些被告之要遵循其政策的人民带来何种影响。我很少看到预测这些政策将会对贫困产生何种影响的文章，也很少看到全面考虑和分析替代政策的后果。在这里，只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可能去寻找替代的观点，也根本不存在鼓励公开、直率的讨论空间。意识形态指导了政策解决方案，这些国家都被期望毫无争议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方针。

这些态度令人生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造成贫穷，同时也因为它们是反民主的。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曾在没有寻找替代的建议时而盲目遵循某些观点。但现实情况是整个世界都被引导着这样做。发展中国家面临十分困难的问题，而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处于最糟糕的情况，它们才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常常并不成功，其失败的情况甚至要比其有效的情况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政策——它们被设计用来帮助某个国家调节危机和更长久的不平衡——在很多国家中造成饥荒和暴乱；即使结果并不是如此可怕，即使当它们暂时成功地弥补了一些增长的不足，但通常的情况往往是，增长的利益会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富裕阶层，从而造成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有时会面临更严重的贫困。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当权者并没有怀疑这些政策，那些决定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也没有怀疑这些政策；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很多人如此担心他们可能会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因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进行资助，其他机构也会对其施援），以至于最谨慎地表达出他们的疑问（如果有的话），并且只是私下的表达。虽然没有人对遭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造成的痛苦表示高兴，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他们却认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任何苦难都是其走向成功的市场经济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并且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从根本上降低了这些国家在长期内将要面对的痛苦。

毫无疑问，有些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但据我判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经济机构所主导的全球化和发展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痛苦远远

超过其应该承担的程度。激烈抗议全球化不仅使人觉察到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而且让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不平等也有所认知。如今，除了那些既定利益者，很少有人能够因将贫穷国家生产的产品拒之门外而获益。强迫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货物开放市场，但发达国家却依然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这种虚伪的、假装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这会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对此，愤怒将不断增加。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野蛮攻击行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整体来看，一个全球性机构像其他所有机构一样，需要遵循某些规则，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生存。因此，政策的结果必须是公平公正的，而且我们需要看到结果是公平公正的。我们必须像关注权力一样适当地关注穷人，必须反映出对正派和社会正义的基本认识。在目前的世界中，这些规则必须通过民主进程加以实现；管理机构和权威部门的工作规则必须要保证他们会注意和反映所有受到政策和决策影响的人们的要求和需要，这些政策和决策往往依据偏远地区的情况而定。

我是基于自己的经历撰写本书的，因此，不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有很多脚注和引用。实际上，我尝试着描述我所看到的事情，并且讲述我所听到的故事。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不会找到铁的证据，证明华尔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接管世界这一可怕的阴谋。我不相信存在这样的阴谋。证据是很微妙的也是不显著的，它经常表现为些微的言论，或者是在将大门紧闭后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记载讨论结果的备忘录。很多我所批评的人可能会说我把事情弄错了，甚至他们可能拿出证据表明我的观点和所发生的事情相矛盾。再次强调，在本书中，我只是解释我的所见所闻。

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开始刻意用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发展议题和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关于改革国际经济机构的争论（管理国际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体系）以及为使全球化更加人性化、更有效和更公平同样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我访问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并向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学术界学者、发展工作者、非政府组织的人们、银行家、商人、学生、政治活动家、农场主等演讲。我访问了

棉兰老岛，艰难跋涉穿越喜马拉雅山看到了不丹偏僻的学校、尼泊尔的农村灌溉项目，领略了孟加拉国动员女性农村信贷计划的影响，并且目击了中国部分最贫困山区的农村降低贫困项目的效果。我看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并且从中获益颇多。在本书中，我试图摘取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学到的最本质的内容，并将其表述出来。

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对我的著作进行公开辩论，这场辩论不仅要在政府和国际组织关着门进行，也要在更为开放的大学环境中进行。那些生活受到全球化管理政策影响的人们有权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并且他们有权知道这样的决策在过去是如何做出的。至少，本书应该提供更多的过去 10 年来发生的信息。只有更多的信息才能制定更好的政策，并且，更好的政策将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如果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会觉得自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致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在此，无法将其一一列出；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世界银行总裁吉姆·沃尔芬森提供机会使我能够为美国和发展中世界的人们服务；另外，他们还给予我机会一瞥如何制定影响我们生活所有方面的决策，对于学者来说，这种机会相对较少。我要感谢世界银行的几百名同事，因为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不仅就本书所讨论的议题展开了富有活力的讨论，而且他们还与我分享了他们在此领域中多年积累的经验。此外，他们还帮我安排了许多访问，正是在这些访问中，我产生了对发展中国家所发生事情的独特认识。我小心翼翼地挑选出每个人，唯恐忘了其他人；但如果没有答谢与我工作最紧密的那些人，那就是我的失误了，这些人包括 Masood Ahmed、Lucie Albert、Amar Bhattacharya、Francois Bourgignon、Gerard Caprio、Ajay Chhibber、Uri Dadush、Carl Dahlman、Bill Easterly、Giovanni Ferri、Coralie Gevers、Noemi Giszpenc、Maria Ionata、Roumeen Islam、Anupam Khanna、Lawrence MacDonald、Ngozi Ojonjo-Iweala、Guillermo Perry、Boris Pleskovic、Jo Ritzen、Halsey Rogers、Lyn Squire、Vinod Thomas、Maya Tudor、Mike Walton、Shahid Yusuf 和 Hassan Zaman。

我还需要感谢世界银行的其他同事：Martha Ainsworth、Myrna Alexander、Shaida Badiee、Stijn Claessens、Paul Collier、Kemal Dervis、Dennis de Tray、Shanta Devarajan 、Ishac Diwan、David Dollar、Mark

Dutz、Alan Gelb 、Isabel Guerrero、Cheryl Gray、Robert Holzman、Ishrat Husain、Greg Ingram、Manny Jimenez、Mats Karlsson、Danny Kaufman、Ioannis Kessides、Homi Kharas、Aart Kray、Sarwar Lateef 、Danny Leipziger、Brian Levy、Johannes Linn、Oey Astra Messook、Jean-Claude Milleron、Pradeep Mitra 、Mustapha Nabli、Gobind Nankani、John Nellis、Akbar Noman、Fayez Omar、John Page、Guy Pfeffermann、Ray Rist、Christof Ruehl、Jessica Seddon、Marcelo Selowski、Jean Michel Severino、Ibrahim Shihata、Sergio Shmuckler、Andres Solimano、Eric Swanson、Marilou Uy、Tara Viswanath、Debbie Wetzel、David Wheeler 和 Roberto Zagha。

另外，我还要感谢很多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人士，我曾与他们探讨这里所反思的很多议题，这些人包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的 Rubens Ricuper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的 Marc Malloch Brown；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 Enrique Iglesias 、Nancy Birdsall 和 Ricardo Haussman；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前行长 Jacques de Larosière，其他联合国地区性代表处人员及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的职员。几乎同世界银行的同事一样，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从本书以下的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我常常不赞成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以及他们做事的方式，但从他们身上以及在与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中我学到了很多，尽管在这些讨论中，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这里，也做出澄清，虽然我非常严厉地批判他们，但是我很欣赏他们投入的艰苦工作、他们艰难的工作环境以及他们愿意在个人层面而不是正式层面开展更为开放、自由的讨论。

我还应当感谢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这些发展中国家既有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也有像乌干达和玻利维亚这样的小国。这些官员，不仅包括总理和政府领导人，也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教育部长和其他内阁成员等，他们愿意花时间和我讨论对自己所在国家的看法，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挫折。在长时间的会见中，我们经常倾心交谈。他们中的很多人，比如说捷克前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对我的很多观点并不赞同，但在与他的交谈中，

我受益匪浅。其他人，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任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Andrei Illarionov）和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劳特科（Grzegorz W. Kolodko）、埃塞俄比亚总理麦乐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及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Yoweri Museveni）对我的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看法表示赞同。国际经济组织中有些给予我帮助的人希望我不要提及他们，对此我尊重他们的选择。

虽然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与政府官员们讨论，但我仍然有机会与大批商人会谈，他们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描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且对各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解释。尽管感到难以从中挑选出任何个人来表达我的感谢，但我还是应当提及霍华德·戈登（Howard Golden）先生，他对自己在诸多国家所积累的经验进行的详尽描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作为一名学者，我有进入所访国家的渠道，因此能够以并非由“官方立场”所指定的视角来观察问题。本书的出版应归功于全球化的网络——这是全球化较健康的方面之一。我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刘遵义[⊖]，他当时是亚太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青木昌彦（Masa Aoki），目前是日本经济与国际贸易部的研究主任，另外还有钱颖一。不仅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他们对亚洲的见解，而且还感谢他们为经济打开了多扇门。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学术界的同事及我以前的学生，例如韩国的 Jungyoll Yun、印度的 Mrinal Datta Chaudhuri、马来西亚的 K. S. Jomo、中国的林毅夫和泰国的 Amar Siamwalla 都曾帮我观察和理解他们的国家。

在世界银行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历了狂热的工作之后，我开始了具有更多沉思的研究和教学时期。我深切感激布鲁金斯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在这些机构中我的同事和学生，我曾与他们就本书所包含的观点进行有价值的讨论；同时也感谢我的合作者 Ann Florini 和 Tim Kessler，他们与我一起创立了“政策对话倡议”，起初以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中心，目前位于哥伦比亚大学校内（网址为：www. gsb. edu/ipd），以促进我

⊖ Larry Lau，1992～1996 年担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1997 年开始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译者注

在本书中所呼吁的对可替代政策进行有学识的民主讨论。在此期间，福特、麦克阿瑟、洛克菲勒等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机构也为我提供了资助。

虽然本书的撰写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自己的经历，但与此同时，通过我的同事，也通过一些记者，这些经历被放大了。在本书中，我希望能够在公开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这一主题中产生一些共鸣：之所以产生我所描述的许多问题，是因为有很多问题都是关着门进行的。我一直相信，新闻的活跃和自由是对权力滥用的限制，也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我经常接触的许多记者都致力于这一使命。在我向他们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需要感谢的人很多，这里冒昧地只列出几个人：在本书有关俄罗斯的那一章，Chrystia Freeland 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关于东亚经验方面，Paul Blustein 和 Mark Clifford 为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

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鉴于大量的见解和信息以及这里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吸引力，我本可以写几卷书。但不幸的是，这正是我撰写本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我不得不将本应撰写几卷书的资料压缩成更简短的叙述。尽管我认为同样重要，但我不得不舍弃某些想法，并且跳过某些限定条件。我已习惯于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另一种是简洁的通俗演讲。对于我来说，本书代表着一种新的类型。如果没有 Anya Schiffrin 不辞辛劳的努力，本书可能不会如期出版。在本书的撰写和修订过程中，Anya Schiffrin 花几个月的时间与我一起工作，帮助我进行那些艰难的选择，这个过程有时看起来很痛苦。担任我的编辑有 20 年的 Darke McFeely，自始至终地鼓励和支持我。Sarah Stewart 的编辑工作很出色，Jim Wade 不知疲倦地对最后的手稿进行了整体的加工，Eve Lazovitz 在若干关键阶段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Nadia Roumani 多年来一直堪称我的左膀右臂，作为一位女性，没有她我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Sergio Godoy 和 Monica Fuentes 不辞辛劳地认真核查事实并且寻找到我所需要的统计数据。Leah Brooks 在最初的草稿中给予我大量的帮助。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助理 Niny Khor 和 Ravi Singh 在校稿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书建立在大量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其中既有我自己的研究，也有与一大批合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这些合作者人数众多，难以一一提及。我也从那些与遍布世界的同事们所进行的难以计数的讨论中受益甚多。这里，我应当提及伦敦经济学院的 Robert Wade 教授，他曾经是世界银行的职员，在国际经济机构一般问题以及本书所涉及的特定主题（比如说东亚和埃塞俄比亚）方面都撰写了很多具有见解性的文章。向市场经济转型已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过去 15 年里非常感兴趣的科目。尤其从雅诺什·科尔泰（Janos Kornai）的见解中，我获益良多。我还应当提及另外四位学者：Peter Murrell、Jan Svejnar、Marshall Goldman 和 Gerard Roland。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公开辩论的价值；我有时可能并不同意某些人的观点，尤其是 Richard Layard、Jeff Sachs、Anders Aslund 和 Andrei Shleifer，但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以及从阅读他们对于某些事件的阐释中学到很多。另外，在与一大批转型经济学家讨论中我受益颇多，这些经济学家主要有俄罗斯的 Oleg Bogomolov 和 Stanislav Menshikov。

Steve Lewis、Peter Eigen 和 Charles Harvey 根据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向我提供了有关博茨瓦纳的见解；Charles Harvey 就第 2 章的内容为我提供了详尽的评论。过去若干年来，与 Nick Stern（担任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之后，他接替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Partha Dasgupta、Ravi Kanbur（他负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贫困问题的《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这是在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发起的）、Avi Braverman（他曾长期担任世界银行的研究员，如今是 Ben - Gurion 大学的校长）、Karla Hoff、Rąaj Sah、David Bevan、Mark Gersovitz、David Newbery、Jim Mirrlees、Amartya Sen 和 David Ellerman 的共同工作和讨论对我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要感谢 Andy Weiss，他在转型问题方面切合实际的见解、对私有化后果的经验分析以及对资本市场不完善更全面的见解使我受益匪浅。早期，我主要和 Marilou Uy 共同完成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的研究工作，其他参与人还有 Howard Pack、Nancy Birdsall、Danny Leipziger 和 Kevin Murdoch，他们向我阐述对东亚地区的看法，在处理爆发的危机时，这些看法使我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我要特别感谢 Jason Furman，他曾与我共同在白宫和世界银行工作，他的所有工作，尤其是关于东亚和对“华盛顿共识”批判

方面的工作，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也要感谢 Hal Varian，他对本书的书名提出了建议。任何阅读本书的读者都会清楚地看到与不完全信息和市场相关的理念的影响，我相信，这也是理解任何市场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中心环节。与 Carl Shapiro、Michael Rothschild、Sandy Grossman、Steve Salop 和 Richard Arnott 的共同工作对于提供有关失业、资本市场不完善、竞争的局限以及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和局限性等方面的见解很有帮助。在致谢即将结束时，需要提及 Bruce Greenwald，20 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合作者和好友。

目录

华章经典·经济
HUA ZHANG CLASSIC
ECONOMICS

中文版序

前言

致谢

第 1 章　全球机构的承诺　1

第 2 章　未兑现的承诺　18

第 3 章　自由选择　46

第 4 章　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将世界带到崩溃的边缘　77

第 5 章　谁失去了俄罗斯　115

第 6 章　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和其他危害　143

第 7 章　建立市场经济的颇佳之路　154

第 8 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议程　167

第 9 章　未来之路　184

后记　216

注释　221

译者后记　239

第 1 章

全球机构的承诺

如今，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代表性不明确的国际官员到处受到攻击。以往，当这些技术官僚召开会议讨论诸如优惠贷款和贸易配额等世界性议题时，外界的反应非常平静；而如今，昔日的平静已演变成激烈的巷战和规模庞大的示威游行。1999 年，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西雅图会议遭到反对者的抗议，这令人非常震惊。也就是从这时起，反全球化运动越来越激烈，而且愤怒的情绪不断蔓延。事实上，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y Fund，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会出现冲突和骚乱。2001 年，在热那亚，一位抗议者在抗议运动中丧生，正是从这时起，反全球化战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阵亡。

对全球化机构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进行抗议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十年来，如果能够证明对发展中国家强加的严厉方案过于苛刻的话，这些发展中世界的人民就会对其进行抗议。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抗议活动长期不为西方世界所知。而目前，在发达国家也会发生这些抗议活动，这着实新鲜。

以前，只有少数人对诸如结构调整贷款（为帮助某些国家适应和应对危机而制定的方案）和香蕉配额（一些欧洲国家对它们前殖民地以外的国家强制实施的香蕉进口限制）等议题感兴趣。而现在，即便是一个仅有 16 岁的市郊小伙子都对诸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Tariffs and Trade，GAT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等深奥的条款有深

⊖ 1992 年，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三国间签署的允许货物、服务和投资但不包括劳动力在三国间自由流动的协定。

刻的见解。抗议活动引起了当权者的深思，甚至像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这样的保守政客都表示，对于那些最需要全球化承诺利益的人来说，全球化并不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1]似乎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明显，一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几乎在一夜之间，全球化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议题，无论是会议室、报刊专栏，还是学校，世界各个地方好像都在讨论它。

全球化力量曾经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具有争议呢？很多国家在对外开放贸易时，其经济发展速度比不开放时的发展速度更快。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由出口驱动时，国际贸易有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出口增长是使许多亚洲国家富裕以及数以百万人经济状况改善的核心所在。因为全球化，世界上许多人的寿命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其生活质量比以前更好。西方世界的人民可能认为在耐克低薪工作是一种剥削，但对于许多发展中世界的人民来说，在工厂里工作是比待在农村种植水稻更好的选择。

全球化降低了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那种被隔离的感觉，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识的机会，这种机会甚至好于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所能达到的程度。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那些通过互联网通信进行的联系，给国际社会造成较大的压力。反全球化抗议本身就是这种全球连通性的结果，虽然有许多政府强烈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国际地雷公约》[㊀]。1997 年，121 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该公约降低了儿童和其他无辜者因地雷而受伤的可能性。与此类似，一些组织有序的公共压力迫使国际社会豁免了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虽然全球化存在很多负面影响，但它同时也能使人受益。1992 年，牙买加向美国开放了牛奶市场，虽然这可能会对当地奶制品生产者带来不利的影响，但它同时意味着一些贫穷的孩子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牛奶。新的外国企业可能会对受保护的国有企业造成伤害，但同时也能够引进新技术、进入新市场和创建新的企业。

作为全球化世界的另一面，虽然对外援助存在诸多缺陷，但还是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了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是在未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实现的：菲律

㊀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又称《渥太华公约》。——译者注

宾游击队放下武器后，世界银行对其进行资助，为其提供就业机会；灌溉项目的实施使得那些幸运的农民因其农田得到灌溉而收入翻番；教育项目使农村地区的人们都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在一些国家，艾滋病项目有助于控制这一致命疾病的传播。

很多人诋毁全球化是因为他们常常忽视了全球化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全球化的提倡者们认为它的好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对这些提倡者来说，全球化（通常与接受已取得胜利的美国式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进步；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有效地实现增长和与贫困斗争，就必须接受全球化。但是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并没有为其带来它承诺的经济利益。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使得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赤贫之中，他们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 1 美元。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不断地承诺要降低贫困，但是，贫困人口的实际数目增加了近 1 亿。[2]而与此同时，世界总收入却以年均 2.5% 的速度保持增长。

在非洲，随着殖民地的独立，人们对其抱有较高的期望，但最终这些期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实现。相反，随着收入减少以及生活标准的不断下滑，非洲大陆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过去几十年间在预期寿命方面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也开始呈现下滑趋势。虽然艾滋病的肆虐是预期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贫困也是其原因之一。即使是那些放弃了计划经济的非洲国家，在成功地组建了相对诚实的政府、平衡了他们的财政预算、将通货膨胀降低到合适的水平后，却依然无法吸引私有投资者。如果没有这些私有投资，它们将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如果说全球化并没能在降低贫困方面取得成功，同样，它也没能成功地维持稳定。亚洲和拉美爆发的危机威胁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稳定。对金融危机蔓延的恐惧波及全世界，新兴市场国家通货的崩溃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也会随之下跌。1997 年和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一度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威胁。

在俄罗斯和其他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中，全球化和实行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其带来预期的效果。西方人告诉这些国家，新的经济体系将会给它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繁荣。实际正好相反，新的经济体系给它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贫困：在许多方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比他们预计的情况还要糟糕。将由国际经济组织策划的俄罗斯经济转型和由中国人自己策划的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199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60%，而到 20 世纪末期，这个数字正好相反，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0%。与此同时，俄罗斯的贫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增长，而中国的贫困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降。

全球化的批评者谴责西方国家的虚伪，这些批评者是正确的。西方国家迫使贫穷国家取消贸易壁垒，但它们却保持自己的贸易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向它们出口农产品，并因此剥夺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出口收入。当然，这其中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这正是我极为关注的问题。在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就与前任主席在委员会中形成两派，强烈地反对这一虚伪做法。这种虚伪做法不仅伤害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使美国人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作为消费者，他们需要为购买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时作为纳税人，他们需要负担巨额的农业补贴。我的这些斗争大部分都是徒劳的。特殊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处于绝对优势——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结局。

但是，甚至还没有对这些虚伪行为具有获罪感，西方国家就开始了推动全球化议程，以发展中世界的损失来确保它们自己能够获得不均衡的利益。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仅拒绝向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开放市场——比如，从纺织品到糖等许多货物都保持其配额，同时还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富裕国家开放市场；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仅继续对农产品进行补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更难以与其竞争，同时坚持要求发展中国家削减其对工业产品的补贴。看看“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其生产产品所获得的价格——在 1995 年最后一个（第八个）贸易协定之后的情况，对于一些最贫穷国家来说，相对于为其进口所支付的价格，其净效益是降低了它们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

价格。[⊖]结果，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的情况的确变得更糟。

西方银行受益于拉美和亚洲宽松的资本市场控制，但是这些地区却因为这些投机性热钱（它们往往是在一夜间流入和流出某个国家的资金，经常押宝似的赌某种通货是升值还是贬值）突然涌入某些国家后突然回流而遭受损失。资金的突然流出将会造成通货的崩溃，从而削弱了银行体系。乌拉圭回合同样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医药公司现在可以阻止印度和巴西医药公司“剽窃”它们的知识产权。但是发展中世界的医药公司正在为其国民生产他们能够消费得起的救命药，这些药的价格仅相当于西方医药公司出售价格的一小部分。因此，可以说乌拉圭回合所做出的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西方医药公司不断发展，提倡者宣称知识产权保护将为这些医药公司提供创新的动力；但是，在发展中世界，由于很少人能够买得起这些药品，因此销售利润的增长将会很少，进而使得激励效益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个人不能持续支付如此高的医药费用，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无力购买如此昂贵的救命药而被判了死刑。就拿艾滋病来说，由于国际义愤非常强烈，以至于医药公司最终不得不放弃以前的主张，甚至同意降低医药价格，并于 2001 年下半年开始以成本价格销售其药品。但这里依然存在潜在的问题——乌拉圭回合谈判所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不平衡的，它压倒性地反映了生产者的利益和观点，而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和看法，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况都一样。

不仅是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各个方面看起来都是好心办坏事。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当那些由西方推荐、向西方委员会咨询后设计并由世界银行或其他国际组织资助的方案失败时，除非存在一定的债务减免形式，否则，发展中世界的贫穷人民依然还需还清贷款。

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全球化的利益并没有其提倡者描述得那么多的话，由

⊖ 第八个协定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该谈判被称为乌拉圭回合是因为它于 1986 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开始的。此回合谈判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在马拉喀什结束，当时 117 个国家加入了这一贸易自由化协定。该协定最终由美国总统克林顿于 1994 年 12 月 8 日签署。世界贸易组织（WTO）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运作，到 1995 年 7 月已有超过 100 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该协定有一条规定了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

于环境的破坏、政治程序的腐败以及较快的转变进程没有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足够的文化适应时间，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金融危机在造成大量失业后，又会反过来带来长期的社会分裂问题，从拉美的城市暴乱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种族冲突等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实，这些都不是新问题——但在全球范围内，那些驱动全球化的政策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这的确是一项重大改变。几十年来，西方人几乎不了解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危机。当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看到金融危机变得更加频繁并且贫困人口数目不断增加时，他们知道一定是哪儿出了错。但他们并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些规则，或者影响制定这些规则的国际金融机构。那些评估民主进程的人看到了“制约性”——那些由国际金融机构强制性规定的、作为对其提供援助进行回报的条件——是如何破坏一个国家主权的。但是直到出现抗议者，才出现一丝改变的希望和释放抱怨的机会。一些抗议者走向极端；一些抗议者赞同针对发展中国家较高的保护主义壁垒将会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变得更糟。但抛开这些问题，正是贸易联合主义者、学者和环境主义者（他们都是普通公民）在布拉格、西雅图、华盛顿、热那亚等地的街道上进行游行，也正是他们提出要对发达世界的议程进行改革。

抗议者与美国财政部长及大部分发达工业国家的财政部长和贸易部长们看待全球化的眼光不同，他们的观点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怀疑抗议者和政策制定者是否在讨论同一问题，他们是否看到了相同的数据，当权者的观点是否被特别和特殊的利益所阻碍。

同时遭到诽谤和赞扬的全球化，其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从本质上讲，全球化是世界国家和人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它显著地降低了交通运输和通信成本，并且削减了货物、服务、资本、知识和跨国界（较小范围内的）的人力资源移动的人为壁垒。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成立新的机构，这些机构与现有机构并存，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工作。在国际平民社会的竞技舞台上，新的群体，如同天主教的大赦运动那样减少了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加入到诸如国际红十字会这样长期建立的组织中。被跨国公司强力推动的全球化，不仅使资本和货物进行跨国界流动，并且使技术也跨国界流动。全球化使得人们再次关注建

立长期的国际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其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劳工组织（ILO），最初成立于1919年，它提出了“体面劳动”的口号，其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就业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它尤其关注改善发展中世界的卫生条件。

全球化的许多方面，也有可能其大部分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欢迎。当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和医疗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时，没有人愿意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孩子夭折。正式定义较为狭窄的全球化经济领域和国际机构成为争议的主题。这些国际机构制定规则，要求或推动诸如资本市场自由化（废除发展中国家制定的用以稳定那些不稳定的资金流入流出该国的规章制度）等内容。

要想理清哪里出了问题，有必要审视管理全球化的三个主要国际机构，这三个国际机构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组织，它们也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诸如作为世界银行小姐妹的大量区域银行；诸多联合国下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这些组织的观点常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明显不同。比如，国际劳工组织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太关注工人的权利，而亚洲开发银行（ADB）赞成“竞争性多元化”，认为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可选择的发展战略，包括“亚洲模式”，在此模式中，政府一方面依赖市场，另一方面又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创建、重塑和引导市场，包括促进新技术等；同样，在此模式中，企业需要对他们员工的社会福利承担相当多的责任——这正是亚洲开发银行所倡导的，与那些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所推行的美国模式明显不同的地方。

本书中，我主要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20年来，它们一度处于主要经济议题的中心，包括金融危机和一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1944年7月在新罕什布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的产物，部分目的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毁坏后的欧洲重建筹集资金，并将世界从未来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世界银行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更能够

反映出其最初的使命。最后一个词“开发”[⊖]几乎是作为一个事后产生的想法而加上去的。在当时，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依然是殖民地，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微弱贡献或可以或可能采取的努力被认为是它们对欧洲宗主国的义务。

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是保证全球经济稳定。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都深深印入那些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人心中。大约 75 年前，资本主义面临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笼罩了整个世界，并造成前所未有的失业增加。更糟糕的是，美国有 1/4 的工人失业。后来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参与者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解释，并提出了一套对应的简单解决方案：经济衰退是因为缺乏有效总需求，而政府政策能够有助于刺激总需求。比如，在货币政策无效时，政府可以依赖财政政策，包括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模型随后遭到的批评和提炼，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市场力量不能迅速地将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状态，这一基本经验到现在依然正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承担避免另一次全球衰退的重任，为做到这一点，它通过要求那些在保持全球总需求中没能公平地承担相应份额的国家放任自身的经济衰退来对其进行施压；在必要的时候，它还向那些面临经济衰退和无力以它们自己的资源刺激总需求的国家提供贷款以保持流动性。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理念中，该组织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市场经常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并且，在这些国家复苏过程中，不能帮助它们筹集必需的资金。正如联合国成立的信仰是需要在全球层面集体行动以维持政治稳定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的信仰是在全球层面需要集体行动以维持经济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公共机构，其成立的资金是由世界上的纳税人提供的。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向资助它的公民直接负责，也不向那些生活有可能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的人负责。相反，它向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负责。他们通

⊖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英文为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因此，最后一个词是“Development”，即“开发”。——译者注

过一个很复杂的投票制度来维持自己的控制，该投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各国的经济实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对投票制度进行了微小的调整，但主要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仅有一个国家具有有效的否决权，那就是美国（这一方面，与联合国相似，历史的时代错误决定了谁拥有否决权——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者——但最终，该否决权由 5 个国家分享）。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之初，其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市场经常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如今，它以意识形态的热忱支持市场是至高无上的；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认为一些国家需要国际压力来推行更为扩张的经济政策（比如增加支出、减少税收或者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而如今，只有那些国家实施诸如减少赤字、增加税收或提高利率等导致经济萎缩的政策时，它才提供资金支持。如果凯恩斯能够看到在他的下一代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可能会从坟墓中翻身起来。

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国际组织发生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在美国和英国鼓吹自由市场理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新的传教机构，通过它们，这些观点勉强地在贫穷国家推行，而这些贫穷国家往往非常急切地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赠与。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这些国家的人民）经常会怀疑这些政策，但如果必要的话，这些贫穷国家的财政部长们宁愿改变他们的信仰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金。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世界银行内部的研究部门（它指导着世界银行的思想和方向）进行了人员调整，其思想得以进化。美国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霍利斯·钱纳里（他曾经对发展经济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基础性贡献）成为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密友和顾问。而麦克纳马拉在 1968 年担任世界银行的总裁。由于麦克纳马拉为其看到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情况所震动，因此将世界银行的努力方向放在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上，并且由钱纳里组织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家和他一起工作。但当 1981 年威廉姆·克劳森开始担任世界银行总裁时，他聘请了另一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一位国际贸易专家，以在“寻租”

（特殊利益方如何利用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以别人的代价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方面的研究而出名）。对于钱纳里和他的团队关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如何失灵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改进市场和降低贫困这些问题，克鲁格认为政府是问题所在，自由市场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方法。在新的意识形态下，钱纳里所召集的经济学家有很大一部分离开了世界银行。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使命截然不同，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它们的活动变得相互交错。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突破了只向项目贷款（诸如修路和修水坝）发放贷款的做法，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也开始以结构调整贷款的形式提供广泛的支持，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时，会对这些国家强加某些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当关注危机；但是发展中国家一直需要帮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国家生活中永远离不开的一部分。

柏林墙的倒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新的舞台：对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进行管理。最近，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巨大的保险箱也显得资金不足，它要求世界银行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支持，但严格地说，世界银行仅仅作为一个次级合作伙伴来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方案指南。原则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明显的分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处理某个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比如说预算赤字、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贸易赤字以及对外借贷等；而世界银行主要用来管理结构性议题——国家政府如何运用其资金、国家的金融机构、劳动力市场以及贸易政策等。但在这个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更为帝国主义化的观点，它认为，由于几乎所有的结构议题都有可能影响总体经济表现，进而影响到政府预算或者贸易赤字，因此它几乎将所有的问题都纳入其管辖范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经常对世界银行表示不耐烦，即使是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处于至高无上的年代，依然存在某些国家最适合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知道答案（基本上，对每个国家来说答案都相同），但是却看不到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的需要，而且当世界银行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争论时，它经常发现自己犹如在真空状态下提供解答。

本来，这两个机构能够在发展和转型这些挑战性的议题上提供可选择的观点，并且在此过程中它们能够强化其民主进程。但这两个机构都是由 7 国集团（7 个最重要的发达工业化国家政府）[⊖]尤其是它们的财政部长的集体意志所驱动，而他们常常最不希望做的事就是对可选的战略进行现场民主辩论。

很显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半个世纪后，它并没有完成其使命。它并没有按照其既定目标行事——为面临经济衰退的国家提供资金，帮助这些国家将其经济恢复到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尽管事实上在过去 50 年里我们对经济进程的理解已经得到巨大提升，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变得更加频繁，其影响程度更深（除大萧条外）。据估算，差不多有 100 个国家经历过危机。[3] 对其资本市场进行自由化的每个主要新兴市场至少经历了一次危机。但这并不是霉运的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早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造成了全球不稳定。并且，一旦某个国家处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和方案不仅不能稳定这种状况，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反而将情况变得更糟，尤其是对贫穷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实现其促进全球稳定的最初使命；在其他承担的新使命中，如指导一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方面同样不成功。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国际金融及相关问题的工作相似，布雷顿森林协议同样要求建立第三个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来管理国际贸易及相关问题。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一些国家通过提高关税以其邻国的代价来维持本国经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指责扩散和加深了萧条。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要避免这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再次发生，同时要鼓励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虽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功地降低了关税，但却很难实现最后的谅解。直到 1995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或者说在大萧条过去 3/4 个世纪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但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明显不同，它本身并不制定规则，只是为贸易谈判的进行提供谈判场所，并确保

⊖ 这 7 个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目前，传统的 7 国集团与俄罗斯一起组成 8 国集团。这 7 个国家目前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7 个经济体，7 国集团的成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永久成员，部分是因为历史的偶然。

其协定协议得以实施。

建立国际经济组织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这些年来意图逐渐变味儿了。当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崇尚凯恩斯主义，它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看法逐渐被自由市场颂歌所替代，这只是新“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就发展中国家“正确”的政策所达成的共识，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稳定方面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法。

华盛顿共识中所达成的许多想法是针对拉美国家的问题发展起来的，在拉美，政府在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失去了对预算的控制，从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内，在这些地区内许多国家实现了蓬勃发展但未能持续，据说是因为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不幸的是，有针对性地对拉美国家的问题而开发的想法随后被应用于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与拉美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优势和劣势。尽管当时在理论和经验上不存在强有力的机构保证这些政策能够促进增长，但像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样的政策还是在拉美被广泛推广了。甚至当事实表明这些政策造成了不稳定时，这些政策仍到处加以实施，有时候，即使是在更不合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许多情况下，即使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适用于拉美国家，它们也不适合处于发展和转型早期阶段的国家。大部分发达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已经明智地选择保护它们的工业，直到它们变得足够强大可以与国外公司竞争为止，从而来增强其经济实力。而全方位保护主义对于那些尝试保护主义的国家并没有效果，同样，迅速实行贸易自由化也不起作用。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进口产品市场，将会造成与其自己生产的产品进行竞争，而在与那些来自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同类产业进行竞争时，这些产业非常容易受到攻击，这将会在社会和经济上产生灾难性后果。工作被系统地摧毁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生产的货物根本不能与那些来自欧洲和美国获得高额补贴的货物进行竞争——至少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和农业部门发展到足够强大和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之前是这样。更糟糕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主张依然是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其利率水平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

因为在安全网到位之前实施贸易自由化，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就变得非常贫困。因此，自由化经常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自由化过程中承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但痛苦却一直在增加。甚至是那些并没有失去工作的人也遭受到不断提高的不安全感的打击。

另外一个例子是资本控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盟国家一直都禁止资本自由流动。有些人或许会说，在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难以发挥作用前，坚持要求它们冒险开放资本市场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抛开公平这一观念不管，就是糟糕的经济学。资本市场自由化后，热钱频繁地进出某个国家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就像海上的小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快速资本市场自由化就像推动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广阔的大海上航行，如果没有将这些小船上的许多窟窿修补好、船长没有接受应有的培训、没有将救生衣放到甲板上，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在大浪撞击后小船也很有可能倾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同“错误”的经济理论，但是如果其活动范围限制在欧洲、美国及其他能够发展自己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殖民地的解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为国际金融机构大范围地推广其原始使命提供了机会。当前，这些机构逐渐在世界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不仅是那些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就是那些寻求“批准印章”以便它们能够更好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也要遵循它们的经济指令，这些指令反映了国际组织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理论。

对许多人来说，结果最终都是贫穷；对许多国家来说，结果最终是社会和政治混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在所有领域都犯了错，主要涉及：发展、危机管理、一些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构调整项目并没有带来稳定的增长，甚至对如玻利维亚这些遵循其限制和约束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许多国家由于过分的节俭制约了经济增长；成功的经济方案需要特别关注先后顺序（即改革发生的秩序）和步骤。比如，建立较为强大的金融机构之前，如果为了追求竞争而过快地开放市场，那么摧毁就业机会的速度就要快于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在许多国家中，在先后顺序和步骤方面犯下的错误造成失业和贫困增加。[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恶化了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危

机。拉美的自由市场改革也只有一两个国家取得了成功——智利就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但到目前为止，拉美地区其他的大部分国家不得不去弥补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谓的成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援助后增长失去的10年；另外，还有许多国家目前仍然存在较高的失业率——比如阿根廷，自1995年以来其失业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甚至在通货膨胀率下降时依然如此。2001年，阿根廷的经济崩溃了，这是过去几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系列政策失败中最近的一件事。最终，在连续7年的高失业率情况下，阿根廷的市民不得已发生了暴动，这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竟然能够非常安静地忍耐这么长的时间。甚至是那些经济实现了有限增长的国家，我们也只看到发生在富人身上的利益，尤其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前10%——而与此同时，贫困依然居高不下，在一些国家中，处于底层贫困人民的收入反而有所下降。

存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中潜在的问题是关于管理的：即由谁来决定它们怎么做。由于这些组织不仅受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控制，同时也受这些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利益所支配，因此这些机构的政策自然会反映这一点。倾向于这些机构的选择正说明了它们的问题，同时也经常造成其他的发展障碍。然而，目前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几乎所有的活动（更准确地说是其所有的借贷行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些机构都是由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代表们来领导的（根据惯例和不成文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一般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负责人一般由美国人担任）。这些人都是关着门选举出来的，并且在发展中世界工作的经历从来没有成为考察这些候选人的先决条件。这些机构并不代表它们服务的国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映的是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声音。世界贸易组织反映的是贸易部长的声音。这些部长们都反映出其国内特定集团关注的问题——不仅是出口者希望看到新的市场对他们生产的产品开放市场，同样货物生产者也担心来自新进口产品的竞争。当然，这些集团希望尽可能地维持现在的贸易壁垒，并且尽可能地说服国会（或者他们的议会）争取到补贴。事实上，贸易壁垒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补贴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都不如对生产者利益的

关注——同样，相对于那些必须克服的贸易壁垒，环境和劳工问题更是没有受到重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通常与金融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来自于金融企业，在为政府服务期满之后（即在退休后），他们又会回到这些金融企业任职。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本书多处提到时任美国的财政部长，他来自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政府服务期满后（退休后），他又到花旗集团（Citigroup）任职，花旗集团控制着最大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号人物——斯丹·费舍尔（Stan Fischer），直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花旗集团。这些人自然会运用金融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因此这些机构的政策自然会反映那些决策者的观点和利益；本书以下的章节我们会多次看到这种情况，这并不令人惊讶，国际经济机构的政策常常与它们在发达工业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利益联系在一起。

对于那些辛辛苦苦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农民来说，对于那些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而使其承受高附加值税收的商人们来说，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体系仅是一种没有代表性的征税。随着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对贫困人口燃料和食物补贴的削减；随着泰国人看到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的健康支出减少，艾滋病患者不断增加；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因为所谓的成本恢复方案不得不支付其子女的教育费用，从而不得不忍痛做出不送他们的儿女去学校读书的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庇护下的全球化国际体系正趋于清醒。

由于没有选择，没有方式表达他们的关注和迫切的改变要求，人民就选择了暴动。当然，街道不是讨论问题、阐明政策或伪造妥协的地方。但是抗议者也使得世界上所有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将华盛顿共识政策作为一个与真正实现增长和发展方式的选择方案。已经付诸实践的全球化并没有实现其提倡者承诺的目标——或者说其能够或应该达到的目标，关于这一点非常明显：不仅对普通公民来说是这样，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同样如此；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没有带来增长，即使实现了增长，其增长的利益也不能被所有人分享；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政策的净效益也经常使少数人以其他人的代价而受益，使得少数富人以穷人的代价而受

益。在许多情况下，商业利益和价值取代了对环境、民主、人权和社会司法等问题的关注。

全球化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有能力产生巨大益处，比如对亚洲的国家来说，这些亚洲国家按照自己的条件来拥抱全球化，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实现全球化，尽管也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倒退，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在很多其他国家，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与此相当的利益。

19世纪美国的经验为今天的全球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一对比有助于阐明过去的成功和如今的失败。当时，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以及本地市场的扩张，形成了新的民族经济，随着这些民族经济的形成，成立了民族企业，它们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但市场并不是毫无规律地发展，政府在经济演变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法律宽泛地解释了允许联邦政府对州际的商业条款进行规制时，美国政府获得了广泛的经济空间。联邦政府开始规制金融体系，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最后提供失业和福利系统以处理市场体系引起的问题。联邦政府同时也促进一些工业（例如1842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铺设了第一条电话线）的发展，并鼓励发展其他产业，例如农业，不仅要帮助建立研究型大学，同时为农场主提供新技术培训等额外服务。联邦政府不仅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它没有从事一系列积极的再分配政策，但至少它制定了利益被广泛分享的方案——不仅包括扩大教育和改进农业生产率的方案，也包括给所有美国人提供最少机会的土地赠与。

如今，随着交通和运输成本的继续下降，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的人为壁垒不断降低（虽然仍然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壁垒），我们拥有与民族经济形成早期进程相似的“全球化”进程。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世界管理机构对每个国家的公民负责，用国家政府引导其国有化进程类似的方式来监视全球化进程。相反，我们的体系可以说是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少量参与者

⊖ 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部长，他们都与特定的金融和商业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控制着整个局面，但与此同时，那些受到他们决策影响的人们几乎没有发言权。现在是时候改变管理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了，需要重新考虑在国际层次中如何进行决策，按照谁的利益制定决策，更少地强调意识形态，同时更多地考虑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我们所看到的东亚的成功发展能够在其他任何地方实践，这一点非常关键。全球继续不稳定的成本非常大，全球化能够被重塑，在其被重塑，在其能够恰当公正地运行时，便有可能帮助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在此全球经济体系下，增长不仅是持续和稳定的，而且增长的成果能够被更公正、更平等地分享。

第 2 章

未兑现的承诺

1997 年 2 月 13 日，我开始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当我步入位于华盛顿特区 19 街那座雄伟、现代、闪闪发光的世界银行主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该组织的格言，即“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在 13 层中庭的中央是一尊雕像，雕塑的是一个小男孩牵引着一位年长的盲人，该雕像用以纪念对河盲症（盘尾丝虫病）的根治。在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组织共同努力根治这种疾病前，每年有成千上万非洲河盲症患者因这种本可预防的疾病而致盲。在街道的对面耸立着另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在该栋大楼的大理石中庭，摆放着大量的花丛，它提醒世界各国来访的财政部长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财富和权力的中心。

民众往往会混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它们在文化、风格和使命上有明显的区别：世界银行致力于消除贫困，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维护全球稳定。然而，为完成其使命，这两个机构都有经济学家队伍花 3 个星期深入到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已经尽力确保其职员有相当一部分永久居住在他们试图提供援助的国家；与世界银行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仅有一位“驻地代表”，而且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通常在华盛顿制定，并且由其代表团在短期内制定。在政策制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们舒适地住在各国首都的五星级酒店内，注视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提供的数字。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差异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如果不到乡下去了解民情，人们是不会了解和热爱这个国家的，我们不应当只将失业看做是一个统计数字，一个经济的“伤亡人数”，一个与通货膨胀做斗争或确保西方

银行得到偿付过程中的无辜受害者。这些失业者都是有家庭的，他们的生活受到局外人建议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案例中，这些政策都是被强制实施的。现代高科技战争被认为是没有身体接触的战争：从5万英尺的高空中投下炸弹，却能使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发生了什么。现代经济管理也与此类似：我们可以在豪华酒店内无情地强制推行某些政策，而如果我们对那些生活正在遭到破坏的人们有所了解的话，在推行这些政策时就会三思而后行。

在非洲、尼泊尔、棉兰老岛或者埃塞俄比亚的村庄中，那些在首都之外考察的人们看到的情况和得到的统计数据证实：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下的人口数目仍在增加。甚至在那些河盲症得以根治的地方，尽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许以诸多美好的愿望和承诺，但人们仍忍受着贫困，而其中大部分地区曾是这些发达国家的殖民地。

心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况都一样。虽然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自由（一般都是对自治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但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以往那种殖民地主人的观点。因此，它们依然保持着殖民思想——“白人的负担”，它们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好的。虽然控制着全球经济局势的美国并没有多少殖民地，但美国人的信用也受到了损害，这主要不是因为其“天定命运”[⊖]的扩张主义，而是因为冷战。

在去世界银行任职的前晚，我举行了我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经济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日益严重的世界贫困问题。对于世界上大约12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们或者大约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5%）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人们来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为实现“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这一梦想做些什么？我将怎样着手实现一个更为现实的梦

⊖ Manifest Destiny，在19世纪40年代用以说明人们确信美国领土扩张不可避免的观念，人们相信天定命运在美国盛行是由于它的经济和政治优越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使美国应当统治整个北美。——译者注

想——减少世界贫穷？我的任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认真思考什么战略对于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是最有效的；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一起推动这些战略的实施；在发达国家中，尽我所能关注发展中世界的利益和其关心的问题，要么是努力争取开放发达国家的市场，要么是提供更有力的援助。我深知这些任务的艰巨性，但却从未想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人为的、完全没有必要的，而这些障碍主要是街道对面我们的小姐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的。我并不期望国际金融机构或者支持这些金融机构的政府部门中的每个人都将消除贫困视为己任；但我认为应该对战略进行公开的辩论——这些战略在很多领域似乎都失败了，尤其是在“贫穷”这个领域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我非常失望。

埃塞俄比亚，权力政治与贫穷间的斗争

在华盛顿工作4年后，我已习惯了官僚和政客间的奇异世界。但直到1997年3月，到世界银行任职还不到1个月时，我到埃塞俄比亚（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才开始完全沉寂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和数学这个令人震惊的世界。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仅为110美元，而且该国遭受了持续的干旱和饥荒，并造成200万人丧生。我去拜访梅莱斯·泽纳维总理，他曾为反抗孟吉斯图·海勒·马里亚姆的血腥统治领导了17年的游击战争，最终梅莱斯的部队于1991年获得胜利。紧接着，新政府就开始了重建国家的艰苦工作。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博士，梅莱斯曾经学过经济学，因为他知道要把国家从多个世纪以来的贫困中解脱出来，就一定需要经济转型，他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创造力足以使他在我教授的任何大学班级里都能名列前茅。他对经济学原理理解的深度——当然，还有对他的国家所处环境的了解程度——都超越了我在此后3年里所接触的许多国际经济官员。

梅莱斯实现了这些知识属性和个人正直的完美结合：没人怀疑他的忠诚，在他的政府内几乎没有关于腐败的指控。他的政敌大多数来自长期处于资本统治地位的群体，他们在梅莱斯执政后失去了政治权力，挑起了梅莱斯关于其民

主原则的承诺问题。然而，梅莱斯并不是一个旧式独裁者。他和他的政府总体上致力于地方政府的分权程序，拉近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同时确保中央不会失去与独立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新宪法甚至赋予每个地区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退出中央政府的权利，从而保证位于首都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谁）不会冒险忽视对全国各地区普通公民的关注；或者确保该国中某一部分人不能将其意愿强加给其他人。1993 年，当厄立特里亚宣布独立时，政府实际上履行了其承诺。但是，随后出现的事情表明埃塞俄比亚同其他地方一样，基本民主权利并不稳定。比如，在 2000 年春天，政府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的一所大学，关押了一些学生和教授。

1997 年，当我到埃塞俄比亚时，梅莱斯正忙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取消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借贷方案。埃塞俄比亚的宏观经济——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关注的——好得不能再好了。不存在通货膨胀，实际上物价正在下降。自从梅莱斯成功取代了孟吉斯图后，该国的产出一直保持稳定增长[1]。梅莱斯的成功表明，只要能够实施正确的政策，甚至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也可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在经过多年斗争和重建后，埃塞俄比亚又重新获得了国际援助。但梅莱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出了问题。存在风险的不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其所谓的扩大的结构调整贷款计划（该借贷方案的补贴率很高，主要是帮助贫穷国家）提供的 1.27 亿美元的资金，而且还包括世界银行的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援助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它应当审议每个受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且保证该国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方式生活。如果不是这样，就存在不可避免的麻烦。在短时间内，一国可以通过借贷来超越其生活方式，但最终会有算账的一天，这时就存在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关注通货膨胀，那些政府支出超出税收和外国援助的国家经常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局面，如果它们依靠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就更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当然，除通货膨胀外，还有其他衡量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宏观”这个词是指“总体”行为，是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整体水平。某个国家可以实现较低的通货膨胀，但同时经济没有出现增长，而且失业率较高。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

说，这样的国家会被列入一个具有灾难性经济框架的名单中。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本身不是结果，而是实现某种结果的方式：正是因为过高的通货膨胀经常导致低增长，而低增长又导致高失业率，因此，通货膨胀会如此不受欢迎。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经常混淆结果与方式，从而失去对最应该关注问题的观察力。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多年来一直维持两位数的失业率，然而，正是因为能够基本保持预算平衡，而且其通货膨胀似乎也在控制范围内，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其“A”级的评价。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取消其援助；通常，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其援助时，其他捐赠者也会这样做。这不难理解，除非具备良好的宏观经济框架，否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如果这些国家出现巨额赤字和高速通货膨胀，那么就存在不能妥善支配这些资金的风险。如果政府不能成功地管理好其整体经济，那么对于外国援助资金的管理也将会很糟。但如果这些宏观经济指标——通货膨胀和增长——是坚实的，如同在埃塞俄比亚那样，可以肯定其潜在的宏观经济框架一定非常不错。不仅仅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确实有这样健全的宏观经济框架，而且世界银行有直接证据证明该政府的能力以及向穷人做出的承诺。埃塞俄比亚制定了一项农村发展战略，对穷人尤其关注，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占总人口 85% 的人群。埃塞俄比亚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军费开支——这对于一个以军事手段获得政权的政府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它知道如果将资金花费在购买武器上，就不能用于反贫困。的确，这正是国际社会应当给予援助的那种政府类型。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给予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计划，而无视埃塞俄比亚良好的宏观经济框架，仅仅是因为它对埃塞俄比亚的财政状况表示担忧。

埃塞俄比亚政府拥有两项收入来源：税收和外国援助。只要一个国家政府的收入等于支出，它就可以保持预算平衡。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从外国援助中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一大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在这些援助耗竭后，埃塞俄比亚将会陷入困境。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如果能够将支出限制在其所征收的税收金额内，埃塞俄比亚的预算状况才

可以被判定为是坚实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逻辑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它意味着任何贫穷国家都不能将其从援助得到的资金用于任何支出。比如，如果瑞典资助埃塞俄比亚一笔资金用于修建学校，该逻辑表明，埃塞俄比亚应该改变其用途，将其作为储备（所有国家都拥有或者应当拥有储备账户，这些账户保留一定的资金以备不时之需。黄金是传统的储备物，但如今已被硬通货及其他计息的关联产品所代替，最常用的储备方式就是拥有美国国债），但这并不是国际捐赠者给予援助的理由。在埃塞俄比亚，那些独立运作且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感激的捐赠者们希望看到建立新的学校和诊所，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同样希望如此。梅莱斯强烈地表达了对该问题的看法：他告诉我，17 年来，他从未如此艰难地战斗过，而在他成功地说服捐赠者为他们修建学校和诊所后，那些国际官员却告诉他不能这么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不是植根于对计划的持续性保持长期关注。有时，这些国家使用援助资金建立学校和诊所；而当援助资金耗尽后，就没有资金来维持这些设施。捐赠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将该考虑纳入到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援助项目中。但是，在埃塞俄比亚这一具体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的内容超越了对该问题的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国际援助太不稳定，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在我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立场毫无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荒谬的暗示。据我所知，国际援助要比税收收入稳定，因为税收收入会随经济状况变化而有明显的差异。当返回华盛顿时，我请求工作人员核查统计数据，结果他们确认了国际援助要比税收收入稳定得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税收来源稳定的推理，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应当在其财政预算中计入外国援助，而不是税收收入。并且，如果税收收入和外国援助都不包括在预算中收入的那一栏，那么每个国家都会被认为是处于糟糕的状况之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理更有缺陷。对于税收收入的不稳定性，有许多合适的应对方法，比如留出额外的储备和保持支出的灵活性。如果各种来源的收入有所下降，并且没有可供提取的储备，那么政府就不得不准备削减支出。但

是像埃塞俄比亚那样接受援助范围广泛的贫穷国家来说，其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灵活性；如果埃塞俄比亚不能够获得资金来建立传统的学校，那么，它只是不会去建立学校。埃塞俄比亚的政府官员们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关注税收收入或者外国援助下降后所发生的事情，并且他们已经设计出若干政策来处理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他们所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不到他们立场的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一部分人建立的学校和诊所。

除了对如何对待外国援助持有不同意见外，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埃塞俄比亚间关于提前偿还贷款的争端，我也有不同看法。埃塞俄比亚动用了部分储备提前偿还了一家美国银行的贷款，这一交易具有完美的经济意义。不管抵押品（一架飞机）的质量如何，埃塞俄比亚对贷款支付的利息要比其储备的收益率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建议埃塞俄比亚提前偿还贷款，而且就算日后出现需要资金的情况，政府也能够利用飞机作抵押而获得资金。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反对埃塞俄比亚提前偿还贷款，它们反对的不是这项政策的逻辑，而是认为埃塞俄比亚在没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行事。为什么一个主权国家在采取每项行动前都必须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呢？如果埃塞俄比亚的行为威胁到其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的能力，人们或许可以理解；但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因为这项金融决策非常明智，它提高了该国偿还债务的能力。[2]

多年来，位于华盛顿第19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应该对其造成的后果负责，并应根据结果进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埃塞俄比亚自我制定政策的结果应该已经有力地证明，埃塞俄比亚政府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那些从它手里接受资金的国家有义务向其汇报可能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一切事情；如果不向其汇报的话，就有可能取消其借贷计划，而无视行动本身的合理性。对埃塞俄比亚来说，这些干扰多少带有新殖民主义的色彩；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这正是标准的运作程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埃塞俄比亚关系中，还存在其他的契合点，比如说，有关埃塞俄比亚金融市场自由化的问题。良好的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差距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按资产规模来衡量，埃塞俄比亚全国整个银行系统的总资产规模甚至小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国民银行的资产规模，而贝塞斯达仅仅是华盛顿的郊区（贝塞斯达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蒙哥利马县的一个未成建制的自然聚集区，2000 年人口仅为 55 277 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要求埃塞俄比亚向西方国家的竞争者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要求其将埃塞俄比亚国内最大的银行进行分割。可是在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或者汉诺威制造和汉华银行这样超大的金融机构组成的世界里，它们却宣称为了有效地竞争而不得不进行合并[⊖]。的确，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家规模只有东北部贝塞斯达国民银行那么大规模的银行的确无法与花旗银行这样的全球金融巨头竞争。当全球金融机构进入某个国家市场时，它们就能够抑制该国国内的竞争。在诸如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里，在吸引当地银行的储蓄，在对大型跨国公司进行贷款时，与向一些小型商业企业或农场主提供信贷相比，这些国际金融巨头会更为积极和慷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仅希望对外国竞争者开放银行系统，还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出售埃塞俄比亚政府国库券的拍卖市场来“强化”该金融体系，这场改革可能是许多国家所希望的，但却完全不符合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状况。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希望埃塞俄比亚对其金融市场进行“私有化”改革，也就是说，允许市场力量自由决定利率水平——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才做到这一点。当时，这些国家的市场以及必备的规制设施远比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发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混淆了目标与方式。健康银行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优良的条件向那些能够偿还的机构或个人提供信贷。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农业国家的农场主来说，能够以合理的条件取得贷款用来购买种子和化肥尤其重要。而提供这种贷款的任务并不轻松；即使在美国，在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只有当农业处于更重要的地位时，政府才在提供需要的贷款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塞俄比亚的银行体系看起来非常有效，其银行存贷率的差额要远低于那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

⊖ 1998 年 4 月 6 日，花旗集团和旅行者集团宣布合并，并得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合并后的实体将成为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于一身的金融大超市。——译者注

议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依然不满，仅仅是因为它认为利率水平应该由国际市场力量来自由决定，而不管这些市场是不是竞争性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自由化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目的。它对市场的信任显得非常幼稚，以至于它相信自由化的金融体系会降低贷款的支付利率，并因此而获得更多可利用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教条主义立场的正确性是如此确信以至于它对实际经验毫无兴趣。

埃塞俄比亚以很好的理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关于开放其金融体系的要求。它看到了其东非的一个邻国在答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金融市场自由化，它相信银行之间的竞争将会导致利率下降。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后，当地和本土商业银行迅速增加，然而与此同时，银行立法和银行监管没有跟上，这就出现了可预见的后果——仅在 1993 年和 1994 年，在肯尼亚就有 14 家银行破产。结果，利率不断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埃塞俄比亚政府对此非常警觉，这可以理解。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承诺提高其农业部门公民的生活水平，它担心金融市场自由化将会对其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而那些以前能够设法取得贷款的农民发现现在他们无法购买种子和化肥，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便宜的贷款或者被迫支付他们根本不能承受的高利率。埃塞俄比亚遭受过干旱的破坏，从而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因此，其领导人并不希望事情更加恶化。而埃塞俄比亚人则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会减少农民的收入，从而使目前已经非常悲惨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埃塞俄比亚不愿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埃塞俄比亚对改革并不热衷，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对其的援助贷款计划。但令人兴奋的是，我和世界银行其他的经济学家成功地说服了世界银行管理层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更多的贷款，这非常有意义：埃塞俄比亚是一个迫切需要帮助的国家，而且它拥有一流的经济框架和一个承诺使该国贫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政府。虽然在几个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的立场变得温和，但世界银行还是贷出 3 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金额。为了扭转局势，在同事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发动了一场决

定性的战役——“知识界的院外游说”。在华盛顿，我和同事们召开会议鼓励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职员们重新审视不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自由化问题，以及对诸如埃塞俄比亚这样依赖外国援助的贫穷国家实施不必要的强制性预算节制的后果。我试图通过直接的渠道接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也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同事间接地接近他们。那些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世界银行的同事们也在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过程中付出了类似的努力。我利用了与克林顿当局的联系施加影响，并与美国派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交谈。总之，为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能够得以恢复，我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

最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其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很高兴我的努力帮助了埃塞俄比亚。然而我也了解到，影响这种改变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是从国际官员内部着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组织并不透明，不仅只有少得可怜的信息能够从内部向外部传递，外部的信息也许更加难以渗透到这些组织内部。这种不透明性也意味着信息难以从组织的底层向高层传递。

为埃塞俄比亚争取贷款所做的努力使我了解了很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情况。非常明显，有证据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埃塞俄比亚进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对埃塞俄比亚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无论信息多么充分，也不管人们对它的政策多么不感兴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像从来不听取别人的意见。本质的问题成为从属于程序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是否偿还贷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未能成功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议。在埃塞俄比亚所处的发展阶段，怎样最好地在国内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依然是本质问题，并且应该征询专家们的看法。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要求外部专家共同判断明显具有争议的议题，这一事实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的做法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将自己塑造成唯一能够提供“合理”建议的提供者。甚至像偿还贷款这样的事情都要向外部经济学家咨询，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合理。其实对于这类事情，只要埃塞俄比亚的行为是提高而不是削弱了对其贷款的偿付能力就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看法完全不正确。但这样做就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

侮辱，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诸多决策都是关着门来制定的——几乎从来都没有对刚提出的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自己暴露于对权力政治、特殊利益和其他隐蔽原因的怀疑之中，它们与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和行为的使命和其表述的目标毫不相关。

对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规模适中的机构来说，要想了解世界上每个国家大量有关的经济情况非常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被指派到美国工作，在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经常感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经济的理解很有限，从而为美国制定了具有误导性的政策建议。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美国的失业率降到6%以下，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开始上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模型表明他们是错误的，但他们对我们的努力毫无兴趣。事实上，我们是正确的，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到4%以下，但通货膨胀并没有上升。在对美国经济错误分析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误导的政策建议：提高利率。幸运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并没有理睬他们的建议，但其他国家却不能如此轻松地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缺乏详尽的知识并不重要，因为它向来都倾向于采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当这种方法面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挑战时，其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真正宣称他们是发展专家，因为正如我所说，其原始使命是维持全球经济稳定，而不是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但它却毫不犹豫地参与到有关发展的议题中，并且参与的程度较深。发展问题非常复杂：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要远大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缺乏市场机制，而即使存在市场机制时，运行得也不完善。同时，信息问题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都有可能严重地影响到经济行为。

不幸的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宏观经济学家的培训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在这些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录用雇员的一些大学里，失业从来都没有出现在核心课程涉及的模型中。不仅如此，在标准的竞争模型——该竞争模型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中，需求总是等于供给。如果劳动力需求等于供给，那么就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显然，没有工作的人会选择不工作。按照这种解释，在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失业（当时有1/4人没有工作）可能是对更多闲暇的欲望突然上升的结果。而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们对闲暇的欲望会突然变化，或者是那些本应该好好享受这种闲暇的人们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高兴。但是，根据标准模型，这些问题都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虽然这些模型可能会为学术界带来一些乐趣，但在解释诸如南非这样的国家问题时，它看起来尤其格格不入。在南非，自从种族隔离解除后，其失业率就一直超过25%，将其折磨得痛苦不堪。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不会忽视失业的存在。因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下，根据其假设，市场运行得非常完美。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如同货物市场或者其他要素市场一样，需求必定等于供给，这样就不可能存在失业。这些问题并不是市场的问题，一定是其他地方的问题——贪得无厌的工会和政治家们通过要求和获得超额高工资来干预自由市场的运行。这里存在的政策暗示是：如果不存在失业，那么工资就会降低。

但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宏观经济学家典型的培训能够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团也不太可能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首都进行仅3个星期的考察就能够制定真正适合该国的发展政策。这些政策更应该由这些国家国内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流的经济学家来制定，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更了解这个国家，且一直在为解决该国家的问题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其他外部人可在分享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对发挥作用的经济力量提供可选择的解释方面发挥作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想仅仅扮演纯粹顾问的角色，而是要与其他有可能提出各自想法的人展开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在政策形成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它能够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其地位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要求考虑一个国家的特定环境和直接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可能忽略了其制定的政策对该国可能产生的短期效应，而仅仅满足于从长期来看该国会变得更好；任何负面的短期影响只是一种阵痛，仅是整个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一部分。利率的飞速上涨如今可能造成饥荒，自由市场能够产生效率，效率最终导致增长，而增长将造福于所有人。忍受和痛苦是获得长期增长所必须经受的一部分，情况证明该国已经驶入正确的轨道。在我看来，痛苦有时是必须的，但这不是它本身的优点。设计良好的政策经常能够避免许多痛苦；并且有些形式的痛苦是事与愿违的，比方说，食物补贴突然削减可能会导致骚乱、城市暴力和社会结构的瓦解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工作，说服了很多人相信，如果这些国家要在长期内取得成功，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很必要。经济学家总是关注于稀缺的重要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时常将自己视为稀缺的使者：每个国家都不能按照超越他们自己的方式而长期生存。当然，我们也不需要那些由具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老牌金融机构来告诉某个国家需要对收入的支出加以限制。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计划运行得很好，而不仅是确保各国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生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式的方案存在着可替代的选择：这些替代方案能够将伤害限制在合理的水平，它们并不是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上，但已产生了正面的效果。博茨瓦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 2 300 英里，是一个仅有 150 万人口的小国，自独立以来，它已经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权。

1966 年，当博茨瓦纳完全独立时，它同埃塞俄比亚及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都是处于赤贫的穷国，人均年收入仅有 100 美元。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个农业国家，该国水资源不足，且仅有少量的基础设施。但博茨瓦纳的发展非常成功。虽然当前该国正遭受艾滋病的侵袭，但在 1961 ~ 1997 年间，其年均增长率超过 7.5%。

博茨瓦纳拥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从而有助于其经济发展。其他国家，诸如刚果共和国（前扎伊尔）、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它们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在这些国家，丰富的资源助长了腐败，并产生了特权精英，他们忙于处理为控制国家的财富而进行的内部斗争。

博茨瓦纳的成功在于它有能力保持政治一致性，这种政治一致性是建立在

对国家统一广泛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政府和被管理者间生效的契约来说，这种政治一致性非常必要，它由政府和其他外部顾问联合起来共同达成，这些外部顾问主要来自于一些公共机构和私有基金会，包括福特基金会。这些顾问帮助博茨瓦纳制定该国的前景规划方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打交道不同，这些顾问在和政府一起工作时，他们都公开坦诚地向公众解释他们的政策，以获取对该方案和政策的广泛支持。他们与博茨瓦纳高级政府官员，包括内阁部长和国会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其讨论形式既有研讨会，也有面谈。

博茨瓦纳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博茨瓦纳政府中的资深人士在挑选顾问时非常谨慎。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要为博茨瓦纳银行推荐一位副行长时，博茨瓦纳银行并没有立即接受，博茨瓦纳银行的行长飞赴华盛顿对他进行面试，事实证明他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当然，没有哪项成功是毫无瑕疵的，博茨瓦纳也是这样。另外一次偶然的机会，博茨瓦纳银行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其挑选研究主任，结果证明这一行为非常不成功，至少在有些人看来是如此。

在处理发展中国家问题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来自福特基金会及其他机构的顾问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并且其产生的结果存在较大的不同。在发展中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到处受到谩骂；而博茨瓦纳和其顾问团之间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其标志性的表现就是博茨瓦纳授予斯蒂夫·刘易斯（Steve Lewis）该国最高奖章，在斯蒂夫·刘易斯担任博茨瓦纳的顾问时，他是威廉姆斯学院的发展经济学教授。

20年前，博茨瓦纳发生经济危机，作为其成功重要基础的政治一致性受到威胁。一方面是由于耕牛饲养受到干旱的威胁；另一方面，钻石行业出现的问题对该国的预算以及其外汇头寸造成压力。博茨瓦纳当前的确正在经受流动性危机，最初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危机所造成的，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该危机能够通过弥补赤字以防止衰退和困难而得以缓解。然而，尽管这可能是凯恩斯推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图，但该机构如今却不再将自己看做赤字金融专家，而承诺使经济达到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在面对经济低迷时，它反而采取了凯恩斯之前的那种财政约束的立场，只有在借贷国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就有关合适的经济政策达成一致意见时才对外贷款。然而这些合适的经济政策几乎总是继承紧缩性政策，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或者变得更糟。博茨瓦纳在承认它的两个主要行业部门（耕牛饲养和钻石）存在易变性时，就已经谨慎地保留部分储备基金以应付这样的危机。但当它看到自己的储备不断减少时，它知道它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博茨瓦纳勒紧裤腰带，同心协力地渡过了危机。但是因为博茨瓦纳能够更广泛地理解过去若干年制定的经济政策以及以一致性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方法，所以，节俭并没有造成社会分裂，而其他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国家，却经常出现社会分裂。据推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它应当做的事情——在危机爆发时，及时向那些拥有良好经济政策的国家提供资金，而不是处处强加一些限制——这些国家就能够按照其自身的方式以较小的代价渡过危机（在博茨瓦纳爆发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1年向其派出了使团。可笑的是，该使团发现他们难以向博茨瓦纳强加新的条件，因为博茨瓦纳早已做了许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可能坚持要求做的事情）。从那时起，博茨瓦纳再也没有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

在更早时期博茨瓦纳的成功中，独立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外部顾问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最初博茨瓦纳与南非签署的钻石卡特尔协议得以继续的话，博茨瓦纳很可能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好。在独立之后短期内，作为1969年在钻石方面的让步，卡特尔向博茨瓦纳支付2 000万美元。据报道，每年返回的利润高达6 000万美元；换句话说，只需4个月卡特尔就能收回成本！世界银行的一位出色且敬业并支持博茨瓦纳政府的律师，强烈要求重新进行合同谈判以争取一个更高的价格，这一举措使得矿产企业利益者大为惊慌。德比尔斯（De Beers，南非的钻石卡特尔）试图告诉人民：博茨瓦纳正变得贪婪起来。他们通过世界银行，动用其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来阻止这位律师。结果，他们成功地收到世界银行的一封信，使得该问题变得非常清楚：即这位律师并不代表世界银行。对此，博茨瓦纳的反应是：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的建议的原因。结果，第二大钻石矿的发现为博茨瓦纳就整体关系重新进行谈判提供了机会。到目前为止，新达成的协议能够很好地为博茨瓦纳的利益服务，并且使博茨瓦纳和德比尔斯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

埃塞俄比亚和博茨瓦纳就是如今更为成功的国家所面临挑战的象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致力于增进其人民的福利，但他们在其民主较为脆弱并且某些条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却在殖民者留下的遗产中（没有多少机构和资源能够利用）试图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这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发展中世界对比的象征：成功与失败的对比；富裕与贫穷的对比；希望与现实的对比；成为什么与有可能成为什么之间的对比。

20世纪60年代末，当第一次到肯尼亚时，我就明白了这一对比。这里曾是一个富饶、肥沃的国家，其中一些最有价值的土地仍由旧殖民者所拥有。当我到肯尼亚时，仍然存在殖民公仆，只是现在他们摇身变为顾问了。

在后来几年中，我对东非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我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又对该地区进行了几次访问），20世纪60年代的渴望与随后发展的情况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肯尼亚时，那里广泛流传着自由（uhuru，斯瓦希里语，意为自由）和自助（ujama，斯瓦希里语，意为自助）的精神。但当我再次访问这里时，政府办公室中大量的职员都已是外语流利、训练有素的肯尼亚人；但肯尼亚的经济则是多年低迷。很多难题都是由肯尼亚人自己造成的，诸如看起来相当猖獗的腐败。但是，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造成的高利率以及其他难题，至少部分地可以谴责为是外部人的行为所致。

乌干达在开始进行转型时，其国内经济形式可能要比其他国家更好。乌干达是一个咖啡生产相对富饶的国家，但是它缺少经过培训的本地管理者和领导者。英国在自己的军队中只允许两个非洲人晋升到军士长的职位。不幸的是，他们其中一个是叫做伊迪·阿明的乌干达人，伊迪·阿明最终成为乌干达军队的将军，并于1971年推翻了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总理的政权（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英皇非洲步枪队，并参与了镇压肯尼亚毛毛起义的战争，阿明很享受自己所采用的那种英国自信的特定措施）。阿明将肯尼亚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屠宰场；因为有人反对阿明于1976年将自己称为“终身总统”，阿明杀了30多万人。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精神变态的独裁者实施的恐怖统治直到1979年才结束，当时阿明被乌干达的流亡者和来自邻国坦桑尼亚的力量所推翻。如今，该国正走上恢复之途，由一位魅力超凡的领导人约韦里·

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来领导，他已经实施了主要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减少了文盲和艾滋病。他对讨论政治哲学问题和讨论发展战略问题同样感兴趣。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听取其“客户国家”关于发展战略或者财政约束之类主题的想法并不特别感兴趣。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方法经常让人觉得有一种被殖民统治的感觉。一张照片可抵得上成百上千的文字，这张在1998年拍摄的照片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使自己铭记于成千上万人的心中，尤其是那些曾是殖民地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总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者被称为执行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曾是法国财政部官员，他个子矮小、穿着整洁，并自称为社会党党员。在这张照片中，他表情严肃地站着，将手臂搭在坐在那儿谦卑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身上。这位倒霉的总统最终被迫将其国家的经济主权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换取印度尼西亚所需要的援助。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量的金钱并没能帮助印度尼西亚，而是被舀出去帮助“殖民权力”下的私有部门贷款者（在正式场合，“仪式”是签署一份协议书，一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权的有效协议，虽然它常常坚持说该协议书是该国政府的意向！）。

康德苏的拥护者声称该照片不公平，他们认为康德苏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在拍照，并且对于这张照片的理解脱离了特定的背景。那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所采取的姿态，在每天的交往中，他们远离摄像头和记者，无论是该组织的领导还是普通员工都是这样。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张照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自从殖民主义在半个世纪以前“正式”结束后，情况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脑海浮现出其他“协议”签署时的场景。令我吃惊的是，照片中的这种情形与标志着“日本开放”的海军上将佩里的炮舰外交或鸦片战争结束时或印度王公投降时的情形是何等相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姿态，与其领导人的姿态一样，非常明显：这是智慧之泉，信仰的传播是如此微妙，以至于很难被发展中世界的人们捕捉和掌

握。其传达的信息同样非常清楚：在最好的情况下，有一批精英（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的领导），只有他们才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要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谈话都寥无希望。

25年前，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许正确地给予那些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以充分的尊重。但与军事中存在能力平衡转移一样，智力中也存在更明显的能力平衡转移。目前，发展中国家都拥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在世界上最好的学术机构培训过。这些经济学家对于当地的政治、条件和发展前景等都非常熟悉，这是一种明显的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像这些官员一样，它不断重复地追求扩大其管辖的范围，超越了最初授予它的目标界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逐渐蔓延，最终超出宏观经济的核心领域，开始涉足结构性问题，比如说私有化、劳动力市场、养老金改革，等等，开始涉及发展战略更广泛的领域，因此，智力能力平衡变得更加倾斜。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声称它从来不下达任何指令，每一个贷款协议都是与借贷国就贷款条款进行谈判而达成的。但这些谈判都是一面倒的，在谈判过程中，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的国家都迫切需要资金。虽然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我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生的案例中，我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在1997年东亚危机蔓延期间，访问韩国时，我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韩国的经济学家们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他们国家的政策将会是灾难性的。然而，在对这些政策进行审议时，甚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它实施了过度的财政紧缩政策；在对未来经济进行预测时，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认为该项政策有意义[3]。但韩国的经济官员们却都保持沉默。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却没有能够从政府内部的官员身上找到答案，直到两年之后我再次访问韩国时，才揭开了谜底，而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得以恢复。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过去的经验，对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韩国官员很不情愿地解释说，他们不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公开地表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能够削减它自己的资助，而且能够通过向私有金融机构讲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经济的怀疑，利用它那充满威

胁的讲道来打消私有市场资金在韩国投资的念头。因此，韩国没有办法，只能保持沉默。甚至韩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做出隐含的批评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韩国的批评意味着韩国政府并没有充分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而是有所保留，因此韩国实际上不大可能彻底地贯彻和执行这一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情况，即该国已经“出轨”了。这里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任何偏离都标志着“出轨”）。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宣布谈判已经破裂，或者说谈判甚至会推迟，这将会向市场释放出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具有非常强的负面作用，其最好的情况是造成利率上升，而最糟糕的情况是造成所有的私有资金全部抽回。对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私人投资都很少的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严重的情况是，其他捐助者（世界银行、欧盟和许多其他国家）将会在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后才允许使用它们的资金。最近主动地进行债务减免又成功地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权力，因为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该国的经济政策，否则就不可能进行债务减免。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熟悉的那样，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这里存在较大的杠杆效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客户”国家间的权力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使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在谈判中的行为加剧了目前已经非常困难的局面。在规定协议条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效地限制了客户国家政府内部有关不同经济政策的任何讨论，更不用说在该国范围内进行更加广泛地讨论了。危机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会说还不到时候，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姿态。但无论有没有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没什么两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非常简单：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问题在争吵中提出来或者公开提出时，它们将被视为对从未受到侵犯的正统的挑战。而如果这些问题被接受，它们甚至可能会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可信度。政府领导人知道这一点，并且已经领会到其中的含义，因此他们会选择在私下进行争论，而不是公开地进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进行修正的机会很渺茫，而激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或者造成他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来对待其他问题的机会要大得多。如果他们生气了或者被激怒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会推迟其贷款——对于一个面临危机的国家来说这将会引起恐慌。但实际上，政府官员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方案保持步调一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同意这些方案，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知道这一点。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间典型的协议条款，甚至是不经意的翻翻都可以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资金接收者之间缺乏信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对整个过程都进行监督，不仅仅是监控健全的宏观管理相关的指标——诸如通货膨胀、增长和失业等，而且还监控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些中间变量，诸如货币供给等，而这些变量经常与最终关注问题的变量之间只存在松散的关联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制定严格的目标——以上事情应该在30天、60天或者90天内完成。有时候，一些协议甚至规定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或“目标”，该国的国会应该通过什么法律，并且规定如何通过这些法律。

这些要求都被称做“条件”（conditions），在发展中世界里，人们讨论非常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限制性”。[4] 当然，每一份贷款文件都包含了一些基本条件。最起码，一份贷款协议需要指出该项贷款需偿还，通常还要附上偿还的日程表。当然，还有很多协议被强行附上一些条件，并指出，附上这些条件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该项贷款能够被偿还的可能性。“限制性”就是指那些更强有力的条件，这些条件常常会使贷款成为政策工具。比如，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某个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它就会采取分期发放贷款的方式，将后续的分期发放贷款与可证实的自由化步骤捆绑在一起（即根据自由化步骤决定是否进一步发放贷款）。我个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少在形式和范围上已经利用了“限制性”，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能改善现有的经济政策，但是它的确具有负面的政治效应，因为这些国家非常怨恨那些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条件。某些拥护限制性的人会辩解说，任何银行家都会对借贷者强加一些条件，以使该项贷款能够得以偿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限制性与世界银行的限制性存在较大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限制性甚至降低了贷款被偿还的可能性。

例如，不管这些条件从长期范围内多么有价值，它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削弱

该国的经济，并且存在加剧衰退的风险，因此会使该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贷款更加困难。贸易壁垒的削减、垄断和税收扭曲等可能会提高长期增长率，但是其对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如同其试图去调整一样，可能只会加剧经济衰退。

虽然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托责任，可以证明这些限制性是不正当的；但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道德责任或提升受援国经济的名义看，这些限制性可能是正当的。但危险在于，即便制定这些条件的意图非常好，很多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会超过100个，并且每个条件都有苛刻的实现时间表——都会削弱该国处理紧急核心问题的能力。

这些条件已经超越经济学范畴，涉及本应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拿韩国的例子来说，贷款条件包括中央银行规章的变化，使韩国的中央银行更加独立于政治进程。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那些具有更加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国家实现了更快的增长速度[5]，或者其经济波动更少或更轻微。人们的普遍感觉是，欧洲独立的中央银行在2001年加剧了欧洲经济的衰退。因为，它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固执地对不断增加的失业这些天生的政治问题做出反应。仅仅为了表明它是独立的，就拒绝允许利率下降，对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毫无办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部分是因为欧洲中央银行以关注通货膨胀为自己的使命，关注通货膨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的，但它却只能抑制增长或加剧经济衰退。在韩国经济危机期间，虽然韩国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但韩国中央银行依然被告知不仅要更加独立，而且应该专注于通货膨胀；然而，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处理失当的货币政策与危机有什么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来推动它的政治议程。在韩国首都首尔，当我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时，我发现其答案令人震惊（虽然在那时不应该感到惊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们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些国家应该具备独立的中央银行，专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记忆深刻。在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时，我强烈反对由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康尼·麦克提出的试图改变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规章，并专注于通货膨胀的提议。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使命不仅仅是关注通货膨胀，它还要关注就业和经

济增长。总统也反对这种改变，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美国人民认为联邦储备银行已经是过多地关注了通货膨胀问题。总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将为此问题而斗争，而一旦这一问题弄清后，原先的支持者就退缩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是在美国财政部的影响下——向韩国强加了一些政治条件，即使是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条件他们都无法接受。

有时，这些条件看起来只不过是简单的权力训练：199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的贷款协议中，坚持要求韩国提前向特定的日本货物开放市场的日期，虽然这并不可能帮助韩国处理危机问题。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行动代表“抓住机会，打开窗户”，利用危机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推行的变革的杠杆作用；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纯政治力量在作祟，做出一些有限价值的让步，借此表明谁在当家做主而已。

限制性不仅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怨恨，而且也没能成功地实现发展。同时，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研究表明，限制性不仅没能保证资金能够很好地被利用，使这些国家实现快速增长；而且，根本就没有证据表明限制性能够发挥作用。毕竟，好的政策是买不来的。

限制性之所以不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最简单的原因可能与经济学家提出的可替代性这一基本概念相关。经济学家认为，可替代性就是资金因为某种目的而流入，与此同时释放了那些有其他用途的资金；这种影响或许与原先的意图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们强制施加的条件能够保证这一特定贷款得到很好的利用，但却不能保证该项特定贷款所释放出其他资源（资金）是否能够被很好地利用。比如，如果某个国家需要建设两条道路：一条是为了便于总统到达他的夏日别墅而修建的；另外一条是为了使大批农民能够将他们的产品运送到附近的港口而修建的；但是该国只能筹集到建设一条道路的资金。如果作为借贷协议的一部分，借贷者坚持对这笔贷款强制施加一些限制性条件，要求将这笔资金用于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道路建设中，即建设农村道路。如果该国政府能够获得贷款者提供的这笔资金，那么，该国本来用于建设农村道路的资金可能会被用于修建通往总统夏日别墅的道路。

限制性之所以没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样存在其他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

强制施加的条件是错误的：肯尼亚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和东亚国家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对这些国家都有负面影响。在其他情况下，这些限制性被强制施加的方法使其在政治上不能持续；当一个新政府掌权时，它将会抛弃这些条件。有些条件甚至被看做是新殖民权力，侵犯了该国的国家主权。政策经受不起政治进程的兴衰变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姿态中的确存在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假装它超越于政治。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贷方案部分是由政治驱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肯尼亚的腐败这一议题说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看到了肯尼亚的腐败问题，接着就停止了其规模本来就相对较小的贷款方案。但它却继续向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在有些人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没有注意到重大的盗窃罪，而是对一些不太重要的偷窃行为采取强硬立场。它不应该对肯尼亚的偷窃相对仁慈，因为相对于肯尼亚的经济规模来说，偷窃的数额已经够大了；它对俄罗斯应该更加严格。该问题不只是公平或一致性的问题；世界本身就不公平，没有人真正期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一个几乎没有战略重要性的非洲贫穷国家和一个具有核能力的国家。理解这一点相对简单得多：是否进行借贷具有政治性，并且政治性的判断经常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推动私有化，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如果由政府来管理企业，它将不能摆脱其承担的政治压力。任何未将经济从政治，或是对社会的广泛理解中分离出来的观念都是狭隘的。如果贷款提供者强制实施的政策引发了骚乱，就像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那么经济状况就会恶化，因为资本会出现外逃现象，并且企业界也会对投资更多的钱心存疑虑。无论是实现经济发展还是维持经济稳定，这些政策都不是正确的。

目前，不仅开始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是什么以及这些条件是如何强制实施的，也开始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条件是如何制定的。在访问一个客户国家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程序是先撰写一份草案报告。到客户国家去访问，只是打算对该草案报告和其建议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修正一些明显的错误。实践中，这些草案报告常常被称之为样板文件，整段整段的文

字从一个国家的报告中借用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报告中。文字处理器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这项工作。有一个看似虚构的小故事，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偶然的机会，某个文字处理器没能成功地执行“查找和替代”功能，为某个国家撰写的报告被借用，而这个国家的名字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为另一个国家而印发的文件中。很难说这不是因为时间紧急而出现的一次偶然，但这个小故事可以证明，在很多人心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都是千篇一律的。

即使那些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贷款的国家也会受这一观点的影响。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只是通过限制性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它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章第四条协商条款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各国进行磋商，确保每个国家都能够拥护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是为了贸易目的而实现汇率可兑换性）。代表团在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方面的活动时，它就悄悄地影响了该报告：真正的第四条协商只不过是整个监督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该报告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每个国家经济状况进行等级划分的总体评估。

虽然一些小国往往不得不听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章第四条进行的评估，但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却从来都不将其放在心上。比如说，即使美国的通胀水平达到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非常热衷于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的指示：提高利率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不明白美国经济当时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10年前已经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允许美国能够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和较低的通胀水平。如果美国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它就不会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这一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丰裕，使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转化为相当可观的财政盈余。较低的失业率对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关注。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在被排挤出劳动力队伍后又重新进入就业行列，从而削减了政府救济与福利支出，其幅度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反过来又降低了犯罪率，从而使得所有美国人都获益。另外较低的失业率鼓励个人承担风险，接受那些没有职业保障的工作；而这种愿意承担风险的精神正是美

国所谓“新经济”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

美国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联邦储备银行都没有对该问题予以过多的关注。美国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因为美国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捐助者的援助，并且我们知道市场同样不会重视我们是否忽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市场不会因为我们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惩罚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奖励我们。但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并不会如此幸运，如果它们忽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只会给它们带来危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进行评估和设计方案时要在某个国家内部进行广泛地咨询，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该国的人民可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更了解该国的经济情况，就像我们在美国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另一个原因是，要使设计的方案能够以有效、可接受的方式加以实施，必须要该国在广泛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承诺，而只有通过讨论才能达成这种一致性——但是在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避开了这种公开的讨论。公平地说，在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公开的讨论，即为了达成一致而进行范围广泛的磋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在非洲国家待了多年。如果说这是一种危机，那么它就是一次持久性的危机。在很多情况下，的确有时间进行磋商和达成一致，比如说在加纳，世界银行（当时我的前任迈克尔·布鲁诺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就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并且这只是宏观经济更为稳定的案例的一部分。

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时，越来越确信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政策与方案不能被强加到各国头上，这些国家要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由它们自己制定政策和方案，也就是说达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所制定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必须符合该国的情况。为此，“限制性”必须要向“选择性”转变，对那些将更多的资金运用地很好的国家给予奖励，相信它们能够继续很好地利用这些资金，并为它们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世界银行新的说法（rhetoric）反映了这一点，并由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 D. 沃尔芬森强有力地加以阐述：“应该将国家置于驾驶员的位置。”即使是这样，或许有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一进程还远不

充分，世界银行依然希望保持控制权。他们担心国家坐在被双重控制的汽车驾驶员座位上，而实际上，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教练手中。改变世界银行的态度和操作程序非常缓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同国家，世界银行的计划实施步骤也不同。但在这些问题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无论是态度上还是程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至少在公共的陈述中，同世界银行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完全忽视贫穷国家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以及更大程度地关注贫穷问题。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同意指引“供人分享的”贫困评估。在贫困评估过程中，作为第一步，客户国家要参与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来，首先评估该问题的规模。从哲学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潜在的戏剧性转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像并没完全明白客户国家参与的重要性。一次偶然的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世界银行可能领导贫困项目，当时贫困项目刚开始启动。理论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应该为某个特定客户国家的前期咨询进行准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向世界银行发出一个非常专横的信息，要求世界银行“尽快”将其针对客户国家“参与的”贫困评估草案送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我们中的一些人开玩笑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事情搞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只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代表团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哲学变化，因此，实际上只有世界银行有权对一些已经成文的内容发表不同的看法，至于借贷国的公民也可以参与进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这类故事非常有趣，也正是他们不曾担忧的。

然而，即使是参与的贫困评估，也没能完全地贯彻，它们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即便是现实和预期之间依然存在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应该针对他们自己的方案有自己的声音，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如果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差距继续长期存在或者依然如此之大，就会令人失望。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质疑，并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大。虽然已经对参与的贫困评估进行了更为公开的讨论，但是与以往的案例相比，许多国家期望更多的参与，并要求进行更公开的讨论，这一期望并没有实现，因此，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

在美国和其他成功的民主主义社会，公民将透明度、公开、知道政府在做什么，等等，视为政府责任的实质内容。公民将这些视为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恩赐。美国政府于1966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案》成为美国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转模式中，它不仅将公民（因为这些公民通常非常不情愿地支持这些协议，更不要说与他们分享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了，因此，他们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烦恼）从参与讨论的名单中排除，甚至都不告诉他们这些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关于保密的流行文化的确非常强烈，许多谈判和一些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世界银行的成员保密，甚至对联合代表团也保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严格按照“有必要知道”这一基本原则来提供信息。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团长、位于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少数人以及客户国家政府的少数人在这个“有必要知道”的名单中。世界银行的同事们经常抱怨说，即使是那些代表团的人也不得不到那些肯“透露”正在做些什么事的国家政府去获得消息。有好几次，我遇到一些执行董事（即各国派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他们代表这些国家，我们称之为执行董事），很明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是一头雾水。

最近有一段插曲表明，如果缺乏透明度，结果将会怎样。现在，大家或许都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声音较弱。这个问题到底是历史时代的错误还是实习政策的表现，目前还存在争论。但我们应该期望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会——做点什么，至少是在要求其执行董事如何投票这方面做点什么。美国的执行董事代表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行事。2001年，国会通过、总统也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反对国际金融机构要求对小学收费的提案（这是以“成本复苏”为名义而毫无用处的一项实践）。但是，美国的执行董事忽视了该项法律，且由于机构的保密性，美国国会——或者其他任何人——很难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根本无法知道其执行董事是否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行事）。后来，只是因为消息泄露了，人们才发现这一问题，从而激怒了那些甚至习惯于官僚行为的国会议员。

当前，尽管对公开和透明度进行多次讨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没有

正式地认识到公民基本的“知情权”：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能通过《信息自由法案》弄清楚国际公共机构正在做些什么。

我应该说明：所有这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模式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和实践都白白浪费了。有时候，资金能够流入那些具有良好政策的政府——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政策都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这样，这些资金的确很好地发挥了作用。有时候，限制性转移了国家内部制定好的政策方法的争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僵化时间表部分地来自于以往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政府承诺进行一定的改革，但一旦他们有了资金，这些改革就不会出现；有时候，这些僵化的时间表有利于强制变革的步伐。但通常的情况是，限制性并不能保证这些资金能够很好地被利用，同时也不能保证发生有意义、深远的和长期持续的政策改变。有时候，限制性甚至是事与愿违的，不仅是因为这些政策不能很好地适应该国，还因为强制施加这些限制性的方式造成该国人们对改革进程的敌意。还有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不仅仅导致这些国家贫穷，并且还造成该国承担更多的债务，甚至产生了更多的统治精英。

国际机构完全逃避了我们对现代民主中公共机构所期望的那些直接责任。目前，是给国际经济机构的表现进行“评级”以及对这些国际机构在某些地方制定的方案进行审议的时候了，看看他们到底在促进增长和降低贫困方面做得有多好或者有多糟。

第3章

自由选择

财政约束、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华盛顿共识”建议的三个重要支柱。华盛顿共识政策[⊖]是用来处理拉美国家出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并且具有重大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一些国家政府存在巨额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主要是由无效的政府企业的亏损所造成的。由于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政府企业远离竞争，这样，无效率的私有企业迫使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这些国家不能长期在巨额的财政赤字下运转，而且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就不得不要求一定程度的财政纪律。如果政府集中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不是管理那些在私营部门毫无争议地表现得更好的企业，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就比较好；因此，可以说自由化常常显得非常有意义。当贸易自由化——削减关税和取消其他保护主义措施——按照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步骤实现时，就会在消除那些无效工作岗位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样，就存在非常明显的效率收益。

问题是，到后来，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本身都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成为建立更公平和持续的增长手段（方式）。在具体操作这些政策时，政策被实

⊖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有关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金融和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斯认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经济采用和将要采用的政策上取得了共识，并根据会议精神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主张，即：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政府开支应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改革税制，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译者注

施得太远、太快，以至于将其他需要的政策都排除在外。

结果，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财政约束在错误的环境下被过度实施，将会导致衰退；高利率将会抑制未成熟的商业企业的成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兴致勃勃地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其推行的步伐和方式往往给那些准备不足的国家增加了非常实际的成本。

私有化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政府通常会花费较大的经历来做它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将会影响它们做本应该做的事情。问题不是因为政府太大，而是因为政府没能做正确的事情。基本上，政府很少管理钢铁制造厂，即使管，也是弄得一团糟（尽管世界上最有效的钢铁制造厂是由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创建和管理的，但它们是例外）。总体上，竞争性的私有企业能够使某些功能有效地发挥，这正是私有化的论据——将国家管理的工业和企业转变为私人部门管理。然而，要使私有化对经济增长做贡献，必须满足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且私有化的实现方式也大相径庭。

不幸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非常狭隘的意识形态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们认为，私有化应该迅速地进行，并且要对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进行打分，那些私有化进展较快的国家可以获得高分。结果，私有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利益，进而，私有化的失败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导致每个私有化观点都招来憎恨（厌恶）。

1998 年，访问摩洛哥的一些贫穷山村时，我看到世界银行和非政府组织采取的政策方案对山村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比如，共产主义的基本灌溉项目较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率水平。但也有些政策方案没能成功。某个非政府组织非常辛苦地向当地的村民传授饲养小鸡的技术，建立一些农村妇女在从事更为传统的活动时能够胜任的企业。刚开始时，这些农村妇女都能够从政府企业那里买到刚出壳 7 天的小鸡。但当我访问该村庄时，这个新企业倒闭了。我和村民及政府官员讨论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结果发现答案很简单：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告诉该国政府，政府不应该经营小鸡的分销，因此，政府就取消了小鸡销售。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简单地假设，如果政府取消了小鸡分销，那么将会有类似的私人部门立即来填补这一空缺，进行小鸡分销。事实正是如此，有一家私有部门开始向村民们提供刚出壳的小鸡。但是在前两个星期，这些小鸡的死亡率较高，但该私有企业却不愿意提供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自然就不能够承担购买可能大量死亡的小鸡的风险。这样，一个本可以改变贫困农民生活水平的新生企业倒闭了。

这个失败的例子所隐含的假设就是我发现并不断重复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单地假设市场能够快速地符合每项需要，当市场实际上不能够提供基础服务时，一些政府活动才出现。这样的例子大量存在。除了在美国，这一点非常明显。当许多欧洲国家建立它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失业保险和残疾人保险体系时，运行良好的私有养老金市场并不存在，没有私有企业销售抵御这些风险的保险，但在个人生活中经常伴随着这些风险，它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在美国最为严重的大萧条后期，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在美国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其私有养老金市场运行得也不好——甚至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人能够获得抵御通货膨胀的保险。同样，在美国，建立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Fannie Mae）的原因之一就是私有市场不能以合理的条件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质押贷款。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取消政府企业将会留下巨大缺口——即使最终私有部门弥补了该缺口，但在缺口存在期间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如同我们常见的案例一样，在适当的规制或竞争框架建立起来之前，科特迪瓦就开始对电话公司进行私有化改革。购买了政府资产的一家法国企业成功地说服科特迪瓦政府不仅在已有的电话服务方面，而且在新的蜂窝服务方面，都给予该企业垄断地位。这样，私有企业不得不提高价格，价格之高以致在校大学生根本支付不起链接互联网的费用，而互联网却是避免富人和穷人，在数字准入方面已经存在的鸿沟进一步扩大的必需媒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快速私有化更为重要；我们可以随后再处理竞争和规制的问题。但这里存在的危险是，一旦既定利益已经形成，就会存在一定的

动机和资金来维持其垄断地位，压制规制和竞争，从而在这一进程中扭曲政治程序。与以前相比，为什么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不关注竞争和规制，这里存有很自然的原因。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对垄断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可以使政府产生更多的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地关注于宏观经济问题，比如政府赤字规模；而不考虑其结构性问题，比如企业的效率和竞争性。姑且不论私有垄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比国有垄断企业更为有效，至少它们在利用其垄断地位进行利己方面更为有效，且最终都需要由消费者承担损失。

私有化不仅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同时也对工人造成损害。私有化对就业的影响可能是支持和反对私有化的主要论据。那些提倡私有化的人认为，只有通过私有化才能淘汰那些生产率低的工人；而反对私有化的人则认为，私有化会削减工作岗位但不会对社会成本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上，这两个观点都有大量值得论证的事实。私有化通常会通过调整工资水平使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然而，经济学家们的假设都关注整体效益。虽然同样存在与失业相联系的社会成本，但私有企业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在给定最小限度工作保障的情况下，雇主可以开除工人，其成本较低或者没有成本，充其量就是支付微薄的中断契约补偿金。私有化遭受如此广泛的批评是因为不像那些所谓的绿地投资[⊖]——反对私有投资者接手现有企业，而是要求投资新建企业——私有化常常是摧毁工作岗位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

在工业化国家，人们承认失业是痛苦的，并且通过失业保险这一安全网稍微改善了失业的痛苦。在欠发达国家，由于基本上不存在失业保险计划，因此失业工人通常不会成为公共负担，但却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并且以城市暴动、犯罪增加、社会和政治动荡等最糟糕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不存在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巨大的失业成本，主要包括：既使是那些努力保住自己工作岗位的人们也会感到非常不安；那些成功维持雇用的家庭成员也会感到更加孤独，并增加了额外的资金负担；为了使孩子能够帮忙持家，很多家庭不得不让孩子辍学。这类社会成本可能在直接失去工作后维持较长时间。当某个企业被

⊖ 绿地投资又称为创建投资或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译者注

出售给外国人时，这种情况常常尤其明显。至少，如果国内企业知道其员工不能获得其他工作时，这些企业会考虑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并努力适应该社会背景而不情愿解雇工人。另一方面，外国所有者可能会通过降低成本来履行其对股东承诺的股票市场价值最大化义务，而很少考虑提出的作为“过于膨胀的劳动力”的义务。

改组国有企业非常重要，而私有化常常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的有效方法。但是，将人民从在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工作变成失业并不会增加该国的收入，并且它的确也没有提高工人的福利水平。道德是非常简单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再次重复：私有化的需要仅仅是更全面方案的一部分，当私有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就业机会减少时，道德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必须实施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较低的利率水平，它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时机选择（和秩序）就是一切。这些不仅仅是实用主义问题，也不仅仅是“执行”问题，而是原则问题。

私有化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就是经常会导致腐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花言巧语声称私有化会降低经济学家所谓的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这些政府官员要么撇去政府企业的利润，要么为他们的朋友签署合同或为其找工作提供便利。但与其设想的相反，在许多国家（这些国家中，私有化如今成为“行贿”的笑话），私有化使腐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政府开始腐败的时候，没有证据表明私有化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毕竟，正是对这些企业管理不善的那些腐败政府在处理私有化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私有化意味着他们不再受限于每年去撇去企业利益。通过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政府企业出售，他们能够为自己获取资产价值中最重要的一大块，而不是将其留给后任官员。如今，他们就能有效地窃取那些很有可能被未来政治家撇去的大部分企业利润。毫不奇怪，之所以设计非法操纵的私有化程序，其目的就是使政府部长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使政府国库的收入最大化，更不用说经济的整体效率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研究“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私有化”伤害的破坏

⊖ 在韩国进行讨论时，我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点。私有所有者在解雇其工人时显示出巨大的道德心；他们觉得存在社会合约，不情愿废除，即便这意味着他们自己将会损失资金。

性时，俄罗斯为我们提供了案例。

私有化的提倡者幼稚地说服他们自己可以忽视这些成本，因为好像在教科书里讲到，一旦清楚地定义私有财产权后，新的所有者将会确保有效地管理这些资产。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在短期内这种状况不尽如人意，但长期来说，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缺乏合适的法律框架和市场机制，新的所有者可能会剥去这些资产，而不是以此为基础进行企业扩张。结果，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私有化都没能像它应该的那样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相反，有时候私有化与衰退相关，并且能够证明私有化是破坏民主和市场机构信心的强大力量。

自由化

自由化——取消政府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贸易壁垒的干涉——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今，甚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都认为它在自由化议程方面走得太远，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并将其破坏作用向一些小的新兴国家蔓延。

在某些方面，自由化得到广泛的支持——至少是得到发达工业国家精英们的支持——这其中有一方面就是贸易自由化。但如果更近距离地观察贸易自由化，看看它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贸易自由化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正如我们在西雅图、布拉格和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抗议活动一样。

一般认为，通过强迫资源从低生产率利用的领域转移到更有效的使用领域，贸易自由化能够提高一国的收入；正如经济学家们认为的，这是利用比较优势的结果。但资源从低生产率利用向零生产率的转移并不能使某个国家富裕，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实施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将工作机会摧毁非常容易，正如无效的企业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倒闭时那样，这正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直接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识形态固执地认为，随着取消由于保护主义壁垒的庇护而形成的旧式的、无效的工作，就会创造新

的、更有效的工作机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工作机会能够在瞬间被创造出来，至少在大萧条期间不会这样。创造新的企业和工作，必须要有资本和企业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就是缺乏商业机会和缺少资金（由于缺少银行的支持），在许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它的财政紧缩方案常常也造成利率的提高，利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时超过20%、有时超过50%、甚至有时超过100%。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美国这些经济环境非常好的国家，也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和企业，更别说是发展中国家了。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实在是太昂贵了。

虽然东亚地区那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向外国开放自己的市场，但它们开放的步伐比较慢，并且是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进行的。结果，这些国家能够利用全球化来增加其出口，并且其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些国家在削减贸易壁垒时非常谨慎和系统，只有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后才取消贸易壁垒。它们确保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企业时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同时，在创造新的企业时，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在中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20年来，它正逐步取消贸易壁垒，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

我们应该发现，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一样很容易关注这些问题。在最近两次美国总统竞选中，候选人帕特·布坎南就利用了美国工人担心贸易自由化会造成他们失去工作这一点。即使在接近充分就业的国家（1999年的失业率下降到4%），这些国家具有完善的失业保险体系，再借助一系列的援助就可以帮助工人从某项工作转到另一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布坎南的竞选主题也引起共鸣。事实上，就连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美国工人也非常担心贸易自由化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威胁，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贫穷发展中国家工人的状况，在这些国家中，工人处于生存的边缘，他们的日均消费水平仅为2美元甚至不足2美元，而且没有储蓄形式的安全网，几乎没有失业保险，且它们的失业率高达20%甚至更高。

实际上，贸易自由化后出现的事实往往不能够兑现其承诺——相反，它只是造成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一直遭受强烈反对的原因。但是，那些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壁垒以及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毫无疑问增加了对贸易自由化的

敌意。西方国家推动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出口它们的产品，但同时继续保护那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可能对其经济造成威胁的部门。这原本就是在西雅图开展新一轮贸易谈判遭受反对的原因之一；前几轮的贸易谈判已经保护了发达工业国家的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保护了这些国家内的一些特殊利益，而欠发达国家没有获得对等的利益。抗议者非常明确地指出，前几轮贸易谈判已经大大削减了工业品的贸易壁垒，从发达工业国家出口的汽车到机械。同时，这些国家的谈判者却维持他们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并且继续关闭诸如纺织品等货物的市场，而纺织品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

最近进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将服务贸易纳入到谈判的议题。不管怎样，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服务的出口开放市场，诸如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服务，但不包括海运服务和建筑服务，而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优势的领域。美国吹嘘其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了利益，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成比例的利益份额。世界银行的一项计算表明，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南部非洲[⊖]，因为该项贸易协议，收入下降超过了2%。同样，存在很多其他不公平的例子，并且逐渐成为发展中世界谈论的主题，虽然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很少报道这些议题。相对于其他农作物来说，古柯（coca）（可卡因的主要原料）能够为玻利维亚已经非常贫穷的农民提供更高的收入，但玻利维亚将其贸易壁垒削减到甚至低于美国的贸易壁垒的水平，并且与美国合作从本质上消灭了该国这种农作物的种植。然而，作为回应，美国可替代的农产品市场却依然不开放，如食糖，如果美国对玻利维亚的农产品开放市场，那么它就可以生产这些农产品以用来出口。

由于长时间内一直是虚伪的、不公平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对这种双重标准极其愤怒。早在19世纪，西方列强——它们中有许多都是利用保护主义政策取得发展的——已经强行签署了一些不公平的贸易条约。最可恶的可能就是，鸦片战争后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攻打虚弱的中国，并且联合俄国和美国的力量向中国施压，最终签署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它不仅是对贸易和领土

⊖ 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译者注

做出的让步，确保中国能够按照西方列强希望的非常低的价格向它们出口货物，而且也向它们开放了鸦片市场，以至于数十万中国人沉溺于吸食鸦片成为瘾君子（有人可能将其视为以魔鬼的方式实现的“贸易平衡”）。现在，不是通过军事力量强迫新兴国家开放市场，而是通过经济实力、通过在危急时批准或取消新兴国家需要的援助强迫它们开放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是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的场所，美国贸易谈判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坚持谈判要更加深入，要加快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将快速贸易自由化的步骤作为对外援助的条件——那些面临危机的国家觉得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当美国单方面而不是打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幌子行事时，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因为受美国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或者商务部常常对外国进行指控；这就存在审议程序的问题——整个过程只有美国政府参与——在美国得出结论后，就对所有的冒犯国家进行制裁。美国将自己视为检举人、裁判和陪审团。虽然同样存在准司法程序，但成功的机会很小：无论是规则还是法官都倾向于发现罪证。当美国利用这些手段来对付其他工业国家时，比方说欧盟和日本，这些国家却有资源来保护自己；但当美国利用这些手段来对付发展中国家时，即使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印度和中国，这也是不公平的竞赛。对美国来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其造成的影响远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增强国际贸易体系的信心。

美国用来维护其地位的说辞加深了这一超级大国为其特殊利益集团而四处仗势欺人的印象。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担任第一届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时，希望中国更快地开放市场。1994 年，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他自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为其成员制定了基本规则。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较长时间的调整期，这非常合理。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这个人均收入只有 450 美元的国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米基·坎特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他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因此应该加快转型的速度。

在这个问题上米基·坎特有一定的筹码，因为中国需要美国批准其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最终，中美协议的签署使得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表明美国的立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毫无理由地坚持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以此来拖延谈判；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自我调整。实际上，美国无意中给予了中国更多的发展时间。但协议本身却表明，双重标准和不公平发挥了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而坚持要求中国进行快速的调整，由于中国已经很好地利用了美国拖延的谈判时间，它能够接受美国的要求；但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将自己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来对待，对于美国纺织品进口贸易壁垒的削减，不仅要求中国给予它10年的调整期（这是1994年谈判的部分内容），而且还要求4年的延长期。

尤其让人心烦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如何破坏美国的信誉和更宽范围的国家利益。这个问题在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时被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部分原因是为了完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这对于世界贸易体制来说是件大事，但我们看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中国是如何被排除在该体制之外的，更何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自身的市场化改革也是有利的。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和国务院强烈反对，但美国财政部还是坚持要在中美协议中加入中国要对其金融市场更快速的自由化这一条。中国完全有理由为此担忧，因为很明显，正是快速的金融市场自由化造成东亚地区中国邻国的金融危机，并且它们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幸运的是，由于中国选择了明智的政策，从而得以幸免。

美国要求中国对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不会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它只是为以财政部为主要代表的美国金融团体的利益集团服务。华尔街相信，在金融服务方面，中国象征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在其他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前，华尔街能进入该市场并站稳脚跟非常重要。这是多么没有远见啊！非常明显，中国的金融市场最终将会对外开放。美国匆忙地使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提前一两年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除非华尔街担心，欧洲和其他各地的金融机构能够在短期内赶上华尔街的竞争者，从而使华尔街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但是，潜在的成本非常巨大。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下，要求中国接受该条约几乎是不可

能的。对中国来说，保持稳定非常重要；其他地区业已证明，快速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非常不稳定，中国不会再为此而冒险。因此，朱镕基总理只得选择回国，放弃签署协议。在中国内部，改革推动者和改革反对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改革反对者们认为，西方国家希望削弱中国，因此它们从来不会与中国签署公平的协议。如果谈判成功，则有助于提升中国政府中改革者的地位，并增加改革运动的能量。但由于没能成功地结束谈判，朱镕基及其支持的改革运动受到质疑，并且削弱了改革派的力量和影响力。幸运的是，这种破坏只是暂时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了追求其特殊的议程，美国财政部甘愿冒多么大的风险。

即使所推行的贸易议程是不公平的，至少仍有明显的理论和事实表明，如果这些贸易议程能够合理地实施，那么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件好事。在金融市场自由化这个例子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问题。许多国家的确存在一些金融规制，这些规制除了能够增加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外，对于实现其目标毫无用处，这些金融规制当然应该被废除。但所有的国家都对其金融市场有所规制，并且，过分狂热的撤销规制已经对其资本市场甚至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带来严重的问题。这里我仅举一例，即美国声名狼藉的储贷危机：一方面，它是美国1991年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了超过2 0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这也是撤销规制带来的成本最低（按占GDP的比例计算）的救援行为，相对于其他经受相似危机的国家来说，美国的衰退是最温和的。

正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及其经验丰富的机构在汲取金融规制撤销的深刻教训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试图将里根、撒切尔的信息带到发展中国家，事实证明，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这些国家在管理充满风险的困难任务时准备得依然不足。然而，更为发达的工业国家直到其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才开始尝试进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改革：对欧洲国家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摆脱资本市场的控制；但它们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尽快地进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改革。

资本市场规制的撤销造成银行危机，进而会造成经济衰退，这一结果对发达国家来说非常痛苦，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更为严重。贫穷的国家

没有建立安全网以缓和衰退的影响。另外，金融市场中有限的竞争意味着金融自由化并不总会降低利率，因此不会实现利率降低的利益。相反，农民们有时候发现他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这样，他们就更难购买为竭力维持生计而必需的种子和化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同贸易自由化的早熟和管理不善的缺陷一样，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很多方式更加糟糕。资本市场自由化包括解除旨在控制热钱流入和流出某个国家的规制——短期贷款和协议只是押在汇率变动上的赌注。无法利用这些投机性资金来创建工厂或者创造就业机会，因为公司不会利用这些瞬间通知就能立马流出的资金进行长期投资。相反，由于这类热钱带来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长期投资更没有吸引力。因为无法吸引长期投资，就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为控制与这些不稳定资本流动相关的风险，这些国家通常被建议留出一定的准备金，其数额相当于短期外币贷款。让我们举个例子看看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假设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小型企业从美国银行接受了一笔1亿美元的短期贷款，支付的利息率为18%。出于谨慎政策的要求，该国需要增加1亿美元的储备。通常情况下，储备的主要方式是持有美国国债，目前，美国国债支付的利息大约为4%。结果，该国的企业以18%的利率从美国取得贷款，与此同时，又将该笔贷款以2%[⊖]的利率借贷给美国政府。由此可以看出，该国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投资，反倒是美国银行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总体上，美国每年可以获得1 400万美元的利息收益。我们无法看出这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较快增长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么说吧，非常明显，它对于发展中国家毫无疑义。另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借贷的动机不兼容。在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是某个国家的私人部门企业决定是否从美国银行借贷短期资金，但政府必须进行自身调节，如果它希望保持谨慎的立场，就需要增加外汇储备。

在追求资本市场自由化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赖过于简单的推理：自由市场更为有效，较高的效率会实现较快的增长。但是，这一简单的推理忽视了

⊖ 译者认为原文印刷有误，应是4%。——译者注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些争议，而且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说，如果不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那么这些国家将无法吸引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声称他们是伟大的理论家；之所以宣称他们是专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全球的经验以及他们对数据的掌控。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甚至是数据也没法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论。中国能够吸引大规模的外商投资，但却没有遵循西方的任何指示（除了宏观稳定外），而是谨慎地阻止资本市场的全面自由化。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由化给出的定义，我们发现自由化并没有带来较快的增长或者较高的投资，更多的统计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

中国的实践表明，要吸引资金，资本市场自由化并不是必须的，问题的实质是：在东亚地区存在高储蓄率（占 GDP 的 30% ~40%，相对于美国的 18% 和欧洲的 17% ~30%）的情况下，该地区几乎不需要额外的资金[⊖]，它本身已经面临如何将这些储蓄很好地用于投资这一重大挑战。

自由化的提倡者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即自由化将会通过多样化资金来源而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结合 1997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看，这一观点尤其可笑。这一观点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这些国家能够向外国人求助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都是精通国际经济实务的，因此，他们一定知道银行家更倾向于将资金借给那些并不需要这些资金的人；同样，他们也一定已经看到当这些国家面对困难时，这些银行家们是如何做的，那些外国借贷者将其资金抽回，从而加重了经济下滑。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一步审视为什么自由化增加了不稳定性，尤其是在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机构之前过早实施的自由化。一个事实依然非常明显：不稳定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其代价是由穷人以不合理的比例来承担的。

外商投资的作用

外商投资并不是华盛顿共识三个主要支柱之一，但它是新全球化的主要部

⊖ 即不需要外国资金。——译者注

分。根据华盛顿共识，通过自由化和释放市场（freeing up markets）来实现增长。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被认为能创造吸引投资（包括国外投资）的环境，此类投资能够实现增长。外国商业在进入国内市场时带来了技术专家，为国内企业带来外国市场，并且具有创造新就业的可能。外国公司同样也能够获得融资来源，这对于本国金融机构十分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在很多（但是不所有的）发展最成功的国家（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中，外国直接投资在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即使如此，外商投资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方面。当外国商业进入国内时，它们常常摧毁了当地的竞争者，打消了小商人希望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进入本土市场后，本地的软饮料生产商都受到它们的压制。当地的冰激凌生产商发现它们根本不可能与联合利华的冰激凌产品进行竞争。

要想将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方法之一就是回忆在美国发生的关于药店和便利店大型连锁的争论。当沃尔玛进入某个社区时，常常会遭到当地企业的强烈反对，它们担心（这是正确的）会被沃尔玛替代。当地的商店店主担心它们无法与沃尔玛进行竞争，主要是因为沃尔玛购买力非常强大。生活在小城市的人们担心，如果当地的所有商店都被摧毁了，该社区的性质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在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忧虑要强烈 1 000 倍。虽然这些关注是合理的，但我们也必须坚持另外一个观点：沃尔玛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低价向消费者提供货物。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许多贫民几乎是在生存的边缘度日，因此，货物和服务能更有效地递送到他们手中显得更加重要。

但是，批判者提出了几个观点。在没有强有力（或者说是有效实施）的竞争法的情况下，当国际企业排挤了当地的竞争者后，它有可能会利用其垄断力量提高价格，这样，低价格所获得的利益将不会持久。

关键的问题部分在于步骤；当地的商业宣称，如果给予它们时间，它们能够适应和应对竞争，也能够有效地生产货物，这对于加强当地社区（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建设、保护当地商业非常重要。然而问题是，当初那些本应该作为应对国外竞争的暂时性保护政策就变成永久性的政策了。

在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做的要少于它们可以做到的。它们逐渐认识到在国内吸取的教训。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从而降低总成本——或者至少不会大幅度地提高成本。

银行业是外国企业经常侵占本土企业的另外一个领域。相对于当地的小银行来说，大型的美国银行能够为存款者提供更大的保险（除非当地政府能够提供存款保险）。美国政府曾经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其优势非常明显：增加竞争能够导致银行改善其服务。外国银行更大的金融实力能够提高金融稳定性。然而，外国银行对本土银行部门造成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但在美国，同样的问题也存在广泛的争论。因为担心资金将会流入到主要的金融中心（比如纽约），使得那些需要资金的边缘区域根本无法获得必需的资金，因此，全国性的银行受到抵制（直到在华尔街的影响下，克林顿政府扭转了民主党传统的地位为止）。阿根廷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这一危险。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前，其国内的银行业已经由外国所有的银行控制，随着这些银行能够轻易为跨国公司（甚至一些大型的国内企业）提供资金，中小型企业开始抱怨缺少准入资本。鉴于国际银行的专长和它们掌握的基础信息，它们更倾向于向其传统客户贷款。最终，它们会拓展到其他的利基市场中，或者出现新的金融机构以弥补这些缺口。缺乏增长——实际上是缺乏金融支持——在那些国家的衰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阿根廷已经广泛认识到该问题，政府采取了有限的步骤来弥补信用缺口。但政府借贷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阿根廷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些基本的教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强调银行稳定的重要性。建立不会因为坏账而损失资金的健全银行很容易，只需要要求它们投资于美国国债就可以了。挑战不只是要建立健全的银行，而且要建立能够为增长提供信贷的健全的银行。阿根廷的例子表明，如果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本身就可能会导致宏观不稳定。因为缺乏增长，它就不可能弥补财政赤字，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强迫减少支出，提高税收，最终会造成经济螺旋下降和社会不安的恶性循环。

对于外国银行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玻利维亚提供了另外一个案例。2001年，在玻利维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家外国银行突然决定，鉴于全

球风险不断增加，将紧缩其信贷规模。信贷供应方面的突然变化使得该国经济陷入更深的低迷，其危害程度要超过早期已经出现的商品价格下滑和全球经济衰退。

对于外国银行的侵扰方面，还存在其他的问题。国内银行对被称之为“窗口指导”[⊖]的政策非常敏感，所谓“窗口指导”，是中央银行用来施加影响的非常微妙的形式。比如，在经济需要进行刺激时扩张信贷，在存在经济过热的信号时紧缩信贷。但是，外国银行不情愿也不会对这类信号做出反应。与此相似，国内银行更有可能对弥补信贷系统的基本缺口（即有些群体尚未享有服务或者服务不足道，比如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做出反应。在具备最发达信贷市场的美国，都觉得这些缺口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 1977 年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案》，强制要求银行向那些服务不周的群体和地区进行借贷。即使是有争议的，《社区再投资法案》也是实现关键社会目标的重要方式。

然而，金融领域不是外国投资者集中投资的唯一领域。在某些情况下，新的投资者说服（经常伴随着贿赂）政府给予他们特别的优待，比如关税保护。在很多情况下中，美国、法国或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也参与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强化这一观点，即政府干涉并从私有部门中获得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作用看起来是无伤大雅的（虽然对反腐败并非必要）。美国商务部长伦·布朗在国外访问时，那些试图与其保持联系并且试图进入这些新兴市场的商人们都会伴其左右。可以推测，如果某人对竞选具有重要的贡献，那么他获得与部长同乘一架飞机的机会将会增加。

在其他情况下，政府会被用来抵消其他政府的分量。在科特迪瓦，当法国政府支持法国电信试图排除独立的（美国）蜂窝电话公司的竞争时，美国政府则出面支持美国企业。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行为超过了合理的领域。在阿根廷，当法国苏伊士里昂水务公司与阿根廷水务公司签署完供水设施协议后，法国公司发现其能够获得的利益并不像其当初想象得那么多，于是，法国

⊖ 窗口指导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劝告和建议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属于温和的、非强制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它是一种劝谕式监管手段，指监管机构向金融机构解释说明相关政策意图，提出指导性意见，或者根据监管信息向金融机构提示风险。——译者注

公司试图重新修改协议条款，而法国政府也加入进来对阿根廷进行施压。

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要求一些国家履行协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协议通常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公平，而且经常是由这些国家的腐败政府签署的。1994 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克林顿总统鼓励美国企业到印度尼西亚投资。很多企业这样做了，且往往获得非常优惠的条件（其中不乏用贿赂打通关口，实际上，这对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利）。与此类似，世界银行也鼓励私有电力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投资，比如巴基斯坦。这些合同包括这样的条款：政府承诺以非常高的价格购买大量的电力（即所谓的拿走或支付条款）。私有部门获得利润，政府承担风险，这就足够糟糕了。但当腐败的政府被推翻后（1998 年印度尼西亚的穆罕默德·苏哈托政府被推翻，1999 年巴基斯坦的纳瓦兹·谢里夫政府上台），美国政府向这些新政府施压，要求它们继续履行这些合同，而不是违约或者至少对合同条款重新进行谈判。实际上，西方列强利用其强权强迫履行“不公平”的条约已经有很长时间了。[1]

还有很多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合理理由。因为常常是从政府那里获得特权，这些投资才繁荣起来。当标准的经济学开始关注这些特权所造成的“扭曲”动机时，就会发现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通常，这些特权都是腐败或者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的结果。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代价就是破坏了民主的进程。尤其是采矿业、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投资，更是如此；在这些领域，外国投资者具有真实动机以获得低价的特许权。

更有甚者，这种投资还具有其他的负面影响——通常，该类投资并不能促进增长。虽然采矿特许权所带来的收入可以是无价的，但发展需要社会的转变。对采矿业进行投资——比如说在某个国家的偏远地区——除了投资产生的资源外，对于帮助发展转变不起任何作用。这种投资有助于形成二元经济，一种存在财富口袋的二元经济。但是二元经济不是发达的经济。相反，实际上，资本流入有时能够通过一个所谓的“荷兰病”机制阻碍发展。资本流入导致本币升值，从而使进口变得便宜而出口变得昂贵。“荷兰病”这个名称来源于在荷兰北海地区发现了天然气之后的经历。天然气的销售导致荷兰的货币升值，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该国的其他出口企业。对于荷兰来说，虽然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但并非不能解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更糟糕的是，资源的可获得性可以改变动机：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样，不会去集中精力创造财富。有许多资源禀赋非常高的国家，人们都非常努力以争取占有与自然资源相联系的收入（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租”）。

对于我已经概括的问题，国际金融机构有意忽略了。的确，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就业议题时，其对创造就业机会的规定非常简单：取消政府的干预（以压制性规制的方式）、减少税收、尽可能地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引进外国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政策都反映了我在前面章节已经描述的殖民主义心态：发展中国家可能必须依赖外国企业家。日本和韩国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功，在这两个国家中，外国投资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视而不见。还有其他的案例，比如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它们一直保持着对外国投资滥用的限制。虽然在这些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因为这些国家的储蓄率都很高，并不真正需要资本），甚至也不是外国企业家发挥了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市场准入和其带来的新技术。

秩序和步骤

或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犯下的错误，主要是秩序和步骤的失误，并且不重视那些最应该得到重视的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在安全网投入使用前，在没有建立合适的规制框架前，在这些国家能够承受现代资本主义部分是因为市场情感突然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前，强制推行自由化；在就业创造的要素到位前，强制推行那些摧毁工作机会的政策；在建立合适的竞争和规制框架前，强制推行私有化。这些一连串的失误反映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和政治程序基本原理的误解，而这些误解与那些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尤其相关。例如，这些人认为，一旦建立了私有财产权，那么，其他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包括那些能够使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机构和此类法制框架。

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背后，存在一个起源于亚当·斯密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力量——追求利润的动机——能够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驱动经济进行有效产出。现代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表明斯密的结论是正确的和有条件的。别忘了，这些条件是非常严格的。[2] 相反，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正出现于对华盛顿共识政策最执著的追逐时期——表明，只要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善（一般情况下，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不能最完美地运作。更为重要的是，原则上，如果政府干预是适当的，那么这种干预就能够改善市场效率。这些限制条件非常重要，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市场才能产生效率——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可以看做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金融市场将不会发挥作用，而且金融市场规制也将不会发挥作用；同样，如果竞争是自动的和完全的，那么反托拉斯机构将不会发挥作用。

然而，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基础是过于单纯市场经济的模型——竞争均衡模型，在该模型中，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不仅非常有效，而且运行地非常完美。因为在该模型中，没有对政府的需求，也就是说，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的”市场完美地运作——华盛顿共识政策有时就是指那些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这是19世纪某些派系中非常流行的放任主义政策的复兴。大萧条以及认识到市场体制的其他缺陷后，其失败主要表现为：存在大范围的不平等，大批的城市由于污染和环境恶化而不能居住。虽然在更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对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合适的平衡依然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普遍反对自由市场政策。

即使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关，但是，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满足看不见的手所需要的条件。市场体系明确要求建立财产权制度和强制其实施的法院；但是，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常常都没有。市场体系要求竞争和完全的信息，但在发展中国家，竞争是有限的，信息远没有达到完全的程度——况且，功能完善的竞争性市场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立的。该理论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假设都必须满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只是在某个领域进行改革，而在其他领域没有配套的改革跟进，那么将会使该领域的

问题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秩序的问题。意识形态忽略了这些问题，它只是要求尽可能快速地向市场经济靠拢。但是，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忽略了改革的秩序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在前面所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贸易自由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方面的失误，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就是秩序的错误。西方的报道中，即使对较小范围的秩序失误都没有给予关注。这些错误造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日复一日的悲剧，这些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那些已经绝望的贫穷产生了影响。例如，许多国家都有营销委员会，它们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然后在国内或国际上进行销售。但是，这些营销委员会通常是无效和腐败的来源，因为农民仅仅获得最终价格的一小部分。即使政府参与这些业务的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政府突然撤出这些业务，也并不意味着充满活力的、竞争性的私有部门将会自动地参与进来。

一些西非国家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撤销了营销委员会的业务。在某些情况下，它看起来很有效；但在某些情况下，当营销委员会消失时，当地的垄断体制就开始发展。有限的资本限制一些部门进入该市场。只有极少数农民能够购买一辆卡车将其生产的产品运到市场上。在缺少具备完善功能的银行的情况下，这些农民也不可能贷到其必需的资金。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能够购买卡车运输其货物，起初市场也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随后，这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就成为当地黑手党的起源。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承诺的净利益并没有实现。政府的税收减少了，而农民的状况并不比以前好，只有少数人（黑手党和政治家）的状况大大好转。

很多营销委员会也制定了统一价格的政策，即不管这些农民位于何处，对他们的产品都支付相同的价格。这看起来很“公平”，但是经济学家却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它在本质上要求那些离市场较近的农民对那些离市场较远的农民进行补贴。在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那些离货物实际销售地越远的农民，他们获得的价格应该越低；实际上，他们需要承担将这些货物运输到市场的成本。在还没有建立起合适的道路体系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非洲国家废除其统一价格。这样，那些偏僻地区的农民获得的产品价格突然之间明显下降，

因为他们不得不承担运输成本。结果，该国那些最贫穷的农村地区的收入垂直下降，大面积的困难随之而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价方案对提高效率的条件或许有轻微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对其实现的利益和造成的社会代价进行权衡。合适的秩序和步骤可能有助于我们逐渐实现效率和收益，而不再需要承担这些代价。

另外，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共识方式，还存在更普遍的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没有意识到发展要求社会发生转变。乌干达激进地取消所有的学校免费入学这一政策，就是很好的证明。但这是仅仅关注于收益和成本的预算会计所不能理解的。如今，发展经济学颂歌的一部分是强调普遍义务教育，包括女性的教育。无数研究表明，像东亚的一些国家，它们已经对基础教育进行了投资，包括女性的教育，而且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比如像非洲的一些国家，要实现高入学率非常困难，尤其对女孩来说更是如此。原因很简单：贫穷的家庭几乎不能够生存，从对其女儿进行的教育中，他们看不到任何直接的收益；并且，教育系统一直倾向于就城市部门的工作提供教育机会，但这些工作主要考虑的是男孩。那些面临非常严峻财政限制的国家，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开始对教育收取学费。它们的理由是：统计研究表明，适当收取少许学费不会对入学率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却不这么想。他知道，他必须要创造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期望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去接受教育（上学）。而且，他知道，如果收取学费的话，他就没法保证长期让所有人都去上学。因此，他忽视了外部专家的建议，取消了所有学校的学费。这样，入学率迅速上升。当某个家庭看到其他家庭将他们所有的子女都送到学校去时，他也决定将女儿送去上学。过于简单的统计研究忽视了系统变化的力量。

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只是没有成功地实现其发展的全部潜力，那么，情况就足够糟糕。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多方面的失败造成了对实际社会结构不必要的腐蚀，进而使得发展议程受挫。当然，在发展和快速转变过程中，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不可避免。传统的权威机构受到挑战，传统的关系需要进行重新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发展尤其需要关注社会稳定的

原因。这不仅是前面章节已经提及的博茨瓦纳历史的教训，同样也是后面章节将要提及的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教训，在这些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取消食物和煤油（穷人们用来做饭的燃料）补贴，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加剧了该国的衰退那样，补贴的取消使其收入和工资迅速下滑，失业率迅速上升。随即发生的暴乱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低迷进一步加剧。取消补贴不仅是糟糕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是糟糕的经济政策。

这些并不是第一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发生抗议，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被更广泛地接受，我相信发生暴动的次数会更多。1995 年，我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在约旦参加约旦王子的加冕会议，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要约旦削减食物补贴以改善政府预算。就在他们几乎成功地达成协议时，侯赛因国王对其进行了干涉，并终止了该提议。侯赛因国王非常享受自己的地位，并在进行非常伟大的工作，他希望一直保持这样。在高度不稳定的中东地区，由食物问题引发的暴动足以推翻政府，并且危害到该地区脆弱的和平。同可能性较小的预算状况改善相比，这些暴动事件将会对繁荣的目标造成更大的伤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狭隘的经济观点使其不能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这些暴动仅仅是冰山一角：它将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上，即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忽视社会和政治背景。但同样存在其他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当拉美需要更好地平衡其预算和控制通货膨胀时，过于节俭的财政政策导致了高失业率，在没有合适安全网的情况下，高失业率又反过来造成了高层次的城市暴乱，这样的环境根本不可能吸引投资。非洲国家的国内冲突一直是制约其发展议程最主要的因素。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冲突与负面的经济因素相关，负面经济因素包括由过度节俭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失业。适度的通胀可能不是创造投资环境的理想状态，但暴乱和国内冲突只会使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

如今，我们意识到，在公民和政府之间存在“社会契约”，当政府政策废止该社会契约时，公民可能不会尊重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间的“契约”。由于在发展转型期间一直伴随着如此频繁的社会剧变，因此，维持这种社会契

约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困难。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吹毛求疵的宏观经济学计算中，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涓滴经济学

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包含着“公平”，即让穷人分享社会增长的收益，也让富人在危急时期分担社会的痛苦。华盛顿共识政策很少在意分配或者“公平”的问题。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华盛顿共识的大部分支持者会辩解说，帮助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他们信仰涓滴经济学[⊖]。涓滴经济学认为，增长的利益最终会涓滴到穷人身上。涓滴经济学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信仰的宣言。虽然在19世纪英国总体上保持繁荣，但其贫困看起来却在增长。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增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随着经济的增长，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却在下降。克林顿政府强烈地反对涓滴经济学，他相信必须要制定积极的方案来帮助穷人。当我离开白宫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同样带去了对涓滴经济学的质疑，如果涓滴经济学在美国不能发挥作用，那为什么它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呢？如果不能实现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贫困的持续减少，虽然这是正确的，但反过来，增长不需要惠及所有人就不正确。“水涨船高”并不正确。有时潮水快速上涨，尤其是伴随着风暴的时候，将会把那些比较弱小的船只冲撞到岸边，击得粉碎。

虽然涓滴经济学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研究。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鲁·刘易斯认为，不平等对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好事，因为富人能够比穷人储蓄更多，并且增长的核心是资本积累。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认为，虽然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不平等在增长，但是后来的趋势就会发生转变。[3]

然而，过去50年的历史并不支持这些理论和假设。正如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表

⊖ 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译者注

明，高储蓄并不需要高度的不平等，在不平等并没有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也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因为政府不相信增长会自动惠及穷人，也因为政府相信较大的平等将会真正促进增长。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保证增长的潮水能够托起更多的船只，将工资不平等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将接受教育的机会延伸至所有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政策维护了社会和政治稳定，社会和政治稳定反过来又有利于改善商业繁荣的经济环境，释放出新的人才储备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能量和人力技术。

此外，那些采纳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国家，穷人从增长中获益较少。在拉美地区，不平等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降低，甚至是贫困也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降低。在某些案例中，贫困实际上却增加了，这些可以从那些遍布于该地区的城市贫民窟得到证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自豪地讲述过去10年来拉美地区的市场改革进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明星学生们在2001年的崩溃后显得更为平静，在过去5年中，衰退和停滞已经折磨了许多“改革”国家），但是它很少提及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数目。

很明显，单靠增长并不能改善一个国家所有人的生活。毫不奇怪，“涓滴”这个名词从政策争论中消失了。但是，该词语以略微变异的形式继续存在。我将这种变异的形式称为“涓滴加”。它支持增长是降低贫困的必要条件，并且认为增长也是降低贫困的充分条件——这意味着最好的战略就是仅仅关注增长，同时提及妇女教育和健康等问题。但是“涓滴加”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实施那些可能有效解决更广泛的贫困问题的政策，甚至在解决诸如妇女教育等特定问题方面，他们也没有实施相应的政策。实践中，“涓滴加”的提倡者坚持与以前涓滴经济学同样的政策，当然这就会有相同的负面影响。当一个个国家实施极其严厉的“调整政策”，迫使它们削减教育和健康支出时，其结果是：在泰国，不仅造成妓女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的支出大大减少；这个曾是世界上与艾滋病做斗争最成功的国家如今出现了大幅的倒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涓滴加”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在克林顿政府内部，从新民主派（他们希望看到政府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到旧民主派（他们希望政府更多地参与经济政策制定），在很大的

范围内都存在对国内政治的观点。但是反映在年度《总统经济报告》中的核心观点，却强烈反对涓滴经济学——或者甚至是“涓滴加”。然而，正是美国财政部在其他国家推行这些政策，如果它在美国国内提倡这些政策，将会在政府内部受到强烈抗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原因很简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只是美国财政部跑马场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例外地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推行它们的观点，正如在其他部门一样，在它们的领域中，也能够推行它们的观点。

优先权和战略

我们不仅要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日程中加入了哪些内容，还要看它忽略了哪些内容，这非常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日程包括稳定，但是不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包括税收及其负面影响，但是不包括土地改革。它有钱帮助银行走出困境，但是却没钱改善教育和健康服务，更不要说去帮助那些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宏观经济的管理失误而造成的失业工人了。

很多并没有列入华盛顿共识的项目，有可能会实现更快的增长和更大程度的平等。在很多国家中，土地改革本身就是关键的选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少数的富人拥有大部分土地。大部分人只能像佃户那样工作，并且只拥有他们生产出产品的一半或者更少，这就是“佃农耕作”。佃农耕作制度削弱了生产动机，因为他们与土地所有者对等地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其效果相当于对贫困农民征收了50%的税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抱怨对富人征税的税率太高，指出高税率如何摧毁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但对于这些隐性税收，它连一个字都没提。如果土地改革能够适当、和平和合法地进行，将会保证工人不仅能够获得土地，而且能够得到贷款，并且教会他们关于新种子和种植技术等额外服务，从而能够大幅度地提高产出。但是土地改革代表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而那些财政部的精英们（正是他们与国际金融机构打交道）可能对此并不感兴趣。如果这些机构真正关心增长和降低贫困，那么，他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在几个最成功的发展案例中，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都

优先进行土地改革。

另外一个被忽视的项目就是金融部门规制。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早期拉美的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这些危机是由轻率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但世界范围内的危机表明，不适当的金融部门规制是造成这种不稳定的第三个因素。直到东亚危机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其政策方针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一直在努力争取减少规制。如果土地改革和金融部门规制并没有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足够重视的话，那么，在很多地方，通货膨胀就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然，拉美地区的通货膨胀非常猖獗，它的确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通货膨胀的过度关注造成了高利率和高汇率，从而造成失业，与此同时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可能对较低的通货膨胀数字非常满意，但当工人和那些关注贫困的人们看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数字时，他们并不高兴。

幸运的是，降低贫困逐渐成为发展的重要优先权。早些时候，我们发现“涓滴加”战略并没有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但平均来说，增长更快的国家能够更好地降低贫困，这是正确的，中国和东亚的案例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消除贫困需要资源，这也是正确的，而且只能从增长中获得这些资源。增长和贫困降低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对此不应该感到奇怪。但这种关联关系依然不能证明涓滴战略（或者涓滴加战略）是与贫困做斗争的最好方法。相反，统计数据表明，有很多国家，虽然他们实现了增长，但并没有降低贫困；在增长率给定时，一些国家在降低贫困方面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赞同增长还是反对增长。在某些方面，增长/贫困的争论看起来毫无意义。毕竟，几乎人人都信仰增长。

这一问题与特定政策的影响有关。有些政策能促进增长，但是对降低贫困毫无效果；有些政策能促进增长，但同时也增加了贫困；有些政策能促进增长，同时也能够降低贫困。最后这类政策被称为优先贫穷增长战略。有时候，有些政策被称为是“双赢”政策，比如说土地改革政策或者使穷人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增长和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做出了承诺。但是往往存在权衡利弊的情况。有时候，贸易自由化可能会促进增长，但与此

同时，至少在短期内贸易自由化也会增加贫困，尤其是在快速实现贸易自由化时更是如此。因为，一些工人失去了工作。有时候也存在双输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对增长几乎毫无贡献，而且还会造成不平等的大幅增加。对许多国家来说，资本市场自由化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关于增长—贫困争论就是关于发展战略的争论，这些战略追求既能促进增长又能降低贫困的政策，避免那些导致贫困增加但与此同时对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贡献的政策，以及在存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在对现状进行评估过程中，要给贫困的影响赋予更大的权重。

要理解这些选择，就需要理解贫困的原因和本质。穷人并不懒惰，与那些状况很好的人们相比，这些穷人往往工作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缺乏食物，身体不健康；因为身体不健康，就限制了他们的赚钱能力，不能赚钱就会使健康情况更糟。在处于仅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下，这些穷人就不能送其子女上学，由于没有接受教育，他们的孩子就又过着贫穷的生活。就这样，贫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贫穷的农民没钱购买化肥和高产出的种子，从而无法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这只是穷人面临的许多恶性循环例子中的一个。剑桥大学的帕萨·达斯古普塔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在贫穷国家，像尼泊尔，除了附近的森林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源，但是，随着他们不断利用这些森林获得取暖与做饭所必需的燃料，森林的土壤被侵蚀，而环境恶化后，他们又不得不过着更加贫困的生活。

伴随贫困而来的是一种无助的感觉。在《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在一项被称为“穷人的声音”的活动中，采访了千余名穷人。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议题，这几乎是意想不到的。这些穷人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说话的地方，并且，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经受着超出他们控制力量的打击。

同时，穷人们也感到不安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没有保障——因为超出他们控制的经济环境变化会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和导致他们失业，东亚危机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健康风险和暴力的持续威胁，这些风险和威胁有时候是来自于那些试图抓住任何机会满足其家庭需要的其他穷人，有时候来自警察和其他具有权力地位的人群。在发达国家，当人们为健康保险的不充分而烦恼时，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险——

没有失业保险、健康保险，也没有退休保险，唯一的安全网是由家庭和社区提供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尽可能地维护这些联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了改善反复无常造成的不安全——无论是来自剥削的老板，还是来自饱受国际风暴打击的市场——工人们已经在为更大的就业安全而斗争。但是，在工人们追求“体面的工作”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追求所谓的“劳动市场弹性”，这听起来有点像是能促进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运转，但实际上，它只是为降低工资和减少就业保障寻求借口而已。

我们并没有预见华盛顿共识针对穷人政策的所有不利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不利方面都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到，在高利率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几乎确定是摧毁工作和造成失业的处方，这是穷人付出的代价。在没有建立合理规制结构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自由化几乎确定是经济不稳定的处方——并且，它也可能造成利率提升而不是降低，这就使穷人更难购买那些能够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种子和化肥。在没有制定竞争政策以及对保证垄断力量不被滥用的情况下，私有化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消费价格。在发生这一连串错误时，盲目地追从财政节俭政策会造成更高的失业，并撕碎了社会契约。

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估了它的发展战略对穷人带来的风险，它同时也低估了这些政策带来的长期社会和政治成本，这些政策毁坏了中产阶级、富足了少量的社会高层，高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的利益。传统上，中产阶级就是那些已经推动法律规则的群体，那些已经推动普遍公共教育的群体，那些已经推动社会安全网建设的群体。这些都是健康经济体的核心要素，而中产阶级的腐蚀随之会影响他们支持的重要改革。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估了其方案的成本，高估了其利益。以失业问题为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人来说，这些人相信当市场正常发挥作用时，需求必须等于供给，失业预示着自由运行的市场中存在干预。工资太高了（比如因为存在工会的力量）。显而易见，解决失业的方法就是降低工资；较低的工资将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就业名单。而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建立在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契约下的理论）已经解释了，

即使在高竞争性的市场中，包括劳动力市场，为什么会继续存在失业——因此，认为失业是因为工会或政府最小化工资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对降低工资的战略，依然存在其他的批评。较低的工资可能使一些企业雇用更多的工人，但是新雇用的工人数目可能相对较少，而工资的降低对所有其他工人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雇主和资本所有者可能会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利润在飙升。他们将会狂热地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型和它的政策指令。另一个狭隘的全球观点的例子就是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学校收费。那些赞成收费的人们认为，收学费对入学率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且政府也急需收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于简单的模型错误地计算了取消学费对入学率的影响；因为它没有考虑对社会更广泛的影响，这些模型甚至没有尝试正确地评估对入学率的影响。

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市场的观点过于乐观，其对政府的观点就显得过于悲观了；即使不能说政府是所有罪恶的源泉，但它的确是造成的问题多、解决的问题少。但对穷人缺乏关注不只涉及市场和政府的观点问题（该观点认为，市场能够考虑到所有问题，而政府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它同样涉及价值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关心穷人，谁应该承担风险。

华盛顿共识强迫实施的政策，其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大部分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宗旨的国家发展程度较低，而即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其增长的利益也未能公平地分配；对危机处置不当；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也令人失望。在发展中世界，该问题更为严重。那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示、忍受财政节俭的国家，不禁要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胜利的果实？"拉美的许多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爆发的短暂增长后，就出现了停滞和衰退。增长没能持续——也许有人说这是不可持续的。的确，在这关键时期，所谓的后改革时期其增长记录看起来并没有好起来，一些国家甚至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前的进口替代时期（当时，这些国家利用保护主义政策帮助国内工业与进口者进行竞争）更糟糕。改革后，拉美地区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2.9%，大约仅为20世纪60年代5.4%的一半。对其进行回顾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增长战略没能持续

（批评家们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但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的增长小高潮也不能持续（批评家再次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的确，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早期增长的爆发仅是一种追赶，它甚至不能弥补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10年，这10年是在上次危机之后出现增长停滞的10年。整个拉美地区的人们都在问，改革是否失败或者全球化是否失败？这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全球化就是改革的核心。甚至在那些实现了一定增长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在很大程度上，其增长的利益都被30%的上层人占有，并且更集中于上层10%的人群。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他们获得的利益很少，有些人的情况可能变得更糟糕。

华盛顿共识改革已使一些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由那些最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风险的人不成比例地来承担的。在许多国家中，改革的步骤和秩序所摧毁的工作机会远超过其创造的就业机会；同样，这些国家面临的风险也超过了它们建立机构以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包括建立有效的安全网。

当然，华盛顿共识也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包括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教训，以及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很好理解的教训，但是大部分国家并不一定必须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吸取这些教训。

有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而遭到不公平的责备——没人情愿被告之要按照别人的方式生活。国际经济机构的批评更深入：虽然在它们的发展议程中有很多好的议题，纵然从长期看来它们也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但这些改革也必须谨慎地实施。如今，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不能忽略步骤和秩序。更重要的是，相对于那些建议的教训，发展更为重要。存在可替代的战略——这些战略不仅在重点上不同，在制定的政策方面也不同。比如，这些战略包括土地改革，但不包括资本市场自由化；这些战略规定在进行私有化之前先制定竞争政策，在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现就业机会的创造。

这些替代战略充分利用了市场，但同时也认识到政府同样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他们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这些改革需要逐步、有秩序地进行。他们看到改变不仅是经济学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广泛进化的一部分。他们认识

到，要想获得长期的成功，改革必须要得到广泛的支持；而改革要想得到广泛的支持，改革的利益就必须要进行广泛地分配。

我们已经唤起别人对一些成功的注意：比如非洲的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博茨瓦纳有限的成功，以及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更广泛的成功。在第 5 章，我们将更近距离地观察转型的成功，比如波兰。这些成功的例子表明发展和转型是有可能的，发展的成功大大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程度。有如此多的成功案例，他们都采取了与华盛顿共识明显不同的战略，事实实在发人深省。

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如果其他国家也采取东亚的战略，它们也能够取得相同的成功吗？25 年前的那些非常有效的战略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还有效吗？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们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这些国家需要考虑替代战略，并通过民主政策程序让它们为自己做出选择。这应该是——而且它早就应该是——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即向各国提供其必要的资金，使它们在对每项后果和风险理解的情况下，做出自己深思熟虑的选择。自由的本质就是有权做出选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 4 章

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将世界带到崩溃的边缘

1997 年 6 月 2 日，当泰铢崩溃时，没有人知道这就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的开始——这次危机将从亚洲扩散到俄罗斯和拉美，并威胁到整个世界。10 年来，泰铢与美元的兑换比率一直保持在 25 泰铢兑 1 美元左右，突然在一夜间，泰铢就贬值近 25%。货币投资不断蔓延，并打击了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到 1997 年年底，由于汇率灾难所引发的危机严重威胁到该区域内的银行、股票市场甚至实体经济。如今，该危机已经过去，但是不少国家在多年后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影响，诸如印度尼西亚。不幸的是，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实施的政策使得当时的状况更加糟糕。虽然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和应对这类危机，但在很多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取得成功。这种事实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反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都呼吁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多政策及该机构本身进行彻底改革。的确，当我们对该问题进行回顾和审议时，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不仅加剧了经济衰退，而且对经济危机的发生负有部分责任：虽然部分国家的错误政策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过快地推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可能是这次危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如今，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了它的很多错误——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意识到，过快地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是多么危险——但是没能承认全部的错误，对于那些遭受灾难的国家来说，国际货币组织观点的改变来得太迟。

这次危机使许多观察家大为吃惊。在本次危机前不久，甚至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还预测该地区将会取得强劲的增长。这之前30年间，东亚的增长速度不仅较世界其他地区更快，而且在降低贫困方面做得更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而且一直更为稳定。东亚地区避免了作为所有市场经济标志的兴衰沉浮。东亚地区的表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被人广泛称为“东亚奇迹”。的确，根据传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是如此自信以至于它将其一位非常忠诚的职员派到本地区当主任，作为他退休前安逸的职位。

令我非常惊诧的是，当危机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是如何强烈地批评这些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亚洲国家的机构非常虚弱，它们的政府很腐败，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些直言坦率的批评几乎都不是出自于对该地区进行过研究的专家，而且他们所说的和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是相矛盾的。我曾经访问过该地区，并对其进行了近30年的研究。世界银行以及世界银行研究部副主任劳伦斯·萨默斯本人曾邀请我参加关于东亚奇迹的一项重要研究，领导一个队伍研究本地区的金融市场。大约20年前，当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他们又邀请我去讨论中国的发展战略。在白宫，我继续对该地区进行研究，比如说，带队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环太平洋边缘的国家群体，随着该地区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其国家元首的年度会议变得更加重要）撰写年度经济报告。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关于中国的争论——并且，在政府的“遏制政策”气氛过于紧张时，就作为内阁成员被派到中国与朱镕基副总理进行会谈，以使气氛平静下来。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每年8月度假期间都会对政策进行讨论，而我则是少数被邀请参与该讨论的外国人之一。

让我很困惑的是，如果这些国家的机构都是虚弱的，那么，它们如何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内都做得这么好？直到我回忆起对东亚奇迹本身进行大肆吹嘘的争论时，我对该地区的了解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的断言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什么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几乎有意地回避对该地区的研究，虽然大概是因为它很成功，但对它们来说，将该地区作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训是非常自然的。后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并且仅是在日本提供了研究经费后，世界银行才开始对东亚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最终研究报告被命名

为《东亚奇迹》)。原因很明显：这些国家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部分指令，而且还因为它们对此根本不予理睬。虽然在最终完成的报告中，这些专家们的观点有所缓和，但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表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华盛顿共识所钟爱的要求政府发挥最低限度的作用大不相同。

不仅是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学术界都在问：奇迹真的存在吗？东亚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高度储蓄，并且很好地进行投资。但是“奇迹”的观点并非与之相应。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实现如此高的储蓄率，并且进行很有效地投资。在东亚国家同时完成这两件事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

当危机爆发时，几乎该地区所有的批评家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预言得到证实。在好奇的析取命题[⊖]中，他们不相信该地区的政府在过去 25 年间取得的成功，所以很快就开始对该地区政府的失败进行指责。

无论是否将其称为奇迹都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在过去近 30 年间，东亚地区取得的收入增长和贫困降低都是空前的。访问这些国家的人没有哪一个不对其发展变化感到惊奇，无论是经济的变化，还是社会的变化，都反映在可以想象的每个统计数字中。30 年前，成千上万辛勤的黄包车夫为微薄的收入而卖力拉车，如今，这些黄包车夫只是为了吸引旅游者，给那些喜欢抓拍的旅游者拍照的机会。高储蓄率、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和国家指导产业政策联合起来为使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服务。几十年来，该地区的增长率非常显著，数千万人的生活标准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地分享。虽然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但总体上，政府制定了有效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只有一项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一致——即宏观稳定的重要性。在华盛顿共识中，贸易很重要，但重点是促进出口，而不是取消进口限制。虽然贸易最终被自由化，但只是随着出口企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逐步自由化。华盛顿共识政策强调要对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快速的自由化，而东亚国家只是逐步进行自由化——它们中最成功的国家，比如中国，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华盛顿

⊖ 也称之为选言命题，即一个命题，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选项，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译者注

共识政策强调私有化，该地区的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帮助建立有效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很多国家的成功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华盛顿共识认为，政府试图塑造未来经济方向的产业政策是错误的；但东亚政府却认为这是它们的核心职责之一。特别是，它们相信如果要缩小与更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就必须缩小知识和技术的差距，因此，它们制定了教育和投资政策以缩小这种差距。华盛顿共识政策很少关注不公平，它含蓄或明确地指出，利益将会涓滴给穷人；但是，东亚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降低贫困和限制不平等，它们相信这些政策对维护社会的凝聚力非常重要，而社会凝聚力对创建有利于投资和增长的环境很有必要。更广泛地说，华盛顿共识政策强调政府最低限度地发挥作用，但在东亚，正是政府帮助塑造和引导市场。

当危机刚爆发时，西方国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在问及对泰国的援助时，比尔·克林顿总统认为，泰铢的崩溃只是泰国经济走向繁荣道路上的小故障，并将该问题撇在一边。[2]1997 年 9 月，在中国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上，克林顿总统与到会的世界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们分享了他的自信和冷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对自己的建议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他们甚至要求修改其章程，允许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施加更大的压力。会议期间，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我遇到的几位财政部长都吓坏了。他们认为，资本市场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热钱是问题的来源。主要的麻烦还在前面：危机将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他们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将阻止采取他们认为可以避免危机的政策，同时，他们也担心这些政策在危机出现时将会恶化其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然而，他们感觉无力对此进行抵抗。他们甚至知道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阻止危机和将损害最小化——但是，他们也明白如果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就会招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谴责，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可能会撤回国际资本。结果，只有马来西亚有足够的勇气敢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愤怒的风险；虽然马哈蒂尔总理的政策——试图将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阻止投机性投资资金迅速流出国外——四处受到攻击，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马来西亚的衰退时间较短，而且程度

较轻。[3]

在香港会议上，我向遇到的几位东南亚国家的部长们建议，他们应该采取一致的行动；如果他们同时强制实施资本管制，即阻止投机性资金快速流出他们的国家，那么，就有可能经受住由国际金融团体毋庸置疑地向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时也能够有助于使其经济远离混乱。他们谈论着在该年迟些时候要一起制定一项计划。但是从香港考察归来，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开背包，危机就开始蔓延了，首先蔓延到印度尼西亚，12 月初就传到韩国。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货币崩溃的冲击——从巴西到中国香港——它们虽然经受住了冲击，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些国家发生的危机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模式：第一个模式以韩国为代表，该国危机的发生过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韩国从朝鲜战争的灾难中崛起时，它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在 30 年内要使韩国人均收入增长 8 倍，大幅度降低贫困，实现普遍读写能力，缩短其与更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比印度还穷；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韩国就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它是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俱乐部。韩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芯片生产国之一，它具有一大批大型联合企业，诸如三星、大宇、现代等，其生产的产品享誉全球。但是在其转型早期，韩国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金融市场，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它才很不情愿地允许本国的企业进行海外借贷。在进行海外借贷时，这些企业都将自己暴露于国际市场反复无常的行为中：1997 年下半年，有关韩国陷入麻烦的流言传到华尔街。流言说韩国将无力从即将到期的西方银行贷款中翻身，并且，韩国没有足够的储备偿还这些贷款。这类流言有自我实现其预言的能力。在这些流言出现在报纸上之前，我就在世界银行听到过了，并且我知道这些流言的出现将意味着什么。很快，以前急切希望向韩国企业贷款的银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决定了不再向其发放新的贷款。当它们都决定不向韩国企业发放新的贷款时，这些流言的预言就成为现实：韩国真的陷入麻烦。

第二种模式以泰国为代表。在泰国，危机是对泰铢进行投机性的攻击（同

时伴随着高额的短期债务）造成的。这些投机者相信泰国货币（泰铢）将会贬值，试图卖出这种货币而买入美元；在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即将本地货币换成美元或者其他货币的能力，这很容易做到。但是，随着贸易者不断卖出泰铢，泰铢就开始贬值——这样，他们的预言就被证实了。作为选择，而且更为普遍的是，政府试图支持本国货币。政府会从其储备（这是国家控制的资金，通常是以美元的形式进行储备的，以备不时之需）中卖出美元，买进本国货币来维持其币值。但最终，政府耗尽了它的硬通货，再也没有美元可以出售了，这时本币（泰铢）的币值就会直线下跌。那些投机者非常得意，因为他们赌对了。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再次购买该国货币，以取得丰厚的利润，并且利润的规模非常巨大。假设一个投机者到泰国银行贷款240亿泰铢，按照当时的汇率，它可以兑换成10亿美元。一个星期后，泰国的汇率下降了（即泰铢贬值了），不再是24个泰铢兑换1美元，而是40个泰铢兑换1美元。那么，要还清这240亿泰铢的贷款，他只需要支付6亿美元，剩下的4亿美元就是利润——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取得了巨大利润，而且几乎没有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相信汇率不会增值（即从24泰铢兑换1美元上升到20泰铢兑换1美元），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即使是最糟糕的情况——如果汇率保持不变，他也只是损失一个星期的利息而已。当预计贬值即将开始，就很难抗拒金钱的诱惑，并且，世界各地的投机者都会涌入其中，以利用这种机遇。

如果说危机具有众所周知的模式，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也并不陌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全部救援行动的一揽子计划，包括来自7国集团的支持，共计达950亿美元）[4]，以至于这些国家能够维持现有的汇率水平。它认为，如果市场相信保险箱中有足够资金的话，那么攻击该种货币就没有什么意义，这样“信心”将会被摧毁。这些资金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它使这些国家能够向其企业提供美元来偿还西方银行的贷款。因此，可以部分地认为，对国际银行进行救援等同于对该国进行援助；出借者无面对承担坏账的全部后果。对那些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汇率暂时维持在其不可持续的水平的国家，还存在另外一个后果：这些国家的富人利用了这次机会将其资金以有利的汇率兑换成美元，然后迅速转移到国外。正如我们在第5章将要看到

的，最为严重的例子发生在俄罗斯，即1998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提供资金后。但是这种现象，有时候惯以一个听起来很中性的名字——“资本外逃”，在以前的危机中，比如1994～1995年间的墨西哥危机，它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为纠正导致危机问题的一揽子计划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笔资金规定了一些附加条件。正是由于其他因素和这笔资金，才说服了市场这些贷款能够翻身，并说服那些投机者四处寻找更容易的目标。这些其他因素通常包括高利率——在东亚的案例中，其利率要高得多——再加上政府支出的削减和税收的增加；也包括“结构改革”，即经济结构的改变，他们相信，这是该国隐含的问题。在东亚的案例中，不仅对拨款强制附加一些条件，比如要求提高利率、削减支出。另外，还提出其他的额外条件，不仅要求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改革，还要求其进行政治改革：其中，重大的改革主要有提高开放度和增加透明度、完善资本市场规制；一些细小的改革，比如，取消印度尼西亚丁香的垄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强制附加这些条件是要它们对其所做的事情负责。它们的确应承担责任，但不应该只是保证它们能够偿还贷款，还应该保证这些国家“做正确的事情”以使国家的经济恢复健康。如果是结构问题造成宏观经济危机，那么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强制施加的这些条件范围非常广泛，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如果要想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就不得不放弃国家大部分的经济主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些国家才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因为放弃国家经济主权将会破坏该国的民主；还有些国家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因为这些强制附加的条件并不能使其经济恢复健康，更何况，这些条件本就不是为使其经济恢复健康而设计的。但正如我们在第2章提到的，这些附加条件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毫无帮助。

这些方案，与其附加的所有条件以及它们的所有资金一起，都失败了。本希望通过这些方案来抑制汇率下跌，但相反汇率却持续下跌。在市场几乎还没来得及对此有丝毫的认识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赶来救援”了。在每个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己认为有效的处方失败了感到非常尴尬，但它却

指责该国没能认真地推行必要的改革。在每个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向世界宣称，在真正的复苏出现之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样做就像是在拥挤的剧院内呼喊救火：相对于预测来说，投资者更相信对这些问题的诊断，因此，他们开始四处逃散。[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不仅没有增强资本流入该国的信心，反而加速了资本外逃。基于这一点和那些我简短地指出的原因，以及所分享的贯穿于对很多发展中世界的理解，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就成为这些国家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的确，在几个出现危机的国家中，无论是大众还是政府官员和商人，都一致认为打击他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风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人们谈论“瘟疫”或“大萧条”的方式一样，就像那些遭遇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而摧毁的国家用地震“前”和地震“后”来记载该事件一样，历史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记载这事件。

在危机不断蔓延过程中，失业率飞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直线下降，银行大批倒闭。韩国的失业率上升了4倍，泰国的失业率上升了3倍，印度尼西亚的失业率则上升了10倍。在印度尼西亚，1997年还在工作的男性中几乎有15%在1998年8月失去了工作，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城市地区，经济破坏程度更为严重。韩国的城市贫民几乎增加了3倍，几乎有1/4的人口陷入贫困；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数翻番。在一些国家，诸如泰国，那些在城市失去工作的人们可以回到农村。但是，这却给农村部门造成增长的压力。1998年，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1%，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7%，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则下降了10.8%。危机3年后，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比危机前低7.5%，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比危机前低2.3%。

比较幸运的是，在某些案例中，其结果并不像人们预测的那样黯淡。泰国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保证及子女的教育不被打断，他们自愿地帮助邻居的孩子进校读书。他们也保证每个人都具备足够的食物，这样，泰国营养不良的影响范围并没有扩散。在印度尼西亚，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看似成功地阻止了对教

⊖ 印度尼西亚的第四大岛，但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岛屿。——译者注

育预期的负面影响。正是贫困的城市工人——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他们的境况都不算好——被危机折磨得痛苦不堪。由高利率引起的小企业破产进而造成中产阶级没落，这将会对该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长期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条件恶化将会影响到其邻近的国家。该地区经济的下滑引起了全球的反应：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从俄罗斯到尼日利亚，很多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的新兴国家都深深地陷入困境。随着那些冒险将其资金投资到这些国家的投资者看到他们的财富在直线下降，并且，当向其贷款的银行要收回贷款时，他们不得不削减在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巴西，这个既不依赖石油也不依赖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的国家也陷入了较深的困境中，它的经济格局与这些国家有很大不同，它是通过外国投资者恐惧的蔓延以及借贷的减少而卷入到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最终，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甚至是阿根廷也受到影响。阿根廷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非常成功，而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标榜为改革的“乖孩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如何引发这次危机

这次动荡颠覆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全球市场经济成功发展5年来的所有成果。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国际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新兴市场，从东亚到拉美，从俄罗斯到印度。投资者们发现，这些国家是高利润的天堂，而且看起来风险很低。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私有资本流动增加了7倍，与此同时，公共资本流动（外国援助）却停滞不前。[6]

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都相信，这是新时期的黎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都相信，或者至少它们认为，资本账户完全自由化将有助于该地区实现更快的增长。在给定的高利率条件下，东亚国家不需要额外的资本，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依然要求这些国家强制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我相信，资本账户自由化是导致这次危机**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得出这个结论，不仅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在该地区发生的事情，还因为我看到本世纪最后25年间几乎上百个其他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危机已变得更加频繁（并且程

度更深），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来分析造成这些危机的因素。[7] 目前，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通常情况下，资本账户自由化意味着没有报酬的风险。即使当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银行、成熟的股票市场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不具备的机构时，资本账户自由化也能产生巨大的风险。

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投资者情绪的突然改变，这种情绪的变化能够将本应大量流入该国的资金大量流出，无论是外国的投资者还是本国的投资者，他们都将其资金投资到其他地方。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反向流动将不可避免地促成危机、衰退或更糟糕的情况。就拿泰国来说，这次逆转的资金金额在1997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9%，1998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3%，在1999年上半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相当于在1997～1999年间，美国年均撤回的资本达7 65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承受这种资金逆转的能力很弱，因此，对于随之而来的重大低迷的后果，它们的应对能力也很弱。这些国家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30年来没有出现重大的经济衰退——意味着东亚国家并没有发展失业保险的规划。但即使它们集中精力来承担这项任务，对它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美国，为那些在农业部门自己经营的人制定的失业保险远远不够，并且，发展中世界正是在这些部门具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抱怨远不止这些：他们不仅认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自由化政策，才造成这次危机；而且还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这些政策时，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将会促进增长，相反，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

如果能够用“讽刺”这个温和点儿的词的话，那么下面的事情的确具有讽刺意味。1997年10月，在危机刚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正在提倡那些潜在地提高危机发生频率的政策。作为一个学者，在没有理论和证据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经济稳定有利，而存在证据表明事实上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时，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极力推行该议程大为震惊。的确，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的立场肯定存在**一定的**基础，而不是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金融市场本身的利益，该利益将资本市场自由化视为市场准入的另外一种形式——即进入更多的市场，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金。在认识到东亚根本不需

要额外的资本后，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提倡者们又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认为通过允许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化，资本市场自由化能够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性![8]对于该观点，即使在我看来，在当时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对其进行回顾时却发现该观点看起来特别奇怪。难以相信，这些提倡者们没有意识到数据表明资本流动先于周期循环。也就是说，在经济衰退时资本将流出该国，而这时正是该国最需要资本的时候；在经济繁荣时流入该国，而此时则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明确，这个时候这些国家正需要外部的资金，但是银行家们却收回了他们的资金。

资本市场自由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忍受投资者群体理性和非理性的怪想法，不得不忍受他们非理性的乐观和悲观。凯恩斯很清楚地知道，情感经常会表现为非理性的改变。在其《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1935）这本书中，他将情感中这种巨大而且经常无法说明的变动视为“动物精神”。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精神都没有东亚明显。在危机爆发前，泰国债券的支付利率仅比世界上最安全的债券的支付利率高出0.85%，这意味着泰国债券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但仅仅一眨眼的工夫，泰国债券的风险贴水迅速飙升。

同样，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提倡者提出了第二个观点，这个观点与第一个观点同样不可信，并且同样毫无根据。他们认为，对资本市场进行控制会抑制经济效率，因此，如果不存在对资本市场的控制，那么，这些国家将能更好地实现增长。利用泰国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该观点是有瑕疵的。在资本市场自由化之前，泰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投机房地产的范围。之所以实施这些限制，是因为泰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泰国需要增长，而且泰国相信将有限的资金投资到制造业中不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能够提升增长率。泰国也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投机的房地产借贷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种借贷会增加泡沫（随着投资者呼吁要求收获该部门中看似繁荣的果实，价格就会飞速上升）；这种格局与曼谷和休斯敦的情况非常相似：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银行觉得如果进行间接借贷，它们能够贷出更多的资金。当投资者看到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时，他们希望在并不太晚之前进入该市场进行博弈——并且，有银行为他们提供资金让他们这样做。这样，房地产开

发商看到了建造新大楼能够快速获得利润，一直到市场超容为止。此时，开发商没法将其建造的房子出租，他们也就无法还清贷款，泡沫就破灭了。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泰国强制实施的旨在避免危机的那些限制妨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如果市场认为要建立办公楼，那么商业建筑一定是回报率最高的活动；如果市场认为要建立空置的办公楼，就像在自由化之后它有效做到的那样，那么，建立空置的办公楼[⊖]就一定是回报率最高的活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逻辑，市场必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当泰国急切需要更多的公共投资来增强其机构和相对较弱的中学和大学教育系统时，数十亿资金浪费在建设商业房地产中。直到现在，这些建筑物都是闲置的，成为过度繁荣和市场失灵的证据，而市场失灵在政府对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规制时就会出现。[9]

当然，不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动自由化，美国财政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和唯一拥有否决权的股东，在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它也在推动自由化。

1993 年，当提出讨论韩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时，我在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谈判包括一系列比较次要的议题——比如韩国向美国开放香肠市场，同样也包括像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样的重要议题。30 年来，在没有重大国际投资的情况下，韩国对于已经取得的不寻常的经济增长非常满意。韩国取得的增长是基于韩国自己的储蓄以及韩国人自己管理的企业。韩国确实不需要西方国家的资金，韩国的增长代表着对现代技术输入和市场准入路径的替代。当其邻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引进跨国公司时，韩国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基于良好的产品质量和具有侵略性的营销，韩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它们的产品。韩国认识到，要保持持续增长并融入全球市场，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或者撤销一些规制，通过这种方式，韩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开始运作。韩国也非常担心拙劣的撤销规制的危险：它看到了美国发生的事情，20 世纪 80 年代时，美国规制撤销达到极限，存贷体系崩溃了。出于借鉴的考虑，

⊖ 意思是无法出租出去的办公楼。——译者注

韩国谨慎地规划自由化路径。该路径对于华尔街来说太慢了，因为它们看到了获利的机会，不想再等了。当华尔街捍卫自由市场的原则和强调政府应发挥有限的作用时，它们根本不屑于要求政府帮助推动它们的议程。正如我们看到的，美国财政部对此反应强烈。

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内部，我们并不相信韩国的自由化是一项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议题，虽然很明显，它有助于实现华尔街的**特殊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担心它对全球稳定性的影响。我写了个备忘录或称之“时评”来阐述该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也引起了对该问题的关注。我们准备了一系列标准来评估哪些市场开放措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我们赞成**优先秩序**系统。很多形式的“市场准入”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当一些特殊团体可能获得大量的利益时，而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获得的利益可能就较少。正是因为没有优先秩序，在以前布什政府期间就存在风险：曾经认为开放日本市场能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美国最大的玩具零售企业反斗玩具店（Toys“R”US）能够将中国的玩具销售给日本的儿童——这对日本儿童和中国工人来说都是好事，但是美国却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虽然我们很难相信这样温和的一项提议会遭到反对，但事实上它确实遭到反对。劳伦斯·萨默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坚决反对这一实践，他认为根本不需要此类优先秩序。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NEC）的责任主要包括：协调经济政策、平衡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其他各机构的政治压力下做出的经济分析，并决定将哪些议题提交给总统做最后的决定。

国家经济委员由罗伯特·鲁宾领导，他认为该问题还没有重要到需要提交给总统加以考虑的程度。反对优先秩序的真正原因只是因为它太透明了。强迫韩国更快地实施自由化并不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不太可能给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带来重要的增长。因此，任何优先秩序系统都将不会强迫韩国把更快地实施自由化排在日程的前面。[10]更糟糕的是，甚至连美国作为一个整体都将不会获得明显收益；但明显的是，韩国实际上可能会更加糟糕。美国财政部指出，韩国的快速自由化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它也不会导致不稳定，在这两方面，财政部都占据上风。在最后分析中，这些问题都是财政部的职责范

围，而且财政部自然不会让其他人凌驾于其地位之上。实际上，这些争论都是关着门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根本就不会听到其他的声音；如果美国的决策制定更透明，或许他们能够听到其他的意见，那么结果也就有可能不同了。的确，财政部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美国、韩国和全球经济都输了。财政部可能会宣称，自由化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是自由化是按照错误的方式进行的。但这正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需要指出的：很可能就是因为糟糕地实施了快速自由化政策。

第一轮失误

毫无疑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通过鼓励、坚持（在一些案例中）毫无根据地快速的金融资本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从而形成促进危机爆发的环境。然而，在刚开始处理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在下面即将叙述的许多失败中，除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政策的批评外，如今几乎所有关于失败的原因都被广泛地接受。

在危机刚爆发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像对该问题判断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处理过拉美的危机，拉美的危机是由于政府的肆意挥霍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的巨大赤字和高通货膨胀造成的。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没能很好地处理这次危机——在所谓的成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实施后，拉美地区经历了近 10 年的停滞，甚至债权人最终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损失——但是至少它制定了一项博弈计划，该计划存在特定的一致性。东亚地区与拉美地区的情况大不相同：东亚地区的政府保持着财政盈余，且经济的通胀率很低，但该地区的公司却都处于深度负债中。

存在这种诊断差异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在拉美地区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需要降低过度的需求；而东亚衰退来临之际，问题不是过度的需求，而是需求不足，抑制需求可能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其次，如果企业的负债水平很低，虽然高利率也会令人痛苦，但还是能够忍受的。如果负债水平较高，强制提高利率，即使是短期的，就等于给很多企

业判处死刑——同样也是对经济判处死刑。

实际上，虽然亚洲经济体的确存在某些弱点需要改进，但是这些国家也不会比其他很多国家的问题更糟糕，并且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国家怎么也不会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那样糟糕。的确，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的快速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低迷与资本主义 200 年来困扰发达工业国家市场经济的诸多衰退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东亚国家不仅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而且在过去 30 年中，这些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要比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家都少得多。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只出现一次负增长；有两个国家在 30 年间都没有出现过衰退。从这些方面及其他方面看，东亚的确值得更多地赞扬，而不是受到指责；而且，如果说东亚是易受攻击的，那么这种易受攻击的特点也是最近才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资本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胡佛式的紧缩政策：现代世界的反常行为

70 多年来，当某个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低迷时，有一套标准的处理方法：政府必定要刺激总需求，要么通过货币政策要么通过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削减税收、增加支出或者放松货币政策。我担任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的主要目标就是将经济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并使长期增长最大化。到世界银行任职时，我本着相同的目标开始着手解决东亚国家的问题，对这些政策进行评估以发现哪些政策在短期内和长期内都最有效。东亚经济很明显受到重大衰退的威胁，需要进行刺激。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推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其结果正如每个人都已经预测到的那样。

在危机刚爆发的时候，东亚经济大体上处于宏观平衡状态——通货膨胀压力较小，并且政府预算保持平衡或存在盈余。这里存在两个明显的暗示：首先，随着投资和消费的下降，汇率市场、股票市场的崩溃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会使该国陷入衰退。其次，经济崩溃将导致税收收益的崩溃，并造成预算缺口。直到赫尔波特·胡佛时期，才有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提出，我们应该关注实

际赤字，而不是结构性赤字，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赤字就会出现。然而，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倡的。

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它推荐的财政政策过于严厉。[11]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衰退，使其比自身的发展趋势更加糟糕。然而，在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执行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在《金融时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捍卫国际货币组织的政策，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期望只是要求这些国家保持预算平衡！”[12]60 年来，没有哪个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相信当一个经济体陷入衰退时还应该保持预算平衡。

我对预算平衡这个议题印象很深刻。当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时，我们进行的主要斗争之一就是取消《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联邦政府限制对其收益的支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都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我们相信，该修正案只会给我们利用财政政策帮助经济复苏带来更多的困难。随着经济陷入衰退，税收收益减少，该修正案将会要求政府削减支出（或增加税收），这就会使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

通过该项修正案就等同于要求政府放弃一项核心的责任，即将经济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尽管实际上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少数走出衰退方法中的一种，尽管政府对预算平衡修正案是如此反对，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还是在泰国、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提倡预算平衡修正案。

自作自受的政策

1997 年和 1998 年，当东亚危机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能认识到在不同国家追求的政策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某个国家的紧缩性政策不仅会抑制本国的经济，同时也会对其邻国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通过不断地提倡紧缩性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剧了危机的蔓延，低迷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随着每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削弱，它就会降低从邻国的进口，从而会将邻国拉下水。

20 世纪 30 年代那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总体上被认为在大萧条的传播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每个遭受打击的国家都试图通过削减进口以支持本国的经济，因此，它们都将消费需求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上。某个国家可能通过征收关税和对本币进行竞争性贬值来削减进口，对本币进行贬值将会使本国的货物相对便宜，而其他国家的货物相对昂贵。然而，随着每个国家都削减进口，该国成功地将自己的经济低迷“出口”到它的邻国，因此就出现“以邻为壑”这个名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一项战略，其效果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摧毁世界各国经济的“以邻为壑”政策更糟糕。该项政策告诉这些国家，当面临经济低迷时，它们就应该削减其贸易赤字，甚至要获得贸易盈余。如果某个国家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偿还外国债权人，这可能是合理的。通过建立外国货币专项基金，某个国家将会很好地支付它的账单——而不用担心对本国国内或其他任何地方造成的代价。如今，不像20世纪30年代，即使在面临衰退时，在提高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壁垒以减少进口时，每个国家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此强烈抨击，反对进一步贬值。的确，救援行动的全部要点就是阻止汇率进一步下降。这本身看起来可能就很奇怪，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对市场都非常信任：为什么不让市场机制决定汇率水平呢，就像由市场决定价格那样？但知识的连贯性从来都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点，它真正担心的是由货币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除了提高关税和货币贬值，还有两种方式来创造贸易盈余：其中一个就是增加出口；但是这并不容易，而且不能很快就实现，尤其在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非常脆弱且本国的金融市场非常混乱时，因为出口者会没法获得政府支持以扩大出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削减收入降低进口——正是这种方法导致重大的衰退。对这些国家和世界来说，不幸的是，这是剩下的唯一选择。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国家发生的事情：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错误的金融政策一起导致了巨大的经济低迷、减少了收入，进而降低了进口并产生了巨大的贸易盈余，给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用以偿还外国贷款。

如果某个国家的目标是增加外汇储备规模，这项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它对该国及邻国的人们造成太大的负担！因此，可以将这些政策命名为“自作自

受”的政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贸易伙伴来说，其后果与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完全相同。任何国家进口的削减，就等同于其他国家出口的削减。从邻国的视角看，它们对出口为何减少了毫不关心；它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即海外销售的下降。这样，低迷就被出口到该地区的各个国家。只有在这时候，即低迷被出口到没有任何可影响之处时，国内经济才得以增强。随着低迷蔓延到世界各地，该地区较低的增长导致商品价格的崩溃，比如石油价格，而且，这些价格的崩溃将会对石油生产国（比如俄罗斯）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的失败中，这或许是最让人伤心的，因为它意味着对其存在理由的最大挑战。它的确担心蔓延——通过投资者的恐惧从一个资本市场向另外一个资本市场传递——正如我们在最后一部分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使这些国家更易遭受投资者情绪变动的攻击。泰国汇率的崩溃可能使巴西的投资者担心巴西的市场。这种嗡嗡声就是**信心**。某个国家如果缺乏信心，就会将这种信心的缺乏传播到新兴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现就像市场心理学者留给人们渴望的东西。无论是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而造成更严重衰退的政策，还是指出在那些表现优异的新兴市场中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的政策，都对恢复信心毫无作用。但是，即使它的确能够在恢复信心方面做得很好，这里依然会出现问题：在集中保护投资者时，它忽视了这些国家中应该得到帮助的人们；在集中于诸如汇率这样的金融变量时，它几乎忽视了经济真实的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忘记了其最初的使命。

利用高利率遏制了经济增长

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它推行的财政政策（与政府赤字水平相关的政策）过于紧缩，但是，它并不承认货币政策的失误。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入东亚时，它强迫这些国家将利率提高到天文水平（按传统的说法）。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以格林斯潘（前任政府任命的）为首的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打算将美国的利率提高 0.25 或者 0.5 个百分点，对此，克林顿总统颇为沮丧。克林顿担心这会摧毁“他”的复苏，他感觉是在以下情况下被选为总统的：“这就是经济，笨蛋!”和“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克林顿总统

并不想让美联储伤害到他的计划。他知道美联储关心通货膨胀，但是认为美联储的担心有些过度——这也是我的感觉，随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克林顿总统担心提高利率的负面效果将会造成失业，而美国的经济才刚开始复苏。这是世界上具备最好商业环境之一的国家所出现的事情。然而，在东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甚至更少承担政治责任，他们强迫这些国家提高利率，不是提高 10 倍，而是提高 50 倍甚至更高，利率提高到 25% 以上。如果克林顿担心将利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就会对刚开始复苏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在正经历衰退的国家，将利率提高到如此之高，其影响就会使其经济瘫痪。韩国首先将其利率提高到 25%，但是被告知情况很严重，必须允许利率进一步提高。在危机爆发前，印度尼西亚就抢先提高了其利率水平，但是被告知还不够高。名义利率飞速飙升。

如果不是过于单纯的话，这些政策背后的推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提高了利率，将会使该国对资本流入更具有吸引力。资本流入就会帮助该国维持汇率水平，并因此稳定通货。这样，争论就结束了。

乍一看，这很合理。但是，看看韩国的例子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回想起韩国的危机，实际上是由外国银行拒绝对向其提供短期贷款造成的。它们拒绝提供短期贷款是因为它们担心韩国企业无法偿还。破产——违约——是讨论的关键。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中——正如 20 年前大部分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写的模型一样——根本就没有破产这一说。在没有破产的情况下讨论货币政策和金融问题，就像讨论《哈姆雷特》而不提及丹麦王子一样。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应该是分析以下问题：对于违约的几率来说，提高利率能做些什么；以及在违约事件发生时，债权人能够收回的数额。东亚的很多企业都是高负债的企业，而且自有资金负债率都很高。的确，过度的杠杆作用曾被认为是韩国的缺点，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这么认为。过度使用杠杆作用的企业对利率上升尤其敏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成的超高水平的利率更加敏感。在很高的利率水平上，过度利用杠杆效应的企业破产更快。即使它不破产，其资产（净值）在其被迫向债权人偿还巨额贷款时会被很快耗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到，东亚国家潜在的问题是虚弱的金融机构和过度

使用杠杆效应的企业；但是它依然推行高利率的政策，确实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其结果与我们预测的一样：高利率政策使处于困境的企业数目增加，进而使得不进行对外借贷的银行数目增加。[13]这进一步削弱了银行。公司以及银行部门困难的加深加剧了紧缩政策通过降低总需求所引致的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同时萎缩。

为捍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它声称，这将帮助受影响的国家恢复市场信心。但是很明显，陷入深度衰退的国家并没有恢复信心。我们看看一位将其所有财产全部投入到东亚的雅加达商人的举动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随着该地区经济直线下滑——紧缩性政策加剧和放大了经济低迷——他突然意识到他的投资组合根本不够多样化，因此，就将投资转向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就像国际投资者一样，当地的投资者对于将其资金投入到正走向失控的经济并不感兴趣。高利率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该国。相反，高利率使衰退进一步恶化，最后实实在在地将资本逐出该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着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无效的捍卫措施。它指出，如果不大幅提高利率，那么汇率就会崩溃，如同那些以美元定价的债务不能偿还一样，这也会摧毁经济。但很明显，事实是，提高利率并没有稳定通货（本国货币）；这样，这些国家不得不在两个账户上都出现损失。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都不自找麻烦地去审视这些国家内部发生事情的细节。比如，在泰国，是已经破产的房地产企业和那些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的企业拥有的外币面值债务最多。进一步贬值将会伤害到外国债权人，但不会使这些企业更多地破产。从效果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这些小企业和其他无辜的旁观者替那些具有过多美元贷款的企业偿还贷款，它们却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当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恳求对其政策进行改变，并指出如果继续实施当前的方针，这场灾难会接踵而至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答复非常简略：如果能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改变它的政策。对于这种“等等看”的态度，我很寒心。所有经济学家都明白，政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益。不会在6～8个月的时间内看到方针改变的利益，而在这期间就有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

东亚就发生了灾难。因为很多企业都过度地利用杠杆效应，很多企业都被迫破产。在印度尼西亚，所有的企业中估计有 75% 都处于困境之中；在泰国，有接近 50% 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贷款。不幸的是，摧毁一个企业远比建立一个新企业容易。降低利率不会使已经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它的净资产依然会被消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误代价很大，扭转过来又太慢。

幼稚的地缘政治学推理，基辛格式的现实政治残余混合起来造成这些错误的结果。1997 年，日本出资 1 000 亿美元帮助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旨在资助需要的刺激行动。但是美国财政部尽其所能制止了这一想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参与进来，持有这样的立场其原因很明显：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市场竞争的强力提倡者，它不希望在自己的领域内展开竞争，而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会造成它们之间的竞争。美国财政部的动机很相似。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唯一具有否决权的股东，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具有相当份量的发言权。人们普遍知晓的是，日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强烈不满——我曾多次参与日本高级官员座谈会，会上，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表现的疑虑和我本身的疑虑几乎相同。[14] 对于日本来说，可能还有中国，它们有可能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出资者，它们的声音可能会成为主流，将对美国的领导和控制发起实实在在的挑战。

控制的重要性——包括对媒体的控制——在危机爆发的早些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世界银行负责东亚地区的副总裁简·米歇尔·塞维利诺（Jean Michel Severino）在一次宽范围的研讨会中指出，东亚地区的某些国家正走向更深的衰退，或者甚至是萧条，财政部对此强烈回应。事情变得非常明显，即：对于财政部来说，它根本无法接受使用 R（代表衰退）或 D（代表萧条）这些词汇，即便是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 10% ~15%，即便是很明显有正当的理由使用这些严厉的术语，它也不会接受。

最终，萨默斯、费舍尔、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没法忽视萧条。日本再次慷慨地提出要帮助实施宫泽计划，该计划是以日本财政部长（大藏省大臣）的名字命名的。这次提供的支持规模减少到 300 亿美元，该计划被接受了。虽然美国认为，这些资金不应该通过财政扩张用于刺激经济，而应该用于

公司和金融复兴——但是，它毕竟有效地救助了美国和其他的外国银行和债权人。至今，亚洲人对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破产仍耿耿于怀，许多官员都愤怒地向我诉说这次变故。危机后3年，东亚国家最终平静地联合起来开始建立更为合适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清迈倡议》这个无伤大雅的名字来命名[⊖]，这是以启动该倡议的泰国北部城市来命名的。

第二轮失误：装模作样的重建

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需要“重建”成为新的颂歌。那些在账面上存在坏账的银行应该被关闭，而那些欠债的企业也应该破产或者由其债权人接管。而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关注于以下问题而不是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提供流动性以资助需要的支出。令人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能成功地关注于重建，而且它所做的很多事情将已经消沉的经济进一步推向深渊。

金融系统

东亚危机首要的是金融系统的危机，金融系统应该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金融系统堪比经济的大脑，它试图通过指导资金在哪里使用是最有效的，从而在竞争性的各种用途中分配这些资金，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资金能够获得最高的收益。金融系统也监视着这些资金，以保证它们能够按照承诺的方式加以利用。如果金融系统毁掉了，那么，企业就不能获得维持现有产出水平的运营资本，更不要说通过新投资实现金融扩张了。危机能够引起恶性循环，其中，银行削减它们的贷款，导致企业削减其产出，这又反过来导致更低的产出和更低的收入。随着产出和收入的直线下降，利润开始下降，这样一些企业甚至被迫破产。当企业宣布破产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很难看，这样银行就会进一步削减贷款，进一步恶化已经衰退的经济。

⊖ 2000年5月，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日本、韩国的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清迈倡议》。《清迈倡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译者注

如果有足够多的企业不能偿还它们的贷款，那么银行甚至有可能崩溃。即使是单一的银行崩溃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金融机构决定信用度。该信息高度专业化，不能够被轻易地传递，而是被深深地嵌入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记录和机构备忘录中。当某个银行停业时，该银行拥有的大部分借贷者信用度的信息也就被销毁了，而重建这些信息的成本却很高。即使在更发达的国家，通常一个小型或中型企业至多能够从两个或三个银行那里获得信用。当某个银行迅速停业时，它的很多客户很难在一夜之间就能找到一个信用替代提供者。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融资资源更有限，如果某个商业依赖的银行停业的话，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该恶性循环的担心诱使全世界的政府部门通过谨慎的规制强化金融系统。自由市场的商人们再次非常愤怒地反对这些规制。当他们的声音受到注意时，结果已经损失惨重。1982～1983年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7%，20%的工人失业；在前面已经提到，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放松规制导致存储系统崩溃，使美国纳税人付出超过2 000亿美元的代价。

对保持信贷流动重要性的认识与引导政策制定者试图处理金融重建问题相似。对“信息资本破坏”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心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存储系统崩溃时就立刻关闭了寥寥无几的几家银行。大部分虚弱的银行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并到其他银行中，消费者几乎不知道这种转变。通过这种方式，信息资本得以保存。即便是这样，存储危机也是造成美国1991年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

诱使银行运营

虽然东亚银行体系的弱点比美国银行体系的弱点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辞也一直在关注这些弱点，并将其视为东亚危机的根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能正确理解金融市场如何运营的，也没能理解它们对经济其他部分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拙劣的宏观模型从来都没能从整体层面上涵盖金融市场的广阔情景，至于微观层面——也就是说，在企业层面——就更不完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充分重视企业和金融困境，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

的稳定政策，包括高利率政策，反而极大地加深了这些困境。

在他们着手处理重建的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的队伍开始考虑关闭虚弱的银行；仿佛他们心中存在达尔文竞争模型，因此这些虚弱的银行一定不会生存下来。他们的立场有一定的基础。在其他地方，如果允许虚弱的银行继续在**没有严格监督**的情况下运营，那么这些虚弱的银行就会创造高风险的贷款。它们会冒险发放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如果它们很幸运，这些贷款能够得以偿还，并且较高的利率使它们恢复偿付能力；如果它们很不幸，它们将会停业——由政府来收拾乱摊子——但是，如果它们不着手解决风险贷款问题，就会出现所有案例中发生的情况。通常，这样的风险贷款的确转化为不良贷款，当算账的那天到来时，政府将会面临甚至比早些将银行关闭更大的救援。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教训，该教训清楚地反映在美国储贷危机的案例中：多年来，里根政府一直拒绝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当危机不能再被忽视时，纳税人所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关键的教训：即保持信贷流动性的重要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重建战略涉及治疗类选法，即将确实存在问题的银行与运行较好的银行区分开来，将确实存在问题的银行关闭；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存在问题但可修复的银行。一般要求银行的资本与未尝贷款及其他资产具有一定的比率，该比率被称为**资本充足率**。这并不奇怪，当很多贷款不能被偿还时，很多银行都不能满足资本充足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指出，这些银行要么关闭，要么尽快满足资本充足率。但是坚持主张银行尽快满足资本充足标准加剧了衰退。在经济学第一节课中，我就向我的学生警告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犯下的这类错误，并称之为“合成谬误”[⊖]。当只有一家银行存在问题时，坚持要求它满足其资本充足标准有意义，但是当很多或者说大部分银行都存在问题时，该项政策就只能说是场灾难。有两种办法来提高资本对贷款的比例：增加资本或降低贷款。在衰退时，尤其是东亚大量的银行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很难增加新资本。那么替代

⊖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意为它是一种谬误，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对全局而言未必是对的。——译者注

选择就是降低未偿还的贷款。但是在每个银行都收回其贷款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陷入困境。没有充足的运营资本，这些企业不得不削减产出，减少对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衰退开始螺旋式地加剧。并且，随着更多的企业陷入困境，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甚至进一步恶化。改善银行融资形势的努力事与愿违。

随着大量的银行关闭，并且那些成功生存下来的银行面临陷入困境的贷款数目越来越大，它们就不情愿接纳新的客户，这样，越来越多的商业就会发现它们根本无法获得信贷准入。没有信贷，复苏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货币贬值意味着出口应该得以繁荣，来自该地区的货物变得更便宜，便宜30%甚至更多。虽然出口数量增加，但根本没有增加到它们期望的那么多，原因很简单：为扩大出口，企业需要运营资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是由于银行的关闭和减少贷款，企业甚至不能够获得维持正常产出的运营资本，更不要说扩大生产了。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关闭印度尼西亚银行的政策时，很显然它对金融市场缺乏理解。在印度尼西亚，有16家私人银行被关闭，而且通知说其他银行也有可能随后关闭；除了那些数额非常小的存款人外，其他存款人只能靠自己了。毋庸置疑，幸存下来的银行立即出现挤兑现象，存款被迅速转向国有银行，因为它们被认为具有绝对的政府保障。结合前面已经讨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这对印度尼西亚银行系统和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且几乎决定了印度尼西亚的命运：萧条不可避免。

公司重建

在将注意力集中于金融重建时，除非能够有效地处理公司的问题，否则很明显，金融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在印度尼西亚，几乎75%的企业都陷入困境，在泰国有50%的贷款都得不到偿还，公司正陷入瘫痪。面临破产的企业也处于地狱的边缘：根本不清楚谁真正拥有这些企业，是当前的所有者还是债权人？直到该企业破产，所有权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没有清楚的所有者，那么对当前的管理者和以前的所有者来说，都存在剥夺资产的诱惑，而实际上，这

种资产剥夺的确发生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当公司濒临破产时，由法院任命托管人来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但是，在亚洲，不仅没有法律框架，也没有人来履行托管人的职责。因此，在剥夺资产发生前，必须强制尽快地解决破产和企业困境问题。不幸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误导性的经济学通过提高利率制造了混乱，高利率迫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它与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一起抑制了重建的步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司重建战略——对那些事实上处于破产的企业进行重建——并不比它进行的银行系统重建战略更成功。它混淆了**融资**重建（包括理清谁真正拥有该企业、清偿债务或者资产净值的转化）和**真正的**重建，即具体细节的决策：企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如何生产以及应该如何组织生产。在出现巨大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快速进行融资重建的确具备宏观利益。但是，由于进行破产谈判的某些个体参与者未能重视系统的利益，他们就有可能拖后腿——因此，破产谈判常常被拖延，甚至要花费 1～2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经济体中只有少数的企业破产时，这种耽搁的社会成本很小；当很多企业都陷入困境时，因为宏观经济衰退被延长了，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尽其所能促进问题尽快解决。

我认为政府应该在推动融资重建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确保企业享有真正的所有权。一旦所有权问题解决了，新的所有者将开始承担真正重建的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正好相反，它认为政府不应该在融资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需要在推动真正的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出售资产以降低韩国看似过剩的芯片生产能力，以及引入外部（通常是外国）管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那些经过宏观管理培训的国际官员，他们总体上对公司重建具有特殊的洞察力，或者专门对芯片产业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重建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韩国和马来西亚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用了两年时间）取得了成功，完成了对大部分陷入困境的企业的融资重建。相反，泰国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进行重建，但却软弱无力。

最令人忧伤的失误：甘冒社会和政治动乱的风险

也许根本不能充分估量错误地处理亚洲危机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迈克尔·康德苏和 22 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他们主要来自工业国家，以及主要的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于 1997 年 12 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会议时，我警告说，如果继续强制实施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会存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风险，尤其是在那些存在民族分裂历史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早在 30 年前就发生过大范围的民族骚乱）。康德苏平静地回应说，他们需要向墨西哥学习；如果要想本国的经济得到恢复，他们就必须采取痛苦的措施。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在我警告将面临灾难仅 5 个月后，就发生了暴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 230 亿美元来维持汇率和救援债权人时，却没有用比这笔资金少得多的资金来帮助穷人。按照美国的说法，花了数十亿上百亿美元建立公司福利，但却没有区区几百万美元来为普通公民建立福利。印度尼西亚彻底削减了对穷人的食物和燃料补贴，第二天就爆发了暴动。正如 30 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样，印度尼西亚商人和他们的家庭成为牺牲品。

这不只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可能被愚蠢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残忍的。如果我们对那些面临饥饿的人或那些由于营养不良而成长受到抑制的孩子漠不关心，这就是糟糕的经济学。暴乱不会恢复商业信心。暴乱只会将资本逐出该国，而不会吸引资本进入该国。而且，暴乱是可以预言的——正如很多社会现象一样，虽然它并不具备确定性，但却有很高的可能性。很明显，印度尼西亚已经具备发生这种剧变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应该知道这一点；在全世界范围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要削减食物补贴时，就会发生暴乱。

印度尼西亚发生暴乱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它的立场，恢复了食物补贴。但是从表面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然没有汲取“不可改变性”这一基本教训。正如那些因为高利率已经破产的企业不会在利率降低后起死回生一

样，由于削减食物补贴引发的暴动造成的社会分裂就像陷入衰退一样，在食物补贴恢复后并不能重新恢复。的确，在某些地区困难更为严重：如果能够提供食物补贴，为什么第一步就取消呢？

印度尼西亚发生暴动后，我有机会与马来西亚总理进行交谈。马来西亚过去曾经历了种族暴乱。为阻止这种暴乱再次发生，马来西亚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提出一个方案，以促进马来西亚人的就业。马哈迪·莫哈末[⊖]知道，如果他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马来西亚的政策，就会发生暴动，这样，在建立多民族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所有成果将会被毁于一旦。对他来说，阻止严重的衰退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国家的生存问题。

复苏：这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辩护吗？

在本书出版时，危机已经过去。许多亚洲国家的增长又开始重现，2000 年开始的全球衰退对它们的复苏仅有轻微的阻碍。那些成功避免了 1998 年衰退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在 2001 年陷入了衰退；而韩国的表现要好得多。随着世界范围的衰退逐步地影响到美国和德国，没有人认为虚弱的机构和糟糕的政府是这次衰退的原因；如今，他们看起来已经想起，这样的波动一直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些人相信他们的干涉是成功的，但是，在更大范围内，有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的确，复苏的本质表明了这一点。几乎每个经济衰退最终都会结束。但亚洲危机比其应有的程度更为严重，而复苏比其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未来的增长前景也不应该是预计的那样。

华尔街认为，当金融变量刚开始转向时，危机就结束了。只要汇率还在降低或者股票价格还在下降，就不清楚“底”在何处。但一旦达到谷底，至少是损失到头了，也就会知道最糟糕的情况。然而，为估量真实的复苏，单靠汇率

⊖ 马来西亚第 4 任总理，任期为 1981 年 7 月 16 日至 2003 年 10 月 31 日，被人尊称为宏愿之父。——译者注

和利率稳定是不充分的。毕竟，人们并不依靠汇率和利率生活。工人们在乎的是工作和薪金。虽然失业率和实际工资可能已经降至最低点，但是，对于那些依然处于失业状态以及那些发现自己的收入下降了 1/4 的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只有工人们又重新开始工作且他们的薪金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时，才是真正的复苏。受到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如果继续按照 10 年前的速度增长的话，它们目前的收入要低 20%。2001 年，印度尼西亚的产出依然比 1997 年低 5.3%；泰国，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优秀的学生，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更不要说弥补失去的增长了。这还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早地宣布成功的第一个例子：早在 1995 年，当墨西哥银行的国际借贷者开始得到偿还时，它就宣布墨西哥的危机已经结束；但在危机爆发 5 年后，工人们才开始恢复到以前的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关注金融变量，而不关注实际工资、失业、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更广泛的福利措施等，这一事实本身就非常明显。

如何最快地实现复苏，这个问题很复杂。很明显，答案取决于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对许多衰退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标准的凯恩斯方法：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东亚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部分问题是缘于金融部门的弱点——虚弱的银行和过度利用杠杆效应的企业。但是衰退的加深使这些问题变得更糟。痛苦并不是什么优点；痛苦本身也不能帮助经济复苏；不仅如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造成的痛苦还加深了衰退，使其复苏更为困难。有时候，正如拉美地区的国家那样，比如阿根廷、巴西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危机是由肆意挥霍的政府通过支出超过预算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削减支出或者增加税收——这注定是痛苦的，至少在政治意义上是这样。但因为东亚既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肆意挥霍的公共部门——通货膨胀率很低而且也非常稳定，危机前还保持一定的预算盈余——应对拉美国家危机的正确措施就不适用于处理亚洲危机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就在于它们的这些失误可能是长期持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认为经济需要的仅仅是一副好的泻药：忍受痛苦；痛苦越深，随后的增长也就越猛烈。也就是说，它们的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关注的是它的长期前景——即从现在开始 20 年后——那么，它就应该艰难地咽下

泻药，并忍受深度的衰退。如今，人们忍受痛苦，但他们子女的情况至少应该要好得多。不幸的是，事实并不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一个深度衰退的经济体在复苏时可能增长得更快，但它却从来都不能弥补失去的增长。如今的衰退越严重，收入可能就越低，甚至从现在开始起20年后都一样。并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的那样，情况可能要好得多。衰退的影响是长期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如今衰退的严重程度，不仅使当前的产出很低，而且多年后产出可能更低。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当前对经济健康的良药与以后最好的药是一致的。它暗示应该直接寻求经济衰退程度最低和衰退持续时间最短的经济政策。不幸的是，这既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意图，也不是其政策的效果。

马来西亚和中国

对马来西亚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选择了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而东亚的其他国家都接受了它的方案）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负面影响。在危机爆发时，马来西亚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严厉批评。虽然马哈迪·莫哈末总理的言辞和人权政策常常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他的许多经济政策是成功的。

马来西亚很不情愿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部分缘由是其官员不希望被外部人命令，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信心。在1997年危机初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迈克尔·康德苏宣称，马来西亚的银行非常虚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一个队伍很快被派到马来西亚来审议该国的银行系统。当时，马来西亚的不良贷款率很高（15%），它的中央银行强制实施强硬的规制，使得银行为其损失进行了充足的防备。此外，马来西亚强硬的规制姿态阻止了银行进行外币兑换的波动性[⊖]，甚至限制这些银行向公司借出外国债务（这些预防性措施在当时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 即借入美元贷出林吉特的危险，林吉特是马来西亚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评估银行系统实力的标准方法是在模拟训练中历练它，强调测试和评估它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反应。马来西亚的银行系统经营得很好。很少有银行系统能够在较长的衰退或萧条中生存下来，马来西亚的银行也不例外；但是，马来西亚的银行系统不同寻常的强大。在多次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我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在撰写报告时的困难：如何在与执行总裁的断言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如实地阐述马来西亚的现象。

在马来西亚，人们在激烈地争论如何正确应对危机这个议题。财政部长安瓦尔·依布拉欣建议“一个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也就是说，提高利率并削减支出。马哈迪·莫哈末对此表示怀疑。最终，他抛弃了他的财政部长的看法，经济政策也发生了逆转。

随着区域性的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被套牢，马哈迪·莫哈末再次出手。1998 年 9 月，马来西亚将林吉特盯住美元（1 美元兑换 3.80 林吉特），降低利率，并且下令所有的离岸林吉特必须在月底返回国内。政府也对马来西亚居民的资本向海外转移进行严格的限制，并且对外国投资资本遣返回国冻结 12 个月。这些措施被宣称是短期措施，并精心设计使大家相信，该国对长期外国投资没有敌意。那些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并获利的人被允许将其投资和利润带出国。1998 年 9 月 7 日，在《财富》杂志非常著名的一个专栏中，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力劝马哈迪·莫哈末加强资本控制，但他只是少数劝说者之一。马哈迪·莫哈末的中央银行行长阿马德·穆罕默德·东及其副手 Fong Weng Phak 双双辞职，据说是因为他们不同意这些控制被强迫接受。一些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的来自华尔街的经济学家——预测，当强制实施控制时，就会出现灾难。他们认为，外国投资者将会受到惊吓，多年以后才会再来此投资。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会直线下降，股票市场将会下跌，随着汇率的扭曲会出现林吉特黑市。同时，他们警告说，控制会导致资本流入的枯竭，并且对阻止资本流出无效。总之，将会出现资本外逃。这些批评家们预测经济将遭受痛苦，增长将会停止，而且控制不会被撤销，马来西亚正在推迟处理潜在的问题。甚至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这位平时都很安静的人，也加入到这场公共的谴责中。

事实上，结果远不是这样。我在世界银行的团队与马来西亚一起努力将资本控制转变为一种输出税。因为资本快速流入和流出某个国家将造成极大的动荡，它们会在其他方面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大的外部性”效应，普通人不会涉及这些资本流动。政府有权，甚至有义务采取措施处理这些动荡。总体上，经济学家相信以市场为基础的干涉（比如税收）更有效，并且比直接控制的负面影响更少，因此，我们在世界银行内部鼓励马来西亚取消直接控制，并且征收输出税。此外，该税可以逐渐降低，这样，在干涉最终被撤销时就不会产生大的动荡。

事情正如计划的那样进展。在强制实施控制 1 年后，马来西亚履行了其承诺，取消了输出税。实际上，马来西亚曾经强制实施过临时资本控制，并且事情一旦稳定就立刻取消。那些如此全面地攻击该国家的批评者们忽视了马来西亚的历史经验。在 1 年的过渡期内，马来西亚重新整合了它的银行和公司，这再次证明那些批评家们错了。那些批评家们认为，只有遵守政府从来都不认真做任何事这一自由资本市场规律，经济才能够实现重建。的确，在指导方面，马来西亚比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令的泰国取得更大的进展。对此进行回顾时，很明显，马来西亚的资本控制使其在轻微的衰退后复苏得更快，[15]并且未来的增长中所承担的国家债务更少。资本控制使其具有更低的利率水平，更低的利率意味着很少有企业要破产，并且因此公开资助的公司和金融救援行动的金额要少得多。较低的利率也意味着复苏能够在更少地依赖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发生，因此，政府借贷就更少了。如今，马来西亚的形势要比那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好很多。没有证据表明资本控制阻止了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实际上增加了。[16]因为投资者关心经济稳定，因为马来西亚在维持稳定方面做的工作比它的邻国更好，所以它能够吸引外资。

中国是另外一个遵循独立自主计划的国家。两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得以避免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是偶然——它们都实施资本控制。当发展中世界中那些实施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家看到它们的收入确实在下降时，印度的增长率却超过 5%，中国的增长率则接近 8%。这在全球增长尤其是那个时期贸易增长全面减缓的情况下更为可观。中国通过遵循主流经济学的建议取得了

如此的成绩。这里不存在胡佛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却存有经济学家已经讲授超过半个世纪的合理建议：在面临经济衰退时，应以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应对。中国抓住了这次机会将其短期需要和长期增长目标相结合。在过去10年内并预计要持续到下个世纪的快速增长，为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大量的需求。对具有高回报的公共投资来说存在巨大的机会，包括加速那些刚起步的项目，以及那些已经设计好但因为缺乏资金而不得不搁置的项目。标准的解决办法很有效，中国也避免了增长的下滑。

在制定经济政策决策时，中国知道将宏观稳定和宏观经济结合起来。它知道需要继续重建公司和金融部门，也意识到经济下滑将会使得改革进程的推进更加困难。经济衰退将会使更多的企业陷入困境，并且让更多的贷款得不到偿还，从而削弱银行系统。经济衰退也会增加失业，失业的增加将会使重建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更高。同时，中国意识到经济和政治及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所有方面，中国完全赏识宏观经济政策系统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往往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习惯性地忽视了。

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脱离危险了。事实表明，前几年中国的银行和国有企业的重建依然存在挑战。但是这些挑战在其强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能够得以很合理地应对。

虽然因为个体环境的不同，很难确定危机产生和快速复苏的原因，但我认为，只有主要的东亚国家，中国采取了直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反的计划从而避免了危机；马来西亚的经济衰退时间最短，它也直接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这绝不是偶然。

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韩国和泰国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对比的例子。从1997年6～10月，在经历了短时期的政策摇摆不定后，泰国几乎完全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然而，在危机开始后超过3年时间，它依然处于衰退之中，其国内生产总值较危机前的水平低近2.3%。很少公司得以重建，并且有近40%的贷款依然是不良贷款。

相反，韩国并没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指令管理银行，而且韩国政府像马来西亚政府一样，在重建公司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韩国降低汇率将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不是让它反弹。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使其能够恢复储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要为储备而购买美元，那么就会压低韩国货币的面值。韩国将汇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是为了扩大出口和限制进口。此外，韩国并没有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关注实体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好像它比那些制造芯片的韩国企业更了解全球芯片产业一样，认为韩国应该尽快地削减剩余产能。韩国很潇洒地忽视了该建议。随着对芯片需求的恢复，经济也复苏了。如果韩国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天知道韩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复苏！

在评估复苏时，更多的分析家忽略了印度尼西亚，只是因为其经济受政治事件和社会动乱所影响。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和社会动乱其实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措施脱不开干系。没人知道苏哈托是否能够实现更得体的转型，但是很少人认为其政策会使经济更加混乱。

对未来的影响

尽管存在很多困难，东亚危机也存在一些有益的影响。东亚国家将毋庸置疑地全面发展更好的金融规制体系、更好的金融机构。虽然东亚的企业已经展示出在全球市场非凡的竞争能力，但是韩国的经济很可能会更具竞争性。最为严重的是腐败问题，即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将被遏制。

然而，处理危机的方法——尤其是使用高利率的方法——对该地区的中期（也可能是长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其核心原因的确是一种讽刺。虚弱的、处于规制下的金融机构很糟糕，因为它们造成糟糕的资源配置。虽然东亚银行远非完美，但在过去 30 年中，它们在配置巨大资本流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支持它们快速增长的原因。虽然那些人推动东亚“改革”的意图是提高金融系统配置资源的能力，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很可能削弱了市场的总体效率。

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新投资是通过增加新的权益（在公司内出售股票份

额）获得融资的。的确，只有少数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日本拥有广泛多样的股份所有制，这些国家都有强大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股东保护机制。建立这些法制机构需要时间，而且很少有国家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必须依赖负债。但负债天生是有风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比如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在危机发生时将利率提高到过高的水平，等等，甚至会使借贷风险更大。为合理地应对高利率，企业将不得不追求较低的借贷水平，并且强迫他们更依赖未分配的利润。因此，未来的增长将会受到限制，资本也不会自动流到最具有生产率的用途中。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就造成更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尤其是资本配置，而它们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稀有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将这种损害考虑在内，因为它的模型根本就不会反映资本在现实中是如何运作的，也不会反映不完全信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冰释失误

然而，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其在财政政策建议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比如在推动印度尼西亚银行重建上，也可能是在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方面，以及低估地区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性方面（即一国的衰退可能会对其邻国产生影响），但是，它还没有承认其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失误，甚至没有来解释它的模型在预测事情的过程中为什么败得如此悲惨。它也没有寻求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知识框架——这意味着在下次危机中，它将会犯同样的错误（2001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自己的信誉卡上再一次记下了失败——关于对阿根廷政策的失败，部分原因是它再次坚持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大量的失败，其部分原因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骄傲自大有关：没有人喜欢承认失误，尤其是如此巨大、后果如此严重的失误。无论是费舍尔还是萨默斯，无论是鲁宾还是康德苏，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美国财政部，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政策是误导性的。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在意我发现了他们已经失败的不可辩驳的事实。（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决定支持低利率，并改变东亚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辩解说，这是因

为是时候这样做了。我认为它部分是因为公共压力而改变计划。）

但是，在亚洲也存在其他理论，包括我并不赞同的阴谋论，该理论认为，这些政策是处心积虑地要削弱东亚——在过去40年中，这个地区表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或者最少是提升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的人们的收入。我们理解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先告诉亚洲的国家对短期热钱开放市场。这些国家这样做了，并且热钱蜂拥而入，但是又突然流出。这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说应该提高利率，并且应该进行财政限制，这样就导致衰退进一步加深。随着资产价格的直线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催促受影响的国家出售它们的资产（想当然地忽视了这些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最令人羡慕的增长纪录，从而很难将其和糟糕的管理结合在一起），而且只有将其出售给外国人时，这种交易才会发生——而不是由它们自己人管理。这些销售由抽出它们资本相同的外国金融机构来处理，它们抽出了资本，进而陷入危机。接着，如同它们一开始指导这些资金首先进入这些国家获得大量佣金时一样，这些银行从销售或者分裂这些问题公司的工作中获得大量佣金。随着事件逐渐明朗，犬儒主义的行为蒸蒸日上：这些美国人和其他金融公司不再进行重建；它们只是控制资产，直到经济复苏，然后将这些资产通过以低价[⊖]购买而按照正常价格出售的方式来获得利润。

我相信存在一系列更简单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参与这一阴谋，但是它反映了西方金融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运作模式是不透明的，这就将该机构及其政策与那些详细审查的政策隔离开来，这些详细审查的政策可能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和采取那些适合东亚情形的政策。东亚失败承担的痛苦与那些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一样多，在第8章和第9章，我们将更近距离地观察公开的原因。

一个可替代的战略

在应对这些抱怨时，我依然会提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的战

⊖ fire sale price，火灾受损物品拍卖，象征着低价。——译者注

略，对我进行批评的人直接问我做了些什么事。本章已经暗示了我的基本战略：尽可能地将经济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的状态。要达到这个目标，反过来就要求扩张的（或至少不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们的正确组合将依赖于某个国家自身的问题。我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金融重建的重要性的看法——处理虚弱银行的问题——但是，我将会按照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金融重建，首要目标就是维持资金流动，并且停止对现有的债务进行偿付：进行债务重组，就像最终在韩国发挥作用时那样。维持资金流动反过来又要求对现有机构重建付出更大的努力。公司重组的核心部分将包括实施特别破产条款，旨在快速解决导致宏观经济动荡的困境，这些动荡远超出正常的范围。《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条款规定，考虑到一个企业相对迅速的重组（而不是清算），需要更快地解决由宏观经济动荡造成的破产（就像东亚那样）——对此，我称之为超级第11章。

有没有这样的条款都需要政府强力地干涉。但是政府干涉的主要目的是金融重建——建立明晰的企业所有权，使它们能够重新进入信贷市场。这就能使它们充分利用由于较低汇率政策形成的出口机会，消除资产剥夺的动机；也将会为他们提供强大的动机从事任何真正需要的重建——并且，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将会获得比国际或国内官员（这些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从来都不够格）更好的地位来指导重建。这样的金融重建不需要更大的救援行动。大量救援行动战略的幻灭现在几乎已经非常普遍。我不确定我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在我的观念中，与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相比，采用这一战略，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失败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迅速地从其东亚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只是进行了微小的改变，它们再一次尝试巨大的救援行动战略。随着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改革的失败，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替代战略。现在，至少我所推举的方法中的关键要素，已经获得了不断的支持。如今，在危机爆发5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7国集团才开始谈论需要更多地强调破产和停滞（暂时对支付进行冻结），甚至强调临时使用资本控制。我们将在第9章中重新审视这些改革。

亚洲危机带来很多改变，这些改变将对这些国家的未来大有益处。公司治理和会计准则得到改善——在某些情况下，将会使它们位于新兴市场的顶端。在泰国，新宪法承诺更强大的民主（包含公民“知情权”的条款，甚至在美国的宪章中也不包括该类条款），承诺其透明度一定要超越国际金融机构。这些变化再配合一定的条件，就会在未来促进经济强劲地增长。

但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损失抵消了这些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经济的方式给大部分国家留下了私有和公共的债务遗产。不仅使那些企业担心像韩国企业那样过高的债务，即使具有更谨慎的债务水平，它们也担心：过高的利率迫使成千上万企业陷入破产表明，即使是合适的债务水平也可能具有高风险。结果，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我融资。最终，资本市场无效——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识形态方法改善市场效率所造成的伤害。更重要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减缓了。

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的政策造成的后果致使全球化受到攻击。国际组织的政策在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失败长期存在；但是这些失败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东亚危机使发达国家深刻地体会到发展中世界人们长期感受到的不满。20 世纪 90 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甚至提供了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说明为什么对国际机构如此不满，为什么它们需要改变。

第 5 章

谁失去了俄罗斯

1989 年下半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所有时代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济转型开始了。这是 20 世纪第二次大胆的经济和社会实践。[1] 第一次是早在 70 年前俄国的转型。作为 1917 年大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政权占据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结果，占世界人口 8% 的人生活在苏维埃体制下。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同东欧及东南欧国家一样，都远没有结束，但是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俄罗斯的转型已经落后了，远没有达到市场经济提倡者承诺或者期望的程度。对于生活在俄罗斯的大部分人来说，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生活可能比以前的生活状况更糟糕，未来的前景更凄凉。中产阶级遭到毁坏，建立了任人唯亲的体系和黑手党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项成就就是建立了意味着自由的民主制度，包括新闻自由，而这看起来也很脆弱，尤其是当以前那些独立的电视台一个个都被关闭时，这种脆弱性便暴露无遗。然而，俄罗斯人不得不承受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的很多责备，西方的咨询家，尤其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咨询家，他们如此迅速地鼓吹市场经济的信仰，同样也必须受到某些谴责。最起码，他们支持俄罗斯和其他经济体沿着他们的路径前进，赞成新的信仰（市场原教旨主义）。

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犹如一部不断上演的戏剧。很少人能够预见苏联突然解体，同时很少人预见斯博里斯·叶利钦会突然辞职。很多人看到了寡头政治——叶利钦时代最糟糕的超额支出已经得以遏制；其他人只是简单地看到寡头政治者已经堕落（失去天恩）。一些人看到自从 1998 年将危机作为俄罗斯复兴开始以来的多年内，其产出开始增长，而这次复兴将会对中间阶级进行重建；

其他人只是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视为对过去10年破坏的修复。目前，俄罗斯的收入明显低于10年前，而且贫困有所提高。悲观主义者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在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中摇摆的核大国；乐观主义者则认为，虽然半独裁式的领导实现了稳定，但是却以失去一些民主自由为代价。

得益于高油价和卢布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长期反对），1998年之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但随着油价不断下跌，以及贬值利益得以收割[⊖]，增长也开始放缓。如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预计俄罗斯经济不会像1998年危机时那样，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当石油——该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价格很高时，它仅能够实现收支相抵。如果石油价格下降了（这种情况在依赖战争、和平、市场等反复无常的行为中可能会发生），那么将会带来真正的麻烦。只能说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未来仍是乌云密布。

对谁失去了俄罗斯这个问题具有如此多的争论并不奇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问题显然是被放错地方了，美国和西欧国家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变革。很明显，一定是某些事情出了问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20多个从苏维埃政权中分离的国家，情况都一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领导者声称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建议，该问题会变得更加糟糕。从来都没有水晶球告诉我们如果采取了替代政策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次控制性的试验，及时回到历史去尝试替代战略。同样我们也没有办法确信将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已经要求对政治和经济做出特定的判断，而且也知道，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有些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政策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卢布的贬值会导致一系列通货膨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俄罗斯维持高估的货币汇率，并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来维持卢布的汇率水平，最后却压垮了该国的经济（当卢布最终于1998年开始贬值时，通货膨胀并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的那样飙升，它反而首次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策和结果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复杂。但

⊖ 即已经得到贬值的利益，卢布不会进一步贬值以获得利益。——译者注

是，一些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来管理其转型有助于指导我们理清思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的政策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的判断，它解释了是什么在驱动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误导。如果那些人（包括我自己）有机会直接看到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这些政策的结果，那么，他们就有特定的义务来解释这些相关事件。

重新评估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柏林墙被推倒的10多年后，很明显，我们知道向市场经济转型会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有很多多年以前看起来已经得以解决的议题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只有对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有所理解，我们才有希望制定出对未来有效的政策。

1917年大革命的领导者意识到存在比经济变革更危险的内容，那就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可以说，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是经济的试验；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变。部分是由于没能意识到其他因素的关键作用，经济转型才出现这种凄凉的结果。

第一次大革命意识到转变任务很困难，而且革命者相信其中并不会出现民主手段；它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来领导。20世纪90年代进行第二次革命时，一些领导者首先想到，如果能迅速地实施市场经济，俄罗斯人民将会很快看到市场的利益。但是，俄罗斯的一些市场改革者（与他们的西方支持者和建议者一样）对民主不信任，也不感兴趣，他们担心如果允许俄罗斯人进行选择，他们可能不会选择“正确的”（这是他们自己认为的）经济模式。在东欧和苏联，当一个个国家并没有实现“市场改革”承诺的利益时，民主选举就会拒绝市场改革的极端，并且开始拥护社会民主党。对于很多市场改革者所表现出来的与以往的做事方法不寻常的关系，不应该感到奇怪：在俄罗斯，相对于当时西方其他民主国家的元首来说，叶利钦总统的权力更大，被忿恿包围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杜马（国会），并通过政令实施市场改革。[2]

转型的挑战和机会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转型刚开始时，它就表现出巨大的挑战和机会。在

此之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特意开始从一个由政府完全控制经济每个方面的状态转向由市场决定决策的经济类型。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经济转型，目前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有段距离。1945年以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都从战时动员转向和平时代的经济建设。那时，许多经济学家和专家担心战时复员将会造成重大的经济衰退，因为它不仅包括决策如何制定的改变（战争时期由政府制定生产的重大决策，而战时复员就是要取消这种行政命令，恢复私人部门对生产的管理），而且包括货物生产（比如从坦克到汽车等）的巨大再分配。但是在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整两年，美国产出比1944年增长了9.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都用于国防。在和平时期，该数字迅速下降到7.4%（1947年）。

从战争转向和平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正如我下面将要详细阐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市场机构，虽然在战争期间，大部分都被吊销，并被“命令和控制”的方式取代。相反，俄罗斯不仅需要调换资源，而且需要建立大量的市场机构。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面临相似的经济问题。它面临着社会重大转变的挑战，包括建立支撑市场经济的机构。中国真正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不但没有出现持续的转型衰退，而且呈现出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负责向俄罗斯和其他很多转型国家提供建议的激进经济改革者都没有对这些经验给予充分的注意，也不去汲取能够学习的经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俄罗斯的历史（或者其他进行转型国家的历史）让这些经验失灵。他们故意忽视俄罗斯学者的建议，无论这些俄罗斯学者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原因很简单：他们相信这场即将发生的市场革命可以从其他那些不相关的学科中获取所有的知识。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的是教科书经济学——一个超级简单的市场经济版本，它几乎不关注动态变化。

看看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在1989年所面临的问题：在俄罗斯，有些机构的名字与西方机构的名字相似，但它们发挥的功能却不相同。俄罗斯也有银行，并且银行也开展储蓄业务，但是它们并不制定政策来规定谁将获得贷款，

它们也没有义务监督和确保这些贷款能够被偿还。它们只是简单地根据政府的中央计划提供“资金”，就像是中央计划规定的政府代理机构。俄罗斯也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也生产货物，但是这些企业自己并不能做决策：它们只是用分配的投入（原材料、劳动力、机器）生产要求生产的产品。企业家的工作主要是应付政府提出的难题：政府只是给企业分配产出任务，并不一定提供需要的投入，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分配的资源有些过量。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忙于一些交易，以便他们能够完成分配的任务，从而为自己获取更多的额外油水。这些行为——对于维护苏维埃体制功能的运行来说是必须的——只会增加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腐败。[3] 如果说不是完全违反正在实施的法律的话，对其进行规避就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也预示着转型的“法制规则”的破产。

与市场经济一样，苏维埃体制下也有价格，但这些价格是由政府通过法律制定的，而不是由市场制定的。一些价格，比如基本必需品的价格，被人为地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使那些即使处于收入底层的人们也能够避免贫困。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也被人为地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些资源是俄罗斯能够提供的唯一货物，因为俄罗斯有大量的资源储备。

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三个核心要素：价格、私有财产和利润，再配合竞争，它们就能够提供激励机制，调整经济决策制定，确保企业能以最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但这同样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认识机构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和规制框架，以保证合同能够被履行，并且能够以有序的方式解决当借贷者不能偿还欠款时发生的商业争端。要存在有秩序的破产程序，使竞争得以维持，吸纳存款的银行在储户要求提款时能够随时支付。该法律框架和代理机构有助于保证证券市场以公平的方式运作，经理们不会利用股东，大股东也不会利用小股东。在具备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为应对无拘无束的市场资本主义所出现的问题，法律和规制框架的建立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在许多银行陷入困境后建立了银行规制；在股东受到始料未及的欺骗后建立了证券规制。那些寻求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家并没有必要重新体验这些灾难：他们可以从这些实践中汲取经验。但是，虽然市场改革者曾提起该机构的

基本构造，他们也只是进行短暂的忏悔。他们试图通过捷径实现资本主义，希望在还没建立支撑机构或者虽然建立了机构但还没有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建设市场经济。在建立股票市场之前，你必须要确定存在有效的规制。如果希望新的企业能够增加新资本，就需要银行是真正的银行，而不是那类由旧体制所规划的银行，或那些仅向政府贷款的银行。一个真正有效的银行系统需要强大的银行规制。新企业需要获得土地，也要求土地市场和土地登记。

与此相似，苏维埃时代的农业，农民习惯于给予他们需要的种子和化肥。他们不用担心获得种子和化肥以及其他的投入（比如拖拉机），也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建立投入和产出市场，这就要求创建新的企业。社会机构同样也很重要。在苏维埃旧体系下，没有失业，因此不需要失业救济。工人们通常终生为同一国有企业工作，而且这些企业提供住房和退休福利。然而，1989 年以后的俄罗斯，如果存在劳动市场的话，个体将不得不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获得住房，这种机动性几乎不可能。因此，住房市场很有必要。如果失业后工人没有什么依靠的话，最低水平的社会敏感度意味着雇主不情愿解雇工人。因此，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重建”就不会实现。不幸的是，1989 年的俄罗斯，既不存在住房市场，也不存在真正的安全网。

苏联和其他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它们不得不将原有的价格体系——价格扭曲体系——转向市场价格体系；不得不建立市场和制度框架来支撑新的价格体系；不得不对所有以前属于国家的财产进行私有化；不得不建立一类新企业——擅长规避政府规则和法律——这些新企业有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以前这些资源往往都被毫无效率地利用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点，这些经济体都面临艰难的选择，也存在做何种选择的激烈争论。最具争议的议题集中于改革的速度：一些专家担心如果不尽快进行私有化改革，将会形成一大批资本主义既定利益者。但是其他人担心如果私有化改革进展得过快，改革将会成为一场灾难——经济和政治腐败相结合——将会遭遇强烈的反对或抵制，无论是来自极左派的还是来自极右派的（前者常常被称为“激进派”，后者被称为“渐进派”）。

休克疗法——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提倡的疗法——的观点在大部分国家极为流行。然而，渐进主义者相信，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选择合适的转型速度和正确的改革顺序（“秩序”），那么就能够实现更好的管理，不需要具备完善的机构。举例来说，在建立有效的竞争或规制权力之前，对垄断进行私有化可能仅意味着用私有垄断取代政府垄断，它们甚至更无情地剥削消费者。10年之后，终于意识到渐进主义者方法的明智：乌龟跑赢了兔子。渐进主义者不仅准确地预测了休克疗法将会失败，而且指出了它之所以无效的原因。他们唯一的失败就是低估了灾难的程度。

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俄罗斯是一个富裕的国家。75年的计划经济可能使该国的平民完全不了解市场经济，但它却提高了人们的教育水平，尤其是技术领域的水平，这对新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毕竟，俄罗斯是第一个将人类送往太空的国家。

经济理论很清楚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失败：这是因为，没有政府代理去收集和处理所有能使经济功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相关信息。无私有产权和利益动机，就缺乏激励，尤其是对经理和企业家的激励。有限的贸易机制与巨大的补贴和人为地制定价格结合起来，意味着该体系处于普遍扭曲之中。

后来，俄罗斯用分散的市场体系取代了集中计划，用私有财产取代了公共所有权，并且通过贸易自由化取消或至少降低了扭曲，这些都有可能造成经济产出的增长。军事开支的削减——在苏联时期已经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大份额，其规模是后冷战时期的5倍还多——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事与愿违的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转型国家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改革”的故事

几乎在转型刚开始时，改革就立刻犯下第一个错误。在积极狂热地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中，1992年一夜间大部分价格都放开了，刺激了彻底消灭储蓄的通货膨胀，并将宏观稳定问题推到议程的首要位置。每个人都意识到，在恶性通货膨胀（月通货膨胀率达两位数）的背景下，要成功地进行转型非常困难。

因此，第一轮休克疗法——瞬间价格自由化——就加速了第二轮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的改革进程。这就需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

在大部分商品价格被完全放开时，一些最重要的价格却依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自然资源产品的价格。近来宣布要实行“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它们发出了公开的邀请：比如说，如果能够购买石油，然后转销到西方国家，那么就能获得数百万甚至数亿美元的利润。因此，人们就这样做。他们不是通过建立新企业挣钱，而是通过旧企业家身份的新形式致富——利用错误的政府政策。并且，正是这种“寻租”行为为改革者提供了借口：问题不是改革进行得太快，而是改革进行得太慢。只要立即放开所有的价格就行了！该争论存在一些合理性，值得考虑，但是用其对激进改革进行防卫却显得毫无诚意。政治进程从来都不给技术统治论者免费的统治，而且它还具备充分的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统治论者常常遗漏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即使在功能完善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改革也常常“非常杂乱”。即便奋力争取瞬间自由化是有意义的，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些重要部门，比如能源价格方面不能成功地快速自由化，那么我们如何推进其他方面的自由化进程呢?

自由化和稳定性是激进改革战略的两个支柱，快速的私有化是第三个支柱。但是前两个支柱给第三个支柱的运行制造了障碍。起初的高通货膨胀使得大部分俄罗斯人都取出了存款，因此俄罗斯国内再也没有足够的人有钱去购买私有化的企业。即使他们有钱来购买这些企业，在高利率和缺乏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生存也会存在较大的困难。

私有化被认为是经济重建进程中的第一步。不仅所有权必须改变，而且管理方式也必须改变；同时，需要对产出重新调整，这些企业要从生产被分配生产的产品到生产消费者希望生产的产品。该重建需要新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造成工作岗位的减少。当然，只要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转向高生产率的就业中，工作岗位的减少才有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不幸的是，由于该战略在重建中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正面的重建太少了。

激进改革战略并没有取得意想的效果：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复一年地下降。本来认为是转型过程中短期的转型衰退变成 10 年或更长时间的衰退，

而且好像永不见底。其造成的破坏——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比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还要大。1940～1946年间，苏联工业产出下降了24%。而1990～1998年间，俄罗斯工业产出下降了42.9%——几乎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45%）。可以将俄罗斯社会经济的损害与1989年后的转型进行比较：农用家畜下降了一半，制造业投资几乎停滞。俄罗斯能够在自然资源领域吸引外商投资；如果非洲将自然资源的价格定得足够低的话，非洲国家早就显示出能吸引外商在自然资源领域进行投资的能力。

当然，稳定/自由化/私有化并不是增长的方案。它的目的是为增长创造条件。然而它却为下滑创造了前提。不仅仅是投资停滞了，而且资本也用完了——储蓄被通货膨胀蒸发了，私有化或者外国贷款的收益大部分被盗用。资本市场开放的私有化不仅没能造成财富的创造，反而造成资产的提取。寡头政治执政者虽然仅仅获得微薄的薪水，但他们能够利用政治影响来储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希望将其资金转出该国。将资金留在俄罗斯意味着在一个深度衰退的国家进行投资，不仅冒着回报非常低的风险，而且还要冒着资产被下一届政府没收的风险，因此，毫无疑问他们要抱怨私有化进程的“非法性”。任何一个人如果足够聪明能在私有化赌博中成为赢家，那么他也将足有智慧将其资金投资于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或者投资于秘密离岸银行账户的安全避难所。数十亿美元在瞬间流出该国就不足为奇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承诺复苏就在眼前。到1997年，它终于有了乐观的理由。自1990年以来，产出已经下降了40%，将来它还能下降多少？另外，俄罗斯正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行事。俄罗斯已经进行了自由化，尽管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化。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如何进行私有化，它自然就会演变成一种瞬间的私有化：本质上是将有价值的国有资产卖给朋友。的确，政府这样做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无论是以现金支付的形式还是以竞选捐款的形式（或者二者都有）。

但是，我们在1997年看到的复苏情景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的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其他遥远的地方所犯下的错误是关键的。1998年，东亚危机的附带结果给俄罗斯造成了影响。这次危机已经造成新兴市场投资总体上

的不稳定，而且投资者需要更好的收益率来补偿他们向这些国家贷出的资本。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中的虚弱就是公共财政的虚弱：俄罗斯政府已经严重负债。尽管它已经很难实现收支基本平衡，但是俄罗斯政府依然在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速私有化的压力下、在建立有效的税收体制之前，将其国有资产以少量的金额变卖了。政府创造了强大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和商人阶级，他们仅仅支付其应缴纳税收的少部分，实质上，他们所缴纳的税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应该缴纳的都要少。

因此，在东亚危机时期，俄罗斯的情况很特殊。俄罗斯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它的政府非常贫穷。俄罗斯政府实质上放弃了那些非常有价值的国有资产，然而它却不能够为穷人支付养老金和福利金。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的贷款数目高达数十亿美元，其负债不断增加；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从政府手中获得巨额收益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却将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鼓励政府开放其资本账户，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它们认为该政策将会使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更具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它为资金迅速逃出该国开了方便之门。

1998 年的危机

俄罗斯深度负债，而且亚洲危机造成的高利率也制造了巨大的额外压力。当石油价格下降时，这一摇晃的塔楼就崩塌了。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加深了东南亚的衰退和萧条，石油需求不仅没能得到预期的扩大，实际上反而减少了。石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平衡造成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滑（相对于 1997 年的平均价格，1998 年前 6 个月下降了 40%）。对俄罗斯来说，石油不仅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而且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石油价格的下降具有可预见的破坏性。我在 1998 年就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当时价格看起来已经下降，并且低于俄罗斯的开采成本加运输成本。在当时的汇率水平下，俄罗斯的石油工业已经无利可图。卢布贬值将不可避免。

很明显，卢布被高估了。俄罗斯国内充斥着进口产品，而国内生产者很难与外国产品进行竞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远离军工企业使更多资源用以生产

更多的消费品。但是，投资已经停滞了，而且该国也没能生产消费品。高估的汇率——与其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私自加入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起——摧毁了该国的经济，虽然官方失业率保持在被抑制的状态，但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在缺乏合适安全网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的经理不情愿解雇工人。虽然失业率是隐性的，但是其造成的损害并不小：工人们看起来还在工作，企业看起来也在支付薪水。工资下降到大面积拖欠的程度，即使工人们能够获得工资，也只是以实物支付而不是卢布。

如果将这些人和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看，高估的汇率则是一场灾难；对新的商人阶级来说，高估的汇率是一种恩惠。他们需要用更少的卢布来购买他们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他们的香奈儿手提包以及进口的意大利风味食品。对于试图将其资金转移出这个国家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来说，高估的汇率同样也是一种恩惠——它意味着在从外国银行账户提取他们的利润时，他们拥有的卢布能够兑换更多的美元。

大部分俄罗斯人都遭受折磨，但改革者和他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咨询家还是担心贬值，他们认为贬值将会造成另一轮恶性通货膨胀。他们强烈反对汇率的任何改变，并且愿意将数十亿美元抛向该国以避免这一事情发生。在1998年5月，确切地说是6月，很明显，俄罗斯可能需要外部援助来维持其汇率水平。货币的信心已经被摧毁了。当人们认为贬值不可避免时，国内利率开始飙升，越来越多的资金随着人们将卢布兑换成美元开始流出该国。因为害怕持有卢布，以及对该国偿还债务的能力缺乏信心，1998年6月，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对卢布贷款支付大约60%的利率（俄罗斯国债GKOs，其性质等同于美国国债）。在大约一周时间内，该数字飙升到150%。甚至在俄罗斯政府承诺以美元还贷时，它同样需要面对高利率（俄罗斯政府发行的以美元为面值的债券收益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大约50%，高出同期美国政府对其国债支付的利率45个百分点）；市场认为违约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且市场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投资者相信俄罗斯如此强大和重要不会失败，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利率依然比正常情况要低。在纽约投资银行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时，他们到处传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行动将会是多么强大。

危机不断上演，投机者能够看到它们的储备还剩下多少，随着储备不断地减少，把赌注押在贬值趋势上成为一种单向的赌博。他们冒着几乎一无所有的风险赌卢布将会崩溃。正如预期的那样，1998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拿出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赶来救援。[4]

在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推行了加速危机的政策，当危机发生时，情况变得更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借贷更多的外国货币而减少借贷卢布。这种主张很简单：卢布利率较美元利率高。通过借入美元，政府能够省下资金。但是，该推理存在明显的缺陷。基本经济理论认为，美元债券和卢布债券利率的不同应该反映出贬值的预期。因为市场是均衡的，因此借款（或者出借的收益）的风险调节成本是相同的。我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市场更没有信心，因此，在不考虑货币的情况下，我并不相信借款的风险调整成本是相同的。我不太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能比市场更好地预计汇率变动。在俄罗斯这个例子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认为他们比市场更聪明——他们愿意打赌，在俄罗斯货币这个问题上市场是错误的。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不断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误判。不仅它的判断存在缺陷，而且它还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如果卢布真的贬值，俄罗斯将会发现它更难偿还以美元为面值的贷款。[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择忽视该风险，通过诱使俄罗斯借入更多的外国贷款，使俄罗斯在卢布一旦贬值的情况下其状况远不能维持在原来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俄罗斯最终延迟偿还贷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救援行动

鉴于希望恢复俄罗斯经济的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97 年 7 月 20 日批准了一项 112 亿美元的贷款，作为 226 亿美元国际借贷者一揽子贷款的一部分。俄罗斯立即收到了 48 亿美元，而且将这些钱耗尽了，但是却并没能维持卢布的汇率。世界银行被要求提供 60 亿美元贷款。

世界银行内部对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们中有很多人自始至终对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存在疑问。我们怀疑，将来可能增长的利益是否足够大，以至

于能证明让俄罗斯背一身的债务是值得的。很多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俄罗斯更容易推迟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比如说对石油公司征税。在俄罗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存在腐败。世界银行自身关于腐败的研究已经表明，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区之一。西方国家知道他们的数十亿美元有很多将会从计划的用途中转向腐败官员和同事以及他们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朋友手中。然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似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反对向腐败的政府贷款，但是这里显然存在两种标准。弱小的、没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比如肯尼亚，因为腐败从而拒绝向它贷款；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腐败的范围和程度远比肯尼亚严重得多，却能够不断地获得贷款。

除了这些道德上的问题外，还存在直接的经济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资金本被用来维持汇率。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被高估而且导致该国的经济遭受痛苦时，维持该汇率就毫无意义。如果维持汇率有效，那么该国将承受痛苦。但是在更多可能的情况下，维持汇率并没有取得效果，这样资金就被浪费了，而且使该国负债累累。我们的计算表明，俄罗斯的汇率的确被高估了，因此，提供资金来维持汇率就只能是糟糕的经济政策。此外，在贷款之前，世界银行就以一段时间内政府的收益和支出为基础进行了计算，并且计算结果表明，1998 年的贷款将会无效。除非发生奇迹使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否则到当年秋季时，俄罗斯将会再度陷入危机。

进一步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是一个大错误，我是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得出该结论的。俄罗斯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俄罗斯能够将这一点和它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它将不需要外部资金；否则它们根本就不清楚外部资金会有什么大的作用。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向俄罗斯提供资金。

尽管世界银行的职员强烈反对，但在克林顿政府的巨大压力下世界银行还是向俄罗斯提供了贷款。世界银行设法达成一种妥协，公开宣称规模巨大的贷款是按分期贷款的形式进行的。世界银行做出决定立即提供 3 亿美元的贷款，根据俄罗斯改革的进程日后再提供剩下的部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该方案在额外资金到来之前就会失败。结果，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起来能够忽视腐败和随后这批资金将会出现的风险。

它的确认为将汇率维持在高估的水平是件好事，并且这些资金将使其能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维持高汇率。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该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

救援行动的失败

在提供贷款3个星期后，俄罗斯单方面宣布推迟还款和卢布贬值。[6] 卢布崩溃了。1999年1月，从实际效率术语来说，卢布从1998年7月的水平下降了75%。[7]1999年8月17日的公告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新兴市场的利率水平飙升到比东亚危机的峰值还高。甚至那些采用合理的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也发现它们不可能筹集到资金。巴西的衰退进一步加深，最终它也面临货币危机。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刚刚从前一次危机中复苏，便再一次被推到悬崖的边缘。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也越过悬崖陷入危机，甚至美国也受到影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启动了该国最大的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采取私人救援，因为美联储担心它的失败将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

令人惊讶的并不是崩溃本身，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包括一些最重要的高级官员——他们居然对这一结果感到惊讶。他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方案是有效的呀！

我们自己的预测也只是部分的正确：我们认为这批资金可能会将汇率维持3个月；但实际上只维持了3个星期。我们觉得，那些寡头政治执政者将会花费数天甚至数星期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出该国；实际上他们只用了数小时或是数天。俄罗斯政府甚至“允许”汇率升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寡头政治执政者将会用更少的卢布购买更多的美元。满脸微笑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什琴科告诉世界银行总裁和我说，这只是“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这些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贷给）俄罗斯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仅仅在数天后就出现在塞浦路斯和瑞士银行账户上——时，它自欺欺人地宣称这不是它提供的贷款。该观点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么是对经济学毫不所知，要么是它和格拉什琴科一样无诚意，或者二

者兼有。当资金被输送到某个国家，这些美元上并没有做标记，因此它就可以说流到各处的钱不是自家的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贷款，而且反过来允许其将这批美元给予寡头政治执政者，允许他们将其带出俄罗斯。我们其中有些人讽刺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些钱直接存到瑞士和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中，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寡头政治执政者从救援行动中受益，华尔街和其他西方的投资银行家也一直给予救援一揽子计划施加压力，他们知道该救援不会持续：尽管他们也尽力地进行救援，但最终还是将会带着它们的援助和能够争取的资金逃离该国。

因为注定需要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导致俄罗斯陷入深度负债中，其政策却没有取得一丝成效。失误的成本并不是由提供贷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来承担，也不是由推动该贷款的美国来承担，也不是由从中受益的西方银行家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来承担，而是要俄罗斯的纳税人来埋单。

这次危机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卢布的贬值刺激了俄罗斯的进口竞争部门——真正由俄罗斯生产的产品最终在其国内市场占据的份额不断增长。这一“无意识的结果”最终导致期待已久的俄罗斯实体（与地下经济相对）经济的增长。这的确是对失败的讽刺：宏观经济被认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长处，然而即使在这方面，它也没能取得成功。这些宏观经济方面的失败与其他失败结合起来，造成了规模巨大的经济衰退。

失败的转型

预测与实际的差距，很少有比向市场经济转型更大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地方分权等结合起来被认为在短暂的转型衰退后，便可很快地实现产出大量增长。随着无效的旧机器被替换、新一代企业家的出现，预计转型的长期收益要比短期收益更大。所有的收益，很快就会（如果不是立即到来的话）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中。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大部分处于转型经济中的国家，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仅有少数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斯诺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其国

内生产总值与10年前相等。对于剩下的国家来说，收入下降的幅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很难测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其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还少。摩尔多瓦的下降幅度最明显，如今其产出比10年前的1/3还少。乌克兰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10年前的1/3。

数据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背后的真实问题。俄罗斯很快就从一个工业巨头——这个国家成功地首次将人造地球卫星送到宇宙空间轨道——转变成为一个资源出口国；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占其所有出口的一半还多。然而，西方国家的改革咨询家们在撰写以《俄罗斯即将出现经济繁荣》或者《俄罗斯如何变成市场经济国家》命名的著作时，数据本身很难映衬他们描绘的玫瑰色图景；与此同时，更多冷静的观察家正在撰写其他的著作。[8]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下滑成为争论的主题，一些人认为，因为成长的和关键的非正式部门——从街道商贩到水管工人、油漆工和其他服务提供者，他们的经济行为通常很难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体现——的数字表明下滑的规模被高估了。然而，其他人认为，因为俄罗斯有很多交易是实物交易（超过工业销售的50%）[9]，同时因为“市场”价格通常要比这些“实物交易”价格更高，因此，统计数据实际上低估了经济的下滑。

将这些问题都考虑在内，仍然认为大部分个人的基本生活标准明显恶化了，这反映在大部分的社会指标中。当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明显增加时，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缩短了3年，乌克兰人的预期寿命也差不多缩短了3年。与那些由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下滑所表明的情况一致，家庭消费调查数据——人们的食物消费，衣着消费以及居住条件——证明了他们的生活标准在明显下降。假定政府减少了国防支出，那么，生活标准应该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更多。换言之，假设以前的消费支出得以保存，并且军工支出的1/3能够转移到新的消费品生产中，在不出现重建以提高效率或利用新的贸易机会的情况下，消费——生活标准——会增加4%，虽然数量很小，但是远比实际下滑的情况要好。

贫困和不平等的增长

这些统计并没有反映俄罗斯转型的全部情形。它们忽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功：你们如何评估新民主的利益，是不是同样不完美？同时也忽视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失败：贫困和不平等的增长。

在国民经济这块蛋糕的规模不断缩小时，它也被越来越不平等地分割，以至于每个俄罗斯人只能得到越来越小的一小块。按照每天2美元的标准，1989年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中；而到1998年下半年，该数字飙升到23.8%。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超过40%的俄罗斯人生活水平每天低于4美元。对儿童的统计显示出更严重的问题，有超过5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的家庭中。其他可比较的国家中，即使情况不是更糟糕的话，同样也面临贫困的增长。[10]

到世界银行任职不久，我就开始更近距离地审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正在从事的战略。当我对这些问题更加关注时，在私有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此回应强烈。他举了交通阻塞的例子，他看到很多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在夏天的周末离开莫斯科，而且，商店中充满了进口的奢侈品。这与以前体制下毫无情趣的零售设施相比，其情景大大不同。我并不是否认确实有足够多的人富裕起来了，以至于造成交通阻塞，或者创造了对古驰（Gucci）鞋以及其他进口奢侈品的需求，这些需求足以使特定的商店繁荣起来。在很多欧洲的圣地，富裕的俄罗斯人已经取代了20年前富裕的阿拉伯人。在某些地方，街道的标志都是用俄文和当地语言标明的。但是，在一个人均收入为4 730美元（1997年的数字）的国家中，由梅赛德斯（奔驰轿车）造成的交通阻塞是该国经济存在问题的信号，而不是经济健康的信号。它是一个明显的社会信号，表明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不是分布在更多人手中。

在转型大幅增加了贫困人口数目的同时，也导致了少数阶层的繁荣，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可能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通货膨胀首先掠取了他们少得可怜的储蓄。在工资增长并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教育和健康支出的削减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生活标准。那些

能够移民的人就选择移民（在一些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失去了10%甚至更多的人口，在该国接受教育的职工中，该比例更大）。我在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国家中遇到了许多聪明、勤奋和具有雄心壮志的学生，他们都向西方国家移民。这些损失很重要，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在俄罗斯的人意味着什么，而且还因为他们对俄罗斯的将来预示着什么：从历史的观点看，中产阶级是建立以法律规则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的核心力量。

不平等的增长幅度，就像经济下滑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一样，惊奇地出现了。专家们的确预计到了不平等的增长，或者至少测度了不平等。在旧的体制下，通过抑制工资差异可以保持收入平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这并不利于过着轻松的生活，但却避免了绝对贫困，并且通过提供高度平等的教育、住房、卫生保健和儿童看护服务等，来保持生活标准相对平等。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工作努力和产出良好的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得到奖赏，因此不平等的增加不可避免。然而，我们期望俄罗斯能分摊那种由于财富继承而引致的不平等。因为在没有不平等遗产的情况下，就会存在更为平等主义的市场经济。事情的发展是多么不同啊！如今，俄罗斯不平等的水平可以与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相比，即那些建立在半封建传统基础上的拉美社会。[11]

俄罗斯出现了所有国家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结果——产出大量下滑、不平等大幅增长。而且未来的前景也非常不明朗：极端的不平等阻止了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它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时，更是阻止了经济增长。

误导的政策如何导致转型的失败

我们已经看到华盛顿共识政策造成失败的某些方式：以错误方式进行的私有化并没有提高效率、促进增长，反而掠取了资产，导致了经济下滑。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在改革中结合起来的，就像实施的步骤和秩序一样：在法律基础机构建立之前进行资本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只能提高掠取资产的能力、增强掠取资产的动机，而不能提高对该国未来再投资的能力和动机。完整地表述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全面地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造

成俄罗斯经济下滑的方式，这本身就可以写成一本书。在这里，我只希望概括三个案例。在每个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捍卫者可能都会说，要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这些事情可能已经变得更糟糕。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缺乏竞争政策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会坚持这些政策是其方案的一部分，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实施这些政策。对其的捍卫很直率：存在那么多条件，任何事情都包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中。然而，俄罗斯知道，一旦俄罗斯陷入不可避免的字谜游戏中，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威胁说要取消援助，那么，俄罗斯将会努力谈判，就会达成这样的一项协议（并不是经常履行），并且资金的闸门再次被打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意的是货币目标，是预算赤字和私有化速度——移交给私人部门的企业数目，而从不在意它们是如何进行的。几乎其他任何事情都是第二位的；很多事情——像竞争政策——实际上是用来装饰门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堵住那些批评者的嘴，因为这些批评者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遗漏了制定成功转型战略的重要因素。在我再三重复要实施更强大的竞争政策时，很多俄罗斯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他们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有效的竞争权力机构，并再三向我表示感谢。

要确定应该强调什么、建立怎样的优先秩序并不容易。教科书经济学经常提供不充分的指导。经济学理论认为，要使市场能够很好地运转，必须要存在竞争和私有产权。如果说改革很容易，人们挥舞着魔术棒就会实现竞争和私有产权。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择了强调私有化，而不理会竞争。做出这种选择可能并不奇怪：公司和金融利益常常都是与竞争政策对立的，因为这些政策限制了他们获利的能力。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错的后果远比单纯的高价格政策严重：对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寻求建立垄断和卡特尔，提高他们的利润，但没有有效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其进行约束。并且正如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证明垄断利润对那些情愿求助于黑手党技术的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要么是为了获得市场支配地位，要么是为了加强勾结。

通货膨胀

早些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快速自由化是如何在刚开始就导致通货膨胀爆发的。俄罗斯的情形中最悲惨的部分就是错误一个接一个，这些错误综合起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1992 年，通过突然的价格自由化造成快速的通货膨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叶利钦体制来说，有必要对其进行抑制。但是，平衡从来就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项，它的过度热情最终造成过高的利率。没有证据表明将通货膨胀降低到合适水平以下就能够促进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例如波兰，就忽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在调整的关键年份，波兰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大约 20% 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明星学生，例如捷克共和国，它将通货膨胀率降到 2% 的水平，然而经济却出现了停滞。还有其他更好的理由相信过度热情地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将会压制实际的经济增长。高利率明显抑制了新投资。许多新的私有化企业，甚至那些可能还没考虑对资产进行掠取的企业，当发现这些企业并不能实现扩张时，就转而进行资产掠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高利率导致汇率水平的高估，进而使得进口价格更便宜而出口更困难。这样，那些在 1992 年之后到莫斯科旅游的人能够看到商店内摆满了进口衣服和其他货物，却很难看到那些印着“俄罗斯制造”标签的商品，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转型开始 5 年后情况依然如此。

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人们开始使用实物交易（易货贸易）。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工人们都是以工厂生产的或可以得到的任何东西来进行支付的，从厕纸到鞋子等。当工人们试图获取现金来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以掩盖其企业的经营活动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跳蚤市场，它们掩盖了巨大的无效率。高通货膨胀对经济来说成本很大，因为它干扰了价格体系的运行。但是，对价格体系的有效运行来说，实物交易并不是摧毁性的，而且，过度严格的货币政策只是用一套可能甚至更糟糕的政策来替代一套无效的政策。

私有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俄罗斯要尽快地进行私有化；而私有化如何进行则被看做是次要的事情。我较早写的一些关于改革的失败——收入的下降和不平等的增加——可以直接与这一错误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对转型经济10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其调查显示，在缺乏制度的基础结构（诸如公司治理）时，私有化对增长没有正面的影响。[12]华盛顿共识再一次证明是错的。很容易就能发现私有化实施的方式与这些失败之间的联系。

例如，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中，由于缺少法律保证将公司治理得很好，这就意味着那些能够控制公司的人存在从小股东那里窃取资产的动机；而且相对于股东来说，管理者也存在相似的动机。当能够如此容易地窃取这些利益时，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去创造财富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私有化进程的其他方面像提高了公司盗窃的机会一样增加了窃取资产的动机。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通常是将私有化的企业转变为大型国有企业，并交给它们以前的管理者来管理。这些内部人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多么不确定和多么艰难。即使他们事先预定要这么做，他们也不敢等待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其他的一些改变，尽管这些改变是他们收获所有投资和重建的全部价值所必需的。他们关注在今后几年中能从企业那里拿点什么，而且通常情况下，通过掠取资产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私有化被认为消除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那些这样假设的人，对现代经济中国家作用的观点是幼稚的。国家在多个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私有化的确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中央政府的授权使地方和地区政府具有更广泛的判断力。某个城市或者州（地区政府）可以利用系列规制和税收措施在它们的权限内从企业那里勒索“租”。在发达工业国家，存在法律规则以避免地方和州政府滥用它们潜在的权力：而在俄罗斯，却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则。在发达工业国家，社区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社区都要使自己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但是，在存在高利率和全面萧条的世界中，任何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吸引这样的投资，地方政府很少花精力去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而

是更多地考虑它们能从现有的企业那里掘取多少利益——如同新私有化企业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所做事情一样。当这些私有化的企业跨越多种权限运营时，某一地区的权力部门就会这样推理：他们最好在别人拿走自己那部分资产之前拿走他们能够攫取的任何东西。这只会造成管理者尽快地和尽可能地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任何东西。最终，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企业只剩下穷困。这是一场关于攫取的赛跑，在每个层面都存在掠取资产的动机。

就像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者所宣称的那样，自由化的问题不是它进行得太快，而是它进行得不够快，私有化同样如此。就拿捷克共和国的例子来说吧，当它的经济出现停滞时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扬，很明显，该国的言辞超过了它的表现：它将银行保留在政府手中。如果某个政府对公司进行私有化，但是却将银行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没有制定有效的规制，那么，该政府就不会制定提高效率的严格预算限制，而会采取不透明的方式对企业进行补贴的替代方法——这就是公开鼓励腐败。捷克私有化的批评者们认为，问题不是私有化进展得太快，而是进展得太慢。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一夜之间就能成功地对所有的东西进行私有化，当政府实施瞬间的私有化时，很有可能就会将事情弄得一团糟。任务太艰巨，不正当的动机太多。快速私有化战略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其失败已经被预见到了。

不仅是俄罗斯（许多其他独联体国家也是如此）强制实施的私有化没有引导该国经济取得成功；而且，它还破坏了政府、民主和改革的信心。在没有建立征收自然资源税体系之前就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卖出的结果，就是把叶利钦的少数朋友和相关者变成亿万富翁，而该国却不能支付每个月仅 15 美元的养老金。

糟糕的私有化最惊人的例子就是贷款换股方案。1995 年，俄罗斯政府不是向中央银行而是向私有银行借贷所需要的资金。这些私有银行很多都是由政府官员的朋友所掌握，他们都得到了银行经营许可证。在对银行没有进行充分规制的情况下，这些经营许可证等同于印钱执照，以便向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朋友或政府放贷。作为贷款的条件，政府拿出它拥有的企业的股份作为抵押。这

样，如此神奇，政府不偿还贷款，私有银行就接管了可能是进行虚假出售的企业（虽然政府的确通过“拍卖”这种字谜游戏的形式来进行）；于是，少量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立即就成为亿万富翁。这些私有化没有政治的合法性。并且，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它们没有合法性的事实使得这些寡头政治执政者有必要在新政府可能试图扭转私有化或者破坏他们的权力地位之前，将他们的资金快速地转到国外。

那些从政府的慷慨中受益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叶利钦的慷慨中获益的人们，努力地工作以确保叶利钦再次当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定叶利钦转让的部分资金反过来支持他的竞选，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寡头政治执政者实在太聪明，以至于他们不会利用他们的钱来为竞选买单；他们提供给叶利钦的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现代竞选管理技术以及通过他们控制的电视台网络进行正面宣传。

贷款换股计划规定了寡头政治执政者发财致富的最后阶段，一小群人（据报道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在刚开始时与黑手党有关联）不仅来决定俄罗斯的经济，而且还来决定俄罗斯的政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宣称自己控制着俄罗斯50%的财富。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捍卫者们把他们比作美国的强盗贵族，比如哈里曼家族和洛克菲家族。但是，他们的行为与19世纪资本主义情形中的这些行为存在巨大的不同，甚至与那些在美国荒蛮的西部开凿铁路和矿藏的人们也不相同，俄罗斯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对俄罗斯的开采被称为“狂野的东部”。美国的强盗贵族创造财富，正如他们积累财富一样。这些美国强盗贵族们虽然获得大蛋糕中的一大块，但他们却让美国更富有。与此相反，俄罗斯的寡头政治执政者们却在窃取资产，掠夺人民，使他们的国家更穷。他们将企业带到破产的边缘，而自己银行账户的金额却与日俱增。

社会背景

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官员们没能清楚地认识转型经济的社会背景。由于转型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事情，这就存在问题。

市场经济包括一系列经济关系——交换。这些交换很多都会涉及信用问题。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借钱，需要相信这些钱能够被偿还。支持这一信用的是法律体系。如果某个人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法律就会强迫他来履行该义务。如果某个个体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偷取财产，那么能够通过诉诸法院对窃取者进行惩罚。但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制度性基础结构中，个人和公司只是偶尔诉诸法律。

经济学家经常提到，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是“社会资本”。随意的暴动和黑手党资本主义经常被视为是对社会资本的腐蚀，但是，在我访问的一些独联体中，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社会资本腐蚀的直接表现，只不过腐蚀的方式更为微妙。这不只是一些管理者品行不端的问题，而是众人从别人那里几乎无法无天的偷窃问题。比如，用温室点缀哈萨克斯坦的风景——不过，这些温室都没有玻璃。当然，在没有玻璃的情况下，温室将不会发挥其功效。在转型的早些时候，人们对将来是如此没有信心以至于每个人都会将其能够带走的东西都带走：每个人都想在其他人将温室的玻璃带走之前自己将其带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摧毁了温室（和他们的生计），即使玻璃的价值很小，但是对每个人来说，能将其能够带走的东西带走非常重要。

俄罗斯转型的进展方式加快了对俄罗斯社会资本的腐蚀。虽然有些人可能获得了财富，但不是通过努力工作或者是通过投资获得的，而是通过利用政治关系以低价的私有化获取国家财富而获得的。将公民和政府绑在一起的社会契约被摧毁了，正如那些没有养老金的人们所看到的，政府出售了有价值的国有资产，但是却向他们宣布，政府没钱来为他们支付养老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关注宏观经济——而且尤其是关注通货膨胀——导致它逃避了对贫穷、不平等和社会资本等问题的关注。在面对这一关注的“近视症”时，它会说，“通货膨胀尤其对穷人造成更大的困难”。但是，它的政策框架中没有关于如何对穷人的影响最小化的设计。通过忽视其政策对穷人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阻碍了宏观经济的成功。社会资本的腐蚀所造成的环境并不能吸引投资。由于俄罗斯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没有关注最小安全网的建设，从而延缓了重建的进程，即使是顽固的车间经理们也经常发现很难解雇工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存在饥荒，解雇工人和极度痛苦并没有什么差别。

休克疗法

在俄罗斯，关于改革战略的巨大争论主要集中在改革的步骤上。“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最后谁是正确的？经济理论主要集中于均衡和理想化的模型，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常常试图使其他地方的客户国家相信，但是在改革的动态问题、秩序、时间选择和步骤等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论述要比人们期望的少得多。这些辩论者都用暗喻使别人信服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的优点。快速改革者会说，“你不能分两次跳跃跨过一个深坑”；而渐进主义者则提出，孕育一个婴儿也需要花9个月的时间，因此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某些情况下，两种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改革前景，而不在于现实问题。当我在匈牙利参加一次座谈会时，一位与会者提出，“我们必须快速改革！必须在5年内完成”；而另外一个人则提出，“我们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将会用5年的时间”，这样的争论有很多，它们争论更多的是改革的方式而不是改革的速度。

对渐进主义者的两个本质批评，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迟疑将会造成浪费”——很难设计非常优秀的改革；以及接下来的问题，比如，成功的大规模私有化需要具备重要的先决条件，而创造这些先决条件需要时间。[13]俄罗斯特殊的改革格局表明，动机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俄罗斯人为创造的资本主义不是提供财富创造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是提供掠取资产的动机。相对于平稳运行的市场经济而言，快速的转型将造成混乱的狂野东方。

布尔什维克式的市场改革法

如果激进改革者超越狭隘的观点来看经济学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历史表明，激进改革中的大部分经历都被一些问题所困扰。从1789年的法国

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再到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都可以验证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这些革命发起的力量，但是，每次革命都产生了自己的罗伯斯庇尔[⊖]，自己的政治领导人，他们要么被革命腐蚀，要么就是将革命推向极端。相反，成功的美国“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它是政治结构的革命性改变，它代表了社会结构进化性的改变。俄罗斯的激进改革者试图同时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进行革命。但最悲惨的评论就是，最后，他们在两方面都失败了：其中，一些苏联官员只是被赋予权力来运营他们以前管理的企业，并从中受益；而前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依然掌控着权力的控制杆。这就出现新的问题：一些新的寡头政治执政者能够并且愿意极大地发挥其政治和经济权力。

实际上，激进改革者采用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战略——虽然他们正在阅读不同的教科书。他们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是让精英干部来领导（是“强迫”的委婉说法）群众走正确的道路，至于群众希望和认为的最好的道路，根本没有必要考虑。在俄罗斯的后期革命中，由国际机构充当先锋的精英们也试图强迫不情愿的群众进行快速改变。

那些提倡布尔什维克式方法的人们不仅看起来忽略了这些激进改革的后果，而且还假定政治的进程将按照历史提供的但毫无依据的方式运作。比如，像安德烈·施莱弗这样的经济学家，他意识到制度性基础结构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但是相信不管私有化如何实施，在政治上都需要管理私有财产的机构。

安德烈·施莱弗的观点可以被认为是科斯理论的（无根据的）扩展。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因为其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为了实现效率，明晰的产权界定是最基本的。即使我们将资产分配给那些根本不知道如何很好地管理这些资产的人，在具有明晰产权的社会中，他们也能将该资产出售给那些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些资产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快速私有化的提倡者认为我们真的不需要更进一步在意私有化是如何完成的原因。现在，我们意识

⊖ 1758年5月6日到1794年7月28日，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译者注

到，如果科斯的推测有效，需要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14]——而且非常确定，俄罗斯在开始进行经济转型时根本不满足这些条件。

然而，安德烈·施莱弗及其同伴们将科斯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们相信，政治进程与经济进程一样，是按照同一种方式进行管理的。如果在财产中能够建立具有既定利益的群体，那么就需要建立制度性的基础机构，这对市场经济有效来说非常必要，而且，这种需求也将反映在政治进程中。不幸的是，政治改革的漫长历史表明，收入的分配很关键。正是要求改革的中产阶级提出了“法律规则”。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些非常富裕的阶层通常在紧闭的大门背后讨价还价争取特殊优惠和特权。很明显，在这个世界中，绝对不会是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要求建立强力的竞争政策。如今，在俄罗斯，我们也没有看到寡头政治执政者——新的垄断主义者要求建立强力的竞争政策。只有当那些希望通过与克里姆宫进行幕后特殊交易以获取财富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发现，他们对俄罗斯规则制定者的特别影响逐渐削弱时，他们才会提出法律规则的需求。

只有在政府利用手中的职权剥夺这些寡头政治执政者们的权力时，这些寡头执政者才会提出开放媒体，将媒体从少数人的集中控制中解放出来，他们是要控制媒体以维持他们的权利。在大部分民主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被要求支付垄断价格的中产阶级不会忍受这样的经济权力集中。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媒体权力集中的危险，今天的美国绝不可能接受像俄罗斯那样大规模的权利集中。然而，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很少注意媒体权力集中所带来的危险；相反，他们只关注私有化的迅速进行，私有化进程的标志就是行动的快速。的确，当他们看到私有媒体被集中利用，而且被有效地利用以保证他们的朋友——叶利钦和所谓的改革者——的权力时，他们感到很惬意甚至很自豪。

存在充满活力和批判的媒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保证做出的决定不仅能够反映少数人的利益，同时也要反映社会的总体利益。计划经济体制的传承非常关键，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公共的详细审查。在俄罗斯没能建立一个有效、独立和有竞争力的媒体的原因之一就是，政策——比如贷款换股计划——在制定时并没有经历其应得的公共批评程序。然而，即使在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紧急决定，不管是在国际经济组织机构中还是美国财政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着门制定的。无论是西方纳税人（我们认为这些机构要对他们负责），还是俄罗斯人民（他们为此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寻找，“谁失去了俄罗斯？为什么？”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没有什么启示意义。

第6章

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和其他危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政治机构。虽然根据所有的指导贷款的原则，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但1998年对俄罗斯的救援本质上是出于维护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权。如果没有明确支持，那么默许腐败的贷款换股自由化方案的部分原因是该腐败有好的出发点——使叶利钦再次当选。[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些领域中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与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的政治判断存在联系。

实际上，俄罗斯管理者整体上对美国财政部的战略存在疑虑。1993年，在俄罗斯改革派溃败后，斯特罗伯·塔尔博特（当时掌管着俄罗斯的政策，后来成为俄罗斯的副国务卿）表达了对休克疗法战略的忧虑：是不是休克太多了，而治疗太少了？总统顾问委员也强烈地感到美国给俄罗斯提供了糟糕的建议，利用纳税人的钱去引诱他们接受该建议。但是，美国财政部却声明，俄罗斯的经济政策是它们自己的跑马场；无论是在政府内还是政府外，都把开展公开对话的努力搁置一边；并且它的委员会顽固地坚持休克疗法和快速私有化。

与经济学一样，政治判断也支持财政部官员的姿态。渐进主义者担心真正的危险是休克疗法的失败：贫困增加了，收入降低了，这将会削弱对市场改革的支持。事实再次证明渐进主义者是正确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已经普遍存在对激进改革和休克疗法的失望。除了少数已经成为自己盟友的国家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计划经济国家非常轻视和不信任。

实际上，在欧洲的词汇中，许多前共产主义者被称为所谓的具有各种说服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他们可能处于旧新政民主党和更近时期的新民主党人之间，虽然他们更靠近前者而非后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民主的克林顿政府看似拥护与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保持高度一致的观点，但是却经常与那些在转型经济中的右倾改革者结为盟友，这些右倾改革者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和激进市场改革的信徒，他们很少关心政策的社会后果和分配后果。

在俄罗斯，除了共产主义者外，没有可以打交道的人了。叶利钦本人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政治局候选成员。在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权力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被剥夺过。几乎所有的俄罗斯改革者都与共产主义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曾经，分歧看起来位于那些与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旧政体下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的人和任何其他人之间。“好人”就是那些已经开始做生意的苏联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他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领导人，接替盖达尔成为苏联的总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打交道的、非常实际的人。但是，只要能够逃脱处罚，有些“实际的人”就会随时准备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窃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富，显然他们并不是左翼理论家。然而，谁可能领导俄罗斯进行自由市场改革，对这件事做出的判断（错误的或者正确的）可能会指导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转型早期做出它应该与谁结盟的决定，2000 年，强硬的实用主义介入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还存在理想主义，那么叶利钦和其支持者最终的失败已经造就了犬儒主义。普京看似得到布什政府的热情支持，因为他看起来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物，他短暂的克格勃经历就是证明。以前，我们是根据在旧体制下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根据他在旧体制下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一个人。对此，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纠正过来。在与转型国家新兴的领导和政党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错误的意识形态已经使我们感到迷茫，那么，同经济政策设计一样，错误的政治判断也不会发挥作用。我们的盟友，他们除了使自己更加富裕外，有很多人对建立在西方国家能够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漠不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改革战略和叶利钦政府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晰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人员的反应，与越南战争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前美国政府内部官员的反应非常相似：他们忽视事实、否认现实、压制讨论，在事情变得非常糟糕后开始大把大把地撒钱。他们会一直说：俄罗斯将会

“出现拐点”，增长即将出现；下一步贷款就会使俄罗斯的经济最终走向正轨；目前的情况表明俄罗斯将会履行贷款协议的条件；如此等等。随着成功的希望开始变得越来越渺茫，危机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开始改变说法了：重点从对叶利钦的信任转移到对替代战略威胁的担心。

我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担忧。某一天，我接到了俄罗斯政府高级顾问办公室的电话，他希望在俄罗斯组织一次头脑风暴会议，讨论俄罗斯应该做些什么事来维持运转。多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提供的建议就是稳定；在增长方面它提不出任何建议。而且很明显，稳定——至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稳定——并不能实现增长。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得知这一信息时，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财政部（根据最高层的报道）给世界银行总裁和我打电话，命令我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在财政部将世界银行作为它自己的财产时，其他国家在经过仔细的配合协调后，甚至可以从侧翼包围美国财政部部长。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接到俄罗斯的电话通知后，带着俄罗斯邮寄的邀请函，我动身去了俄罗斯，为俄罗斯做它希望我做的事——在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识形态和美国财政部特殊利益的影响下，进行一次公开的讨论。

我的旅行非常迷人，大范围的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大批非常聪明的人士努力探讨和设计经济增长战略。他们非常清楚那些数字——但是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并不只是统计的问题。和我交谈的很多人都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中遗漏的或者没有充分注意的项目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增长只是需要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担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快速私有化的压力，他们依然觉得快速私有化将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有些人意识到建立强大的竞争政策的重要性，并且哀叹他们缺乏足够的支持。但最使我震惊的是，华盛顿精神和莫斯科精神并不一致。在莫斯科，当时存在健康的政策争论，很多问题都受到关注，比如，高汇率正在抑制增长——他们是正确的。另外一些人担心货币贬值将会造成通货膨胀——他们也是正确的。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民主社会中，他们需要争论和讨论。俄罗斯正试图这样做，试图公开进行讨论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正是华盛顿——或者更准确的说，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害怕民主，它们希望压制争论。我除了对此加以关注、感到悲哀和对此加以讽刺外，别无他法。

随着失败的证据逐渐显现出来，美国一直在支持一匹虚弱的赛马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美国政府甚至试图更坚决地对批评家和公共讨论施加压力。财政部试图取消世界银行内部与新闻界之间的讨论，以确保只有当它们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时才能听到关于这些事情的评论。令人吃惊的是，即便如此，当美国报纸披露可能有证据表明存在腐败时，美国财政部几乎都不会动摇它的战略。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第5章讨论的贷款换股私有化计划（在该计划中，少数寡头执政者掌控着该国大部分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批评的焦点，针对这一点，美国并没有察觉自己与腐败已经联盟了。在那些本应该认识到要得到公共支持的事件中，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将安纳托利·丘拜斯（当时负责私有化，并组织了贷款换股的诡计，毫不奇怪，他成为所有俄罗斯公共官员中最不受欢迎的）邀请到他的住处。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俄罗斯的政治生活。通过长时间坚决地与那些掌权者（他们在腐败的私有化进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站在一边，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已经把他们和这些政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以普通俄罗斯人的代价增加了富人的利益。

当美国和欧洲报纸最终公然披露这一腐败时，财政部的指责就显得空洞无力和缺乏诚意。事实是，杜马的总检察长在这些新闻故事披露之前就将这些指责转嫁给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内部，其他人力劝我不要和他见面，以免我们对其他的指控提供口实。如果不了解腐败的程度，那是因为耳朵和眼睛都被蒙上了。

应该做些什么事

如果我们不与特定的领导人亲密接触，并且假设对民主进程进行无限的支持，那么，将会很好地为西方国家的长期利益服务。这些应该通过支持莫斯科

和其他省份的年轻人和新兴领导人来完成，他们正在反腐败并正努力建设真正的民主。

在克林顿政府刚开始时，我就希望对美国的俄罗斯战略进行公开辩论，该辩论需要更多地考虑外部世界所进行的讨论。我相信如果克林顿曾遇到这些争论，他将会采取更平衡的方法。他将会对穷人的关注更敏感，将比财政部的官员更明白政治进程的重要性。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克林顿总统从来都没有机会听取全部的问题和观点。财政部将总统在制定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看得非常重要。或许因为美国人不感兴趣，克林顿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该问题对他来说足够重要，以至于要求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美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的改革

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有很多人相信政策的失败并不只是偶然的：失败是故意的（蓄谋的），其目的就是抽去俄罗斯的精华，将其视为不确定的未来威胁加以根除。这更是一种阴谋论的观点，它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人看得比我认为的更恶毒，也更聪明。我相信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提倡的政策将会成功。他们相信一个强有力的俄罗斯经济和一个稳定的、以改革为导向的俄罗斯政府对美国和全球和平都有利。

但是，这些政策并不完全是利他主义的，这些政策也反映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或更准确地说，是美国金融和商业市场的利益。例如，1998 年 7 月的救援行动只是对西方银行进行救援，与对俄罗斯的救援行动一样，它们也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最终的确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但并不只是华尔街的直接利益影响了政策，金融界流行的意识形态也直接影响了政策。例如，华尔街将通货膨胀视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它侵蚀了属于债权人的真实价值，将会导致利率的上升，利率上升又反过来导致债券价格的下降。对金融家来说，失业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对华尔街来说，没有什么比私有财产更神圣；这样，将私有化作为重点就不足为奇。他们根本就不会热衷于承诺竞争——毕竟，是乔治·布什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制造了全球铝业的卡特尔，看起来也正是他在抑

制全球钢铁市场的竞争。而且，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根本就不会出现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这些概念；相对于行动更直接地受政治进程控制的银行，他们觉得独立的中央银行让人更舒服。（在俄罗斯这个案例中，这种姿态的确存在一定的讽刺意味；1998 年危机后，是俄罗斯独立的中央银行威胁要推行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政府成员希望的更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政策。正是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求表明它忽略对腐败进行控诉的能力。）

美国更广泛的特殊经济利益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冲突方式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并且使美国看起来更虚伪。美国支持自由贸易，但通常的情况是，当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地发现它的某种产品能向美国出口时，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利益就被镀锌了[㊀]。劳工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混合使用了许多贸易法——正式名称为“公平贸易法”，但在美国之外，这些法律都被称之为“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来建立进口贸易壁垒（带刺的铁丝网）。这些法律允许某个公司在它相信国外对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某种产品时，请求政府征收特殊关税进行保护。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称为倾销，这种特殊税收就称为反倾销税[㊁]。然而，通常的情况是，美国政府以较少的证据来决定成本，这样的决定方式毫无意义。对大部分经济学家来说，反倾销税[㊂]只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他们会问，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企业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

关于铝的案例

在我为政府工作期间，美国特殊利益干预贸易和改革进程最令人悲伤的事件发生在 1994 年年初，当时铝的价格开始迅速下降。为了应对铝价的下降，美国铝生产者控诉俄罗斯对铝进行倾销。对这种情况进行的任何经济学分析都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并没有倾销。俄罗斯只是以国际价格销售铝，国际铝价的下降是因为全球增长放缓从而造成全球铝需求的下降，也是因为俄罗斯军用飞机减少了对铝的利用造成对铝需求的下降。而且，碳酸饮料新的包装设计比以

㊀ 意为受到保护。——译者注
㊁ 原文为倾销税，dumping duties，根据上下文应该是反倾销税，anti-dumping duties。——译者注
㊂ 原文为倾销税，同上，以下都是反倾销税。——译者注

前减少了对铝的利用，也导致铝需求的下降。当看到铝价垂直下降时，我就知道该产业不久就会像政府请求一定形式的救济，要么是新的补贴，要么就是保护企业免受国外的竞争。但是，当我看到美国铝业公司（Alcoa）的领导保罗·奥尼尔提出要建立全球铝业卡特尔的建议时，我还是大吃一惊。卡特尔通过限制产量从而提高价格。奥尼尔的利益对我来说并不吃惊；真正让我吃惊的是美国政府不仅宽恕卡特尔，而且实际上在建立卡特尔的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他也提出，如果不能建立卡特尔，就要援引反倾销法。这些法律允许美国对那些以低于“公平市场价值”，尤其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的货物征收特别税。当然，这一问题不在于俄罗斯是不是在进行倾销。俄罗斯是以国际价格来销售它的铝产品。因为俄罗斯铝业的产能过剩，并且俄罗斯的电价很低，虽然它是以国际市场价格在销售铝产品，但是这些产品中有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产品的销售价格已经高出生产成本。然而，通常情况下，反倾销法的实施方式就是这些国家能够被指控在进行倾销，即使他们——以经济的观点看——并没有倾销。美国利用特殊的方法评估生产成本，如果以这种方法来评估美国企业，那么或许大部分美国企业都在进行倾销；但更糟糕的是，美国商务部同时扮演着法官、陪审团、检举人的角色，以“最佳获得信息”（best information available，BIA）为基础来对生产成本进行评估，而这些信息通常是由那些试图将外国竞争排除在外的美国企业提供的。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案例中，它时常通过与可比国家的成本进行比较来评估成本。波兰被指控对高尔夫手推车进行倾销，假设的“可比国家”是加拿大。在铝的案例中，如果提起倾销控诉，就存在合理的机会征收充分高的税收以至于俄罗斯不能再在美国销售铝了。它可以在其他地方销售它的铝产品（除非其他国家也仿照美国的做法），这样的话，国际铝价就会被继续压低。对于美国铝业公司来说，全球卡特尔因此就更可取了：它为美国铝业公司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来提高铝价。

我反对卡特尔。因为能够使市场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是竞争。卡特尔在美国是非法的，它们在全球也应该是非法的。在推动竞争法的强力实施过程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强大联盟。如今，对美国来说，帮助建立全球卡特尔是对每项原则的背叛。然而，还存在更多的风险。俄罗斯

正在努力建立市场经济。卡特尔可能会通过限制俄罗斯少量的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货物来伤害俄罗斯。而且，建立卡特尔可能会给俄罗斯提供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作的错误课程。

在到俄罗斯的快速旅行中，我与俄罗斯掌管经济的第一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谈话，他和我都认识到俄罗斯并没有进行倾销——按照经济学对倾销的理解——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法律是如何运作的。只要存在倾销指控，那么就有征收反倾销税的好机会。但是，他知道卡特尔对俄罗斯来说是多么糟糕，不仅对俄罗斯的经济很糟糕，而且对其正试图进行的改革也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他同意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对此强烈抵制。他也愿意面对强迫接受反倾销税的风险。

我努力地使那些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人相信，支持奥尼尔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且也的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一次热烈的非正式顾问团会议中，他们做出了支持建立国际卡特尔的决定。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司法部的人员都非常气愤。安妮·宾曼这位反托拉斯的助理大法官，当着非正式顾问团的面让内阁知道这可能已经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俄罗斯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强硬地反对建立卡特尔，并直接和我交流他们的感受。他们知道卡特尔强加的数量限制将会把更多的权力还给保守的政府部门。在存在卡特尔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被给予一定的配额，即他们可以生产或出口铝的数量。这些政府部门可能掌握着谁会获得这些配额。这就是他们非常熟悉的那类体系，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体系。我非常担心贸易限制所造成的超额利润将会成为进一步腐败的根源。在新黑手党化的俄罗斯，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又会在谁会得到这些配额的斗争中造成大屠杀。

在我努力地使每个人相信利用卡特尔解决方案的危险时，有两种声音占据优势。与俄罗斯保守的国家政府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的国务院，支持建立卡特尔。国务院高度重视命令，将其摆在首位，而卡特尔确实能够提供命令。当然，保守的政府部门从来就没有被说服过，一开始，他们就认为价格和市场的改革运动是没有意义的，铝的案例只是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观点。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鲁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强烈支持国务院。至少卡特

尔暂时是有效的，能够提升铝的价格，使美国铝业公司和其他生产者的利润得以提高。美国消费者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都遭受损失，而且，讲授竞争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消费者的损失超过生产者所获得的利益。但在本案中，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正试图向俄罗斯讲授市场经济。他们得到了教训，但却是错误的教训，这个教训将使他们在今后的多年内付出昂贵的代价：在市场经济中，把事情办好的方式就是去找政府！我们并不打算向俄罗斯传授裙带资本主义101，而且他们也可能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裙带资本主义101的知识；他们可能已经学到所需的知识。但是我们无意地给他们提供了糟糕的例子。[2]

基于国家安全的销售

在特殊利益集团支配着国家和全球成功转型的目标中，铝的案例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事例，布什政府后期和克林顿政府开始时，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从剑戟到犁头”的协议。一个名为美国致富公司（USEC）的美国政府企业将从俄罗斯无效的核弹头中购买铀，并将其带到美国。这些铀将被稀释以至于它不能再被利用到核武器上，而将其用于核电站。这一销售可以向俄罗斯提供其所需要的现金，俄罗斯也可以用这些现金更好地保证其核原料处于控制之中。

看起来难以置信的是，公平贸易法再次被启用，以阻止这一交易。美国铀生产者认为，俄罗斯在向美国市场倾销铀。正如铝的案例一样，这一指控没有任何经济的合法性。然而，美国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并不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撰写的。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企业免受进口的不利影响。

当美国政府基于裁军的意图进口铀受到公平贸易法下美国铀生产者的挑战时，很明显，这就需要对这些法案进行修改。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最终被说服将对这些法律的修改提交给国会。但是，国会拒绝了这一提案。我依然不明白的是，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是否通过使结果成为必然的方式向国会提交提案，从而破坏了对这些法律进行改变的努力，或者他们是否反对一直采取强硬保护主义观点的国会。

接下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同样让我吃惊的事。使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很困窘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彩票业的私有化远落在后面。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进行了数十亿美元的私有化，而美国仅对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价值200万美元的氦工厂进行私有化。当然，这一不同是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拥有更多的和更大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最后，美国的私有化提倡者想到了应该和能够私有化的企业：美国致富公司，该公司不仅浓缩核反应堆用的铀，而且浓缩原子弹用的铀。私有化受诸多问题困扰。美国致富公司受托从俄罗斯挣得浓缩铀；作为一个私有企业，这是一种垄断力量，没有必要通过反托拉斯机构的详细审查。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时已经分析了对美国致富公司进行私有化的动机，结果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每个动机都会将俄罗斯的铀置于美国之外。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存在对核扩散的担忧——担心核原料流入流氓政权或者恐怖组织手中——让一个被削弱的但是拥有浓缩铀的俄罗斯将其浓缩铀卖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这确实不是一幅很好的情景。美国致富公司固执地否认它曾是更广泛的美国利益的筹码，而且很确定，它将一直按照俄罗斯愿意销售的速度尽快地将俄罗斯的铀带入美国；但是每个星期它做这些声明时，我却获得了美国致富公司和俄罗斯代理人之间的秘密协议。俄罗斯已经提供了3倍于他们的供货，美国致富公司不仅拒绝了他们，而且还慷慨地支付了一笔钱，该笔钱只能被称为“封口费”，以对该供货（和美国致富公司的拒绝）保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本身就足够充分要停止私有化，但事实并非这样：美国财政部在私有化方面不仅在国内强硬，在俄罗斯同样也非常强硬。

有趣的是，近10年来美国唯一的重大私有化，被那些几乎与发生在其他地方一样糟糕的问题所困扰，以至于两党联立的法案不得不提交到国会将该企业重归国有。我们预计，私有化将干涉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结果证明这是有先见之明的。相反，在一点上，看起来好像所有向美国的出口都可能被阻止。结果，美国致富公司请求继续对进口提供巨大的补贴。这一由美国致富公司（和美国财政部）勾画的乐观经济景象最后证明失败了，投资者在看到他们的股票价格垂直下降时非常生气。对于一个负责我们国家浓缩铀生产的企业，看

着它的财务仅能支撑其运营，的确令人不安。在私有化那几年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即美国财政部是否能够正面地给美国致富公司出具法律要求的财务证明，以证明该公司能够继续运营。

俄罗斯的教训

俄罗斯在市场经济进程中栽了个跟头，而当时我们是老师，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给它们提供大量的自由市场、教科书经济学；另一方面，它们却发现实际上老师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理想大相径庭。它们被告知自由贸易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它们试图向美国出口铝和铀（其他产品同样如此）时，却发现美国的大门被关上了。显然，美国在没有实行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也取得了成功；或者实际上可以说“贸易是好的，但进口是坏的”。它们被告知竞争至关重要（虽然它们并没有太多地强调这一点），但是美国政府却处于建立铝卡特尔的风口浪尖上，并且将进口浓缩铀的垄断权力给予美国垄断生产者。它们被告知快速和真正地进行私有化，但是由美国进行的私有化尝试却年复一年地被拖延，最终它的诚实性就成为问题。美国向每个人解释裙带资本主义和它的危险，尤其是在东亚危机之后。但是关于影响力利用的问题，不仅在本章开始和中间表述的实例中有所体现，而且在第9章表述的长期资本管理的救援中也有所体现。

如果西方国家的鼓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采纳，我们应该明白其中的原因。它不只是因为过去造成的伤害，比如说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不公平的贸易条约；而且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他人不仅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而且要看我们在做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行为都不太漂亮。

第 7 章

建立市场经济的颇佳之路

随着俄罗斯及其他地方激进式改革战略的失败越来越明显，推动这些改革政策的人们声称他们没有选择。但实际上，的确存在替代战略。2000 年 9 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上，人们强烈地认识到这一点。当时，一些东欧国家，无论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还是那些在经济转型中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它们的前政府官员们都对其改革的历程重新进行了评价。瓦科拉夫·克劳斯领导的捷克共和国由于实施了快速的自由化政策，从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但他对整个转型进程的管理导致捷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低于 1989 年的水平。瓦科拉夫·克劳斯的政府官员辩解说，对于可采纳的政策，他们别无选择。该观点受到捷克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发言者的挑战。确实存在着替代选择，并且其他国家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且，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结果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

波兰和中国就选择了与“华盛顿共识”提倡的战略不同的替代战略。波兰是东欧国家中改革最成功的；过去 20 年中，中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刚开始时，波兰也采用“休克疗法”，试图将恶性通货膨胀降到更合适的水平。在波兰刚开始使用该措施并且是限制性使用时，很多人认为波兰将会采用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型，但他们完全错了。波兰很快意识到，休克疗法适用于抑制恶性通货膨胀，但不适用于社会变革。波兰追求一种渐进性的私有化政策，与此同时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比如开设进行实际借贷的银行、制定能强制履行合同的规制和完善公正处理破产的法律体系。波兰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市场经济就不会发挥其功能。（与波兰不同，捷克共和国在对银行进行私有化之前对公司进行了私有化。国有银行继续向私

有化的公司借贷；低息贷款涌向那些国家提供优惠的公司，而私有化实体并不受严格的财政预算约束支配，从而允许它们拖延真正的重建。）波兰前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格泽戈尔兹 W. 科勒德克认为，波兰的成功在于它毫不犹豫地摒弃了华盛顿共识的教条。[1] 波兰并没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行事——它没有迅速地致力于私有化，也没有将把通货膨胀降到更低的水平作为超越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的首要目标。但是，它的确强调了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十分在意的问题，比如民主的支持对改革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捷克政府努力地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对失业者提供福利、因为通胀而调整养老金，并创建使市场经济功能得以发挥的制度性基础结构。

渐进的私有化进程允许在私有化之前进行重建，大公司被改组成较小的公司。这样，新的、充满活力的小企业部门就建立了，由一批年轻的管理者来领导，对他们的未来进行投资。[2]

与此相似，过去 10 年中国的成功与俄罗斯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年均 10% 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则以年均 5.6% 的速度下降。20 世纪末，中国的实际收入（也称之为购买力）与俄罗斯相当。然而，中国的转型造就了历史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贫困的最大幅度的下降（按照中国采用的贫困标准，该标准较低，为 1 美元/天，贫困人数从 1990 年的 3.58 亿降到 1997 年的 2.08 亿），而俄罗斯的转型则造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贫困最大幅度的上升（战争和饥荒除外）。

中国与俄罗斯战略的差别再明显不过了，而且这种差别在转型刚开始进行时就表现出来了。中国的改革从农业开始，首先是从人民公社（集体）的农业生产制度向“个体责任”制度转变——事实上这是部分进行私有化。它并不是完全私有化：个人不能自由买卖土地，但是，从产出的收益中可以看出能从改革（即使是部分或有限的）中得到多少好处。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它涉及成百上千万工人的利益，但是却在几年内就完成了。与此同时，实现这项成就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一个省[⊖]内试验成功后，其他省纷纷效仿，结果都成功了。证据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强制这种变革，

⊖ 当时为安徽省。——译者注

改革就自动被接受和采纳了。但是，中国领导阶层意识到不能停留在荣誉的桂冠上，应该将改革延伸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在关键时期，他们聘请了几位美国顾问，包括肯尼斯·阿罗和我本人，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进行的研究工作，阿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供了数学基础以解释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市场经济是有效的，另外，在动态经济学、经济改革等方面，他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与那些以教科书经济学全副武装地向俄罗斯进军的转型圣贤们不同，阿罗认识到这些教科书模型存在局限。他和我分别强调了竞争以及为市场经济建立制度性基础结构的重要性，而私有化是次要的。中国人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是动态问题，尤其是如何从扭曲价格向市场价格转变。中国人提出一个独创性的解决办法：价格双轨制，在此价格体制下，企业在旧限额（即旧的命令和控制体系下要求生产的）内生产的产品运用旧的价格体制来定价，但是任何超过旧限额的生产都利用自由市场价格体制来定价。该体制允许完全的边际激励——就像经济学家充分认识到的那样，这正是激励的关键所在——但是它避免了在所有产量瞬间调整为新价格时有可能出现的规模巨大的再分配。它允许市场“探索”无扭曲的价格，该过程并非总是平坦的，总会伴随着少许的波动。更重要的是，中国渐进主义者的方法避免了猖獗的通货膨胀这一缺陷，它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护下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休克疗法的标志，接着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包括储蓄账户的崩溃。在中国逐渐实现了它的目标后，就取消了价格双轨制。

与此同时，中国发动了一种创造性的毁灭工程——通过创建新的经济而取消旧的经济。在乡镇和农村，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新企业，将他们从经营农业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参与创建合资企业。外国企业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国，使中国成为新兴市场中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接收者，仅次于美国、比利时、英国、瑞典、德国、荷兰和法国，位居世界第八位。[3] 到20世纪末，其排名甚至更高。同时，中国开始建立“制度性的基础机构”——有效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银行规制和安全网。随着安全网的建立和新的就业岗位的出现，中国又开始着手重建旧的国有企业，像缩减政府官僚机构一样缩小它们的规模。在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国就完成了对大部分住宅的私有化。虽然这项任务还远没有结束，它的未来也非常不明确，但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比20年前要好得多。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转型”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经济增长和发展并不能自动给予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非常复杂。50年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增长和民主之间存在某种平衡。一般认为俄罗斯能够实现比美国更快的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知道，虽然俄罗斯放弃了自由，但是并没能实现经济增长。虽然也有些成功的改革是在专政统治下取得的，比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但是，更多的情况下，专政最终还是摧毁了经济。

稳定对增长非常重要，任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能意识到，一个具有10亿人口的中国对不稳定的恐惧程度。最终，增长和繁荣被广泛分享，这对于长期稳定来说，即使是不充分的，却也非常必要。西方民主依次表明，自由市场（经常是由政府来界定）在个人自由的环境下能够成功地引致增长和繁荣。这些观点在过去是正确的，在未来的新经济中看来更是如此。

在追求稳定和增长的同时，在进行私有化和重建现有企业前，中国就提倡竞争，成立新的企业、创造新的工作。中国认识到宏观稳定的重要性后，就从未混淆目的和手段，也从未极端地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它认识到，如果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避免大量的失业。创造就业机会必须与重建工作先后进行。中国的很多政策都可以从这方面进行解释。中国的自由化体现出较强的渐进性，这就保证了那些配置不当的资源在重新配置时能够更有效地被利用，而不是造成无谓的失业。货币政策和金融制度为成立新企业和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虽然仍有资金依然支持无效的国有企业，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认为，这对于维护有可能被高失业率暗中破坏的社会稳定非常重要。虽然中国没有迅速地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但随着新企业的成立，国有企业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以至于在转型开始20年后，国有企业仅占工业产出的28.2%。虽然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开放，但它同时也意识到了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的危险。

中国发生的事情和那些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思想体系俯首哈腰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明显不同，一个个案例表明，作为市场经济的新成员，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决定，中国在做每项政策决定时都更在意该政策的激励效益。

在中国，乡镇和农村公共企业是转型早期的核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思想体系认为，由于它们是公共企业，因此不可能成功。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了。乡镇和农村企业解决了管理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为其他地方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乡镇和农村企业将其宝贵的资金投入到财富创造中，并且有强有力的竞争保证他们能够取得成功。乡镇和农村的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资金发生了什么，而且知道它们是否能够创造就业，是否能够提高收入。虽然这可能并不民主，但却存在责任。中国的新产业都坐落于乡村区域。这有助于中国减少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动乱。这样，中国就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奠定了新经济的基础，维持和提高了它的社会资本，而在俄罗斯，社会资本却被腐蚀了。

最令人深思的是，很多采取渐进性政策的国家在快速进行下一步深入改革时都取得了成功。中国的股票市场规模超过了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大部分农业管理与1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而中国仅用5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个体责任制的转型。我所描述的俄罗斯与中国及波兰的对比，在转型经济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重复。捷克共和国早期因为快速改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赞扬，但是后来的情况非常明显，捷克建立的资本市场并没有为新的投资者增加资金，却允许很多狡猾的资金管理者（更确切地说，是白领罪犯，如果他们在美国做了与在捷克共和国相同的事，他们就会坐牢）轻松地攫取他人数百万的资金。转型中的这些事情和其他错误造成的结果就是，相对于1989年的情况，不管有多大的利益、国民的教育水平有多高，国家都被抛在一边；相反，在刚开始进行转型时，匈牙利的私有化水平较低，但却实现了企业的重建，而且现在已经具有国际竞争力。

波兰和中国的情况表明的确存在替代战略。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历史

情况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保证在这些国家中有效的方法在俄罗斯也有效，并且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基于同样的考虑，一些人认为，在假定环境明显不同的情况下，对这些成功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在刚开始转型时，波兰比俄罗斯具有更强大的市场传统，甚至在计划经济时期，波兰都存在私有部门。但是中国在转型开始时市场传统较低。在转型前，波兰企业的表现可能会使波兰能够承受更快的私有化战略，但是，波兰和中国一样选择了更为渐进的路径。

认为波兰有优势是因为波兰的工业化程度更高，认为中国有优势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低。根据这些批评，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俄罗斯面对的任务更具体，即在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对已经存在的工业化进行调整。很少取得成功的事实表明，发展并不容易。如果说转型非常困难，发展也很困难，那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同时实现这两项任务就应该很容易呢？如果说在改革农业方面，中国的成功和俄罗斯的失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此不同比这两个国家在改革工业方面成功的不同更明显。

这些案例之所以成功，其主要贡献在于它们的政策都是“本土的”，即它们都是由本国人民设计的，都对本国的需要和关注的问题比较敏感。无论是中国、波兰还是匈牙利，它们的转型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和其他所有成功转型的国家一样，它们都采取了实用主义——它们从来不让思想体系和简单的教科书模型决定政策。

科学，甚至是像经济这样并不严密的科学，也涉及预测和分析因果关系。渐进主义者的预测被证实了——无论是对那些采取渐进主义战略的国家进行的预测，还是对那些采取替代方案的休克疗法国家进行的预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休克疗法主义者的预测并不准确。

根据我的判断，这些没有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取得成功并非偶然。实施的政策与结果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中国和波兰的成功和其所作所为与俄罗斯的失败和其所作所为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结果正是休克疗法的批评者所预测的——并且只能是更糟。很明显，中国的结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完全相反——但是，却与渐进主义者的预测

完全一致，甚至是更好。

休克疗法专家认为他们的指令从来都没有被完全实施，这种辩解是毫无根据的。在经济学中，没有哪个指令是被完全遵从的，而且政策（和建议）必须根据事实来预测，事实就是在复杂的政治进程中，易犯错的个体会执行这些政策。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它本身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更糟糕的是，这些失败都被独立的观察家和专家所预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对此视而不见。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预测没有被证实，毕竟没有人，甚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保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所产生的广泛的变革后果。这项批评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视野太狭窄——它只关注经济——而且它还采用了一个特别有限的经济模型！

5 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草草做出它们的战略是有效的判断，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改革进程的证据。[4] 正如现在的这些事情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它们做的事情明显不同一样，在另外一个 10 年内也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可以断定，基于目前进行的改革的后果，必须对我们的判断进行修正。然而，目前的有利情况是，有些事情看起来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那些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可能觉得痛苦，但从长期看，它们将会成功。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的历史已经表明，渐进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在阵痛较少的情况下取得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并且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取得快速增长。在龟兔赛跑中，很明显是乌龟最后取得了胜利。激进的改革者，无论是捷克共和国这样的明星学生，还是俄罗斯这样的桀骜不驯者，最终都失败了。[5]

未来之路

那些应该为过去的错误负责的人对俄罗斯将来怎么办提不出任何建议。他们只会重蹈覆辙——继续需要保持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过去所造成的问题使他们认识到需要建立强大的制度，但对于如何建立强大的制度及其意义，他

们几乎提不出任何建议。在一次次参加关于俄罗斯政策的会议后，我感到震惊的是，不仅缺乏减少贫困的战略，而且缺乏提高增长的战略。相反，世界银行曾讨论按照比例在农业部门支持它的计划。鉴于以前的方案在农业部门造成的问题，这对世界银行来说很有意义；但由于农业部门是俄罗斯大部分贫困存在的部门，因此，这对俄罗斯来说意义非凡。建议中仅有的“增长”战略，就是俄罗斯不得不采取那些会使已经流入该国的资本再次流出的政策。持有这个观点的人们忽视了这项建议可能意味着，在寡头执政者、盗贼统治者与他们代表的裙带资本主义/黑手党资本主义之间将建立永久的牢固关系。当他们能够在西方国家获得很高的收益回报时，就没有其他撤回资本的理由。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从来都不在意这样的事实：它们正在支持一个缺少政治法律的体系，因此，那些具有大量财产的人通过窃取或与领导人——叶利钦（他也失去了所有的信任和合法性）的政治关系获取他们的资金。悲哀的是，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必须将已经发生的事视为对国家资产的掠夺，是国家从来都无法补偿的偷窃。俄罗斯将来的目标必须是尝试着停止进一步的掠夺，通过建立法律规则以及更广泛的、具有吸引力的商业氛围来吸引合法投资者。

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1998 年的危机有一点好处，即：卢布的贬值刺激了增长，虽然出口增长并不明显，但在进口替代方面却非常明显；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的确抑制了经济，使其保持在潜在的水平线下。卢布贬值与一些偶然因素相结合，造成20 世纪 90 年代石油价格的飙升，从而为其从较低层次的复苏提供了燃料。同样因为存在刺激增长的持续利益，一些企业利用适宜的环境优势似乎找到了新机会并开始持续增长。这里同样存在其他的积极信号：那些利用伪资本主义体系优势而变得富有的人群中，有些正试图对这些规则加以改变，以保证他们对其他人做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到自己身上。在某些方面存在要实现更好的合作管理的动机——某些寡头政治执政者，在他们不愿让其资金在俄罗斯冒险时，他们却诱使其他人来冒更大的风险，而且他们知道，要这样做的话，他们必须要比过去表现得更好。但是，这里同样存在一些不太积极的信号，即使在高油价盛行时期，俄罗斯几乎都不能实现预算平衡；

它们不得不将资金进行储备以防止油价下跌时可能出现的困境。2003 年年初，几乎是卢布危机 5 年后，俄罗斯的未来仍不确定。货币贬值所引致的增长被腐蚀了，尤其是随后实际汇率增长时更是如此。增长开始放缓。但目前又出现了较低的增长率，俄罗斯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或两个或更多的 10 年来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 年进行补偿——除非存在明显的改变。

同样存在其他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比如，在对应该做的事情编制目录时，很自然地从反思过去的错误开始：对市场经济的基础缺乏关注——包括建立向新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制定强制实施的合同和促进竞争的法律以及设立独立、诚实的司法机构等。

俄罗斯不能只关注宏观稳定性和鼓励经济增长。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在意以下问题：让这些国家按照既定的预算来运转，并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在适度的引导中，虽然稳定对增长来说是必须的，但它几乎并不是增长战略。实际上，稳定战略抑制了总需求。总需求的减少与被误导的重建战略相互作用，最终抑制了总供给。1998 年，就需求和供给的作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总需求的任何增加都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这是真的，它将是对失败最可怕的坦白。6 年中，俄罗斯的生产能力被削减超过了 40%——远比国防削减的程度深，生产能力损失的程度比任何一次甚至最糟糕的战争都深得多。我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对削减生产能力做出了贡献，但我相信总需求匮乏依然存在问题。结果再次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错误的：当出现货币贬值时，国内生产者就能够与外国进口者进行竞争，而且它们也能够满足新需求。产出增加了。这里的确存在超额生产能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却将其搁置多年。

如果俄罗斯能够创建非常友好的投资环境，那么在增长方面它必将取得成功。这包括所有层次政府的活动。国家层次中，好的政策可能会被地方和区域层次糟糕的政策抵消。所有层次的规制将使开展新业务变得困难。就像资本缺乏有效性一样，土地的无效是一种障碍。如果地方政府官员过度压榨企业以至于他们缺乏投资的动机，那么，私有化就毫无用处。应该建立联邦机构，在各

个层次提供一致的动机，这会有些困难。旨在减少较低层次政府滥用职权的政策自身却被滥用，中央政府被赋予过大的权力，同时剥夺了地方和区域政府机构制定创造性和企业家增长战略的能力。虽然俄罗斯整体上处于停滞，但是在很多局部地区却有所进展——需要注意的是，克里姆林宫最近尝试着对地方政府进行控制，实际上抑制了这些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过去 10 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要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多么困难。巨大的不平等、极度的贫困在过去 10 年内为各式各样的运动（从国民主义到个人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运动不只是对俄罗斯未来的经济造成威胁，而且还威胁到全球和平。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扭转这种迅速形成的不平等非常困难。

最后，俄罗斯必须征税。对俄罗斯占支配地位的自然资源业务进行征税应该说最容易。原则上讲，由于自然资源部门的收益和产出非常容易监控，所以对其征税应该比较容易。俄罗斯必须让它的企业认识到，如果不及时纳税，也就是说在 60 天内还没有缴纳，就将没收它们的财产。如果企业没有缴税，而且政府也没收了它们的财产，那么就能够对其进行私有化，这种方式比叶利钦时期采用的那种不可信的贷款换股方式更合法。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纳了税，俄罗斯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来处理其他一些重要而突出的问题。

就像谁欠税必须由谁来缴纳一样，谁欠银行的钱——尤其是那些由于不负责任而且目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银行——就必须由谁来偿还。这种重新收归国有是在更合法的私有化之后进行的，因此就会更有效。

当然，要想使这项议程成功，必定要存在一定的基础：即要具备一个致力于改善公共福利的、相对诚实的政府。西方国家应该认识到，在这方面我们能做的事情相对较少。克林顿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傲慢的家伙们认为，他们能够“选择”一些支持者，于是推动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为俄罗斯指引新的未来，但结果表明：由那些对这个国家了解甚少的家伙们进行的傲慢尝试，利用狭窄的经济学概念来改变历史的进程，注定要失败。我们可以支持作为民主支柱的公共机构——建立思想库，为公共对话创造空间，支持独立

的媒体，帮助教育新一代使其了解民主是如何运作的。在国家、区域和省级层次，有很多年轻的政府官员，他们非常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而且他们具备广泛的支撑基础使结果变得不同——比如知识和金融。如果说对中产阶级的破坏代表着对俄罗斯的长期威胁，那么，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纠正已经造成的破坏，但至少我们能够做些事情阻止对中产阶级的进一步侵蚀。

乔治·索罗斯已经表明，个人提供的援助也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很明显，如果能够很好地加以引导，西方国家可能会做出更多的努力。就像我们建设更广泛的民主交流一样，我们应该与那些既和过去的权力结构又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新兴起的权力机构结盟的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在实力政治允许的范围内要这样做。其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应该对俄罗斯有所伤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就对俄罗斯造成伤害。不仅是它们提供的贷款，随后制定的政策也使俄罗斯负债累累、财力枯竭，而且维持较高的汇率水平抑制了其经济发展；它们也打算维护现有的权力群体，但该群体的腐败显而易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对这个国家政治生活蓄谋已久的干预。可以确定的是，它们阻止进一步改革的议程，而该议程超越了创建市场经济那特定、狭窄的视野，是创建充满活力的民主。就像我在1998年贷款会议中提出的观点一样，今天看来我的结论依然是正确的：如果俄罗斯这个石油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行动一致，它就不需要这些贷款；但如果不能的话，这些钱对它们来说作用不大。俄罗斯所需的不是资金，而是其他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够给予的东西，但是它要求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方案。

民主的责任与失败

我曾对俄罗斯的转型比较悲观：大面积的贫困，少数的寡头政治执政者，挫败的中产阶级，逐渐减少的人口以及市场进程的幻灭。应该用取得的一些成就对此控诉加以平衡。虽然俄罗斯现在的民主很脆弱，但远比过去极权主义时要好。在俄罗斯，虽然大量的媒体被俘虏——以前，有很多媒体都被少数寡头

政治执政者控制；目前，很多媒体都受国家控制——但媒体依然代表各方的观点，其范围比过去国家控制下要宽泛得多。那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充满干劲的企业家，他们承诺在将来要建立更具有活力的私人部门，但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力求向西方移民，而不是留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维埃共和国去面对做生意的困难。

最后，俄罗斯及其领导人必须对俄罗斯最近的历史及其命运负责。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人，至少是少量的精英们造成他们国家目前的困境。俄罗斯人做出了一项关键的决定——比如贷款换股私有化。可以证明，俄罗斯人对西方机构的了解要远远深于西方人对俄罗斯的了解。高级政府官员，像安纳托利·丘拜斯[⊖]，已经公开承认俄罗斯怎样误导（更为严重地说是欺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资金。但是，我们这些西方人以及领导人，并没有保持中立，而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情愿受误导，因为它希望相信自己的方案是有效的，因为它希望继续贷款，希望相信它正在对俄罗斯进行重建。同时，我们确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俄罗斯的方针也有些影响：我们认可了当权者的行为。我们西方人看起来情愿和他们打交道——提供数目巨大的数十亿美元——给他们信用；其他可能不会得到这样支持的人明显会认为这对他们不利。我们对贷款换股方案的默许可能已经压制了批评；毕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转型专家；它已经尽可能地促进快速私有化，对于贷款换股计划也要快速进行。这就是说根本就不关心腐败这一问题。支持、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十亿美元——可能不仅使制定腐败政策的腐败政府依然掌权，而且可能减少了进行更重要改革的压力。

我们将赌注押在支持领导人身上，并且推动了特殊的转型战略。有些领导人已经被证明是不胜任的，有些人走向腐败，还有些人二者兼有。这些政策被

⊖ Anatoly Chubais，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现任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译者注

⊜ 当丘拜斯被问及俄罗斯政府是否有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隐瞒俄罗斯的真实财政状况时，他坦率地说："在这种状况下，当局者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金融机构明白，我们除了从它们那里骗出200亿美元，并没有别的办法"。见 R. C. Paddock，"叶利钦的副手说俄罗斯骗贷"，《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9日。

证明是错误的，有些政策是腐败的，同样还有些政策二者兼有。这样，再提及政策是正确的，仅仅是因为没有被很好地执行，就显得毫无意义。不应该在理想的世界中预测政策，而应该在现实世界中预测它们。设计政策时，不应该依据它们如何在理想世界中充分实施来进行，而应该将它们置于现实生活中加以考虑。主观判断并不是为了追求更有希望的替代战略。如今，正像俄罗斯开始要求其领导人对其决策的后果负责一样，我们也应该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对其政策负责。

第 8 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议程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远不算成功，这就出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的方式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看待自己的目标，以及作为它的部分功能和使命，它如何争取实现这些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信它正在履行赋予它的任务：维护全球稳定，不仅帮助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而且还帮助它们实现增长。直到最近，它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关注贫困问题——这是世界银行的义务——但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也开始考虑该问题，至少它这样说了。我相信，在履行该使命过程中，它已经失败了，这些失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它对其使命理解的必然结果。

多年前，通用汽车公司的前总裁和国防部长查尔斯 E. 威尔逊[⊖]有句著名的名言："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就对美国有利"，该名言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独特观点的象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似乎具有相似的观点——"对全球经济有利的金融界的观点就对全球经济有利，而且应该被采纳"。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正确的；但在更多情况下，并非如此。在某些案例中，金融界认为符合它自己利益的东西实际上并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因为流行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将如何最好地处理经济问题的清晰思路弄得模糊不清。

⊖ 1941 ~ 1953 年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是通用汽车第二任总裁；1953 ~ 1957 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缺乏知识一致性：从凯恩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凯恩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知识之父）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作用的观点中，存在必然的一致性。凯恩斯界定了市场失灵——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市场单独行事的原因之一——可能会从集体行动中获益。他认为市场可能造成持久的失业。他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需要全球一致行动，因为一个国家的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的进口就是其他国家的出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国家的进口减少都将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经济。

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市场失灵：他担心在衰退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将会无效，但是一些国家可能不能通过贷款来支持支出的增加或者补偿税收的减少，这些都是刺激经济所必需的。即使一个国家看起来很有信用，它可能也不能够获得资金。凯恩斯不仅界定了一系列市场失灵，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能够改善这些问题：通过向国家施加压力而将经济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当国家面临衰退且无力支付政府支出的扩张性增长时，通过为这些国家提供流动性来维持全球总需求。

如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相信市场基本上能够很好地运行，而且政府基本上运行得很糟糕。我们面临明显的问题：一个为了处理特定市场失灵而建立的公共机构，目前却被经济学家们来运作，而这些经济学家对市场具有较高的信心，却对公共机构的信心极低。通过对过去30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观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矛盾显得尤其麻烦。

经济学专业已经开发了系统性方法来解释政府行为的市场失灵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市场可能不会运转良好，为什么必须要一致行动。在国际层面，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单个政府不能很好地为全球经济福利服务，并解释了全球一致行动（由政府一起工作涉及的行动，它通常是通过国际组织形成的）为何能够改善某些事情。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提供国际政策一致性的观点，不仅需要确定一些重要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市场可能无效），

而且要分析这些特别政策如何能够扭转或最小化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伤害。应该再进一步说明这些特别的干预为何是应对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在失灵出现之前就处理这些问题，并在市场失灵出现时对其进行修复。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凯恩斯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他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可能不会充分地追求扩张性的政策——它们可能不会考虑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初的理念中，试图要给予这些国家国际压力以实施比它们自己选择的更为扩张的政策。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了这一方针，它给予这些国家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但要求它们实施比它们自己选择的更为紧缩的政策。根据我的判断，虽然这种做法看起来拒绝了凯恩斯的观点，但如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清楚地表达市场失灵的一致性理论，该理论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为其对市场进行的特别干预提供了基本原理。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常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政策除了加深它们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外，还允许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新汇率机制的新作用

大约 30 年前，世界转向灵活的汇率体系。在此转变背后存在一致性理论：汇率，就像其他价格一样，应该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政府对汇率决定的干预与对其他任何价格决定的干预一样，都不会成功。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实施了大量的干预。花费数十亿美元试图将巴西和俄罗斯的汇率维持在不可能维持的水平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干预是因为有时候市场表现得过度悲观——它们“有些过头了”——因此，国际机构更镇定的手能够有助于稳定市场。这令我非常震惊：信奉市场能够有效运转（如果不够充分）这一教条主义的机构竟然决定汇率市场需要如此大幅度的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都没有对其行为提供很充分的解释，不仅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一特殊市场进行这么昂贵的干预是值得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其他市场它是毫无价值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市场可能会表现得过于悲观，我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也相信市场有时候表现得过于乐观，这不仅是在汇率市场才会出现的问

题。市场存在更多的不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这就要求一系列更广泛的干预。

比如，正是因为过度的繁荣导致了泰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投机性热钱流入该国，如果说不是制造了该泡沫，至少是吹大了它。当资金流动转向时，繁荣之后就出现了过度的悲观。实际上，投机性资本流动方向的变化是汇率过度波动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现象能够与疾病相比的话，那么，治疗疾病比仅仅治疗这种表现——汇率的波动性更有意义。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使得投机性热钱更容易流入和流出某个国家。通过向市场注入数十亿美元来直接治疗症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使潜在的疾病更加严重。如果投机者撤离他们的资金只是个体行为，这将会是一场不引人注意的博弈——高风险的行为，其平均收益为零，因为某些人的收益正好等于其他人的损失。使投机者获利的资金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政府的资金。比如，1998 年下半年，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西政府动用500 亿美元将巴西的货币汇率维持在高估的水平上时，这些钱哪儿去了？这笔钱并没有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而是进入了某些人的口袋——大部分进入了投机者的口袋。一些投机者可能是赢家，一些可能是输家，但作为一个整体，投机者的获益正好等于政府的损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投机者有机会套利。

蔓延

这里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政策时缺乏一致性和适度的完整性，正是这些政策加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试图解决的问题。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对这些“蔓延”进行隔离时，必须要考虑发生了什么。本质上，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某个正在发生的危机将会蔓延到其他国家，也就是说，该危机能够像传染病那样传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认为它必须要进行干预，而且要很快地进行干预。

如果蔓延是个问题，理解蔓延机制的运作非常重要，通过这种机制，蔓延就会发生，就像流行病学家那样，尽最大的努力控制这一传染病，尽最大的努力来解释它的传播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一个一致性理论，一个国家的衰退导致

该国进口减少，这就会伤害到它的邻国。在谈到蔓延的问题时，我们在第 4 章看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行动的，正是这次危机实实在在地加速了该疾病的传播，因为它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勒紧裤腰带[⊖]。收入的减少很快造成进口的大量减少，而且在紧密的区域一体化经济中，进口的大量减少导致它的邻国逐渐变得虚弱。随着区域内部经济的突然崩塌，对石油和其他商品需求的下降导致其价格的下降，进而对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出口这些产品。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将财政节俭作为解毒剂[⊖]，宣称这是恢复投资信心的根本。东亚危机是通过石油价格的崩溃传导到俄罗斯的，而不是通过东亚奇迹经济体中部分投资者（外国和国内的）的信心和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之间的神秘联系传导的。因为缺乏一致的和具有说服力的蔓延理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传播了而不是控制了疾病。

贸易赤字什么时候会成为问题

一致性的难题不仅困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疗法，而且困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诊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担心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赤字问题，在它们的微积分学中，这是即将发生问题的明显标志。但是，在抱怨这些赤字时，它们常常很少注意这些资金到底用来做了什么？如果一个政府存在财政盈余（1997 年危机前很多年泰国都存在财政盈余），那么，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赤字本质上是因为私人投资超过私人储蓄。如果某个私有部门的企业按照 5% 的利率贷款 100 万美元，并将其投资到某个行业，产出利润为 20%，那么对该企业来说，这 100 万美元贷款并不是问题，投资收益足够偿还这笔借贷。当然，即使该企业在判断上存在失误，其收益率仅为 3% 或者甚至是零，也不存在多大问题。借贷者会陷入破产，债权人损失了部分贷款。这对债权人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对这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并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

⊖ 即采取紧缩性政策。——译者注

⊖ 矫正方法。——译者注

一致性方法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它也意识到，如果一些国家的进口大于出口（即存在贸易赤字），那么，其他的国家一定是出口大于进口（即存在贸易盈余）。这是国际会计中无法打破的法则，即世界上所有赤字的总和一定等于所有盈余的总和。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和日本坚持保持贸易盈余，那么其他国家一定是贸易赤字。我们不能够仅抨击那些贸易赤字的国家，贸易盈余的国家也同样有错。如果日本和中国保持它们的贸易盈余，而且韩国也将贸易赤字转变为盈余，那么，赤字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在其他国家。

大量的贸易赤字依然是个问题。说其是问题是因为，它暗示着某个国家不得不年年借贷。并且，如果那些提供资本的国家改变了想法，停止进行借贷，那么，该国将处于巨大的麻烦之中——危机。相对于向国外销售货物来说，它需要花费更多的钱来从国外购买货物。当其他国家拒绝继续支持贸易缺口时，该国将不得不尽快调整。在少数情况下，该调整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如果该国严重借贷只是为狂购小汽车而融资（这是最近发生在爱尔兰的事情），那么，外国人拒绝为购买汽车提供融资，该狂购就会停止，贸易缺口就被关闭。但更多的情况是，该调整并不会那么平静地进行。如果某个国家是进行短期借贷，这样，债权人就可以要求现在撤回它们已经贷出的用以支持前几年赤字的资金，这时，不管这些资金是用来刺激消费还是进行长期投资，问题都会更严重。

破产和道德风险

当调整不能够很平静地进行时，经常就会出现危机。但危机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正像在泰国发生的那样。那些从国外借贷进行房地产投机的人不能够偿还贷款，破产就会很普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处理破产表明还有另外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因为知识的前后不一致而受到困扰。

在标准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某个放贷者进行了一项糟糕的贷款，它应该承担后果。贷款人很可能陷入破产，但国家有法律规定应该如何解决此类的破产。这就是市场经济假定的工作方式。我再次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政府

提供贷款的方案的确是对西方债权人进行救援。这些债权人预计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因此削弱了保证借款人能够偿还贷款的动机。这就是保险业中声名狼藉的道德风险问题，现在，在经济学中也出现了。保险降低了你谨慎行动的动机。危急事件中的救援行动就像是“免费”的保险。如果你是出借人，当你知道如果这批贷款不能偿还时就会出现救援行动，那么你就不会很谨慎地来筛选你的申请者。与此类似，在面临汇率波动时，谨慎的企业确信可以应对。但在某个国家的借款人没有购买保险来抑制该风险的情况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阻止货币贬值，那么就是鼓励借款人招惹风险——而且没有任何担忧。在1998年俄罗斯的卢布危机中，道德风险问题尤其明显。当华尔街债权人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时，他们得知，鉴于俄罗斯的核地位，俄罗斯需要多大的救援就会有多大的支持行动，而他们也相信俄罗斯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援。

在只关注这些症状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表示，如果没有它，俄罗斯将无法偿还贷款，而俄罗斯也不会取得信用，并通过这种表示来为自己的干预行为开脱。一致性的方法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争论中的谬论。如果资本市场能够很好地运作——确切地说，如果资本市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有效——那么，他们是有远见的；在评估适用什么利率时，他们就会看到即将发生的风险。一个已经摆脱了沉重债务的国家（即使是通过违约的形式），也会处于一个更好的增长环境中，而且因此能够偿还任何额外的借款。这就是第一步要进行破产处理的部分原理：债务清偿或重组有助于企业——和国家——前进和增长。18世纪的债务人监狱可能为个人不愿意陷入破产提供了强大的动机，但是它们不会帮助债务人偿清债务。这种做法不仅残忍，而且也没有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

历史支持该理论分析。在最近俄罗斯的案例中，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情况很严重，并因此而遭受广泛的批评。到2001年，俄罗斯能够从市场上获得贷款，资本也开始流回到该国。同样，即使韩国有效地强制实施债务重组，给外国债权人机会是选择滚动贷款还是选择贷款得不到偿还，资金也会向韩国回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设计出一致性的模型，考虑它如何处理东亚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否在危急期间提高利率。当然，提高利率将会迫使成千上万家企业陷入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论点是，不提高利率将会导致汇率崩溃，汇率崩溃将会导致更多的破产。暂且不论提高利率（结果是加深了衰退）是否会实现坚挺的汇率（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样）这个问题；也不论是否会有更多的企业因为提高利率或者汇率下降而造成伤害（至少泰国的事实强烈地表明，汇率进一步下降造成的损害更小）。追根溯源，汇率贬值造成经济中断的问题是由企业造成的，这些企业选择不购买保险以应对汇率崩溃。对该问题进行的一致性分析首先要询问为什么会出现表面上的市场失灵——为什么企业不购买保险。而且，任何分析都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本身就有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干预汇率使一些企业没有必要购买保险，因此加深了未来干预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

从救援到“参与”救援（Bail-i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它在寻求新的战略，但由于缺乏一致性，在探索可行的替代战略方面，它成功的机会必定很小。对它实施救援战略的过度批评导致它试图采取所谓的“Bail-in”战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私人部门机构“参与”到任何一次救援行动中。它开始坚持，在它向某个国家贷款进行救援行动前，私有部门借贷者需要广泛地“参与”；它们必须对欠款加以削减，豁免欠债的实质部分。毫不奇怪，这一新战略最先不是在巴西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尝试，而是在厄瓜多尔和罗马尼亚这些毫无权力的国家来试验，因为它们太弱小了，它们无力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战略很快被证明在观念上是有问题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有瑕疵的，对实践目标国家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罗马尼亚的例子尤其令人迷惑。它并不存在违约的威胁，它只希望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得到新资金来证明它是有信用的，这将有助于降低它支付的利率水平。但新的出借人只有在获得与面临的风险相对应的利率水平时才提供新的贷款。不能强迫这些新出借人采取“削减”措施。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按照资本市场良好运转这一一致性的理论来制定政策，它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这里存在更严重的问题，它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使命。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处理由信贷市场偶然的不理性所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它拒绝向那些实际上有信用的国家出借资金。而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将其借贷政策的权力移交给那些导致危机的个人和机构。只有当他们愿意对外贷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对外放贷。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发现，这些出借人也很快会发现该变化的深层含义。如果出借者拒绝向客户国家提供贷款或者不赞同解决方案，那么，这些贷款国家就不能够获得资金——不仅是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也包括世界银行和其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令暂时提供贷款的机构的资金。这些债权人具备巨大的杠杆效应。在布加勒斯特[⊖]的国际私人银行中，一位28岁的小伙子只提供几百万美元的贷款，就有权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是否向罗马尼亚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评估是否向罗马尼亚贷款的责任委派给这位28岁的小伙子。毫不奇怪，这位小伙子，以及在布加勒斯特其他国际银行分行的30岁和35岁银行家们很快抓住了赋予他们的谈判权力。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次要求降低私人银行提供的贷款数额时，私人银行就会降低它们愿意提供的贷款数额。有一次，只要罗马尼亚能够获得3 600万美元的私人部门的短期贷款，它就能够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贷款。私人银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的资金集中起来，不仅提出高位美元（高利率）的要求，至少在罗马尼亚的案例中，还提出要罗马尼亚谨慎地放松规制。这种“规制抑制”允许债权人做他们能够做而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提供更多的贷款，或者创造更具风险的、更高利率的贷款——来提高他们的利润，但却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破坏了规制的真正初衷。不能胜任的、更腐败的政府可能会受到诱惑，但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接受该出价，部分是因为它并不是真正需要这笔资金。

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某个国家如何解

⊖ 罗马尼亚首都。——译者注

决其宏观经济问题来决定是否提供贷款。在“参与”战略下，虽然某个国家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可能都令人满意，但是，如果它不能从私有银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为的贷款的话，它可能就不能获得任何其他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有这些方面问题的专家，而不是布加勒斯特那个28岁的银行职员。

最终，至少在罗马尼亚的案例中，甚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该战略的失败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私人部门并没有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的资金数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继续向该国提供资金。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各方要求其缩小管辖范围时，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扩大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能成功利用它所拥有的权力，这个增加权力的提议相当大胆。该提议基于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类比：在国家内部，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它向那些“有偿付能力但没有流动性”的银行提供贷款，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净资产为正值，但它却不能从其他任何地方获得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各国发挥相同的作用。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市场存在一致性的观点，那么它很快就会发现这一想法的缺陷。[1] 在完全市场理论中，如果某个企业是有偿付能力的，它应该能从市场上借得资金；任何一个企业如果是有偿付能力的必定是有流动性的。通常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看似存在这样的信念，即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比市场更好地判断汇率应处于什么水平，因此，也能够比市场更好地判断某个需要贷款的国家是否有信用。

我不相信资本市场能够完全有效地运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认为市场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认为的那样有效，但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时，我认为市场看起来稍微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的更“理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借资金存在一定的优势；通常，它只在资本市场拒绝提供资金时才出借资金。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该国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

“便宜”的资金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出娄子了，并且违约已经若隐若现，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第一债权人。它将首先得到偿付——即在其他债权人，比方说外国债权人没有得到偿还的情况下，首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进行偿还。这样，其他债权人只能得到剩下的东西，他们也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因此，理性的私人部门金融机构会一直坚持风险补偿——更高的利率水平用以弥补他们得不到偿付的可能性。如果某个国家的资金更多地流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就只有少数的资金偿还给私有部门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债权人将会要求一个补偿性的、更高的利率。资本市场的一致性理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地考虑这个问题——并使它更不愿意贷出一揽子救援中的数十亿美元。市场更为一致性的理论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时期更努力地寻找可替代的战略，比如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的那些战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议程

缺乏一致性造成很多问题，这一事实可能并不令人惊讶。问题是，为什么会缺乏一致性？即使这些问题很明显了，为什么在一个个议题中还继续存在？部分原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世界是复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是很实际的人，他们力求尽快做出艰难的决定，而不是像学术界那样平静地去追求知识一致性和连贯性。但是，我认为还存在更根本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追求其原始使命中规定的目标（维护全球稳定），而且还要保证那些国家在面临衰退的威胁时，提供追求扩张性政策需要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追求金融界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它的既定目标经常会相互矛盾。

因为不能公开这一矛盾，所以压力更大：如果要公开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作用，那么，就可能会削弱对该组织的支持；几乎可以确定，那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进行有效改进的人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将其新的使命遮盖起来，至少在表面上使其看起来和以前的使命一致。过分简单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提供了门帘，在门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对“新”的使

命进行交易。虽然它的使命和目标的改变可能非常平静，但却并不神秘：从服务于全球经济利益转向服务于全球金融界利益。

我很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都没有正式地改变它的使命，也没有将金融界的利益置于全球经济稳定或者贫穷国家福利之上。我们不能够过多地谈论任何一个机构的动机和意图，只能考察构建和管理该结构的那些人的动机和意图。尽管这样，我们时常不能确定他们的真实动机——他们说的与他们的真实动机之间存在差距。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试图根据机构的表现来描述它的行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像它在追求金融界的利益，这就为我们理解其他看似矛盾和知识不一致的行为提供了方法。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应该没什么出人意料的：它从金融界的视角和意识形态来处理问题，这很自然地与它的利益紧密地（即使不是完全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核心职员都来自金融界，而且他们在退休后都能在金融界获得一份待遇很好的工作。在现代民主中，存在许多像这样的“旋转门”的利害关系，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官员很快从政府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原因很明显，这些企业能够从政府服务或者合同中获利；或者受政府规制影响。公民担心，由于受到诱惑，政府官员会对其未来潜在的雇主尤其好，即使不存在明显的实物交易，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做来提高对未来的预期。经济学家——和普通公民——相信动机这一问题。如果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行为怎能不受影响，即使影响是很细微的。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大部分民主政治已经强制限制这种旋转门，但是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有可能阻止一些很有天赋的人为公共利益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此地忽视民主责任以至于它根本没有权衡其轻重，它更多地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银行，从其救援行动中获取利益也是意料之中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至少是它的很多高级官员和雇员）相信资本市场自由化可实现发展中国家更快的增长，它是如此强烈地相信这一点以至于它不相信任何与之相反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都不希望伤害穷人，并且相信它提倡的政策最终会使穷人受益；它信赖涓滴经济学，不希望看到可能表明相反观点的证据。它相信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有助于贫穷国家实现增长，因

此，它相信将资本市场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是首要的。

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就更容易理解它为什么强调外国债权人得到偿还而不是帮助国内商业保持运营。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不会为7国集团买单，但很明显它是在努力工作（虽然不是经常都成功）以确保7国集团的出借者能够得到偿还。正如我们在第4章看到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大面积干预，存在替代政策，该替代政策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且从长期来看对全球稳定也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已经简化了测验程序；可能正试图策划一项停滞（暂时中止支付），以给予这些国家——和他们的企业——时间来赔偿和重新开始它们已经停滞的经济。它可能已经试图设置一个加速的破产程序[2]。但破产和停滞并不是受欢迎的选项，因为它们意味着债权人将不能得到偿付。这些贷款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抵押的，因此，在破产的情况下，很少能够索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撕碎合同的违约会破坏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在很多方面它们都错了。破产是每个信贷合同中不成文的部分；如果债务人不能对债权人进行偿还，法律规定了应该如何处理。因为破产是信贷合同的隐含部分，所以，破产并不会破坏信贷合同的“尊严”。但这里存在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不成文的契约，即公民和他们的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有时被称为“社会契约”。该契约要求基本的社会和经济保护条款，包括合理的就业机会。为了维护所谓的信贷合同的“尊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愿意撕碎更为重要的社会契约。最终，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破坏了市场，同时也破坏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它强迫世界各国接受的战略遭到如此的敌意。它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被用来在短期内将汇率维持在不可能持续的水平上，在此期间，外国人和富人能够将其资金以更优惠的条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该国开放资本市场）带出该国。对于每一卢布、每一卢比、每一克鲁赛罗来说，只要汇率保持不变，它们就能够在该国获得更多的美元。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又常被用来偿还外国债权人，即使这些债务是私人的。在很多情况下，私有债务实际上被国有化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国和欧洲的债权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非常高兴向泰国和韩国银行以及商人贷出的贷款得到偿还，至少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还得到了偿还。但是，泰国和韩国其他的纳税人就不那么高兴了，他们所缴纳的税金被用来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不管他们是否从这批贷款中获益。凌辱加上伤害，在数十亿美元被用来将汇率维持在不可能持续的水平和对外国债权人进行救援时，在他们的政府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而削减支出后，接下来这些国家就要面对衰退，数百万工人失去工作，当需要找到适度的资金来为穷人支付食物和燃料补贴时，周围已经没有资金了。难怪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愤恨如此之多。

如果我们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做是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追求政策的机构，那么它的其他政策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在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贸易赤字问题的关注。危机之后，对东亚国家强制实施大幅度的紧缩性政策，导致这些国家的进口快速下降和大范围的储备重建。就机构担心对债权人进行偿还的能力这个视角看，这的确很有意义：如果没有储备，那么这些国家将无法偿还它们和它们国家的企业所欠下的美元贷款。但是，如果更多地关注全球稳定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问题，我们就会采取更为宽松的方法来对储备进行重建；与此同时，制定其他政策使这些国家免受国际投机者反复无常的行为的影响。1997 年，泰国用外汇储备来与投机者做斗争，并耗尽了它的外汇储备。一旦决定了泰国需要尽快重建外汇储备，那么，泰国就必然会面临更深的衰退。正如我们在第 4 章看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作自受的政策已经代替了大萧条时期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使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得更糟。从债权人的视角看，这些政策有时有效，而且见效非常快：在韩国，外汇储备从基本是零到 2001 年 7 月几乎达到 970 亿美元；在泰国，从本质上的负值增加到 2001 年 7 月的 310 亿美元。当然，对债权人来说，这些都是好消息；他们现在确认韩国有美元来偿还任何贷款，而这正是债权人要求的。

我宁愿采取对债务人的关注更富有同情心的战略，而更少地关注债权人的利益。我会说，在经济走入正轨之前，维持经济运转和推迟几年建立储备更重要。我已经设计出其他的维持短期稳定性的方法——除了前面已经提出的停止

（偿付）和破产等方法外，还包括马来西亚已经使用的短期资本控制和“出口税”。有办法来保护一个国家，以免它受投机者、短期贷款者或投资者突然改变他们的观点所造成的伤害。没有哪个政策的出现是无风险或不付任何代价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虽然这些替代战略强制提高了债权人的成本，但却降低了那些身陷危机国家的人们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捍卫者指出，债权人的确已经付出了某些代价。很多贷款并没有完全得到偿还。但是，这一观点在两方面出现失误：首先，这些对债权人友好的政策试图降低原本可能会发生的损失。他们并没有设计全面的救援，而是部分的救援；他们并没有制止汇率下降，而是试图阻止它进一步下降。其次，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算要做的事情，它常常是不成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将紧缩性政策推行得太远，以至于到最后，债权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更广泛的是，无论是从全球经济的利益来看，还是从金融市场的利益来看，全球金融稳定都可以得到证明；然而，几乎可以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很多政策——从资本市场自由化到大面积的救援——都造成了全球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关注和反映金融界的利益，该事实也有助于解释它的一些防卫言辞。东亚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很快注意到对向这些国家借贷问题的责备，尤其是对于它们缺乏透明度的责备。即使是这样，很明显，缺乏透明度并不会导致危机，而且透明度也不会使某个国家对危机具有免疫功能。在东亚危机前，最近的金融危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瑞典、挪威和芬兰等国出现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它们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几个国家。有很多国家，它们的透明度远不如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但是，在这些国家确实不存在危机。如果透明度对经济之谜[⊖]很关键，那么，东亚国家应该较早就出现更多的危机了，因为数据表明，它们的透明度正在不断提高，而不是在降低。尽管它声称东亚在透明度方面是失败的，但东亚不仅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而且还表现得非常稳定。如果东亚国家正如国际货

⊖ 认为经济是一个谜，很难捉摸。——译者注

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所宣称的那样“非常脆弱”（这也是新发现的弱点），那么它不是因为越来越缺乏透明度，而是缘于其他熟知的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国家强制施加的、早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

在对此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至于为什么要关注“透明度”，有一个“透明的”原因。[3] 它为金融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转移责备提供了借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东亚、俄罗斯以及其他任何地方强制推行的政策都受到责备：资本市场自由化导致不稳定的投机行为，金融市场自由化导致了糟糕的贷款实践。由于它们的复苏方案没能如同它们宣称的那样有效，它们就有借口试图解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方案，而是处于困境中的国家的其他问题。

然而，通过更近距离的详细审查，我们发现，工业化国家在其他方面也感到困惑；比如，日本虚弱的银行规制可能为银行提供了向泰国借贷的动机，这样的利率非常具有吸引力，借入者无法抵制比谨慎情况下获得更多贷款的诱惑。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银行规制政策也鼓励不理智的借贷——该银行规制允许将短期贷款视为比长期贷款更安全的贷款行为。这就鼓励了短期借贷，而短期贷款就是东亚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

主要的投资企业也希望为它们的咨询者们开脱，这些咨询者鼓励他们的客户将其资金投入到东亚国家。在美国政府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的完全支持下，从法兰克福到伦敦到米兰的投资咨询家都声称，因为东亚国家缺乏透明度，他们没有办法预先知道事情实际上会有多糟。这些专家很自然地回避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完全开放和透明的市场中，在完全信息下，收益率很低。亚洲曾经能够吸引投资——它创造了高回报——正好是因为它更具有风险。咨询家们觉得他们有更充分的信息——结合他们的客户对高收益的渴求——将资金驱赶到该地区。韩国的高负债、泰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房地产泡沫不可避免地要破裂，还有苏哈托的腐败等，这些核心问题都是路人皆知的，早应该向投资者披露这些问题的风险。

国际银行也发现转移批评很容易。它们希望责备借款人以及泰国和韩国银行糟糕的借贷实践，断言这些银行在它们国家的腐败、政府的纵容下发放了许

多呆账——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再一次加入到这一攻击中。从一开始，人们就应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观点表示怀疑。尽管它们试图为国际出借者开脱，但严峻的事实是每项贷款都有借入者和出借者。如果贷款天生都是不良的，那么出借人和借入者一样存在过错。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正向大量的韩国企业贷款，它们完全知道很多韩国企业是如何发挥杠杆作用的。坏账是糟糕的，这种结果不是来自美国或者西方政府的压力，更何况西方银行宣称它们具有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毫无疑问，这些大银行希望将详细审查从它们自己身上转移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很好的理由支持它们，因为它本身也有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别处的再一次救援导致了部分借贷者缺乏应有的审慎。

此外，还有更为危险的深层次问题。美国财政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已经宣布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它已经告诉各国遵循“正确的政策”——华盛顿共识政策——这些政策将会保证各国的增长。东亚危机开始怀疑这一新的世界观点——除非能够证明这一问题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而是缘于亚洲国家和这些国家糟糕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必须承认，该问题不是因为改革——实施资本市场自由化这一首要的神圣信条——而是因为这些改革没有得到充分地执行。通过关注这些危机国家的弱点，它们不仅转移了自己的失败——既包括政策失败也包括借贷失败，而且还试图利用经验进一步推行它们的议程。

第9章

未来之路

如今，全球化并没有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服务，也没有为环境服务，更没有为全球经济稳定服务。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如此难以管理，以至于除了中国、越南还有少数东欧国家外，随着收入的突然下降，贫困飞速飙升。

对有些人来说，答案很简单：抛弃全球化。这既不可行也不值得。正如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东亚的成功正是缘于全球化，尤其是贸易机会及市场和技术准入的增加。就像更活跃的全球文明社会为更民主和更大程度的社会公正而战一样，全球化也提高了全球的健康水平。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全球化。部分问题也在于国际经济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机构帮助建立了博弈规则。通常情况下，它们这样做是为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和这些国家的特殊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服务。但它们不只是为这些利益服务，时常，它们也以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视角所形成的特定的狭隘观点来处理全球化问题。

很明显，国际经济机构需要进行改革——从国会任命的代表和基金会支持的显赫的经济学家们所撰写的关于全球金融体系结构的改变，到几乎每次国际会议标志性的抗议活动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作为回应，目前已经做了一些改变。新一轮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的多哈启动，该轮谈判被称为“发展回合”，它不仅试图进一步开放市场，而且也试图对过去的一些不公平进行修正，在多哈进行的争论比过去要公开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变了它们的言辞——它们更多地谈论贫困问题，至少世界银行在针对很多国

家的方案中，试图真诚地履行它的承诺——“将国家放到驾驶员的座位上”。但是，国际机构的很多批评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只是简单地将这些改变视为这些机构在面对政治现实时，如果想继续生存下来就必须进行的变革。这些批评家怀疑是否存在真正的承诺。200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命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某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在他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世界银行采取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直到这时，这些批评家根本都还没有恢复信心。有些批评家对这些改革是如此怀疑，以至于他们继续号召更极端的行为，比如抛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抛弃了，它必定以其他的形式重建。在国际危机时期，政府领导人希望有人出来管理，而这正是国际机构应该做的事。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了该作用。

我相信全球化能够被改造以更好地发挥它的潜能，我也相信，国际经济机构能够按照有利于保证该目标实现的方式被改造。但为了明晰这些机构应该如何改造，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失败，而且有时候还败得如此惨烈。

利益与意识形态

在第 8 章，通过审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我们发现该组织好像是在追求金融市场的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履行其最初的使命：帮助深陷危机的国家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我们也会理解货币基金组织其他一系列看似知识不一致和不连贯的政策。

如果金融利益支配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思想，那么商业利益就会相同地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起作用。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忽视对穷人的关注一样——可以获得数十亿美元对银行进行救援，但却没有少量数额的资金来为那些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所造成的大量失业工人提供食物补贴——世界贸易组织也会将贸易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环境学家试图限制某些货物的进口，这些货物是利用破坏环境的技术制造的——用网杀死濒临灭绝的物种，或者对环境造成

污染的发电机发电等；但这些环境学家被告知不允许这样做，因为这是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

虽然这些机构看起来首先是要追求商业利益和金融利益，但它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它们确实相信它们正在从事的议程考虑到了总体利益。尽管存在相反的事实，但很多贸易和财政部长们，甚至是那些政治领导人，都相信每个人最终会从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中获益。很多人对此如此强烈地相信，以至于他们通过能采取的各种方式强迫这些国家接受“改革”，即使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

最大的挑战不只是机构本身，而且还在于思维方式：如果要保证全球化潜在的利益能够被实现，关注环保、保证穷人对影响他们的决策有自己的发言权、促进民主和公平贸易都是必要的。问题是，这些机构已经开始体现出其负责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典型的是：中央银行行长担忧的是通货膨胀的统计，而不是贫困的统计；贸易部长担心的是出口数据，而不是环境指数。

世界是个复杂的地方。社会中的每个群体都关注对它影响最大的那部分。工人们担心工作和工资；金融家担心利率和偿付。如果债权人能够被偿还，高利率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是工人们认为高利率造成经济衰退；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失业。难怪他们将高利率视为危险。对那些能够将其资金进行长期借贷的金融家来说，真正的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他们得到偿还的美元的价值要低于其借出的美元的价值。

在公共政策讨论中，很少人公开地为自己的利益而争论。每件事情都是根据总体利益来表达。需要用一个模型来评估某项特别的政策如何影响总体利益，需要对整个体系如何工作进行审视。亚当·斯密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模型，该模型支持市场；卡尔·马克思知道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看起来对工人们具有不利的影响，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模型。马克思的模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些国家中的数十亿穷苦百姓来说，资本主义看起来并没有兑现它的承诺。随着苏联的解体，全球经济中美国占据支配地位，市场模型开始流行。

这里并不止一个市场模型。日本的市场体系版本与德国、瑞典及美国的市

场版本存在明显的不同。有很多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与美国相比，但是在这些国家中不平等程度较低、贫困更少，而且健康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标准更高（至少，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市场处于瑞典和美国资本主义版本的中心，但政府发挥的作用大大不同。在瑞典，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它持续提供比美国更好的公共福利、更好的失业保险、更好的退休福利。至今，它在各个方面都很成功，甚至在与“新经济”联系的创新方面也是如此。对很多（但不是全部）美国人来说，美国模式运行得很好；对大部分瑞典人来说，美国模式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模式也能很好地为其服务。对亚洲人来说，亚洲模式的多样性运行得很好，即便考虑全球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和韩国以及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来说，都是如此。

在过去50年时间内，经济科学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市场能够很好地运行，以及什么时候它们不能很好地运行。这已经说明为什么市场有可能导致某些东西供不应求——比如基础研究——而其他的却生产过剩——比如污染。最具戏剧性的市场失灵就是周期性的低迷、衰退和萧条，这在过去200年来就已经对资本主义造成伤害，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也造成大部分资本存量未被充分利用。虽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市场失灵的例子，但也存在无数更为隐性的失灵，这些例子中，市场不能够产生有效的产出。

政府能够而且已经在减轻市场失灵方面和确保社会公正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市场进程本身可能会给很多人留下太少的生存资源。在那些最成功的国家中，比如美国和东亚国家，政府已经发挥了这些功能，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得很好。政府对所有人都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并且提供了很多基础组织——包括制度性基础机构，比如法制体系，这些都是市场有效运行所需要的。他们对金融部门进行规制，保证资本市场能够按照其设想的方式运作。他们为穷人提供了安全网。并且，从通信到农业到喷气发动机和雷达，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提升了技术。虽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对政府应该发挥的准确作用存在较大的争议，但人们还是普遍相信，政府应该在使任何社会、任何经济功能有效运作中发挥作用。

我们的民主社会中，对经济和社会政策存在重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有些是

关于价值观方面的——我们应该如何关心我们的环境（如果环境恶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那么我们应该忍受多大程度的环境恶化）；我们应该如何关心穷人（如果能使一些穷人摆脱贫困，或者生活水平略有改善，我们应当贡献我们总收入的多少来关心穷人）；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关心民主（如果我们相信民主会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那么我们是否会对基本权利进行妥协，比如集会的权利）。有些分歧是关于如何发挥经济功能的。推理的命题很明显：只要存在不完全信息或市场（通常是这样），原则上就会存在政府干预——哪怕是一个同样忍受信息不完全的政府——这样做会提高市场效率。正如我们在第3章看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假设在发达经济体中都无效，更不要说在发展中国家了。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提倡者依然认为市场无效的可能性相对很小，而政府无效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他们认为，政府产生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如何解决问题；失业被指责是因为政府将工资定得太高，或者允许工会拥有更大的权力。

与标榜是亚当·斯密追随者的那些人相比，亚当·斯密更清楚地知道市场的局限性，包括由于竞争不完全所造成的威胁。亚当·斯密同样也更清楚社会和政治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经济体必须运行。如果要让一个经济体能够运行，社会凝聚力就很重要：拉美国家的城市暴动和非洲国家的内战造成了与投资和增长敌对的环境。虽然政府凝聚力能够影响经济表现，但它的负面作用也很明显：可预计到，过度节俭的政策——无论是阿根廷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印度尼西亚削减了对穷人的食物补贴——将会造成暴乱。当相信存在大面积的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数十亿美元进入公司和进行金融救援，但是却没有给那些被迫失业的人留下任何东西。

在自己的工作中——不仅是我的著作中，同样也在我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角色中——我已经提出政府作用要平衡的观点。有些人虽然同时意识到市场和政府的局限性和失灵，但是认为这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不同国家间合作的本质取决于它们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

但是，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相

同。弱势政府和太过强势的政府都会伤害稳定和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金融部门缺少合适的规制造成的，俄罗斯的黑手党资本主义是因为没能成功地执行法律基础和秩序造成的。由于没有必要的制度性基础组织，转型国家中的私有化导致了资产掠取而不是财富创造。在其他国家，没有规制的私有垄断比国家垄断更能剥削消费者。相比较而言，有规制的私有化、公司重建和强大的公司治理[1]能够实现更高的增长。

然而，在这里，我不是要解决这些争论，也不是推行我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特别观点，而是强调：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对这些议题也存在实实在在的分歧。一些经济评论家得出结论，说经济学家经常存在分歧，因此他们试图忽视经济学家提出的任何观点。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对于某些议题——比如说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存的必要性、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经济学家的意见是普遍一致的。

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也包括其他的国际经济组织）的表现就像是接受了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建议，认为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意见；的确，就拿资本市场自由化这个例子来说，没有证据表明要支持该政策，但却有无数证据表明要反对该政策。虽然普遍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取得成功，但是，却并不同意将通货膨胀降到越来越低的水平就能够获利；也没有证据表明将通货膨胀降到越来越低，产生的收益才与成本相当，而且，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追求太低的通货膨胀将会出现负收益。[2]

对全球化的不满不只是因为经济学看似凌驾于一切之上，而且还在于经济学的特殊观点——市场原教旨主义——凌驾于所有其他观点之上。世界上许多地方反对全球化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即增加资金的新来源或者是新的出口市场——而是反对一套特别的教条，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强制实施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且，不只是反对这些政策本身，而且还反对认为只存在一套正确的政策这一观念。这一观念不仅公然违反了经济学（经济学强调平衡的重要性），而且也公然违背了基本常识。在我们自己的民主中，我们对经济政策的每个方面都进行积极地讨论；不仅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还包括诸如破产法或者社会保险私有化这样的问题。但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觉得，他们好

像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甚至被迫选择一些国家（诸如美国）已经抛弃了的政策。

对特殊意识形态的承诺不仅剥夺了这些国家的选择权，而且也导致了它们的失败。世界上每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明显不同。比如说，东亚国家的企业负债率高，而拉美国家的企业负债率相对较低；拉美国家的工会力量很强，而很多亚洲国家的工会力量相对较弱。经济结构也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近些年进行的新经济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过去30年的经济进步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的作用、信息和全球竞争格局的改变。我已经注意到这些变化如何改变关于市场经济效率的观点。这些变化也改变了如何适当应对危机的观点。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经济政策的隐含意义——经常遭到反对，这些机构已经拒绝审视东亚国家的经验，仅仅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政策，而且其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由于不能将现代经济社会的这些教训摆到桌面上，因此，在东亚危机发生时，这些机构就没有做好处理该危机的准备，更别说是促进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觉得几乎不需要将这些教训摆到桌面上，因为它知道：如果经济社会不能够提供答案，那么意识形态——自由市场中单一的信念——就能够给出答案。意识形态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看到一系列信念是如此牢固，以至于几乎不需要经验的确认。凡是与这些信念相矛盾的事实立刻就被草率地忽视了。对于自由的、无约束的市场信念者来说，资本市场自由化很明显是合理的，不需要证据证明它能促进增长。它导致不稳定的证据也被认为是调整的代价而已，是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得不接受的部分痛苦，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国际公共机构必不可少

我们不能背弃全球化，这已成为事实。问题是我们如何能让它有效地运行，并且，如果它要运行的话，就必须要全球公共机构来帮助建立规则。

当然，这些机构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全球一致行动是值得的甚至是必要的等诸多的议题上。过去30年中，人们越来越认为，集体行动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是不可少的。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本身不能产生有效的产出时，集体行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存在外部性时——即个人行动对他人产生影响，对于这些影响，他们没有支付也没有获得补偿——市场通常会造成一些产品过度生产而另外一些产品产出不足。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来生产本质上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3] 在一些领域，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4]：比如政府向学生提供贷款。因为就市场本身来说，它不会为人力资本提供投资基金。由于各种原因，市场时常不能够自我规制——繁荣和破灭——因此，政府将在促进经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10年中，对于不同层面——地方、国家或全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集体行动的理解正不断深入。产生的利益大部分来源于地方时，这些集体行动（比如与地方污染有关的行动）应该由地方层面来引导；使一个国家全体公民都受益的集体行动应该在国家层面进行。全球化意味着不断认可那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舞台。正是在这些舞台上，要求全球集体行动——并且全球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些舞台的认可已经与创建全球机构以处理这些问题同等重要。一般认为联合国能够集中处理全球政治安全问题；而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处理全球经济稳定问题。这两者都被认为能处理全球范围的外部性问题。地方战争，除非得到抑制或平息，否则就会传到其他国家，直到它们变成全球冲突。某个国家的经济衰退也能造成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衰退。1998年的巨大问题就是新兴市场中的危机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停滞。

但并非只有在这些舞台上，全球集体行动才是必要的。还存在全球环境问题，尤其是关于海洋和大气的问题。由于工业国家利用矿物燃料导致温室气体（CO_2）的聚集而造成的全球变暖，影响了未工业化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无论在南海群岛还是在非洲腹地的国家。由于氯氟甲烷的使用造成的臭氧层空洞同样也影响到每个人——不仅是那些利用这些化学品的人。鉴于这些国际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已经签署了一些国际协定。有些协定运行得非常好，

比如直接涉及臭氧问题的《1987 年蒙特利尔议定书》；而其他协定，如那些处理全球变暖问题的协定，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没能取得进展。

此外，还存在一些全球健康的议题，比如像艾滋病这样没有国界的高传染疾病的传播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功地根除了一些疾病，特别是盘尾丝虫病（夜盲症）和天花，但在全球公共健康方面的很多领域，未来的挑战还很艰巨。知识本身就是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研究成果能使每个人、每个地方都受益，知识本身没有额外的成本。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它源于对其他人的同情。虽然市场很有效，但不会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物、有衣服穿或者有庇护所。世界银行的主要使命就是通过使这些国家能够实现增长和保持自立来消除贫困，至于在危机时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则不是重点。

虽然在这些领域的大部分领域中，专业机构已经发展成应对特殊需要的部门，但它们面临的问题经常是相互关联的。贫困能够导致环境恶化，而环境恶化能进一步加深贫困。像尼泊尔这样贫穷国家的人们，他们没有其他方式获得热量和能源，这就迫使他们采伐树木、破坏森林植被和灌木，以此获得燃料来取暖和做饭，这样就造成土壤侵蚀，因此造成进一步的贫困。

全球化通过增加世界人民间的相互依赖从而提高了全球集体行动的需要，提高了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为应对这些问题而建立的全球机构没能很完善地运作并不奇怪：这些问题很复杂，而且集体行动在任何层次上都很困难。但是，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说明，抱怨远远不只是针对于这些机构并没有完善地运转。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失败非常严重；它们已经追求了不平衡的议程——一些人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远远多于其他人，而且还有一些人的确受到了伤害。

治理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全球化的失败上溯到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在该过程中，商业利益和金融利益以及意识倾向看似已经在国际经济机构中占据优

势。关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特有看法——这种看法在发达国家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但却强迫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接受。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答案并不难找：是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制定决策；是贸易部长们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制定决策。即使在他们竭尽全力地推行那些符合他们国家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政策时（或者偶然地，进一步竭尽全力推行符合更广泛的全球利益的政策时），他们也是通过特定的、不可避免的更为狭隘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我已经提出，需要在意识倾向上有所改变。但是，一个公共机构的意识倾向不可避免地与直接对该机构负责的人联系在一起。与投票权有关，与谁在桌边有席位——即使仅有有限的投票权——有关。它决定了能够听到谁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关注银行家之间的技术安排，比如说如何使银行支票清算系统更加有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影响到遍布发展中世界数十亿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对于其行为却没有发言权。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们在桌边并没有席位；而那些坚持要求其贷款被偿还的银行家却很好地由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来代表。可以预见政策的后果：救援一揽子计划更多地关注债权人的偿还问题，而不是将经济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我们能够预测到机构管理选择的后果：他们更多在意寻找一位与占支配地位的“股东”的观点相一致的领导人，而不在意寻找某个在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方面具有专长的人，成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务的中流砥柱。

世界贸易组织的治理更为复杂。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财政部长的声音一样，在世界贸易组织，是贸易部长的声音受到重视。因此，毫无疑问，就很少会出现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安排能够保证富裕国家占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每个成员都有一票的投票权，但基本上是通过协商一致来做出决定的。实际上，美国、欧盟和日本在过去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目前可能有所改变。在多哈回合最后一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坚持，如果要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它们的关注必须应受到重视——并且它们应获得一些明显的让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就平添了强大的力量——虽然中国的利益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要使全球化按照其应该的方式运作，那么需要做的最基本的改变就是治理的改变。这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的改变，以及其他所有国际经济组织的改变，以保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不只反映贸易部长的声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不只听到财政部长的声音。

要进行这些改变并不容易。美国不情愿放弃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有效投票权。发达工业国家也不情愿放弃它们的投票权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得到更多的投票权。它们甚至会引起华而不实的争论：这种投票权，就像任何公司中的投票权一样，应该根据资本贡献进行分配。中国在很久以前就愿意增加其资本贡献，如果中国能够增加其资本贡献，那么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投票权。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曾经试图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是美国的纳税人、水管工人和木匠们，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并且，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应该得到投票权。但这是错误的。这些资金几乎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其他纳税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总能够得到偿还。

虽然变化不容易，但还是有可能的。2001 年 11 月，作为发起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出价，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施压的情况表明，至少在世界贸易组织，存在谈判权力的改变。

我依然不指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正式治理的基本改革会很快到来。然而，短时间内，实践和程序的改变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 24 个席位，每个席位代表一些国家。当前的配置中，非洲的席位很少，这只是因为它的投票权太少，而它的投票权太少是因为（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投票权是根据经济实力来分配的。即使没有改变投票安排，非洲也应该拥有更多的席位；即使它们的投票权无效，它们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

有效的参与要求及时通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因为这些国家都很贫穷，它们养不起像美国那样的员工，这些员工能够在所有的国际经济机构中集合起来支持美国的地位。如果发达国家非常认真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它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思想库——独立于国际经济组织——来帮助制定战略和立场。

透明度

除了对它们的治理进行根本的变化外，要保证国际经济机构更多地对穷人、环境、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关注，这是我已经强调的，而最重要的关注方式是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我们曾经想当然地认为，信息畅通和新闻自由甚至已经在约束我们民主选举的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伤害、细微的轻率、偏袒都会受到详细审查，而且，公共压力的力量尤其强大。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公共机构中，透明度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并不是直接选举的。虽然它们是公共机构，但是它不直接对公共负责。这意味着这些机构应该更为开放，但实际上它们并不透明。

尽管在影响方式上存在些许不同，但缺乏透明度的问题确实影响到每个国际机构。在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的谈判都是关着门进行的，因此，很难——直到太迟为止——看清对公司和其他特殊利益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在对是否存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进行裁决时，也是秘密进行的。这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比如，由贸易律师和前贸易官员组成的专家组很少关注环境问题；但通过将这些商议公开，公共详细审查将要么使这些专家组对公共问题更为敏感，要么强迫他们对判决程序进行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现时具有保密倾向：虽然它是公共机构，但是传统上中央银行都是保密的。在国际机构中，保密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与之相反，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规范是公开。在2001年9月11日以前，财政部长甚至要求保护离岸银行业中心的秘密。在开曼群岛和其他一些离岸银行业中心的数十亿美元不是因为这些岛屿能够提供比华尔街、伦敦或者法兰克福更好的银行服务，而是因为保密允许它们在那里从事避税、洗钱和其他犯罪活动。只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在那些其他邪恶的活动中，存在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一个私人银行而是一个公共机构。

缺乏公开的讨论意味着模型和政策没有得到及时的讨论。在1997年危机期间，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和政策经历了传统民主进程的话，就会在危机国家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政策进行完全和公开的辩论，这些政策就有可能不会被接受，并因此出现更明智的政策。那些争论可能不仅披露经济假定的缺陷（正是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制定了政策），而且会揭示债权人的利益被置于工人和中小商业者的利益之上。这样就会出现可选择的行为进程，这些进程使那些弱势群体承担较少的风险，并且可能对应该考虑的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前面已经提到，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时，我已经看到并且开始理解导致保密的强大力量。保密允许政府官员自由进行决策，而如果他们的行为接受公共的详细审查，他们就不能这样做。保密不仅使他们的生活很惬意，而且还允许向特殊利益充分倾斜。保密还能隐藏错误，无论是否无辜，无论对失败的结果进行思考是否得出结论。正如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阳光是最强的消毒剂”。

即使政策并不是由特殊利益驱动的，保密也会造成怀疑——谁的利益真正得到维护？——并且这样的怀疑，即使没有理由，也会破坏政策的政治可持续性。正是该保密以及它引起的怀疑，才使得抗议运动得以持续。抗议者的需求之一就是要求更大程度的公开和透明度。

这些要求具有特殊的反响，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亚危机期间本身就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透明度带修辞色彩的强调造成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那就是，最终当透明度的聚光灯转过来照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就会发现它在透明度方面的欠缺。[5]

保密也破坏了民主。只有对这些公共机构负责的那些人能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包括他们面临什么选择以及他们如何制定决策，才会存在民主责任。我们在第2章已经看到，现代民主怎样开始意识到公民的基本知情权，比如通过诸如《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这样的法律来实施。然而，我们也看到，虽然名义上赞成透明度和公开，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依然没有真正信奉这些观点。尽管它们确实应该这样做。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金融体系

对于所有的国际经济机构，在改革中存在一些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除此之外每个机构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谈起，部分是因为它更明显地出现了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机构中并不明显。

在第8章一开始，我就提出问题，一个由如此有才能的（和高薪水）政府官僚组成的组织为何能犯下如此多的错误？我认为，问题部分来源于它的既定目标（对它来说，是它最初创建时制定的目标，那就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与新目标（比如资本市场自由化，该目标更多的是为金融界的利益服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知识的不一致性和不连贯，而不只是学术界利益的问题。因此，很难得出一致的政策，这并不奇怪。经济科学时常被意识形态取代，这种意识形态给出了明晰的方向，否则即使指导能够发挥作用，并且意识形态与金融界的利益广泛地协调一致，当意识形态不能有效运作时，这些利益本身也不能得到很好地维护。

意识形态和科学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科学意识到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认识经常存在不确定性，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都不愿意讨论与它建议的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而是喜欢制造一种确实可靠的印象。这种姿态和心态使它很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如果它不能承认这些错误，它谈何去汲取教训呢？许多组织可能希望局外人相信它们确实不会犯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在于它经常确信自己绝对不会犯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承认了在东亚危机中的错误，承认紧缩性财政政策加剧了衰退，并且，印度尼西亚金融体系的重建战略导致了资金的出逃，最终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应该为其推行的许多政策负责——但它们已经试图限制这些批评和讨论。当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触及这些错误以及其他错误，并将该报告发表在《纽约时代》头版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显得异常愤怒，随即就发布了禁止批评的命令。更明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都不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它从来都不问问

这些错误为什么会发生，模型出了什么问题，或在下一次危机中如何避免再出现此类错误——将来肯定会出现另一次危机（2002 年阿根廷面临的危机再一次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政策是无效的；它所坚持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将经济进一步推入衰退）。它也从来都不问问为什么它的模型系统地低估了衰退的程度——或者为什么它要系统地推行过分紧缩的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要维护它永不犯错的形象，竟然说，如果在相信它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上出现摇摆的话，它就会失去信任——并且，如果它的政策要成功，就需要市场对它充分信任。这是又一次实实在在的讽刺。经常赞扬市场“完善和理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的相信它能够通过极度有信心的预测从而提高它的信任度吗？预测再三地失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起来绝不是不会犯错的，如果市场就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理性的话，就更是如此。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信任，不仅发展中国家对它不信任，而且它珍爱的支持者——金融界对它也不信任。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更诚实一点、更直率、更谦虚，毫无疑问，它的处境会更好些。

有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提出另外一个借口，用以解释他们为何没有讨论替代政策及其相关的风险。他们指出，这些讨论只会使发展中国家更加糊涂——俨然一副恩人自居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了其对民主进程的深度怀疑。

在这些问题被指出来后，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改变它的心态及其行为模式，那自然好。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相反，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极其缓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部分是因为强大的意识作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仰（机构不会犯错）；部分是因为要利用它那分等级的组织结构来保证它在整个机构中流行的世界观支配地位。用现代商学院的行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一个“学习的组织”，而且像其他组织一样，发现它很难学习和改变，这样当周围的环境发生改变时，它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中。

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认为只有在治理得到改变时，才有可能发生意识倾向的基本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太可能在近期发生。提高透明度将会有帮助；

即使这样，有意义的改革也会受到抵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部，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将自己限制在它的核心领域——那就是管理危机；除了危机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涉足发展或者转型经济等问题。我强烈同意——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民主、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及转型的其他改革。

在其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要缩小其涉足的范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负责收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统计数据，虽然总体上看来它做了一项很好的工作，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它的运行职责对它发布的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了折中，为了使它的方案看起来有效，为了使这些数字“对得上”，它不得不对经济预测进行调整。这些数据的使用者很多都没有意识到这不像普通的预测；在这些预测的案例中，并不是根据成熟的统计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预测，也不是根据那些对经济情况很了解的人的最佳估计进行预测，这些预测只是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谈判结果的一部分。当运营机构也负责统计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的利益冲突，而且很多政府已经通过建立独立的统计机构对此加以回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外一项活动就是监督，根据我们在第2章讨论的第4条“协商”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进行审议。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那些不依赖其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它的独特观点。因为某个国家的经济下滑将会对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对于那些互相施压以维持自己经济优势的国家来说，这的确很有意义；也许它的观点是全球公共产品，但问题出在报告成绩单本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通货膨胀，其实失业和增长同样重要。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也反映了政府和市场平衡的特殊观点。在美国，对第4条“协商”的直接经验使我相信，该项任务也应该由其他机构负责。因为某个国家的衰退会对它的邻国造成最直接的影响，而且，邻国的环境与本国的环境更一致，因此可以选择地区性监督。

强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回到它原始的使命——缩小它的关注范围——能够行使更大的职责。我们可以尝试着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已经阻止了危机的发生，是否建立了更为稳定的全球环境，而且是否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

题。但很明显，缩小关注的范围并没有解决该机构的问题，相反，部分抱怨是它已经推行的政策（比如资本市场自由化）增加了全球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在东亚、俄罗斯还是在拉美国家，它实施的大规模救援政策都失败了。

改革的成就

对于东亚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失败的后果，存在普遍的共识，即国际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做些事情以保证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很多人觉得只需要做些细微的改变。为了对改革进行弥补，在改革初期，他们构思了一个宏伟的题目：**全球金融体系机构的改革**，它建议对阻止另一次危机的博弈规则进行重大改变。

在花言巧语的背后存在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些掌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为了转移对他们的错误和系统的问题所进行的责备，无所不做；同样，为了减少改革，他们无所不为，其目的就是要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金，与此同时，要新型市场承担更多的义务（比如要求它们遵从发达工业国家制定的新标准）。

对已开展的改革进行的讨论强化了这些怀疑。“官方”改革争论集中在相同的机构中，并且由类似的政府支配，而这些机构和政府直接“操作”全球化已经50多年了。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关于改革的争论存在大量的犬儒主义。当在谈判桌前面对那些一直对该体系负责的人时，发展中国家怀疑，是否有可能出现真正的改变。对这些有关的“客户国家”来说，就是一个字谜游戏，在该游戏中，政治家假装做一些事情来纠正这些问题，而金融利益者却尽其所能来维持现状。这些愤世嫉俗者们部分是正确的，也仅仅是部分的正确。危机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全球化进程中某些地方出了问题，并且导致了对宽范围议题的批评，包括透明度、贫困问题，也包括环境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等。

在这些组织机构内部，许多有影响力的成员觉得很满足。这些机构已经改变了它们的言辞。它们谈论着“透明度”，谈论着“贫困”，谈论着“参与”。虽然这些言辞和实际行动间存在差距，但对这些机构的行为、对透明度和贫困的关注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影响。它们建设了更好的网页，并且更开放。参与贫

困评估已经吸纳了更多的参与者，而且更了解这些方案对贫困的影响。虽然机构内部的人觉得这些改变具有重大意义，但外部人觉得改变显得很肤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公开标准依然要比民主政府（比如美国、瑞典、加拿大等）的公开标准弱得多。它们试图掩饰一些批评性的报告；只有当它们阻止的这些报告泄露时，这些报告最后才被迫公开。在涉及参与贫困评估的方案中，那些参与者被告知，对于像宏观经济框架这样的一些重要问题，他们不能参与，这就使那些发展中国家感到非常不满。[6]

还有其他的例子表明，在改革方面同样是说的多做的少。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也只是偶尔意识到短期资本流动和早熟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及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危险。这可以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姿态的主要变化——虽然这一变化太快，以至于无法看到言辞的改变是否或者如何反映到这些国家被强迫实施的政策中。[7] 迄今为止，看起来要获得证据毫无希望，因为一个简单的插曲表明了这一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执行总裁霍斯特·科勒就职不久，他就对一些成员方进行访问。2000年5月末，在访问泰国时，他注意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危险。其实在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危险，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才刚认识到而已。泰国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实施了快速开放的政策。2000年6月，科勒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当时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宣布了要对资本市场进行干预的计划。但是很快，印度尼西亚人——和霍斯特·科勒的观点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纠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僚再一次获胜：虽然在理论上资本市场自由化可能存在问题；但对于那些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来说，资本市场干预（控制）显然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还存在其他对待改革的姿态，那就是不认真或半途而废。[8] 随着对20世纪90年代大量救援的批评不断出现，改革的失败也不断出现。首先出现的是预防性借贷框架，在危机真正发生之前向巴西贷款，虽然阻止了该国的危机，但也只持续了数月时间，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接着出现的是暂时的信贷最高限额，这是设计的另外一项措施，目的是在危机爆发时将资金准备好。[9] 这也毫不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从提议的条件看，看起来没人对它感兴趣。[10] 意识到救援可能会造成道德风险、削弱借贷实践，因此，就实施了债权人必须承担部分

代价的“参与”救援战略。当然，该战略没有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实施，但却被厄瓜多尔、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等小国和缺乏实力的国家采纳了。正如我在第8章所解释的，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救援是个失败的战略。在一些案例中，比如罗马尼亚，在这些战略对该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前就被抛弃了。而在厄瓜多尔，它们被强迫执行，甚至造成更具破坏性的影响。美国财政部新任部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执行总裁虽然都表示对大量救援战略的总体效果持保留态度，但却继续做同样的事情——2000年和2001年，分别向土耳其和阿根廷提供了110亿美元和216亿美元的贷款。这看起来最终迫使其开始对阿根廷救援的失败进行反思。

即使对改革达成广泛的（但不是普遍的）共识，金融中心的人们也会对此加以抵制，这些抵制有时候还得到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东亚危机中，随着注意力集中于透明度，要知道在新兴市场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变得很重要，而且也必须知道对冲基金和离岸银行中心正在做什么。还存在另一种担心，由于更透明，会造成更多的交易都通过这种渠道进行，反而不清楚整体上发生了什么。萨姆斯部长支持对冲基金和离岸银行中心，反对继续寻求提高透明度，认为过度的透明可能会降低获取信息的动机，按技术行话说就是“价格发现”功能。只是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才显示出对离岸金融中心进行改革的重要性，这些离岸金融中心是作为税收和规制的避风港而建立的。对此不应该感到惊奇；这些便利是发达工业化国家深思熟虑的政策结果，是由金融市场和富人来推动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看起来很小的改革都面临强大的抵制，有时候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时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随着短期债务对危机的发生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于债券条款，这些条款允许那些看似是长期债券的能够一夜之间转化为短期债务。[11]并且，随着债权人“参与”救援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债券条款的需求也在增加，这些条款为它们“强迫”参与试验提供了便利，即所谓的集体行动条款。债券市场已经非常成功地抵抗了这两项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看起来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支持。这些改革的批评家认为，对于借入国来说，这些条款可能造成更昂贵的

信贷，但他们忽视了核心要点。如今，借款存在巨大的成本，尤其是当事情趋向严重时，可这些成本只有一部分是由借款人来承担的。

需要做什么

认识到这些问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才刚开始。在我看来，在这些核心的改革中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承认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风险，同时认清短期资本流动（“热钱”）造成的巨大外部性，即不是由这些交易的当事人（贷款人和借款人）直接承担成本。只要存在如此大的外部性，干预——包括通过银行和税收系统[12]进行的干涉——就是值得的。国际金融机构不应该抵制这些干预，而应该尽其所能帮助它们做得更好。

2. 破产改革和停滞。当私人借款人不能对债权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进行偿还时，处理这些问题的合理方法是破产，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对债权人进行救援。所需要的是破产改革，该改革意识到破产会造成宏观经济动乱这一特殊本质；也需要超级 11 章条款，即加速重建和最大程度地延续现有管理层的破产条款。这样的改革还具有更多的优势，它能够促使部分债权人变得勤奋，而不是鼓励那些不计后果的借贷，这类借贷在过去恰恰非常普遍。[13]我们需要的不是试图实施对债权人更友好的破产改革，而不注意宏观引致的破产的特殊特征。这不仅不能解决深陷危机的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无法把握它的疗效——就像我们在东亚国家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不能简单地将某个国家的法律转嫁到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和规范上。如果公共债务得不到偿还（比如在阿根廷），问题就更复杂；但同样需要更多地依赖破产和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起来也是迟迟才接受该观点，但它不能发挥核心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主要的债权人，而且它由债权国家支配。由债权人或者他的代表担任破产法官的破产体系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被接受的。

3. 更少地依赖救援。随着不断利用破产和停滞，就会减少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这些大规模救援的失败非常频繁，大量的资金要么被用来保证西方债权人比他们在其他情况下能得到更多的偿还，要么被用来将汇率更长时间地（允许

该国的富人们将更多的资金以更优惠的条件转出该国，只给该国留下更多的债务）维持在高估的水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救援不仅无效，而且还降低了借贷的谨慎动机和汇率风险的规避动机，从而引发了问题。

4.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需要改善银行规制——包括设计和实施。发达国家中虚弱的银行规制能够导致糟糕的借贷实践，向外输出不稳定性。虽然根据风险基础设计的资本充足标准是否提高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可能还存在某些争论，但是，发达国家通过鼓励短期借贷而造成了全球不稳定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金融部门的放松规制和过度依赖资本充足标准已经受到误导而且不稳定，所以要求制定适合每个国家能力和环境的更广泛的、更少意识形态的规制。20 世纪 80 年代，泰国就非常正确地限制了投机性房地产借贷。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地鼓励泰国人取消这些限制。另外还存在大量的其他限制，诸如速度限制（限制银行资产的增长率），这可能提高了稳定性。然而，这些改革也不能够忽视更广泛的目标：一个安全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很重要，但它必须也能够提供资本来资助企业和创造就业。[14]

5. 改善风险管理。如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汇率波动的巨大风险。虽然这个问题很普通，但解决方法却不明显。专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他们提倡的汇率体系类型也显得犹豫不决。他们鼓励阿根廷实施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东亚危机后，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应该要么实行浮动汇率，要么实行固定汇率。在阿根廷的灾难中，他们可能再次改变了这一建议。不管汇率机制如何改革，这些国家都依然面临巨大的风险。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在向很多国家购买和出售货物时都面临困难，因为在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达 50% 甚至更多。将它们的汇率固定在一种货币上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能够加剧对其他货币的波动。但是，这里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风险。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15]是因为利率的大幅提高引起的，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保罗·沃尔克在美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必须学习管理这些风险，可能通过购买保险来防范国际资本市场的这些波动。不幸的是，目前这些国家只能为短期波动购买保险。的确，发达国家能够比欠发达国家更好地把握这些风险，因此，它们应该帮助发展这些保险市场。对发达国家

和国际金融机构来说，以降低风险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很有意义，比如让债权人抵御大部分真实利率波动的风险。

6. 改善安全网。风险管理的部分任务是，提高国内易受攻击的部分抵御风险的能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安全网都很虚弱，包括缺乏失业保险方案。在发展中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两个部门：农业和小企业部门，即使是在更发达的国家中，其安全网也是虚弱和不充分的。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在改进它们的安全网方面做出实质性改善的话，国际援助也是必要的。

7. 改善应对危机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对1997～1998年危机反应的失败。所给予的援助在设计上是糟糕的，在实施上是差劲的。这些方案并没有充分地考虑缺乏安全网，忽略了保持信贷流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国家间的贸易崩溃将会传播危机。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基于糟糕的预计，而且基于认识上的失败，即没能认识到摧毁企业比重建企业更容易、由高利率造成的伤害在利率降低时不会减少。社会需要恢复平衡：对工人和小企业的关注需要与对债权人的关注平衡；政策对国内资本外流的影响需要与过度关注外国投资者得到偿还平衡。必须根据社会和政治背景考虑对未来金融危机的反应。除了危机处置失当时出现的暴乱所造成的破坏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社会和政治动荡时不能吸引到外资的风险，而且没有哪个政府，除非是那些最受压制的政府，能够控制这样的动乱，尤其是当这些政策是被外部强制实施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需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原则上，而不是关注短暂的投资者心理状态，或关注不可预测的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回到它最初的使命：当国家面临经济衰退时，提供资金以恢复总需求。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再三发问：为什么当美国面临经济衰退时，它追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当它们面临经济衰退时，却坚持相反的政策。2001年，当美国经济开始陷入衰退时，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应该有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而是如何设计这些方案。而现在，阿根廷和东亚的教训很清楚：对那些依然陷入深度衰退的国家来说，永远不会恢复对经济的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这些国家要求偿还资金的条件，不仅需要更严格地加以限制，而且还需要反映上述观点。

还有其他值得进行的改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对“贫困”和失业

的预计方案，这将会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些国家应该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的分析中出现系统的错误——比如，如果贫困的增长大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对此负责。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它的模型是否存在某些系统性的错误？它是否试图故意误导政策的制定？

改革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

也许是因为已经看到世界银行发生的改变，所以，我依然对改革国际经济机构的可能性抱有希望。虽然世界银行取得这些改变并不容易，也没有达到我希望的程度，但是这些改变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世界银行的新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正试图使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进行更多的回应。虽然新的方向并不总是那么明朗，知识基础并不总是那么坚实，而且世界银行内部也不是对此普遍支持，但是世界银行已经开始认真对待外界提出的批评。改革主要包括对三个领域的哲学体系进行改变：发展、总体援助和世界银行的特别援助、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对世界银行的方针再次进行评估时，世界银行考察了成功的发展是如何出现的。[16]世界银行已经意识到要从再评估中吸取一些教训：根据自己的预算限制消费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妇女教育；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新议题。成功不仅来自于促进基础教育，而且还来自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基础，包括支持高级培训。同时促进平等和实现快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更平等的政策已表现出有助于经济增长。支持贸易和开放很重要，[17]但出口扩张创造了就业进而促进了增长，而不是因为进口增加失去了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增长。当政府采取行动促进出口和建立新企业时，自由化是有效的；在其他情况下它常常是无效的。在东亚，政府通过帮助建立促进储蓄和投资有效分配的机构，从而在成功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成功的国家对竞争和创建企业的强调，超过了对私有化和重建现有企业的强调。

整体上看，成功的国家已经采取了更加综合的发展方法。30 年前，左翼经

济学家和右翼经济学家时常看似同意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资本供应的增加是发展的核心问题。只是在这些改变是否应该通过政府导向计划或解放市场实现方面上存在差异。最终，对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的改革都是无效的。发展不仅包含资源和资本，还包括社会转型。[18]很明显，国际金融机构不能负责社会转型，但它们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至少，它们不应该成为社会成功转型的障碍。

援助

但通常，提供援助的方式会切实造成有效转型的障碍。我们在第2章看到，**限制性**——无数被强迫接受的条件，常常有些条件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并不起作用；它并没有实现更好的政策、更快的增长和更好的结果。那些认为改革是被强制实施的国家并没觉得是对改革进行了真正的投资和承诺。然而，要发生真正的社会改变，它们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更糟糕的是，限制性已经破坏了民主进程。最后，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此存在一丝的认可：限制性走得太远；许多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关注于优先秩序。虽然一直试图提炼这些限制性，但在世界银行内部，关于改革的讨论更进一步。有些人认为，应该用选择性替代限制性，也就是只对那些过去记录优良的国家提供援助，允许它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不再采取过去那种微观管理的方式。事实上，选择性提供的援助能够同时对促进增长和降低贫困产生重大影响。

债务豁免

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求按照能帮它们实现发展的方式来提供援助，而且还要求更多的援助。数额相对较小的资金就能够在促进健康和提高读写能力方面产生巨大的作用。实际情况是，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发展援助的金额的确一直在减少，如果按照占发达国家收入百分比或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发展援助额来衡量，发展援助下降得更厉害。需要有对该类援助（和其他全球性公共产品）进行资助的基础，将其保持在更加可持续的水平上，才能完全摆脱美国和

其他地方国内政治的反复无常。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之初，就被授权建立特别提款权——一种国际货币。如今，随着许多国家每年都将数十亿美元储存起来用以防御国际市场的兴衰变迁，有些收入就不能转变为总需求。2001～2002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些问题。发行特别提款权来资助全球性公共产品——包括资助发展援助——不仅能够维持全球经济实力，同时也能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第二个建议包括利用全球性经济资源（海底矿石和海洋捕鱼权）的收入来资助发展援助。

最近，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开始关注于债务豁免。如果不进行债务豁免，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实现增长。如今，它们的大部分出口都用来偿还发达国家的贷款。[19]2000年大赦年的运动对债务豁免动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这次运动得到整个发达世界教会的支持。对它们来说，这被视为道德命令，是对经济公平的基本原则的反映。

债权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在冷战贷款的案例中尤其明显。[20]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臭名昭著的统治者蒙博托提供贷款时，它们知道（或应该知道）这些钱大部分将不会用来帮助该国的贫穷人民，而是用来帮助蒙博托。正是金钱支付保证了这位腐败的领导人促使刚果民主共和国与西方国家的结盟。在很多人看来，让拥有腐败政府的国家的普通纳税人偿还他们的领导人所欠下的债务是不公平的，更何况这些领导人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

在给予债务豁免更大的承诺方面，大赦年运动是成功的。虽然2000年以前，对高负债的国家存在债务救济方案，但很少有方案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标准。在2000年年底，作为国际压力的结果，24个国家通过了这一门槛[⊖]。

但是，债务救济需要进一步发展，因为现在，这些协议仅涉及最贫穷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虽然被东亚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失败毁坏，但它们的境况依然很好，也应该被纳入到保护伞下。

⊖ 即24个国家能够获得债务豁免。——译者注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平衡贸易议程

抗议全球化的全球性运动始于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全球不公平和发达工业国家虚伪最明显的标志。虽然这些发达工业国家已经提倡——和强迫——发展中国家向它们开放工业品市场，但它们却依然向发展中国家关闭自己的市场，比如纺织品和农产品。虽然发达国家提倡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对它们的工业进行补贴，但是这些发达国家却依然为自己的农场主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使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与它们竞争。虽然它们到处宣扬竞争市场的优点，但在国内工业看似受到进口威胁时，美国却迅速地建立了钢铁和铝业卡特尔。美国追求金融服务自由化，但是却反对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进行自由化，比如建筑服务和海运服务。正如我们看所到的，贸易议程是如此不公平，以至于不只是最贫穷的国家不能享受公平份额的利益；而且，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比方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南部非洲地区），因为最后一轮贸易谈判的结果，它们的境况反而变得更糟。

在逐渐认识到这些不公平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最终于2001年11月发动了多哈“发展”回合贸易谈判，该回合谈判的议程主要是矫正过去的某些不平衡。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仅仅同意讨论；只是讨论矫正某些不平衡就被视为是一种让步！

多哈回合谈判中，特别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就是知识产权。如果发明者需要创新的激励的话，知识产权就变得很重要——虽然有很多最重要的研究，比如基础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研究，是不能获得专利的。没有人否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需要平衡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和利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使用者，也包括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阶段，科学技术办公室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担心我们没有实现权力平衡——协定将生产者的利益凌驾于使用者的利益之上。我们担心，如果这样做，前进和改革的速度可能会实实在在地受到抑制；毕竟，知识是研究最重要的投入，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

提高该项投入的价格。我们也关心穷人买不到救命药的后果。该问题在随后出现的南非艾滋病药品供应情况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义愤地迫使医药公司放弃它们的主张——而且很明显，更进一步地说，限制了最坏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民主的美国政府，最初也支持医药公司。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另外一种危险，可将其称之为生物盗版，国际公司将传统药品和食物进行专利化；它们不仅正当地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知识中赚钱，而且在它们这样做时，也压制了长期提供这种产品的国内企业。如果这些专利受到有效的挑战，虽然不清楚它们是否能在法院站得住脚；但很清楚的是，欠发达国家可能不会有充足的法律和金融资源来挑战该专利。该问题已关系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情感和潜在的经济问题。最近，当我在厄瓜多尔安第斯的村庄考察时，那里的市长就抱怨全球化如何导致生物盗版。

改革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进一步考虑更平衡的贸易议程——要更平衡地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更平衡地对待超越贸易议程的议题，比如环境问题等。

但是，矫正当前的不平衡并不需要等到新一轮贸易谈判结束。国际经济公平要求发达国家采取行动，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贸易和平等关系，而不是求助于谈判桌或者以此为交换条件试图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让步。欧盟已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它的“除武器外一切货物”的行动承诺，欧盟可以从最贫穷的国家自由进口除武器外的所有货物。虽然这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抱怨：它们依然不能与获得高额补贴的欧盟农产品进行竞争；但它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一大步。目前的挑战是要美国和日本也采取类似的实践。这样的行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利益，甚至发达国家也会受益，它们的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货物。

以更人性化的态度对待全球化

我所概述的改革可能使全球化更公平，对提高生活标准尤其是穷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更有效。它不仅是改变机构架构的问题。全球化的心态本身都需要改变。财政部长和贸易部长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全球化视为经济现象；但是，对于

发展中世界的很多人来说，它远不止于此。

全球化遭到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看似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冲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包括由全球化引起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城市化，这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社会。不幸的是，迄今为止，那些负责管理全球化的人，在赞扬全球化的正面利益时，却并没有充分注意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威胁到文化一致性和价值观。[21]如果站在发达国家内部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些问题，就非常令人费解：欧洲保护农业的政策，不仅保护它们的特殊利益，而且保护农村传统。一些小城镇的人到处抱怨大型的国家零售商和购物街排挤了小商业者和他们的社区。

全球一体化的步骤非常关键：更为渐进的进程意味着不是埋没传统的制度和标准，而是让它们能够接受和回应新的挑战。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全球化正如其被提倡的那样，看起来时常表现为用国际金融新专政代替国家精英旧专政。那些国家被有效地告知，如果它们不遵循特定的条件，资本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拒绝向它们提供贷款。它们基本上是被迫放弃它们的部分主权，被迫让反复无常的资本市场和投机者来“约束”它们，告诉它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这些投机者关注的只是该国的短期增长而非长期增长，关注生活水平的短期改善而非长期改善。

但是，一些国家确实存在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选择之一就是它们希望屈从于国际资本市场。比如在亚洲，那些避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束的国家比那些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国家发展得更快，实现了更大的平等和贫困的降低。因为替代政策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不同的群体，这是政治进程——不是国际官僚——进行选择的作用。即使增长遭受负面影响，也可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更民主和更平等的社会而愿意付出的代价，就像目前很多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为了更好的环境，牺牲一些增长是值得的。只要全球化按照它以往的方式运行，那么它就代表了对公民权的剥削。难怪它会受到抵制，尤其是受到那些正被剥削的人们的抵制。

如今，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挑战。对全球化存在不满，这些不满是

很正当的。全球化可以成为向善的力量：关于民主和民间社会观点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全球政治运动也已经导致债务减免和《地雷公约》的签署。全球化已经帮助上亿人提高了生活水平，超乎他们以及很多经济学家前不久所能想象的程度。经济全球化让很多国家能够利用全球化为它们的出口寻找新的市场和吸引外国投资。即使如此，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掌握它们自己命运和意识到政府能够在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而不是依靠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自我修正的市场。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全球化是无效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工作被摧毁，生活变得更没有保障，境况变得更糟。他们觉得越来越无力反对他们控制之外的力量。他们看到自己的民主被破坏，自己的文化被侵蚀。

如果全球化仍然按过去的方式运行，如果我们依然不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那么，全球化不仅不会在促进发展方面取得成功，而且还会继续制造贫困和不稳定。如果不进行改革，已经出现的强烈抵制将会越来越激烈，对全球化的不满也将会继续增加。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可能是场悲剧，尤其是对那些本可受益的亿万人来说更是如此。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更多是在经济上遭受损失，但更广泛的政治分歧也会影响到发展中世界。

如果最后一章所概述的改革被严格实施，那么，更人性化的全球化进程就有希望，这样，全球化就会成为向善的强大力量，而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会从全球化中受益，进而对全球化表示欢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对全球化的不满将会很好地为所有人服务。

当前的状况使我回想起70年前的世界。世界陷入大萧条时期，自由市场的鼓吹者说，“不要担心，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给它时间，最终会恢复经济繁荣”。不用担心生活遭到破坏的那些人在等待这个所谓的最终结果中的悲惨境况。凯恩斯认为，市场不能够自我修正，或者说至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能够自我修正（就像他的名言中所说的那样，“长期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论货币改革》（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24年）。

由于失业能够持续多年，因此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受到嘲笑——被视为市场批评者而遭到攻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是极度保守的。他对市场有基本的信仰：只要政府能够纠正这一失灵，那么经济就能够相当有效地发挥功能。他并不想对市场体系进行全面替换；但是他知道，除非这些基本的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将会存在巨大的公众压力。凯恩斯的建议是有效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如像美国这样遵循凯恩斯建议的国家，它们的衰退很少，持续时间更短，并且其经济繁荣的时间比以前更长。

如今，资本主义体制就像大萧条时期一样处于十字路口。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被凯恩斯挽救，他的政策想法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营救了遭受全球经济崩溃之害的那些人。现在，世界上成百上千万的人正等着看是否要对全球化进行改革，以使全球化的利益能够被更广泛地分享。

谢天谢地，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断增强，而且做事的政治意愿也不断提高。几乎所有涉及发展的人，即使是华盛顿机构的人现在也同意，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制，迅速资本市场自由化可能是灾难性的。他们也同意，1997 年亚洲危机时期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是个错误。2001 年玻利维亚陷入衰退（部分是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就存在某些暗示，可能不能强迫玻利维亚遵循传统的节俭路径，强迫其削减政府支出。的确，2002 年 1 月，看起来玻利维亚被允许刺激它的经济，帮助它战胜衰退，利用它将要从最近发现的天然气储备中获得的收益来渡过难关，直到它的经济开始再次增长。阿根廷经济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巨大的救援战略的失败，它开始讨论使用停产和通过破产重组，即我和其他人已经提倡多年的替代战略。大赦年运动的努力实现的债务豁免以及在多哈发起的新发展回合贸易谈判的让步代表着两项改革的胜利。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弥补理论和现实的缺口方面，仍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只是同意开始讨论更公平的贸易议程，过去的不平衡仍有待进行矫正；破产和停产目前已经纳入议程，但是却不能保证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间实现合适的平衡。在讨论经济战略问题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开始更多地参与，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已经出现了反映更大参与的政策改变。仍然需要在制度和心态方面有所改变。应该用以经济科学为基础

的分析、用从市场和政府失灵中理解的政府作用应更平衡这一观点来替代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应该对外部咨询家的建议更重视，以此来阐明不同政策的后果（包括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对穷人的影响），从而支持民主决策的制定；而不是通过对不情愿的国家强制推行特殊的政策去破坏民主决策制定。

很明显，必须进行多方位的改革战略。应该关注国际经济安排的改革。但是，这样的改革可能需要长时间才能进行。因此，第二个战略应该是直接鼓励每个国家自己进行改革。发达国家具有特别的责任，比如，削减它们的贸易壁垒，实践它们宣扬的政策。虽然发达国家的责任很大，但是它们的动机很弱：毕竟，境外金融中心和对冲基金是为发达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且，发达国家能够很好地承受改革的失败可能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稳定。的确，毫无疑问美国正通过多种方式从东亚危机中获益。

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它们自己的福利承担责任。它们能够管理预算，以便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可能是穷困潦倒的），并且取消那些强迫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的保护主义壁垒，虽然这些贸易壁垒可能会给少数人带来大量的利润。它们可以实施强有力的规制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外部投机者和国内公司的品行不端造成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效的政府，具备强大独立的司法制度、民主责任、开放、透明以及消除抑制公共部门效率和私人部门增长的腐败。

它们应该向国际机构寻求帮助的仅仅是：承认它们进行选择的需要和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它们的政治判断，比如说谁应该承担什么风险。应该鼓励它们采取适合它们自己状况的破产法和规制架构，而不是要它们接受发达国家设计的并为其服务的模板。[22]

需要稳定、平等和民主的增长政策，这也是发展的原因。发展并不是帮助少数人致富或者建立一批只有国家精英获益的、毫无意义的、受保护的工业；发展也并不是要为城市富人进口普拉达（意大利最著名的奢侈品品牌）、贝纳通（意大利服装品牌）、拉尔夫劳伦（美国服装品牌）或者路易威登（法国品牌）等名牌产品，而使农村穷人陷入灾难之中。在莫斯科的百货商店能够买到古奇牌手提包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是社会的转变，

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使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以及享受卫生保健和受教育的机会。

如果只是少数人决定某个国家应该遵循的政策，那么这类发展就不会发生。确保能够做出民主决策意味着保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官员和专家积极地参与更大范围的争论，也意味着必须进行广泛的参与，使其超越专家和政治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必须掌握自己的未来。但是西方国家也不能逃脱责任。

如何改变事情并不容易。官僚也是普通人，一旦陷入坏习惯中，要适应改变可能会很痛苦。但是，国际机构必须承受改变中可能出现的痛苦，在使全球化有效过程中，这些改变能使它们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且不仅是为那些富人和工业化国家服务，还要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服务。

发达世界需要在改革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构中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建立了这些机构，同时也需要对它们进行修正。如果我们要合理地关注那些已经对全球化表示不满的人，如果我们要使全球化能够为过去没有享受服务的数十亿人服务，如果我们要使全球化以更人性化的面貌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高我们的声音。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悠闲地冷眼旁观。

后　记

本书第一版受到欢迎实在令人高兴。这不仅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议题，而且说明我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对全球化不满的传播已经超越了最近多年来吸引世界注意的抗议运动。我很高兴本书对有关全球化的争论有所贡献，并且可能有助于重塑全球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球化是好的或者坏的，而在于它是一股能够给一些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强大力量。然而，由于实现全球化的方式被误导，成百上千万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全球化的利益，反而还使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如今的挑战是如何改革全球化，如何使全球化不仅为富人和更发达的工业国服务，而且还要为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国家服务。

在本书完成后的几个月内，它所确定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美国将它的农业补贴提高到新的高度。农业补贴曾被批评为是浪费金钱，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背叛，对环境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是对富裕的大型农场主而不是对需要帮助的贫穷小农场主进行补贴。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甚至更令人信服的抱怨：随着补贴货物供应量的增加，美国富裕的大型农场主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国际上最贫穷的人的情况下获得的。比如，对 2 500 个美国棉花农场主的补贴超过了他们生产的价值，因此压低了棉花价格，仅仅在非洲，估计就会使那里成百上千万种植棉花的农民每年损失超过 3.5 亿美元。对很多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而言，棉花方面的损失超过了美国对这些国家对外援助的预算。

美国钢铁关税这个例子同样如此，按照它的申述，美国政府强化了保障措施以避免进口钢铁的冲击。美国钢铁业的问题已存在多年，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时就遇到了这些问题。对以前的钢铁巨头进行重建很困难。东亚危

机减少了消费、降低了工资和汇率贬值后，对东亚的高效企业来说，很容易削弱美国的企业。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外国企业在技术上并不是更有效的，但在工资下降如此充分以及汇率足够低的情况下，它们也能够取代美国的钢铁企业。比如说，摩尔多瓦（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我最近到该国访问，自从其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收入迅速下降了70%（这是在第6章描述的失败中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例子），而目前，它的预算中有70%都被用来偿还债务。

美国通过提高进口钢铁的关税来应对这些竞争威胁。在摩尔多瓦的例子中，关税超过了350%！如果每次这些奋发图强的经济体发现一丝获得进展的机会，禁止性关税就会打击它们，那么，它们将如何认识市场博弈的规则？应该很明显：这些企业并没有从事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比如，只要美国企业的效率不及东亚企业，就无法采取使它们具有竞争力所要求的措施。美国毫无顾忌地告诫发展中国家，要它们必须“面对痛苦”，但是它自己却不情愿面对痛苦。难怪越来越多人控拆其虚伪。如果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业率很高、具备失业保险系统、更广泛的安全网）说它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来保障它的工人，那么，对于那些失业率很高而且没有安全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这样的措施进行争论是多么更具强制性啊！

本书强调了全球化的很多方面——观点的全球化、知识的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在某个地方所说的话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知晓，某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暗示作用。在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同意发动新一轮贸易谈判时，如果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与他们向国会所说的话（他们主要是要说服国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存在不一致，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事就成为共知的信息。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

好消息是，如今对全球化问题的认知不断增加，不只是长期与之对抗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有发达国家。如今，即使是在金融界内部也开始认识到该系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很多人本身也受到巨大不稳定的伤害。这些金融家在很多情况下都积极地回应本书的观点；一些人（比如乔治·索罗斯）提出了他

们自己的改革提案。很幸运的是，7 国集团已有多位财政部长真诚地做出了要纠正这种不平衡的承诺。

美国银行和公司系统的问题——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美林证券公司和其他丑闻——已经使无拘无束和无规制的市场危险变得非常清楚。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式资本主义看起来是成功的。美国财政部长告诉一些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公司治理和会计系统。现在，这些国家并不是如此确信这就是它们应该遵循的正确模式。美国对这些丑闻的反应（认识到需要改善规制）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提倡的放松规制的颂歌形成鲜明对比。

本书足够幸运，它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超过 25 种），并获得了大量的评论。我很高兴，看起来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我的预定计划，甚至是那些绝对倾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贸易自由化的评论家，也没有挑战我提出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背后的知识不一致或者贸易政策的虚伪。长期以来，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都是关着门进行的，而且没有对它们进行相应的公共详细审查。我不同意这种方式，并希望引起争论。通过对比阅读很高兴：一些人对我的平衡意识加以称赞；但另外一些人却批评我缺乏平衡。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我是否公开“算账”，另一些人赞同我避免了深入研究的“算账”。当然，进行如此多的争论非常困难，虽然赢得了一些斗争，但同时在某些辩论中失败了，我对这些议题非常热心，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但这并不是一本“揭发内幕的书”。这是一本关于观点的书，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书，它是一曲戏剧，由现实中的人来当演员。对其中涉及的个人加以明确能够使所讨论的事件更真实。但是，如果这些特殊的个人不存在，那么其他人也会推行相同的政策：这里存在潜在的力量，这正是本书要揭示的。我试图避免将个人变为讨论的焦点，也就是说将其从争论中隔离出来，除了个别例外，我相信我成功了。对于让某人身陷争论之中，我深表歉意。

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主要批评是，虽然它是一个公共机构，但它并没有按照我们对公共机构的期望来运作。比如，在西方民主中，存在基本的

知情权（在《美国信息自由法案》中就有反映），但对国际经济组织来说，不存在这样的知情权。在美国和大部分其他西方民主社会中，存在着“旋转门”——个人能够迅速地从公共机构转移到那些与他们的公共服务有紧密联系的高薪私人部门。对此进行关注，不仅是因为旋转门可能提升利益冲突，而且还因为这些冲突有可能会破坏对公共机构的信心。某个高级官员可能给承包人一份合同合约，希望（更糟糕的是谅解）当这位高级官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承包人将会通过雇用他而对其进行回报。比如，如果掌管能源部的人来自石油公司后来又回到石油公司，就会担心他们制定的石油政策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和他们具有长期联系的石油公司的利益。政府也已经认识到存在巨大的代价——一些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优秀个人可能不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对旋转门进行强制限制的原因。即使不存在正式的限制，对此看法也非常敏感。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有金融机构（正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它们的利益服务）间的人员转移并不罕见。虽然这种转移是很自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利用这些人在金融方面的专长，而金融界希望利用这些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拥有的全球经验——但这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这些机构被普遍认为（尤其是被发展中国家认为）不仅反映了金融界的观点，而且代表它们的利益，本书对此进行关注也是很合理的。我注意到一个特殊情况，出现了一些对我是否正在打击个人的行为进行公共讨论。这并非我的本意。但不幸的是，它却将注意力从核心的政策议题中转移了。

最令人失望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我并不期望这些政府官员像本书指出的那样，但至少本书可能会激怒他们，让他们就我提出的很多议题进行争论。2002 年 6 月 28 日，当本书在世界银行发行时，在承诺要就实质性议题进行讨论后——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我并没成功地进行讨论——他们决定针对这一窘境进行批评，不仅针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已经开始看到真实的诺言），而且也针对参与活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击让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骄傲自大和对不同观点的蔑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情愿从事有意义的讨论，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对于那些参与论坛——在论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保

证这就是本质的讨论——部署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个例外，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狡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被发表了：在请求取消该讨论的记录（我相信这样的会议应该被记录，但是鉴于希望它能够为公开提供便利，我顺从了他们的条件）后，会议结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的评论传真和电邮给媒体。他们传真和电邮的内容不包括我的评论（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评论），也不包括其他评论员的评论（他们的意见和我的一致）。肯尼斯·罗格夫的评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成一封“公开的信”，它本身就是虚假的，我确信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这封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寄给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抓住传递信息的人，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已经做了什么。

同样还有很多事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埋伏”是半斤八两。首先，它总体上显得是很公开，这正是他们经常喜欢做的事。不是要对这些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而是要隐瞒他们的意图；其次，试图将这种讨论转变为混合了暗示和错误描述的片面的人身攻击。这是对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傲慢观点的最好阐释。

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信息，在遭受“伏击”后，本书的销售增加了。虽然一些新闻报道有很多主要关注我已受攻击的事实而不是对这些议题本身进行讨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我实现了我希望的目标：引起对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机构问题的关注。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使这一情况变得愈加清晰，即我们是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相互依赖就需要集体行动，要求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工作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健康、环境的全球风险，还是经济或政治的稳定性。但是，民主全球化意味着这些决定必须由世界上所有人全体参与来制定。我们这个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有在接受多国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有效。不幸的是，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管理的单边主义不断增加。如果要全球化有效，那么，这一点也必须改变。

2003 年 1 月　纽约

注　　释

第 1 章

1. 雅克·克拉克，1996 年 6 月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做了题为“The Economy Must Be Made to Serve People”的讲话。

2. 1990 年，有 27.18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低于 2 美元；1998 年，每天生活费用低于 2 美元的人口数目估计达到 28.01 亿——世界银行，*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0*，（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0），第 29 页。其他数据参见世界银行年度出版物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and World Economic Indicators*。健康数据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UNAIDS/WHO），*Report on the HIV/AIDS Epidemic 1998*。然而，对于这些数字，也存在一些争议，主要存在三个方面：在消除贫困方面的进展很小；几乎所有的进展都发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贫困的情况更为糟糕。在南部非洲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46% 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每天生活费用低于 1 美元）；在拉美地区和苏联，贫困（按照非常严格的定义）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16% 和 15%。

3. 见 Gerard Caprio，Jr.，et al. eds.，*Preventing Bank Crises：Lessons from Recent Global Bank Failures.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Co-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World Bank*，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和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机构联合主办的会议记录，电子数据交换发展研究（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8）。

4. 然而，存在大量对结构调整方案的批评，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方案进行审议时也提到它的许多缺陷。该审议包括三个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员工的内部审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员工，*The ESAF at Ten Years: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Reform in Low-Income Countries*，不定期论文156号，1998年2月12日）；独立审议者进行的外部审议（K. Botchwey 等，Report by a Group of Independent Experts Review: External Evaluation of the ESAF，[Washington, DC: IMF, 1998]；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提交的从这两项审议中吸取的教训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Distilling the Lessons from the ESAF Reviews [Washington, DC: IMF, 1998]）。

第2章

1. 据《人权观察》报道，孟吉斯图政体因为至少屠杀20万人，并迫使大约75万公民成为难民而遭受谴责。

2. 关于埃塞俄比亚这一插曲，存在更广泛的讨论，可参见 *Robert Hunter Wade*，"*Capital and Revenge: The IMF and Ethiopia*，" *Challege* 44（5）（2001年9月1日），第67－75页。

3. *T. Lane*，*A. Ghosh*，*J. Hamann*，*S. Phillips*，*M. Schulze-Ghattas* 和 *T. Tsikata*，"*IMF-Supported Programs in Indonesia, Korea, and Thailand: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专刊17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1月。

4. 以下关于限制性批评讨论的清单并不一定全面。见 M. Goldstein，"IMF Structural Conditionality: How Much Is Too Much，" 发表于2000年NBER会议的会议论文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修订版本，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10月，第19－21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质疑限制性，不仅质疑它的有效性，而且也质疑过多条件的一致性。比如，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trengthening Country Ownership of Fund-Supported Programs，" 2001年12月5日；世界银行，"*Assessing Aid: What Works, What Doesn't Work, and Wh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对于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更独立，存在相当多的争论。有证据表明（建立在跨国界关联分析的基础上）通胀率可以更低，但是却没有表明诸如增长或失业率这些真实变量可以得到改善。在这里，我的观点不是要解决这些争论，而是要强调，在存在诸多争论的情况下，特定的观点同样不应该被强制施加给该国。

第 3 章

1. 举例，参见 Peter Waldman 和 Jay Solomon，“How U. S. Companies and Suharto's Circle Electrified Indonesia-Power Deals That Cut in First Family and Friends Are Now Under Attack,”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3, 1998, p. 1。

2.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出市场本身能够导致有效的产出这一观点。《国富论》于 1776 年出版，而同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rard，1983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eth Arrow，1972 年获得获得诺贝尔奖）提供了正式的数学证明，详细解释了如果亚当·斯密的观点正确应该满足的条件。其基本结论表明，当信息不完全或者市场不完善时，竞争性均衡是无效的（在帕累托限制下），参见 B. Greenwald and J. E. Stiglitz,“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 (2) (May 1986), pp. 229 - 64。

3. 见 W. A. 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22 (1954), pp. 139 - 91, and S.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1995), pp. 1-28。

第 4 章

1. 其他一些对比的观点，见 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A Cautionary Fabl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994), and J. E. Stiglitz,“From

Miracle to Crisis to Recovery: Lessons from Four Decades of East Asian Experience," in J. E. Stiglitz and S. Yusuf, eds., *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ashington, DC, and NewYork: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09 - 26; or J. E. Stiglitz,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 (2) (August 1996), pp. 151 - 77. See also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ice Amsden,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Masahiko Aoki, Hyung-Ki Kim, Okuno Okuno-Fujiwara, and Masahjiro Okuno-Fjujiwara,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r an extremely readable account of the East Asia crisis, see Paul Blustein, *The Chastening: Inside the Crisis that Rock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Humbled the IMF* (New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More technical discussions are provided, e. g., in Morris Goldste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Cures, and Systemic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1998), and Jason Fur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presented at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3, 1998, vol. 2, pp. 1 - 114.

2. 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受到影响，因此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援助，这与其在墨西哥最近一次危机中慷慨解囊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也引起泰国巨大的怨恨。尤其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泰国给美国提供强大支持后，泰国认为它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

3. 参见 E. Kaplan 和 D. Rodrik，"Did the Malaysian Capital Controls Work?,"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t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工作论文 no. W8142, Cambridge, Mass., 2001 年 2 月。在 Rodrik 教授的个人网页上有可能找到这篇文章，网址为 http://ksghome.harvard.edu/~.drodrik.academic.ksg/papers/html)。

4. 韩国收到了55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收到330亿美元，泰国收到170亿美元。

5. See J. Sachs, "The Wrong Medicine for Asi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1997, and "To Stop the Money Panic: An Interview with Jeffrey Sachs," *Asiaweek*, February 13, 1998.

6. 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为241.3亿美元；1997年，外商直接投资为1 702.58亿美元；1998年外商直接投资为1 709.42亿美元；1990年有价证券投资额为39.35亿美元，1997年上升到791.28亿美元，1998年为552.25亿美元。银行和与投资有关的贸易在1990年为145.41亿美元，1997年为545.07亿美元，在1998年为415.34亿美元。全部私有资本流动1990年为426.06亿美元，1997年为3 038.94亿美元，1998年为2 677.00亿美元。来自世界银行，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0。

7. 有关涉及金融和银行危机的因素，可参见：D. Beim 和 C. Calomiris,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s* (New York: McGrawHill/Irwin, 2001) 第7章；A. Demirguc-Kunt 和 E. Detragiache, *The Determinats of Banking Crises: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MF Staff Papers, vol. 45, no. 1 (1998年3月)；G. Caprio 和 D. Klingebiel, "Episodes of Systemic and Borderline Financial Crises," World Bank, 1999年10月；世界银行成员，"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8/99: Beyond Financial Crisis," 世界银行，1999年2月。

8. 迈克尔·康德苏 (M. Camdessu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Fund,"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账户自由化研讨会上的评论，华盛顿特区，1998年3月9日。

9. 美国2000～2001年的衰退也被认为是由于市场的过度繁荣，对互联网和电信的过度投资部分地导致股票价格飙升而引起的。即使不存在金融机构和货币政策的管理不善，经济也会出现显著的波动。

10. 围绕韩国的争论主要是有关资本市场自由化以及在事情错误时随之而来的救援行动的更广泛的争论，正如他们必然做的那样，该争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内部几乎完全是关着门进行的。比如，当我们准备进行地区

贸易协议和7国进行会谈时，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一次偶然的机会（1995年墨西哥危机），当美国财政部将救援计划提交给国会时，国会拒绝了该提案，财政部又返回到以往的关着门的程序，策划出在美国国会批准下的救援行动方案，并强制其他政府采纳。（以一种在欧洲许多地区产生极大敌意的方式——对美国财政部强制实施的政策的所有分歧在随后几年慢慢地消失，虽然在各种背景下，美国的立场遭到微妙的反对，例如，国际货币组织负责人的选择，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但是美国财政部看起来几乎对其强于国会的能力而狂欢。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April30, 1998*（华盛顿特区）第25页，有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对亚洲危机期间需要采取严格的财政政策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财政不平衡。有趣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0年相似的报告（第14页）中意识到，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从危机中复苏的主要原因。同时可参见：T. Lane、A. Ghosh、J. Hamann、S. Phillips、M. Schulze-Ghattas 和 T. Tsikata，"IMF-Supported Programs in Indonesia, Korea, and Thailand: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ccasional Paper17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1月。

12. Stanley Fischer，"Comment & Analysis: IMF—The Right Stuff. Bailouts in Asia Are Designed to Restore Confidence and Bolster the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Times，1997年12月16日。

13. 过去多年中，我从未听到过国际货币组织的职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那些拥有高杠杆作用企业的国家提高利率的战略进行前后一致的辩护。我所听到的唯一好的辩护来自大通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 John Lipsky，他非常明确地关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他观察到国内商人通常将大量资金存到国外，但却在国内借钱。国内贷款的高利率将"迫使"他们取回部分国外资金用以偿还其贷款和避免支付如此高的利率。这一假设依然没有得到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诸多处于危机的国家，净资本是按照相反的方向流动的。很多商人假定他们只是不能够被"强迫"支付高利率和必须进行再谈判。实际上，高利率根本不可信。

14. 财政部主管官员 Esiuke Sakakibara 在他的演讲“The End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中相继阐述了自己对这些事件的解释，该演讲于 1999 年 1 月 22 日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进行。

15. 有关进一步的细节，见 E. Kaplan 和 D. Rodrik，“Did the Malaysian Capital Controls Works?,” op. cit.

16. 在危机期间，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出与其他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以及地区相似的格局。虽然如此，这一证据对于得出可靠的结论依然显得太粗浅。为了把资本控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和其他影响因素分离出来，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经济研究（和更多的数据）。

第 5 章

1. 本章和以下两章的大部分内容建立在更广泛地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基础之上。参见以下的论文：J. E. Stiglitz，“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in Boris Pleskovic and Joseph E. Stiglitz，eds.，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2000），pp27 - 56；J. E. Stiglitz，“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Corporate Governance Failures in the transition，” in Pierre-Alain Muet and J. E. Stiglitz，eds.，*Governance，Equity and Global Markets，Proceedings from the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Europe*，June 1999（Paris：Conseil d'Analyse economique，2000），pp. 51 - 84. Also published in Challenge 42（6）（November/December 1999），pp. 26 - 67. French version：“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Les defaillances du gouvernement d'entreprise dans la transition，” *Revue d'Economie du Developpement* 0（1 - 2）（June 2000），pp. 33 - 70. 另外，参见：D. Ellerman 和 J. E. Stiglitz，“New Bridge Across the Chasm：Macro-and Micro-Strategies for Russia and other Transitional Economies，” *Zagreb In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3（1）（2000），pp. 41 - 72，and A. Hussain，N. Stern，and J. E. Stiglitz，“Chinese Reform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J. Hammond and Gareth

D. Myles, eds., *Incentives,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s, Papers in Honour of Sir James Mirrle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43 - 77。

有关俄罗斯转型最优秀的新闻报告可参见：Chrystia Freeland, *Sale of the Century* (*New York: Crown*, 2000)；P. Klebnikov, *Godfather of the Kremlin, Boris Berezovsky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2000)；R. Brady, *Kapitalizm: Russia's Struggle to Free Its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and John Lloyd, "Who Lost Russi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15, 1999。

大批政治科学家进行了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支持了我在此提供的解释。可特别参见：A. Cohen, *Russia's Meltdown: Anatomy of the IMF Failur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s No. 1228, October 23, 1998; S. F. Cohen, *Failed Crusad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P. Reddaway, and D. Glinski, *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ts Institute of Peace, 2001)；Archie Brown and Lillia Fedorovna Shevtskova, eds., *Gorbachev, Yeltsin and Putin: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Russi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and Jerry F. Hough and Michael H. Armacost, *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1)。

毫不奇怪，很多改革者提供了与这些列示的观点明显不同的报道，虽然这些解释在早期更为频繁，尽管那时对转型充满更多的希望，但很多文章的观点看起来与随后的事件并不一致。可参见：Anders Aslund, *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or Richard Layard and John Parker, *The Coming Russian Boom: A Guide to New Markets and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For more critical perspectives, see Lawrence R. Klein and Marshall Pomer, eds. (with a foreword by Joseph E. Stiglitz), *The New Russia: Transition Gone Awry*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本章所引用的数据大部分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various years）。

2. Jnnine R. "Wedel, Aid to Russia,"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3（25）, 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 and Institute Policy Studies, September 1998, pp. 1 -4。

3. 进一步的阅读，可参见：P. Murrell, "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4）（1991）, pp. 59 -76。

4.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Approves Augmentation of Russia Extended Arrangement and Credit UnderCCFF, Activates GAB," Press release no. 98/31, Washington DC, July 20, 1998。

5.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确没有忽视这一点。实际上，一些人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试图阻止贬值的选择，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将贬值的代价提高到该国不愿意进行贬值的程度。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打错了算盘。

6. 当然，8 月 17 日俄罗斯政府的宣言更多，但这些都是我们目标的核心内容。另外，俄罗斯政府实施了临时资本控制，例如禁止非俄罗斯居民对短期卢布资产进行投资以及给予外汇信贷和保险支付 9 天的延期偿付期。俄罗斯政府也宣布将支持由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建立支付联盟以维持支付流动性；并且颁布法规以保证给政府雇员和银行人员进行及时的偿付。有关细节可参见 www. bisnis. doc. gov/bisnis/country/980818ru. htm，该网页提供了 1998 年 8 月 17 日两份宣言的原始文本。

7. 见转型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y in Transition），即：http：//www. iet. ru/trend/12 -99/3. e. htm。

8. 见 Chrystia Freeland, op. cit. ; Richard Layard and John Parker, op. cit. ; and Anders Aslund, op. cit。

9. 有关对俄罗斯经济强加的易货贸易的含义和代价，可参见：C. G. Gaddy and B. W. Ickes, "Russia's Virtu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77（September-October 1998）。

10. 转型看来并没有惠及穷人。例如，就处于最底层的人们其收入所占的比例来说，1998 年俄罗斯的比例为 8.6%，1999 年乌克兰的比例为 8.8%，1996 年哈萨克斯坦的比例为 6.7%（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

11. 利用测度不平等的标准方法（基尼系数），到 1998 年，俄罗斯的不平等水平是日本的两倍，比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高出 50%，其不平等水平相当于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的水平。与此同时，那些采取渐进性政策的国家，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它们能够将其不平等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匈牙利的不平等水平甚至低于日本；而波兰的不平等水平低于英国。参见 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A Millienial Perspective*（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1）。

12. 见 J. E. Stiglitz，“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op. cit。

13. 例如，如果某个国家在国内尚未建立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之前就开始实施资本市场自由化——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那样，它实际上导致资本外逃；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尚未建立有效的市场之前就对其企业开始私有化，即将所有权或控制权交到最近退休的人手中，那么就不会存在长期财富创造的动机，而存在资产掠取的动机。如果某个国家在建立规制和法制架构以保证竞争之前就开始私有化，那么就存在创造垄断的动机，而且存在阻止建立有效竞争机制的政治动机。如果某个国家在联邦体系下进行私有化，但是却给予州和地方政府随意增加税收和规制的自由，那么该国就没有消除公共机构寻租的权力和动机，该国根本没有真正实现私有化。

14. 关于科斯定理本身，可参见 R. H.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960），pp. 1 - 44。该定理只有在不存在交易成本、不存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科斯自己意识到这些限制条件的力量。此外，完全清晰地明确产权永远不可能，尤其对转型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即使在发达工业国家，产权也受到对环境的关心、工人权利、分区制等的限制。虽然法律试图尽可能使这些问题变得清晰，但是频繁地引起争论，不

得不通过各国法律程序来解决。幸运的是，在既定的“法律规则”下，总体上相信这是按照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执行。但在俄罗斯并不是这样。参见：A. Shelifer and R. Vishny,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该文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旦赋予了产权，那么就具备建立法制规则的强大力量。关于科斯定理和其在合适的私有化战略中发挥的明智作用更广泛的讨论，可参见：J. E. Stiglitz, *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 J.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op. cit; J. E. Stiglitz, *Quis Custodiet Pisos Custodes*, op. cit.; and J. Kornai, "Ten Years After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 Author Self-Evaluation," in Boris Pleskovic and Nicholas Stern, eds.,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pp. 49 - 66。

第 6 章

1.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虽然这是假定的辩护，但它甚至也是可疑的。寡头执政者并没有利用这些资金支持叶利钦再次当选。但是他们的确向他提供了其所需的组织基础（和电视台支持）。

2. 详情可参见：M. Du Bois and E. Norton, "Foiled Competition: Don't Call It a Cartel, But World Aluminum Has Forged a New Order,"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9, 1994。这篇文章指出 O'Neill 和 Bowman Cutter（当时任克林顿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对达成交易至关重要。俄罗斯得到的好处就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保证的相当于 2.5 亿美元的权益投资。美国铝业管理者们尽其所能照顾自己的形象，以避免反托拉斯检查；并且，根据这篇文章所说，包括 3 名反托拉斯律师在内的美国政府起草了这份协议，协议中他们谨慎地含糊其辞，以使司法部满意。

1995 年，随着全球对铝需求的增加以及强迫俄罗斯生产者遵循卡特尔协议的难度逐渐增大，卡特尔开始土崩瓦解。参见 S. Givens, "Stealing an Idea from

Aluminum," *The Dismal Scientist*, July 24, 2001。另外，美国铝业公司和其他美国铝生产商被控告共谋限制贸易；但是该案件在法院上被撤销了。参见 J. Davidow, "Rules for the Antitrust/Trade Interface," Miller & Chevalier, September 29, 1999, 见网页：www. ablondifoster. com/library/article. asp? pubid = 143643792001&groupid = 12。有关与此观点相似的社论，可参见 *Journal of Commerce*, February 22, 1994。

事情并没有结束，2000 年 4 月，新闻爆料两个俄罗斯寡头执政者（Boris Berezovsky 和 Roman Abramovich）如何成功地形成私人垄断，成立了全球第二大铝业公司（仅排在 Alcoa 之后），控制俄罗斯每年铝产量的 75% ~80%。参见 "Russian Aluminum Czars Joining Forc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00 年 4 月 19 日；A. Meier 和 Y. Zarakhovich, "Promises, Promises," *Time Europe* 155 (20), 2000 年 5 月 22 日。也可参见 R. Behar, "Capitalism in a Cold Climate," *Fortune* (June 2000)。Despite accounts to the contrary, Boris Berezovsky vehemently denies any wrongdoingin relation to Russia。

第 7 章

1. 在《纽约时报》中，克劳特科（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写道："但是，我们国家的成功还有另外同样重要的方面。波兰的确没有指望获得国际金融界的认可。相反，我们希望波兰公民赞同这些改革。因此，工薪和养老金得到支付并且针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另外还有失业福利。在与国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进行艰难的谈判时，我们尊重自己的社会。" George W. Kolodko, "Russia Should Put Its People First," *New York Times*, 1998 年 7 月 7 日。

2. 波兰也表明某个国家能够维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不仅阻止资产被掠取，而且能够真正地提高生产率。在西方国家，生产率的最大收益不是与私有化有联系，而是与公司化相关，例如，在他们依然保持国有企业的同时对企业实施强硬的预算约束和商业实践。参见 J. Vickers 和 G. Yarrow, Privatiza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第 2 章；J. Vickers 和 G. Yarrow,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5（2）（Spring 1991），pp. 111 - 32。

3. 1990 年，中国的净私有资本流入为 80 亿美元。到 1999 年，中国的资本流入飙升到 410 亿美元，是同一年俄罗斯吸引资金数目的 10 倍多（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

4. 如参见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From Plan to Market*（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June 1996）。

5. 俄罗斯激进改革者对他们的失败最好的辩护是：我们并不知道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违反现存事实的情况。其他国家可以获得的选择但俄罗斯却不能获得。在激进改革者接管时，像中国那样由中央指导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崩溃了。由当权人物（即现有管理者，无论如何，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出现了）对企业进行接管就是替代选择。相反，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使其不按照已经实施的方式来引导私有化和自由化战略更为重要。中央权力的崩溃应该使将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自然资源企业）分解为竞争性的部分更为容易并且更为重要，这将造成对经济权力更大的扩散。与此同时，在收益产生的来源被出卖之前，保证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将会更迫切。中国的改革涉及经济决策制定权的大量转移。替代的战略最终可能并没有效果，但很难相信这些问题会变得更糟。

第 8 章

1. 参见：S. Fisher，“On the Need for an 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pectives* 13（1999），pp. 85 - 104。费舍尔像许多提倡最后出借人观点的其他人一样，将某个国家内部中央银行的作用和国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进行了类比。但是，该类比是具有欺骗性的。在一个国家内部要求最后出借人是基于存款的先到先得原则，该援助造成了挤兑的可能性——参见：D. Diamond and P. Di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1983），pp. 401 - 19。尽管那样，如同美国强力表现出的经验一样，这依然无法避免挤兑。只有存在强力的银行规制和存款保险，最后出借人才能应对

挤兑。并且，没人——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热心的支持者也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提供任何类似的存款保险。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僵化地实施很多政策使很多国家在放弃自己的诸多规制权力时持有戒心（即使能够定义规制权力的合适领域，即使国家主权问题并不极为重要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规制部门经常认为，设计很好的债务偿还期延展是宏观经济管理极其重要的部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反对延长债务偿还期。在其他地方，我指出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常不能够考虑其合成的基本谬误：存在系统问题时，当每个银行都不能够增加额外的资本时，它就会收回它的贷款，没有债务偿还期的延展也许弄巧成拙，造成更广泛的违约行为，进一步加深经济衰退。

2. 这就是我称做的“超级 11 章”。详情可参见：M. Miller and J. E. Stiglitz, “Bankruptcy Protection Against Macroeconomic Shocks: The Case for a ‘Super Chapter 11,’”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Capital Flows, Financial Crises, and Policies, April 15, 1999; and J. E. Stiglitz, “Som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Bankruptcy,” in *Governance, Equity and Global Markets: Proceedings from the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Europe*, June 1999 (Paris: Conseil d'Analyse economique, 2000), pp. 605 - 20。

3. 虽然很难说是因为缺乏透明度而引发危机，但缺乏透明度的确具有巨大的成本。一旦危机发生，信息的缺乏意味着债权人将不计后果地从所有借款人手中回收资金。债权人只是缺乏必要的信息将好的和坏的借款人区分开来。

第 9 章

1. 公司治理这个词是指决定股东（包括小股东）。在虚弱的公司治理情况下，经理可能会有效地窃取股东的利益，并且大股东也可能有效地窃取小股东的利益。

2. 世界银行的研究，包括与我的前任 Michael Bruno（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爱尔兰中央银行的行长）合作的研究，有助于提供这一视角的经验性证据。参

见：Michael Bruno and W. Easterly, "Inflation Crise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1 (1998 年 2 月), pp. 3 - 26。

3. 经济学家已经分析了此类货物的本质属性；向增加的个人消费者提供该种货物的边际成本很小或者为零，而且排除他们获益的成本是巨大的。

4. 经济学家已经深度地分析了为什么这样的市场可能不存在，例如，作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结果，通常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透明度的呼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其本身缺乏开放度而长期受到批评；美国财政部则是美国政府最保密的机构，我发现即使是白宫也经常为他们所获得的信息而大伤脑筋。

6. 对透明度的认识只体现于，国内的人们能够决定的一些事情，诸如学校什么时候开学什么时候放假等。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机构绝对不会犯错的立场使其要改变该立场非常困难。在这个例子中，资深人士可以试图板着脸表面上宣称，长期以来他们已经警告过与资本市场自由化相关的风险。这种主张充其量是无诚意的（并且它本身也破坏机构的可信性）。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些风险，就会使他们的政策姿态显得更不可原谅。但是，对那些屈服于他们压力的那些人来说，这些担心充其量是微小的告诫，是以后再考虑的问题；他们被告诉要继续进行，继续快速地进行自由化。

8. 正如我们在第 8 章提到的，多重目标——和不愿意公开讨论委任（反映了金融界的利益）中默许的改变——导致很多知识不一致性的实例；这又反过来使改革的连续进行更加困难。

9. 正如其名，临时信贷最高限额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与危机相联系的）自动提供了信贷。

10. 存在更深刻的问题。虽然临时信贷最高限额保证在危机出现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新的资金，但是，它不能阻止其他短期贷款不会以新的债券来替代旧的债券；银行愿意承担的风险大概已经考虑了可能在临时信贷最高限额工具下产生的新贷款。因此，在危机情况下获得的资金净供给可能没那么大的影响。

11. 这些条款允许债权人在特定环境下要求支付——一般情况下恰好是其他债权人正在回收资金的情况。

12. 在欧洲，诸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特定的税收提案上，即所谓的托宾税——有关跨国金融交易。比如，可参见：H. Williamson，“Köhler Says IMF Will Look Again at Tobin Tax，” *Financial Times*，2001 年 9 月 10 日。如今有大量的文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该税收进行分析。可以参见网址：www. ceedweb. org/iirp/biblio. htm。有趣的是，前财政部长撰写的一篇文章可以用来解释支持该税收的原则——L. H. Summers and V. P. Summers，“When Financial Markets Work Too Well：A Cautious Case for a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Tax，”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aearch* 3（1989），pp. 261 - 86。但是存在重要的执行问题，尤其是在该税收并没有被普遍强制实施的世界中，而且，该世界中，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复杂的金融工具变得非常流行。也可参见：J. E. Stiglitz，“Using Tax Policy to Curb Speculative Short-Term Trad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3（2/3）（December 1989），pp. 101 - 15. For the original proposal，see J. Tobin，“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4（1978），pp. 153 - 59，and B. Eichengreen，J. Tobin，and C. Wyplosz，“Two Cases for Sand in the Wheel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Economic Journal* 105（May 1995），pp. 162 - 72. In addition，see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M. ul Haq，I. Kaul，and I. Grunberg，eds.，*The Tobin Tax：Coping with Financial Volatility*（London and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3. 虽然东亚危机后期，这些提议受到一定的关注，但在阿根廷危机中，涉及公共债务时，这种关注被转变成至高无上的债务重建机制——而根本不考虑当前的危机涉及更多的是私人而不是至高无上的债务。

14.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个国家对外国银行的开放可能不会导致更多的贷款，尤其是对中小型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需要强加要求，与那些在《美国社会再投资法案》中强制的要求类似，以保证在它们开放市场时，它们的小商人不会忍受资本之饥。

15. 债务危机在 1981 年打击了阿根廷，1982 年打击了智利和墨西哥，

1983 年打击了巴西。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内，它们的产出增长率一直较低。

16. 在日本的压力下，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实际上早早地就开始了重估，并反映在世界银行 1993 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出版物中，即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思维的变化反映在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即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比如，1997 年的报告重新评估了政府的作用；1998 年的报告关注于知识（包括技术的重要性）和信息（包括与不完全信息相关的市场不完善）；1999 年和 2001 年的报告强调机构的作用，不仅仅是政策；2000 年的报告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观察。

17. 毫不奇怪，世界银行依然没能如其应该的那样认真考虑对贸易全球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评，可参见：F. Rodríguez 和 D. Rodrik，“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Ben Bernanke and Kenneth S. Rogoff 等，in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r NBER, 2001）。无论这一立场的知识价值如何，它与美国及 G-7 政府的“官方”立场——贸易是好的——背道而驰。

18. 这一转变存在很多方面——包括接受变化（认识到事情不能按照世世代代的方式来做），接受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接受企业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我深信，在正确的条件下，这些改变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对于“作为转变的发展”的观点更广泛的表达，参见：J. E. Stiglitz,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1998 年 10 月 19 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第 9 次普雷维什[⊖]讲座上的演讲。

19. 在很多国家，债务服务超过出口额的 1/4；也有很多国家，债务服务几乎达到出口额的一半。

20. 这样的债务有时是指“恶意逃债”。

21. 重要的例外是詹姆斯·沃尔芬森，他已经在世界银行推动了文化创意。

⊖ 劳尔·普雷维什，阿根廷经济学家，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经济发展的国际论战中一直处于重要位置，人们经常将其称为“拉美的凯恩斯”。——译者注

22. 最近，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断地被推动要与标准（比如银行标准）一致，在制定这些标准时，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发挥作用。事实上，这时常被宣称是为改革全球经济结构努力中少有的“成就”之一。无论它们在提高全球经济稳定性中做得多么好，它们发生的方式已经在发展中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译者后记

近几年，全球化是各国政界、经济界、媒体及学术界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全球化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并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大力弘扬。社会各界对经济全球化有着不同的认知：乐观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国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是一种社会进步；悲观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化是陷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叶，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勃然兴起。可以说，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已越来越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其本身也已全球化了”。

作为当代国际经济学界一位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等多门学科和领域中都有开拓性贡献；他不仅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担任过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具有丰富的政策制定经验，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本书可以看做是斯蒂格利茨为其在华盛顿的工作岁月写下的一本回忆录。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贯批评者，本书中，斯蒂格利茨依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时期的政策强烈抨击，“75年前凯恩斯已经说过，全球货币储备存在问题，他认为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会有所作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发挥作用。”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过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很多倡议，但一旦经济恢复，改革议题就被束之高阁。与此同时，斯蒂格利茨是认可全球化的，他认为

“全球化潜在的优势是无穷的”，但是却不能否认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他指出，“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在于游戏的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而发达国家却按照自身利益制定了这些规则，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确保金融寡头和大公司的特殊利益。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全球化。”

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支持下，我们有机会将斯蒂格利茨的巨著《全球化及其不满》翻译成中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研究”（项目号：07&ZD053）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三期项目（项目号：73300027）的中期研究成果。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虽然对某些专业术语、词汇或短语的翻译要翻阅多本辞典、工具书，或者在互联网上检索和查阅，但是鉴于译者水平有限及时间仓促，本书翻译过程中出现错误和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学界前辈同仁指正。

经济学，让你更快乐

HZ BOOKS
华章经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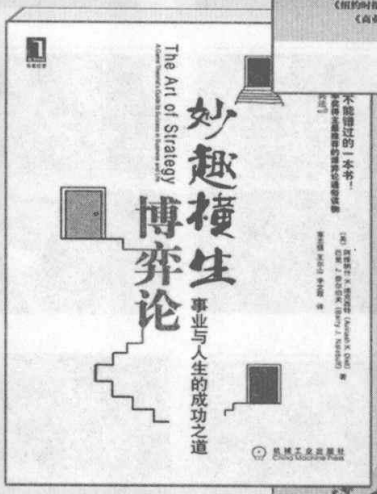
阐明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给出最客观公正的解释
澄清广为流行的误解
告诉读者全球经济的真相

ISBN：978-7-111-28652-3
作者：（美）纳瑞蒙·贝尔拉夫什
定价：38.00元



颠覆“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观点
有趣·有理·有益

ISBN：7-111-26495-8
作者：迈克尔·赫勒
定价：36.0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最推荐的博弈论通俗读物

ISBN：978-7-111-27693-7
作者：（美）阿维纳什 K.迪克西特 等
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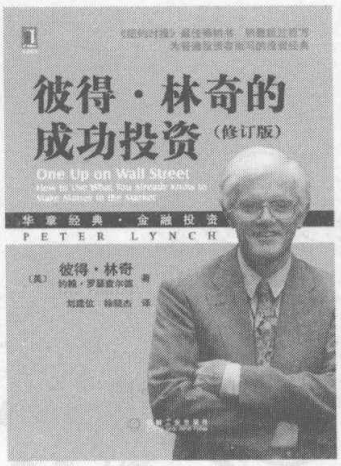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经济财富的守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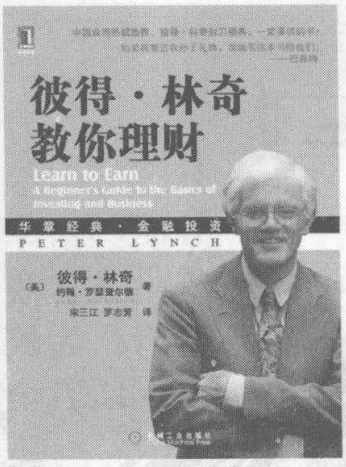
ISBN：978-7-111-28445-1
作者：安奈特·舍尔佛
定价：35.00元

HZ BOOKS
华章经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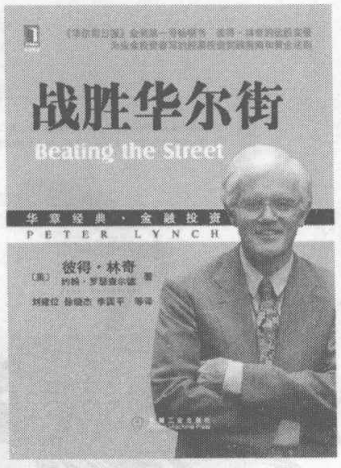
阅读经典 卓越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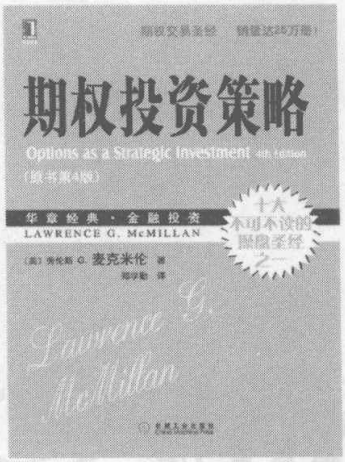
978-7-111-20050-0 38.00元
作者：彼得·林奇 约翰·罗瑟查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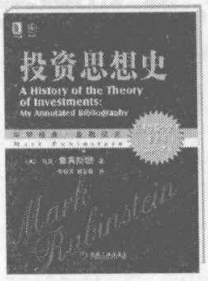
978-7-111-28405-5 36.00元
作者：彼得·林奇 约翰·罗瑟查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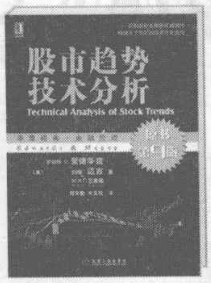


978-7-111-21894-4 48.00元
作者：彼得·林奇 约翰·罗瑟查尔德



978-7-111-29194-7 128.00元
作者：劳伦斯 G. 麦克米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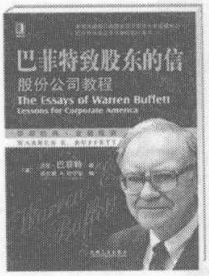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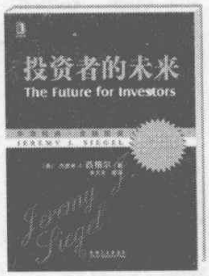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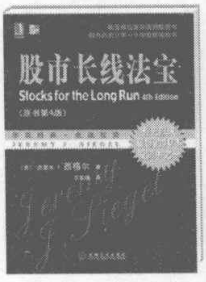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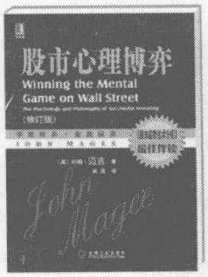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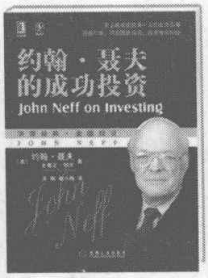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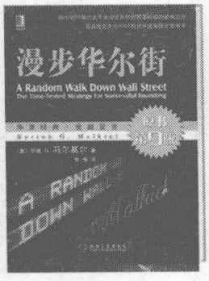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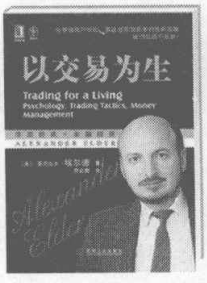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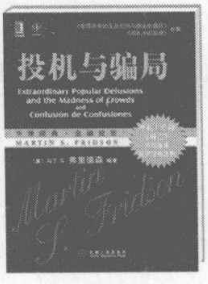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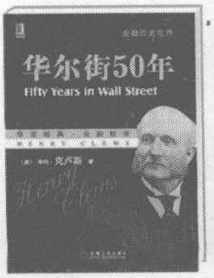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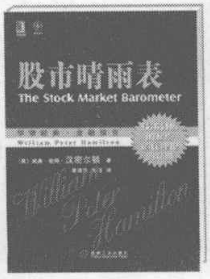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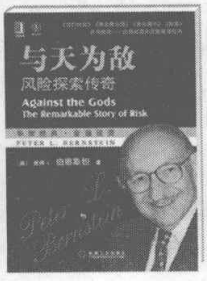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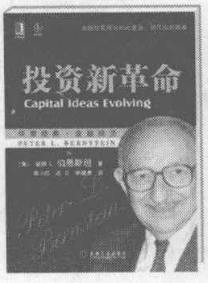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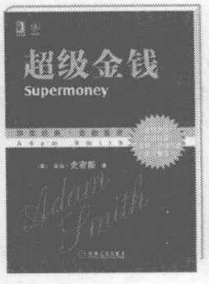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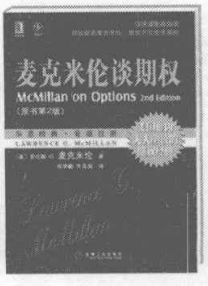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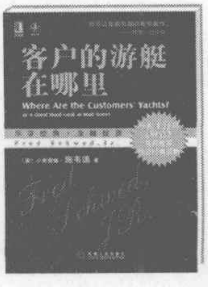












HZ BOOKS
华章经管

华章书院俱乐部反馈卡

活动时间：2010年1月——2010年7月

每月从反馈卡中抽取10名幸运读者，
可免费获得由KeyLogic（凯洛格咨询）提供价值
200元“哈佛管理导师”双周学习体验卡一张。
（可体验学习“哈佛管理导师”中
《战略思维》与《衡量业务绩效》两门课程）

欢迎登陆www.hzbook.com及www.keylogic.com.cn
了解更多信息

华章经管博客已开通，欢迎留下宝贵意见与建议 http://blog.sina.com.cn/hzbook

◎反馈方式◎

网络登记：
登陆 *www.hzbook.com*，在网站上进行反馈卡登记。

传　真：
将此表填好后，传真到 010-68311602、68995261

邮　寄：
将填好的表邮寄到：100037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南街1号309室　闫 南

个人资料（请用正楷完整填写，并附上名片）

姓名:_____ 性别:☐男 ☐女 年龄:___ 联系电话:_____ 手机:_____

E-mail:_____ 邮政编码:_____ 传真:_____

通讯地址:_____ 就职单位及部门:_____

职　务: ☐董事长/董事 ☐总裁/总经理 ☐副总裁/副总经理 ☐高级秘书/高级助理
☐职员 ☐政府官员 ☐专业人员/工程人员 ☐其他（请注明）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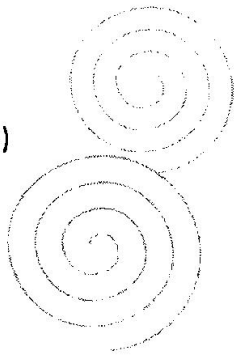
学　历: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研究生以上

所购书籍书名: _____

现在就填写读者反馈卡，成为华章书院会员，将有机会参加读者俱乐部活动！

所有以邮寄，传真等方式登记，并意愿加入者均可成为普通会员，并可以享受以下服务。

- 每月3次的免费电子邮件通知当月出版新书
- 共同享有读华章论坛会员交流平台
- 享受华章书院定期组织的各种活动
  （包括会员联谊活动专家讲座行业精英论坛等）
- 优先得到读华章书目
- 俱乐部将从每月新增会员中抽取10名，
  免费赠送当月最新出版书籍1本
- VIP会员享受全年12本最新出版精品书籍阅读



1. 您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本书？

   □朋友介绍 □会议培训 □书店广告 □报刊杂志 □其他_____

2. 您对本书整体评价为？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其他，原因_____

3. 您的阅读方向？（类别）

   _____

4. 您对以下哪些活动形式最感兴趣？

   □大型联谊会 □专业研讨会 □专家讲座 □沙龙 □其他_____

5. 您希望华章书院俱乐部为会员提供怎样的增值服务？

   _____

6. 您是否愿意支付500元升级为VIP会员，享受全年12本最新出版精品书籍阅读？

   □愿意 □不愿意，原因_____

读华章俱乐部反馈卡